

陈独秀书信集

水如编

新华出版社



2 022 0925 2

陈独秀书信集

陈独秀（1897—1942）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启蒙思想的传播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一生从事革命斗争，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书信集是研究其思想、生平的重要资料。本书收录了陈独秀生前所写的书信，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本书由水如编，共收书信 168 封，分上下两册。上册为 1915—1927 年，下册为 1927—1942 年。本书是研究陈独秀思想、生平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重要文献。

陈独秀书信集

水如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875印张 插页4张 382,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0082-9/D·14

统一书号：3203·137 定价：8.80元

(内部发行)

0
9
美

编者说明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唯其如此，以致学术界专门做为“陈独秀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十分活跃。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迫切需要参考有关的文献资料。出于便利研究工作者参考的考虑，编者将散见于书刊之中及部分尚未刊布过的陈独秀往来书信，汇集编订为这本《陈独秀书信集》，贡献于广大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

书中辑录了陈独秀往来书信353篇，其中属于从书刊中辑录的有309件，属于初次刊出的信稿有44件。所辑录的信件，在编排上均以时间先后为序，凡原信有明确的写信时间的，按写信时间顺序编排，原信未注明写信时间的，以发表时间先后编排；辑录的信件，一律照录原文，遇有脱、误之字需要补、正时，补字以（）标明，正字以〔〕标明，属于原信残缺或辨认不清的字，以□表示，原信无标点的加了标点，并对一些信件中提到的人名、事件，视必要做了简略注释。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一位既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本书原文照录他的信件，未加任何评注，因而在参考使用时，应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本书编者对于陈独秀问题素无研究，加之水平有限，其中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研究工作者批评指正。

编者识

1987. 8. 30.

朋升老兄左右

前奉七月八日惠書，尚未作復，茲又
接續七月廿四日來示，內附者省洋千元兌
票一紙，要收勿念，屢承吾兄承念鄙
况，既感且慙，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
弟生活一向簡單，月省北大兩元，來三百
元，差可支持，乞吾兄等勿吝畫懷，
前承兄轉，向蜀籍尹君覓一取蜀石經拓片
已有所得未，敵機日來，崇皇成都，尊
居在郊外，想平安也，此祝
健康，弟楊秀手
八月六日
嫂夫人均此



一九三七年的陈独秀



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之像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1917—1919)

目 录

编者说明	(1)	陈独秀答李大槐	(10)
		李大槐致陈独秀	(12)
一九一〇年		陈独秀答吴勤	(13)
陈独秀致苏曼殊	(1)	吴勤致陈独秀	(13)
		陈独秀答李平	(14)
一九一四年		李平致陈独秀	(14)
陈独秀致《甲寅》记者	(2)	陈独秀致吕君	(15)
《甲寅》记者答陈独秀	(3)	陈独秀答穗	(16)
		穗致陈独秀	(16)
一九一五年		陈独秀答张永言	(16)
陈独秀答章文治	(4)	张永言致陈独秀	(17)
章文治致陈独秀	(5)	陈独秀答沈伟	(18)
陈独秀答王庸工	(5)	沈伟致陈独秀	(19)
王庸工致陈独秀	(7)		
陈独秀答李平	(7)	一九一六年	
李平致陈独秀	(9)	陈独秀答张永言	(20)
陈独秀答王珏	(9)	张永言致陈独秀	(21)
王珏致陈独秀	(10)	陈独秀答姚孟宽	(22)

姚孟宽致陈独秀	(22)	T · M · cheng	(48)
陈独秀答辉邈	(23)	T · M · cheng致	
辉邈致陈独秀	(25)	陈独秀	(49)
陈独秀致胡适	(26)	陈独秀答毕云程	(49)
陈独秀答汪叔潜	(27)	毕云程致陈独秀	(50)
汪叔潜致陈独秀	(28)	陈独秀答莫芙卿	(51)
陈独秀答沈慎乃	(30)	莫芙卿致陈独秀	(52)
沈慎乃致陈独秀	(31)	陈独秀答陈蓬心	(54)
陈独秀答舒新城	(32)	陈蓬心致陈独秀	(54)
舒新城致陈独秀	(32)	陈独秀答毕云程	(55)
陈独秀答毕云程	(33)	毕云程致陈独秀	(56)
毕云程致陈独秀	(33)	毕云程致陈独秀	(57)
陈独秀答陈恨我	(34)	陈独秀答常乃德	(58)
陈恨我致陈独秀	(35)	常乃德致陈独秀	(61)
陈独秀答程师葛	(36)	陈独秀答王统照	(64)
程师葛致陈独秀	(37)	王统照致陈独秀	(65)
陈独秀答胡适之	(39)	陈独秀答孔昭铭	(66)
胡适之致陈独秀	(40)	孔昭铭致陈独秀	(67)
陈独秀答王庸工	(43)		
王庸工致陈独秀	(44)		
陈独秀答毕云程	(44)	陈独秀答吴虞	(69)
毕云程致陈独秀	(45)	吴虞致陈独秀	(69)
陈独秀答胡适之	(46)	陈独秀答李平	(71)
陈独秀答一民	(47)	李平致陈独秀	(71)
一民致陈独秀	(47)	陈独秀答褚葆衡	(72)
陈独秀答		褚葆衡致陈独秀	(72)

一九一七年

陈独秀答		傅桂馨致陈独秀	(106)
T·M·cheng	(73)	陈独秀答汪启疆	(107)
T·M·cheng		汪启疆致陈独秀	(108)
致陈独秀	(73)	陈独秀答常乃德	(109)
陈独秀答孔昭铭	(74)	常乃德致陈独秀	(109)
孔昭铭致陈独秀	(75)	陈独秀答淮山逸民	(110)
陈独秀答顾克刚	(76)	淮山逸民致陈独秀	(111)
顾克刚致陈独秀	(76)	陈独秀致莫芙卿	(114)
陈独秀致胡适之	(77)	莫芙卿致陈独秀	(115)
陈独秀答程演生	(78)	陈独秀答俞颂华	(116)
程演生致陈独秀	(78)	俞颂华致陈独秀	(119)
陈独秀答叶挺	(79)	陈独秀答常乃德	(121)
叶挺致陈独秀	(79)	常乃德致陈独秀	(122)
陈独秀答常乃德	(83)	陈独秀答曾毅	(124)
常乃德致陈独秀	(84)	曾毅致陈独秀	(125)
陈独秀答陈丹崖	(88)	陈独秀答I·T·M	(131)
陈丹崖致陈独秀	(89)	I·T·M生致	
陈独秀答钱玄同	(90)	陈独秀	(132)
钱玄同致陈独秀	(91)	陈独秀答胡适	(133)
陈独秀答钱玄同	(92)	胡适致陈独秀	(134)
钱玄同致陈独秀	(92)	陈独秀答刘竞夫	(136)
陈独秀答蔡元培	(99)	刘竞夫致陈独秀	(137)
蔡元培致陈独秀	(99)	陈独秀答余元浚	(139)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	(102)	余元浚致陈独秀	(139)
佩剑青年致陈独秀	(104)	陈独秀答俞颂华	(141)
陈独秀答傅桂馨	(105)	俞颂华致陈独秀	(143)

陈独秀答崇拜 王敬轩者	(218)
崇拜王敬轩者致 陈独秀	(218)
陈独秀致区声白	(219)
陈独秀、胡适之 答易宗夔	(220)
易宗夔致陈独秀、 胡适之	(221)
陈独秀答张寿朋	(223)
张寿朋致陈独秀	(223)
陈独秀答莫等	(229)
莫等致陈独秀	(229)
陈独秀答爱真	(232)
爱真致陈独秀	(233)

一九一九年

陈独秀答王禽雪	(236)
王禽雪致陈独秀	(236)
陈独秀答黄介石	(237)
黄介石致陈独秀	(238)
陈独秀答吕澄	(240)
吕澄致陈独秀	(241)
陈独秀致胡适	(243)

一九二〇年

陈独秀答虞杏村	(245)
虞杏村致陈独秀	(245)
陈独秀答臧玉海	(246)
臧玉海致陈独秀	(247)
陈独秀答明慧	(249)
明慧致陈独秀	(249)
陈独秀致周启明	(250)
陈独秀致李大钊、 胡适等	(252)
陈独秀答知耻	(252)
知耻致陈独秀	(254)
陈独秀答章积和	(255)
章积和致陈独秀	(255)
陈独秀致胡适(残)	(257)
陈独秀致周启明	(257)
陈独秀答费哲民	(258)
费哲民致陈独秀	(259)
陈独秀答高铨	(261)
高铨致陈独秀	(262)
陈独秀致杨重熙	(265)
杨重熙致陈独秀	(265)
陈独秀答知耻	(266)
知耻致陈独秀(一)	(267)
知耻致陈独秀(二)	(268)

陈独秀致周启明	(271)
文焕致陈独秀	(271)
朱信庸致陈独秀	(272)
陈独秀、李汉俊、 俞秀松答仲渊等	(273)
陈独秀致胡适	(273)
陈独秀答人社	(274)
人社致陈独秀	(275)
陈独秀答赵仁铸	(276)
赵仁铸致陈独秀	(277)
陈独秀答知耻	(279)
知耻致陈独秀	(281)
陈独秀答郑贤宗	(282)
郑贤宗致陈独秀	(286)
陈独秀答柯庆施	(291)
柯庆施致陈独秀	(291)
陈独秀致胡适	
高一涵	(292)
胡适答陈独秀	(293)
陈独秀致罗素	(294)
陈独秀答张东荪	(295)
张东荪致陈独秀	(303)
陈独秀致李大钊	
钱玄同等	(305)
胡适致陈独秀(稿)	(305)

一九二一年

陈独秀致《群报》 记者	(307)
陈独秀致胡适	(308)
陈独秀致鲁迅、 周作人	(309)
陈独秀答皆平	(310)
皆平致陈独秀	(311)
陈独秀致寅生	(315)
陈独秀答张崧年	(316)
张崧年致陈独秀	(316)
陈独秀答朱谦之	(320)
朱谦之致陈独秀	(320)
陈独秀致胡适	(321)
陈独秀答何谦生	(321)
何谦生致陈独秀	(322)
陈独秀答蔡和森	(323)
蔡和森致陈独秀	(324)
陈独秀答区声白	(330)
区声白致陈独秀	(334)
陈独秀再答区声白	(337)
区声白答陈独秀	(341)
陈独秀三答区声白	(348)
区声白再答陈独秀	(360)

一九二二年

- 陈独秀致周启明
沈兼士等 (369)
周作人答陈独秀 (370)
陈独秀致周作人 (371)
张崧年致陈独秀 (372)
陈独秀答黄凌霜 (375)
黄凌霜致陈独秀 (376)
陈独秀致张东荪 (377)
陈独秀致蒋梦麟
胡适 (378)

一九二三年

- 陈独秀致胡适 (380)
陈独秀答邓汉琼 (380)
邓汉琼致陈独秀 (381)
陈独秀答李子芬 (382)
李子芬致陈独秀 (383)
陈独秀致胡适 (384)

一九二四年

- 陈独秀致胡适 (385)
陈独秀致胡适 (385)
陈独秀致胡适 (386)
陈独秀致胡适 (386)

陈独秀致胡适 (387)

陈独秀致胡适 (387)

一九二五年

- 陈独秀致章行严 (389)
陈独秀致戴季陶 (391)
胡适致陈独秀(稿) (403)

一九二六年

- 陈独秀致蒋介石 (405)
陈独秀致张人杰符琇
黄世见冥飞等 (412)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 (417)

一九二七年

- 陈独秀答符琇 (419)
符琇致陈独秀 (419)
陈独秀答王纯礼 (420)
王纯礼致陈独秀 (421)
陈独秀致蒋希曾 (422)
蒋希曾致陈独秀 (423)
陈独秀答沈滨沂、
朱近赤 (424)
沈滨沂致陈独秀 (426)
朱近赤致陈独秀 (427)

一九二九年

-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432)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关于中
国革命问题) (434)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454)

一九三一年

- 托洛斯基致陈独秀 (463)
陈独秀致蔡元培 (464)
陈独秀致蔡元培 (464)

一九三二年

- 陈独秀致蔡元培 (466)
陈独秀致胡适 (467)

一九三五年

- 陈独秀致胡适 (469)

一九三七年

- 陈独秀致陶亢德 (470)
陈独秀致申报馆
编辑部 (470)
陈独秀致亢德 (471)
陈独秀致陈其昌 (472)

一九三八年

- 陈独秀致《新华
日报》 (475)

一九三九年

- 陈独秀致托洛斯基 (477)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1)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1)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2)
陈独秀致郑学稼 (482)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3)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3)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4)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5)

一九四〇年

-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6)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7)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7)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8)
陈独秀致杨朋升 (488)
陈独秀致西流等 (489)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3)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4)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5)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5)	陈独秀致杨朋升	(520)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6)	陈独秀致杨朋升	(520)
陈独秀致杨朋升	(496)	陈独秀致郑学稼	(521)
陈独秀致连根	(497)		
陈独秀致杨朋升	(500)		
陈独秀致杨朋升	(501)		
陈独秀致西流	(501)		
陈独秀致杨朋升	(508)		
陈独秀致杨朋升	(508)		
陈独秀致杨朋升	(509)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0)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1)		

一九四二年

陈独秀致杨朋升	(523)
陈独秀致杨朋升	(523)
陈独秀致杨朋升	(524)
陈独秀致Y	(525)

一九四一年

陈独秀致S和H	(512)
陈独秀致Y	(513)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4)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4)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5)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5)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6)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6)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7)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8)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8)
陈独秀致杨朋升	(519)

一九一〇年

陈独秀致苏曼殊^①

与公别后，即遭兄丧，往东三省扶棺回里。路过上海，晤邓秋枚，始知公已由日本乘船过沪赴南洋。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均以久不得公消息为恨。兹由朱少屏所得公住址，殊大欢喜。继今以往，望时惠书，以慰远念。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今仅将哭兄丧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公远处南天，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②字莫愁”。公共有诗贺我乎？刘三沈实均无恙，惟望惠书至切。此上曼公。

陈仲顿首^③

（录自《苏曼殊全集》卷四）

① 苏曼殊，即苏玄瑛（1884—1918），近代学者，字子谷，广东中山人，十三岁为僧，法名情经，号曼殊，思想上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生活上狂放不羁，有《苏曼殊全集》。

② 此处应指一九一〇年冬，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高君曼曾在北京女子师范读书，热爱文学，思想新颖，1931年病故。

③ 陈仲，即陈独秀。陈独秀初名乾生，及长改名由己，字仲甫，早年撰诗文时，常简署陈仲、陈仲子，独秀山民等；一九一三年改用独秀，中晚年曾使用只眼、实庵、檄翁、顽石等笔名。

一九一四年

陈独秀致《甲寅》记者^①

记者足下：

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不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命运，不知将来何如也？……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②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也。

CC生^③白

（录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2号 1914年6月10日）

-
- ① 《甲寅》记者，即章士钊。
 - ② 此篇两处删节号是原有的。
 - ③ CC生，陈独秀早期使用的笔名。

《甲寅》记者答陈独秀

CC生足下：

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读者，然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然曰国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至《甲寅杂志》当与国运同其长短，己身无所谓命运也。有友鲁莽不文，贻愚书曰：“趁国未亡，尔有甚么说，尽管说出来，免得国亡，尔有一肚皮话未说，要又气闷。”如此君言，则国亡时《甲寅杂志》将不作矣，换位而言，《甲寅杂志》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杂志》不能更作，亦必国亡时矣。折柬邀愁人，相逢只说愁。以语足下，其信然否？

记者

（录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2号 1914年6月10日）

一九一五年

陈独秀答章文治

文治先生：

沪上学校，率有规模，非内地可比，究以外人设立者，校规较善，而毕业可期也。就中以德人之同济学校、美人之约翰书院、法人之震旦学院最知名。三校尤以同济之科学最精，分医工二科，预科二年，正科三年，预科之前尚有德文学校，学程四年。上海北京皆有之，中学毕业生，且能听德文讲义者，亦可考预科也。敬复。

记者

(一九一五.九.十五.)

• 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及其他刊物时，常在“通信栏”中与读者通信讨论问题。这些读者，多是青年学生、教员、店员及工人等，身世无从查考，此类情况，均不加注。

章文治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皖省自二次革命后，学校全毁，韩使①来稍规复十之一二。今韩去李来②，学界又恐此残喘莫保。青年学子，怅无所之。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希示一二，即当负笈往游也。余续白。

章文治白

（录自《新青年》1卷1号）

陈独秀答王庸工

庸工先生：

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而上。予觉诸人主张君宪，犹属过崇欧化。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变更，必有其朔，

① 韩使，韩国钧，时为安徽省巡按使（省长）。

② 韩去李来，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徽省巡按使韩国钧去职，改李兆珍任。

亦未闻何国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亦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一曰，国人迷信共和，当以葡萄牙、墨西哥及南美诸邦为前车之鉴。不知南美诸共和国，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其国民之自由幸福，犹在西班牙、土耳其、日本之上。即葡萄牙、墨西哥之国力民智，亦岂吾国所可望尘，竟引以为戒，不虑葡、墨人之窃笑也耶！一曰，共和国元首改选，易至争夺酿乱，不若君位确定之长享太平也。呜呼！诸人多通相斫书者，试展卷稽之。其争夺杀戮之惨，有以加之否邪？筹安会诸人所持上列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诸人而欲行其志也，必别寻他项之理由，或不必待理由之讨论，亦无不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呼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

记者①

一九一五、九、十五、

①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答复读复提问时，有时署名“独秀”，有时署名“记者”，类似情况不再加注。

王庸工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宏议，唤醒青年。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更可惧者，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几如欧战发生时同一度态。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后略）^①

王庸工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1号）

陈独秀答李平^②

李平先生：

来札敬悉。沪上授法文之学校，以法工部局所设之西童公学

^① 此处“后略”是原有的。

^② 此篇（包括本杂志1卷8号陈独秀答李平）在一些书目中，多为“陈独秀答李平敬”，今据《新青年》2卷1号一篇，应为李平。“李平敬白”、“李平谨白”，均系加了谦词。

最称善。然非解普通法语能听讲，且与校长有素者，不获入学。其次则公教育所设之徐汇公学及震旦学院。徐汇为中学程度，学程四年，毕业后入震旦本科。震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本科分文、工、医三门。此外青年会亦有法文夜课，程度尚不甚高。学于他校亦可兼及之，闻有教会私人所设之中法学校及法文公书馆，华人可以入学，惟不悉其内容如何。以法人授法文，当不恶也。李君石曾，闻尚居巴黎，所译二书，犹未出版。《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人类不刊之典。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尚有一事又吾人所宜知者。吾人未读达氏全书，偶闻其竞争之说，视为损人利己之恶魔，左袒强权之先导，其实非也。达氏虽承认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亦承认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也。所著《人类由来》，有言曰：“以富于爱国心 (atriotism)、信义心 (Fidelity)、服从心 (Obedience) 及同情心 (Sympathy) 之故，随时得见互助之效，人人能为公美 (Common good) 而牺牲私己。以此种社会与反此之社会相竞争，必占胜利，是即一种之天然淘汰也。”见 *Descent of Man, part 1. Chap. v. p. 203* (1901)。又曰：“用情之本能，元来为社会本能之一部分。吾人遇夫无论以何种理由为土台之抗议，倘不欲抛弃吾人性质最高尚之一面，将未能抑压此同情心也。”（见同书二〇六页）观此则同情心及互助之说，未尝不见于达氏之书。第其立脚点，乃以为

团体间竞争之手段，斯与克氏不同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记者

一九一五，十，十五。

李平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刻读大志，极称法兰西文明之优美。仆与同学杨成志君，均信仰法兰西教育者。然已毕业中学，毫无法文智识，而俭学会因欧战频仍，停止入会。记者热心劝学，尚有以教之也。再者亡友师复，曾告仆谓李石曾先生，现译克鲁包特金之《互助》，及南遼博士之《人学》二书。他日刊布吾国，必能唤醒一般醉心军国主义功利主义者之迷梦。时事日非，同志零落，而李先生之书尚未出版。仆既望眼欲穿，又念李先生不置。记者倘有所知，亦乞示知一二为盼。余不白。

李平敬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2号)

陈独秀答王珏

王珏先生：

闻同济将设技师科，入学程度甚浅，学膳费年共百五十元，

详情见近日《申报》所载该校告白。汉口德华学堂，乃同济分校，学费全免，膳费略与沪校等，毕业后送沪本校。足下于斯二者，或可任择其一。至于自修书籍，来示所询，过于广漠，无以答也。敬白

记者

一九一五.十.十五.

王 珏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珏前肄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欧战事起，乃改入上海同济，奈该校学费太贵，力难前进，只得退学，欲闭户自修中文洋文及算学，然既无头绪，又苦乏相当书籍。乞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此请

公安

王珏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2号)

陈独秀答李大槐

大槐先生：

恪诵来教，启我良多。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第以为人类进化，犹在中途，未敢驰想未来以薄现

在，亦犹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谓为圆满，不容置议，窒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则期期以为未可。杨、康、章、梁诸先生，皆吾辈之先觉，然吾辈之信仰，不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一一盲从诸先生所云，甚非吾辈所以尊诸先生为先觉之意也。

愚之非难佛法，有精粗二义。精者何？见所为《绛纱记叙》。而某君颇不以鄙见为然。见十号甲寅通讯。其言有云：“大意谓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自何来？世之致疑者，自昔有之矣。从未有为圆满解答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仆所申说，亦但申说此不可解答。”夫以不可解答之理，而复事申说，下愚不解，当为识者所恕。又有以信解行证之说解予惑者。愚以为今世之人，无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其为迷信与否不可知也。粗者何？略见《新青年》一卷二号论文。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

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无政府党人所否认者，政府而已。世人骇为怪异，不敢与近。佛徒取世界有为法一切否认之，其何以率民成教？其弊一也。

好言护法，不惜献媚贵人，以宏教大业，求诸天下万恶之魁，如尊武则天为菩萨化身之类，古今不乏其人。大炎生生堂谓佛徒妄诋程、朱，而程、朱决不苟称当王德、三齐、诸孔孟，何谓知言也矣。今之人心堕落，强半由灰心偷惰而来。人无爱理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富贵。尊国所谓扶气充塞，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奉佛宏法若钱谦益者，在且有皇皇太矣。唯

告海内乎？即号为大师而不腐败堕落者，去不薄世法之月霞师外，兹世曾有几入？此其弊又一也。

此事说来甚长，虽万言不能尽。愚于此问题，尚不欲多论。兹因足下之问，略道梗概而已。倘不当尊意，尚望再示，以发愚昧。不尽欲言。

独 秀^①

一九一五.十一.十五。

李大槐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自杨仁山辈，提倡佛法，康有为、梁起超等，复从而赞美之。梁起超主《新民丛报》时，作康德学说，谓康氏说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国哲学者多致力佛法。刻读大志，见独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难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佛法果为至精深之哲学否耶？再者，近日邪说横行，妖气充塞，青年学子，茫茫然如坠入大海。盼诸君子正言说论，务使未来之主人翁，勿为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所迷惑，而丧其高尚之思想，失其高尚之人格，幸甚。余不白。

李大槐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① 此信初发表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8号，署名“记者”，后收入《独秀文存》，改为“独秀”，类似情况不再加注。

陈独秀答吴勤

吴勤先生：

来书奖誉过实，愧无以当。逻辑之学，输入中土，时日尚浅。其说与中土名学，印度因明学，浅深广狭，不可并语。著自中土者，固所未闻，译本亦属甚少，其最著称者，莫如侯官严氏所译名学。约翰弥尔原著，为逻辑学界空前佳作，后之作者，今尚未有以胜之。惟严译署名已失正名之旨，译文复晦涩不便初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宁读原书，不用严译也。原书名 *J.S. Mill's A System of Logic*，倘嫌义深文繁，不易购读，则先取裘文氏逻辑初课 (*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读之，次则读巴兰亭氏归纳逻辑学 (*Ballantyne's Inductive Logic.*)。裘氏书极浅显易读，巴氏书则稍进矣。近代学术俱重归纳，逻辑亦然弥尔。逻辑学突过前人，即以此也。裘巴二书，上海伊文思馆均有。竟此二书，再读弥尔之作，当可迎刃而解。能通弥尔书，则于逻辑学思过半矣。

记者

1915年11月15日

吴勤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顷读大志，精旨名理，钩元提要，盪冲时局，力辟新机，倘

遗学者，为益固多矣。勤负笈津门，心焉响往，平日研求学理，怀疑多端，辄欲陈书请益，顾以课务缠身，未遑披述。比者有二三同志，欲于课余之暇，略求逻辑之学，惟苦于西文程度太浅，不能直阅彼邦名著，而坊间所售此类书籍，著自中土者甚少，所有译本，名目杂出，罔从选择，诚恐噉牙难读，不得真谛，则匪徒无益，徒掷驹光，且于一切研究程序，皆属茫然。爰思足下学贯中西，蕴抱崇深，于此自有深造，其亦以可教而辱教之乎？

吴勤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3号)

陈独秀答李平

李平先生：

介绍西文书报，自为今之要图，记者不学无识，愧无以任之，惟重以读者诸君之命，一俟拟定范围，自当勉力以副尊望，墨漏舛误之处，将不免也。至若本国出版书报，鄙人所欲评论者，间亦有之，惟举国上下，不许吾人以言论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谅之。

记者

一九一五.十一.十五.

李平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刻于贵志二号，得读复言，为述沪上法文学校，及克达二氏

之学说。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仆兹有一事，商榷于记者，即望贵志特辟介绍书报栏，以为青年阅读之南针，并希指示书报内容、编辑人名、出版地点，与夫代价等等，俾有志之士，得购备无数之良书报，于正业之暇，从事披览。今日我国出版界之腐败，可谓至矣，青年学子，偶一不慎，辄为海淫海盗之说部所毒害，文字之祸人，诚有甚于毒蛇猛兽。此举倘蒙采纳，见诸实行，则造福吾党，岂浅鲜哉。再英法德文之书报，适于我国青年之阅读者，亦祈按期介绍，以为通外国语者告，想亦记者所乐为赞同者也。余不白。

李平敬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8号)

陈独秀致吕君

吕君足下：

来书所言，用意极佩，虑增社会消极之念，故未登载，希谅解之。我国兴学，仅及十年，重以才财均乏，办学欲求完备，实非易易，函授之法，最合今日需要，吾辈当共谅之。至于宅心非正，私利是图，根本已殊，何从责议，所希冀者，但能继起得人，则优胜劣败，终难幸免。彼欧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进，不外竞起研求四字，岂有奇谋异术哉。足下刚直之性，溢于字里行间，揣其所至，可任重致远。愿足下勉之。

记者

一九一五.十一.十五.

(录自《青年杂志》1卷8号)

陈独秀答穗

穗君足下：

足下热心拳术，诚为青年当务之急。惟以记者简陋所知，大力士霍元甲君故后，尚无所闻。此间精武体育会，为霍君遗业，闻今之董其事者农君，乃热心斯道者。倘再赐书，希以完全姓名见示。足下盍往谋之。

记 者

一九一五.十二.十五.

穗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敬启者。穗欲习拳术，但未得良师，想沪上定有名人，恳示一二，并告姓氏地址为禱。

穗 叩

(录自《青年杂志》1卷4号)

陈独秀答张永言

永言先生：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

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托尔斯泰为人，精神伟大，近世罕有。本志取其传中最后一篇者，以其笃行其道，老而不衰也。托氏身为贵族，心在田间，弃家寻志，事远恒情，此其所以为托尔斯泰也。各国教育趋重实用，与文学趋重写实，同一理由，正不独美国为然，特美国尤甚耳。高深之学，自有一部分人士力求之，至于普通国民教育，若轻视生活实用智能，而冀高深之学，其何以利益其群，而争存于世界也。

记者

一九一五.十二.十五.

张永言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顷由乡里来沪，购得贵杂志三册，展诵之余，无任钦佩。内有通信一门，尤足使仆心动，因仆对于耳目所接触之事物，每多怀疑莫决，师友中亦间有不能答其质问者。今贵杂志居然设此一门，可谓投合人心应时之务。仆今后当随事随物，举其所疑，用以奉质，兹就刻下欲问者列之如左：

(一) 贵杂志第三号论欧洲文艺，谓今日乃自然主义最盛时代，且历举古典主义等用相比较。仆意我国数千年文学屡有变迁，不知于此四主义中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意提倡此种主义否？

(一) 贵杂志第二号，托尔斯泰之逃亡一篇。重复三四次读

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托尔斯泰为世界有名之文人，则作斯篇者自非名家不敢动手，顾此篇则实晦塞冗闷，读之令人不欢，原文果亦如是乎，且斯篇之作，其主旨究何在耶？

（一）闻之友人，谓近来美国教育，专重实用，不务高深，及询其何以不必有高深之教育，则又不能详答。足下所知者果如是否？

以上所列，倘足下不厌其琐鄙，尚乞详细惠答，是盼。

张永言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4号）

陈独秀答沈伟

足下倘欲习实用英语，非从师练习不可，若但欲读书，已有四年，择所欲习者一科，假助字书。当能勉强自读。英文文法过简，非多读书不能养成文义判断力。奋力苦读，日久自通也。至应读何书，则以足下拟求何种科学为归，寻之伊文思馆可也。商务群益所印行之译解英文各书，倘购读之，亦有裨益。惟判断文义，须仗自力，依他作解，或有误处，不可知也。

记 者

一九一五.十二.十五.

沈伟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伟虽在沪习英文四载，复因家寒力难前进，只得退学，欲自修英文，茫无头绪。又苦乏相当书报，爰思足下学贯中西，蕴抱崇深，于英文学定有深造。务恳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

沈伟启

（录自《青年杂志》1卷4号）

一九一六年

陈独秀答张永言

永言先生：

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之文，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之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

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时代，最近数十年来事耳。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欧洲人或讥以破坏美术文艺之基础。自东洋人之眼观之，益属狂悖无伦。此日本政府所以明令禁止自然主义之文学之输入也。然于裸体绘画与雕塑，均不之禁，以其属于写实主义，而非自然主义也。

尊论谓“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此义殊尚欠斟酌也。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且比较各国人口之多寡，匪独以人数为标准，当合人口与土地而比例之以为标准。譬如吾国人口总数远出法、德之上，而以每方里容人之数计之，则吾国立

见地广人稀之象。足下所谓人多者，倘暗指拥有四万万人之吾国，当自失其一日之长。然国力伸缩，与其谓之以人口多寡为衡，宁谓之以有无人患为衡。所谓有无人患者，亦非以人数多寡为标准，乃以生产额能否教养此人数为标准。生产超乎人数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伸；人数超乎生产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缩。生寡食众，此吾国所以有人满之患。非真人满也，人数超乎生产额，而教养无资也。

欧人避妊之风，是否害及国力，吾人且措而不论。若夫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足下所虑，适得其反。西妇避妊，非必服药，未见其有伤体育也。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进，犹属望尘，慎勿以抑扬过当为虑。

独 秀

一九一六.二.十五。

张永言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承示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以后方始入于写实主义之境，去西人所处，只得其半，文化粗迟，至可骇也。惟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界别，仆尚未能十分明了，幸于次期列举例证，以开蒙昧。所谓古典主义，是否如我国文字，言则必称先王，或如骈丽文中，征引古事，用为比譬？所谓理想主义，是否如我国文中，动则以至仁极义之语相责难，而冀世所必无之事？

此两义仆之想象以为如是，究竟是否，尚乞教之。

《东西民族根本观念之差异》篇中，言西人“亲不贵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云云，读之甚生疑虑。盖东洋民族，以有子为人生唯一之职务，其偏僻诚可笑，然若如西洋避妊之风日甚，其结果又将如何耶？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避妊之妇，体亦日衰，展转相传，强质愈失，即求幸福，又安可得？贵志之文，似有扬西抑东之意。如此等处，恐尚须斟酌商量也。

张永言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姚孟宽

孟宽先生：

过誉增惭。西籍应译者，视Emile既多且要。本志同人力薄学浅，一时难任。研究Logic入门应读之书，略见本志三号通信答吴勤君。

记者

1916年2月15日

姚孟宽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大志以灌输青年智识为前提，无任感佩。兹有一事，尚祈采

纳。伊米儿Emile^①教育小说，为卢梭氏得意之作，其于欧西教育界影响甚巨，此稍治教育者所共知。顾是书吾国现无译本，虽七八年前沪上某书肆曾已翻刻，惟系译自日文，佶屈聱牙，不可卒读，盖彼书奇特之思想，与浏亮透辟之文章，早已因日译而失真。吾又重译之，宜其难读，索解无从，况以言感发乎。仆虽习教育而不谙法文，愧不能与于斯。大志人才济济，学兼中西，为此不难。诚以此书理虽不纯，然为从事教育者所不可不读，大志苟能由原文译出，必较从日文转译高出万万，其影响于教育界思想界为何如乎？是望足下图之也。仆友王君，颇欲研求西洋精神科学，惟以论理学为各学之学，究西学者首当从事，因以研求之方，实用之道，及今所当读之书询仆。恨未能为其详尽答复，今以转询足下，尚祈示其研究之法，实用之例，且望示以西籍中之精要，当急择读数种，俾资研究。无任祈盼。

姚孟宽白

（录自《青年杂志》1卷6号）

陈独秀答辉暹

辉暹先生：

来示殊奖，愧甚。承询各节，于生理卫生极有关系，愚于斯学，本未深造，年来世乱学荒，益未能详告。兹谨就所见共研究之幸甚。

（一）人身最要之营养曰血，血之新陈代谢机关曰肺，故肺

① 伊米儿 (Emile)，通译为爱弥儿。

之卫生不可不谨也。大凡人身及他种动物，其机能愈发达而为重要之器官者，愈易受病焉。例如女子之乳房及生殖器机关，极为发达而亦极易受病；男子之脑较为发达，而受病者亦较多也。他如家畜中，马以善走称，而足部特发达，然马病多在足；羊以毛贵，而多生皮肤病，豕以多脂为上，多得贫血之症。是其器管愈发达，而受刺戟之感益灵敏，灵敏即病之原也。肺脏为空气中之动物，唯一营养机关，人缺饮食尚可生存至一星期之久，若无空气，虽数分钟不能存也。血液之小循环（即静脉回血由心脏之肺动脉入肺），排除旧瓦斯（gas）而吸收新鲜空气。设空气、灰尘中，含不洁有毒之微生物，吸入肺脏，致起种种恶症，其最危险者为肺结核，我国所称为癆病是也。欧美日本各国公共游戏及建筑物，特设痰盂，即预防癆病微生物，混入空气袭人肺脏也。其他病菌由空气传染者极多，癆症特一例耳。普通之空气灰尘，亦决不能使其尽绝，亦不致有害卫生，证之土木工人及兵士生活可知矣。或曰空气中之灰尘，既不能使之绝，而人生百年，每一时须吸空气数千斛，灰尘入肺，而不致塞满者何也？曰是诚绝妙之问，而造物者亦有绝妙设备，非常人所能识者。盖动物喉部及气管支部之粘膜细胞，有向上运动之力，曰毡毛运动。灰尘入气管，由毡毛运至咽喉，咳吐而出，是即痰也。

（二）颜色鲜艳，不外多浴使皮肤润洁，多吸新鲜空气使血液清洁。其他化妆之品，徒饰外观，然亦非男子所宜为者。

（三）手甲足甲自行脱落之说，恐不确。余尝见病足者，甲长二寸余。外人讥中国人不运动，摄取我国长手甲者相片，有长至四五寸者，或因外界挫折，或劳动者终日磨减，不然似无自落之理。

（四）异族结婚，愚所最主张者也，其理由不外优劣相补而

已。吾国亦有同姓相婚，其生不蕃之说。中国之婚禁偏重男姓，而外国并母性而亦禁之。例如中国中表俗多为婚，而欧美亦称为血族也。盖中国之禁同姓相婚乃出于伦理之见解，西洋之禁血族结婚乃出于生理之见解。凡一族有一族之优劣之点，一姓有一姓优劣之点，以同族同姓优点加同种之优点则固优，以同样之劣点更加劣点，则劣甚矣。此理至明者也，故异族异姓相婚实为人种进化之大原因也。

(五) 运动后心脏鼓动，血行甚速。入浴亦然。恐生血充脑部卒然昏倒之病，他无危险也。

(六) 运动一道，愚酷好之。吾国之拳法，日本之剑术，欧美之体操法，皆略有研究。惟人各有志，如徒欲运动筋血，强健身体，则以极易行之徒手体操为善，老少男女皆可行也。即中国旧式之八段锦亦可。必欲于运动之中，含求技之意，则为术至不一也。

记者

一九一六.二.十五.

辉耀致陈独秀

记者先生足下：

自贵杂志出版以来，风行全国，遗泽后进，曷胜钦佩。兹见贵刊有通询答问一栏，不竟雀跃而请教益焉。因录积疑数则，请于贵志下期內详教之，先生不以唐突见拒也，则幸甚。

一、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

二、常见人颜色鲜艳而有血色颇为可爱，此果何法使之然
欤？

三、手指足趾上之爪，因何自行脱落？

四、异族结婚，后嗣多慧健，究为何故？

五、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

六、现时各种体操繁多，究以何种于身体之康健上为最适
当，可否请示其法？

辉邈上

（录自《青年杂志》1卷6号）

陈独秀致胡适^①

适之先生左右：

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青年》以战事延刊多
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②，本月
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
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
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

^① 胡适，字适之（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美，崇奉
实用主义，191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语文，反
对文言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有《胡适文存》
等。

^②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以后，上海青年会写信给发行该
杂志的上海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的名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
志》的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1916年3月3日，群益书社经理陈子
寿“商于仲（陈独秀——引者）”，遂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马君武君顷应为《青年》撰文，第八号当可录至。足下所译撰伦诗，拟载之《青年》，可乎？语有侵马处，可稍改之乎？中国月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率复不庄。

弟独秀敬白 八月十三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汪叔潜

叔潜先生：

恪诵大教，惠我良多。第鄙见国民运动与政党运动，广狭迥殊，确有不同之点。其理由不可殫述。就其浅显者言之，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即政党成立以后，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欧美立宪国之不若英伦以政党政治称者，以其政党不著

英伦两大政党均得国民之半数也。谓其政党不进化则可，谓其政治不进化，且斥以未上宪政轨道，恐非确论。

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腐败无耻之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前文未达，予读者以误会，资官僚以口实，殊非立论之旨，得尊函纠正之，敢不拜嘉？

独秀谨复

一九一六.九.一。

汪叔潜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见正月号《新青年》），——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夫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

且即就政党政治而论，初亦何尝可以抹杀哉？先生之言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愚诚不审此语何所根据。

英之现今内阁，诚哉已非政党内阁，然此为其政治上之变例，未可据以论断。彼当组织联合内阁之始，首相爱斯莫斯，与在野党领首兰斯顿侯，均有极沉痛之宣言。一则曰：“吾人所以忍痛而悍然为此者，当兹战争紧急之秋，欲求过此难关，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耳。”再则曰：“联合内阁，只以战事为期，吾人之政见，决不抛弃，不过暂行停止耳。”然则彼之所以违背惯例，改组联合内阁，原出于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于政党政治求一变通办法，并非于政党政治，根本推翻。欧战终局以后，政党政治，必仍恢复于英伦，殆可断言。岂独英伦？苟凡励行宪政之国家，则其国之政党，亦必日以发达。苟其政党完全发达，则所谓政党政治，必不让英专美。

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者也。试观日本。日本之政治，官僚政治也。然比来政党之活动，较之前此数年已大进步。安知后此数年，不脱离官僚政治而进于政党政治耶？且日本官僚政治，今犹存在者，亦缘其官僚之知识能力，足与时势相应。反以观之吾国，则最昧于大势，最缺乏常识者，莫官僚社会若。以官僚社会与所谓政客者较，其智识之相差，殆不可以道里计。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日本式之官僚政治，又可断言者也。是故今日惟望国中贤杰之士，以及多数青年，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而群热心于政治，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则国事前途，庶其有豸。夫惟具此信仰，故对于先生论调，与此抵触者，若骨在喉，必吐之而后快。

抑愿尤有进者。二十世纪之民族，独立精神与团体精神，并

行不悖者也。团体精神之最大者，则若国家主义，团体精神之散见于各方面者，则党派是已。党派之纯粹以公共利害为基础者，则若政党。党派之以一部分利害为基础者，则若工商以及凡百职业，亦莫不各有其党。原夫党之所以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既而见夫一人或少数人之主张，不足以与人争胜也，于是求友求助之心，油然而生。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谓团体精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者也。

先生之言曰：“今后青年，宜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愚则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既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居今之时，苟其犹为独行踽踽之人，必其为最无思想之人也。苟其人而欲有所运动，虽欲与党派不生关系，不可得也。

青年杂志者，精神教育之杂志也。凡先生之所为文，固极力提倡时代精神者也。团体精神，亦时代精神之一。愚愿先生之于此三致意也。当否惟裁择之，幸甚，幸甚。

汪叔潜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沈慎乃

慎乃先生：

示悉。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惟兹事体大，必举

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此时所谓官话，即北京话，仍属方言，未能得各地方言语之大凡，强人肄习，过于削足适履。采为国语，其事不便。愚见闻浅陋，于各种官话书报，素少探讨，愧无以对。惟于方言音韵之学，稍有研究。且居恒以为欲图国民知识之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当世议此者少，俟社会需要时，愚将论列一二也。

记者

一九一六.九.一。

沈慎乃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乃以为语言不通，阻教育之前进，谋教育之前进，必先使语言一致，一致之语言何？即官话耶。故全国上下，竭力提倡官话，为谋教育前进之先导。然乃浅陋寡闻，不识有何官话书籍，可为依本，兼之内地教育界友人，纷纷来函询问官话书报，爰思贵杂志通信栏，每见答人之所未知者。又足下学贯中西，见多闻广，于官话书报，定有所悉。故不揣冒昧，直函上陈，务恳指示，使乃及敝友，有所遵循。

三马路中国银行收税处沈慎乃谨启

（录自《新青年》2卷1号）

陈独秀答舒新城

新城先生：

热忱高见，钦佩良深。倘同志来函较多，自当别设一栏为诸君通信地。惟青年社会，如此销沉，深恐曲高和寡耳。数诵来札，感喟如何。呜呼！三户少年，诚非余子所及。

记者

一九一六.九.一.

舒新城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迭读嘉言谏论，心焉向往，振聋启聩，贵杂志不啻为吾国青年界之晨钟。惟我国社会素以家庭为主，于人类相互之关系未明，近日权利偏重，一般人民于家庭外不知有社会，甚者且于一人外不知有家庭，长此以往，不至人尽相食不止。去年夏赴长江学生夏令会，见教会各校学生，皆组织有社会服务部，以课余暇晷，为社会服务，良法美意，甚为感佩。反而求诸国内各校，不惟无此事实，且无此观念，愧仄良深。曾国藩曰：社会风尚，成于一二人。新城不敏，愿提倡社会服务于青年界，冀成风尚，以改良社会。足下何以教之，能于贵杂志辟一栏为通信地乎？希赐裁答。只候撰安。

湖南高等师范英语本科学生舒新城启

（录自《新青年》2卷1号）

陈独秀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本志以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复承读者诸君过当之赞扬，只增惭恧耳。推广销路之策，发行部已尽力图之。惟于兹政象不宁，青年堕落之时，万象销沉，本志岂独有幸理，减价销损办法，已由发行部奉答，兹不赘及。

记者

一九一六.九.一

毕云程致陈独秀

记者先生足下：

敬启者，仆一青年也。三四年来，奔走鼓吹改良社会，多所牺牲，至于今亦几精疲而力尽矣。自审精卫填海，于事无补，然以我生自有责任，此心此志，未敢或懈。半年以前，居恒自思，非有一良好杂志改良我青年界之身心者，则此社会终莫由改良。而起视出版界，足为我青年界之良师益友者，实乏其选。遽见大志出版露布，私心窃窃希望曰：庶乎能应我心之所希望，而能供我之所日夜以求者乎？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若大志者，诚我青年界之明星

也。嗣是以后，仆随时随地，凡遇良好青年，必以有无读青年杂志为问，其未读者，必力为介绍。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爰书数语，请大志广登告白，并用其他种种方法，推广销路于各地方，俾一般青年，均得出陈陈相因醉生梦死之魔境，而觉悟青年人之责任及修养身心之方法，以改良个人者改良社会，并改良一切。仆知欢迎大志与仆有同情者，大有人在，惜无术足以相知，惟愿大志按月准期出版，以慰我爱阅之青年界。此仆致函大志之原因也。

再仆拟多购若干册，分赠亲友，可否减价若干。因仆多购得一册，即可多赠一人也。又仆意沪上各中等以上之学校，可各赠一份，以代告白。并可于放学时，授学生以传单，以简明之文字，告以内容价值，使其得知有此良好合用之杂志，引起其欲购之念。余不白。

毕云程白

(录自《新青年》2卷1号)

陈独秀答陈恨我

恨我先生：

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足下来书意在尊崇孔教，保存国粹，惜无有一语在析理辩难范围，愚诚无词以

答，祈足下取本志第六号《孔子平议》篇及《吾人最后之觉悟》篇中伦理的觉悟一段平心静气读之，以代愚之答词。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来书所谓“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之灵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云云，于东西治化文明之差别，诚能洞见本源。第持此见解抱此杞忧者，先足下而有孔教会筹安会诸君子，今国人方出大力解决此问题，不审足下何所左袒也。

记者

一九一六.九.一.

陈恨我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仆不幸处此尘世，然终不敢不尊孔子，窃以孔子为万世之师表，独一无二之大圣。人人宜瞻仰之敬慕之而效法之始可，而今日固何如乎哉。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置至圣之微言大义于不问，反论孔子以尚谦让弱民性等云云。仆以为处今日之世，自宜重科学，求实际，然先圣之道，一若布帛菽谷之不可须臾离，尤当剖析之整顿之，须能尽青年之责任，安可妄论孔子以滋世祸者哉。顾杨墨起而孟子辩之，佛老盛而退之辩之。予固非有学问者，但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之灵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孔教固我国之精神之灵魂，又岂可自残也耶。想贵杂志为扶助青年人之身性者，望振木铎以醒世之玷辱名教者流，则我幸甚，孔教幸甚，国民幸甚，中华又幸甚矣。

仆一野夫，不谙文墨，惟聆闻之下，一腔忿恨，无以自遏，故书几行鄙俗之文字，以慰记者。记者通达人，尚其谅仆之苦心，勿却仆之私见也。余不赘。

陈恨我谨白

(录自《新青年》2卷1号)

陈独秀答程师葛

师葛先生：

来示诵悉，略复如下：（一）近世德育进步，是否果逊于智育，愚诚不敢妄断。今人所见德育无胜于前代者，有二原因：其一，由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均平，金钱造成罪恶，此非高谈道德所可补救者也。其二，由于社会已成之道德，不克范围今日之人心，近世思想法度，月异日新，駸駸未已；而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逞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综上二因，以判民德，世人之所谓罪恶，未必为罪恶；所谓道德，未必非不道德。欲救斯弊，第一，当改良社会经济制度，不使不道德之金钱，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第二，当排斥社会已成之道德，而尊行真理，不使不道德之道德，演成社会种种悲剧。不然，虽日言德育，而道德自身未有进步，德育乌有进步之可言。（二）晰族勇武可欽，而德之军国主义，则非所仰慕。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弊也失进步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弊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

二者之间，为可矜式。军国主义，其一端也。且国之强盛，各种事业，恒同时进步，决无百务废弛，一事独进之理。以今之中国而言，军国主义殊未得当。若夫慈悲、博爱、非战诸说，为人类最高之精神，然非不武之被征服民族，所可厚颜置诸脑、出诸口。（三）士之浮华无学，正文弊之结果。浮词夸语，重为世害，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也。即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若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写实派文学、美术，自有其精深伟大处，恐犹非空想派之精深伟大所可比拟。（四）卫生延年之说，差为近理。物质文明发达，人类精力，消耗太甚，此直譬说。精力愈用而愈发达，用而虑其消耗，此东洋式之想象见解，非科学家之言也。惟物质文明发达至极，器械之用途日增，人体之劳动日减，吾人除神经外，百体用作将失其能力，此固应思患预防者。盖闻人身精力不用，而虞其废弃，未闻用而虞其消耗也。（五）催眠等诸魔术，属于精神学，非科学所能解释。记者于此，毫无经验，未敢断其是非真伪也。（六）此二种书沪上有无售处，记者不知，未敢率答。

记者

一九一六.九.一.

程师葛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备读大志，造福青年，无任崇仰。又辟通信一门，以为读者

析疑辨难之助，用意良盛。兹有疑义数则，列之左方（下面），尚祈不吝赐教。

（一）近世各国智育进步，一日千里，而德育则未见有以胜于前代。识者遂创德育与智育不并立之说，立国世界，决不能专尚智识，将何道以补其偏？

（二）中西国民强弱不同之故虽多，而中人爱和平，西人尚武勇，实足为其总因，故窃谓德之军国主义，最适于今日之中国。彼佛之慈悲，耶之博爱，与夫社会党之非战，说理虽高，不宜实现。质之明达，以为何如？

（三）近日士不悦学，溺于声色货利，而无高尚之思想，正宜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使之舍彼而图此。而足下谓以后宜趋重写实主义，敢请其故。

（四）卫生学家言，将来人寿可至二百岁，而法国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见饮冰室文集），则谓数十万年后，物质文明发达至极，人类之精力，消耗太甚，故男女平均二十五岁即死。征诸事实，确有若斯之倾向。二说究孰是孰非？

（五）催眠术为最近所发明，有关于生理学。然闻催眠术之精者，能使人直立于实际而不仆，此与物理学吸力之说反背，究为何故？

（六）英文布鲁特奇之英雄传，为古代伟大之著作，读之足兴奋人之志气。沪上各书肆中，不知有购否？又英文人名地名，其读法常有一定之规则，沪上亦有此类书籍否？乞示。

程师葛上

（录自《新青年》2卷1号）

陈独秀答胡适之

适之先生：

拜诵惠书，敬悉一一。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观。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取此故。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属无病而呻。其所以盛称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若以西洋文学眼光，批评工部及元、白、柳、刘诸人之作，即不必吹毛求疵，其拙劣不通之处，又焉能免？望足下平心察之。实非仆厚诬古人也。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

第五项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日本国语，乃合音。惟只动词、形容词，有语尾变化，其他种词，亦强袭西洋文法。颇称附会无实用。况中国文乎？）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

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又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

以上二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无文，何敢，何敢！

独秀谨复

一九一六.十.一。

胡适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二月三日，曾有一书奉寄，附所译《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某君^①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

^① 指谢无量。

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略）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索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

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龙鳞识圣颜”。宛转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溢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贗鼎耳，文学云乎哉！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撰安。

胡适白

民国五年十月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陳独秀答王庸工

庸工先生：

诺倍尔 (Alfred Bernhard Nobel) 乃瑞典人名，为发明炸药“戴拿埋特” (Dynamite 乃以硝酸等混合于硅藻土、锯屑所制。) 之大工业化学家，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八九六年，临终时，悉出资产，创立诺倍尔赏金制度，奖励有功德于人类者凡五种，每种年限一人，每人给金约合华银八万元，不限国籍。其第一种为物理学者，第二种为化学者，此二种均由“斯托亨(瑞典都城名。) 皇家科学院”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Stockholm) 评选。其第三种为医学者及生理学者，由“斯托亨之嘉乐林学会” (Caroline Institute in Stockholm) 评选。第四种为文学者，由瑞典学院 (Swedish Academy) 评选。第五种为有功于世界和平运动者，由挪威议院 (Norwegian Storting) 评选。近已稍变旧章，每年每种，不限一人矣。若法国之罗兰 (Romain Rolland)、瑞典之海敦司塔姆 (V.V. Heidenstam)、丹麦之朋托皮丹 (H. Pontoppidan) 三小说家，同以一九一四年得奖。且亦不限以五种，如丹麦历史家龙德 (Troels Lund) 即其例也。

记者

一九一六.十.一.

王庸工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读贵报增益青年知识匪浅。前见第二号达葛尔译诗注中，言达葛尔氏曾受Nobel赏金。不审此种赏金，出自何国何人，是何制度。乞有以见示。 敬颂

撰 安

王庸工白

(录自《新青年》2卷2号)

陈独秀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然读者如足下既已作此感想，分明事实，仆又何词以抵赖，今而后惟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闻之友人，足下坚苦拔俗，钦慕久之。仆无状，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惭愧惭愧，希足下时督责之幸甚。

独秀谨复

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读大著新青年，乡往益深。惟仆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勸勉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时局之危，仆岂不知，无如仆之愚见，悲观易流于消极。青年立志未坚，逢兹时会已有我生不辰之感，再益以悲观之文字，志行薄弱者不免因而颓丧。仆虽无似，窃以为与其生于百废俱举之时，无宁生于百举俱废之今日，此数十年短促之光阴，可以躬亲建设不朽之大业。岁寒见松柏之后凋，若在春夏之交，松柏又何殊于凡卉。是以仆对于梅特尼廓甫氏之言，深为赞成。仆以未受相当教育，故于世界哲人之学说，不甚了了，然仆自信有活泼之思想，不为俗习及现象所拘，思想绝对自由。梅氏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深合于仆之思想。仆以为今日种种现象之腐败，乃不可免之事。我健全洁白之自身，一日不腐败则乐观之希望一日不绝。仆自乡僻之腐败私塾中来上海，粗浅之新闻，尚不能阅读，遑论其他，苦心研求，渐得进境，乃于黑暗之中，寻得一线之光明。曰凡人苟非画地自限，前途之希望，未可限量。得进一步，有一步之乐趣。因此愈信天助自助者之说，而乐进不已。虽经种种困难，而未有丝毫悲观之念，扰仆心志。因仆畏难之心恒为乐观之希望所战胜也。迄于今日，仆虽仍为无学之人，而仆之进取不少已，仆自视与初来上海之时，已判若两人，故深觉进取之乐。仆知学问优裕胜仆什百千倍之青年，大有人在，深愿其一意

进取，勿以时局之悲观而自馁。时事愈危进取愈力。个人之进取，自足以裨益于国家，自足以裨益于人类进化之大业。先生负教育青年之重任，前途希望，正自无穷。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一乐，先生又何悲乎。伏愿先生一意著述，造福青年，勿以现象悲观而辍笔。不徒为青年界之幸，我国家实蒙其福。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毕云程白

（录自《新青年》2卷2号）

陈独秀答胡适之

适之吾兄先生左右：

奉读惠书，略答之《青年》，匆匆未尽欲言，乞足下恳切赐教是幸。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仆拟作《国文教授私议》一文，登之下期《青年》，然所论者应用文字，非言文学之文也。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尊译《决斗》为

手民所误，错误颇多，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此颂
学 安

弟 独秀白一九一六年十月五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一民

一民先生：

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犹为科学文艺之渊藪。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即无力远游之士，多读法兰西书，视昔日之习英文专为商业计者，思想界所获宏益必多。法语知识，诚吾学界之所急需也。特揭来函，为国人告。惟每期登载，实有未便也。

记 者

一九一六.十一.一.

一民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敬启者，法兰西文学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成立于法京巴黎(paris)，专以传布法国文学为宗

旨。他国人之有志于法国文学者，受益尤多。驻沪协会设立教授机关于法界霞飞路二百四十七号西童公学内，共分三科：初级中级为预科，各一年毕业，高级则为正科，自第二年起，即纯用法语教授。学费，预科年二十七元，正科三十六元，均分三次预缴。又鉴于中国人生计困难，留学实力，有不逮故，凡毕业诸生，学识确优，志趣高尚者，当代为设法，以便寒素而期文化之普及。清贫有志之士，不至有望洋之叹。再者近来所有之法文学校，均为教会所设，教授均不合格，大半劳敝精神于无用，更无良善之精神教育可言。本学校教授，均系受文学协会之考验，决无误人子弟之虞。且法兰西人素以昌明文化为天下先，当能见信于邦人君子也。兹当创办未久，国人未能周知，来学者亦未见发达。将来学生发达之时，当益计划扩充学制，以副来学者之希望。海内通人硕学以及青年学子，不吝珠玉，关于本校学制之组织，尽可随时赐教。有善必纳，决不故步自封。敢请大志将此函每期载入通信栏内之首，以介绍青年诸君之有志学问者。大志以教育青年为宗旨，想必乐于介绍也。幸甚幸甚。此启

法国文学协会
中国上海支部 法文专修学校一民上

(录自《新青年》2卷8号)

陈独秀答T.M.Cheng

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

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此复。

记者

(一九一六.十一.一。)

T. m. cheng 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近来世界主义大昌，于是世界语之声浪，广布五州，竟为今日世界注目之物，何其盛也。窃世界语为人造字，系柴孟霍夫博士 (Dr. Zamenhof) 所发明，原名为 Esperanto，译即希望之意，希望世界大同，人类感情藉此得以融洽也。文言一致，人类智识，藉此得以贯通也。夫世界语之文法整齐，亦简单易学，反对者旋以为不能示高深之学术，斥为无用之学，其说然乎否耶？质鲁如余，岂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发明一事一物，断无无用之处，虽无彰明卓著之成绩，而习之亦不致有损无益，究竟多得一种学问也。矧乃希望万国通行之世界语乎？质诸足下，以为然否？伏祈裁答。

T. M. Cheng 顿首

(录自《新青年》2卷3号)

陈独秀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

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的，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不独洋钉洋针，充斥吾市，即写字之墨、日食之米（年来粤商购米，不之长江而之越南，以厘税重也），外货亦日渐输入。其他大宗之布帛、纸、油、香烟、肥皂等等，更何论焉。——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盖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矣。急不择语，咎又奚辞，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

独秀谨复

（一九一六.十一.一.）

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其意若曰，余虽愿一意著述，造福青年，无如一般青年之不可教耶。嗟夫先生，此言误矣。仆以为无收获者必为未事耕耘之人，必为未事播种之人，若播种焉耕耘焉，则收获之多寡虽不可必，然必有所收获无疑 颗粒无收者，欺人语耳，必不可信。即

如先生主撰之大志，出版迄今，仅有八册。然我青年界所受之影响，已属不可数计。仆之友人，爱读大志者甚多，而仆亦即为拜受先生厚赐之一人。嗟夫，仆敬先生，仆爱先生，仆不能不有所厚望于先生。夫栽培植物，尚须多量之岁月，何况栽培青年。先生既以青年教育为己任，宜有但事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勿挟言者淳淳临者藐藐之成见。当知有许多青年，以大著为菽粟水火而不可一日缺者。目下虽无明效大验之可言，然先生既以笔以墨以心以血为之下种、为之栽培，则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收获之丰，不言可喻。先生幸勿以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一部分人之苟安旦夕，遂谓青年界无一人可资造就。当知有许多良好青年，正在努力修养，渴望先生大著，为修养之南针。先生一身系青年重望，务祈为国自爱。琐琐奉渎，语多不检，乞先生谅之。

毕云程白

（录自《新青年》2卷3号）

陈独秀答莫美卿

美卿先生：

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因产业加增之率，低于人口加增之率也。以脑力体力衰蔽言之，宜励行择种留良之法，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岂独早婚之应戒已哉。

独秀谨复

（一九一六·十一·一。）

莫美卿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属读大著，茅塞顿开。先生热心救世，为吾青年造福，无任钦佩。今仆有一问题与青年前途似有莫大关系，敢乞先生注意。问题为何？即早婚是也。窃思青年有志之士，而欲成功一事业，必先养成六种之要素。六种之要素为何？

一曰学问。

二曰恒心。

三曰资本。

四曰经验。

五曰信用（即道德）。

六曰身体（即健全之身体）。

以上六种要素，为成事之本，缺一不可。然而吾国青春少年，皆因早婚之故，致其学问不能进步，恒心不能到底，资本不能积蓄，经验不能富足，信用不能维持，身体不能强健。于是乎其希望永无达到。其事业永无成功。溯其原因，良可浩叹。观于近来青年成功者之不多，而社会事业之不发达，虽其原因综错不止一端，而早婚之害，则已事实彰彰者也。夫家庭之组织，非真有害而无利。要必先有自立之资格，而后方能养育其妻子。否则，自身尚欲依赖于他人，更有何力顾及妻子乎？故不能自立之人，强之结婚，则种种之害相因而生，虽有智者亦不能避也。彼欧美日本等国，其国民非至法定之年龄，无自立之资格，不得结

婚。故彼国之青年，精神活泼，毫无愁苦。彼国之事业，蒸蒸日上，日愈发达。吾国则不然，既无法律之限制，又无相当之劝导。青年无知，仅知其可喜，不知其可惧。及至木已成舟，悔悟不及。一生荣枯，因此而定。据仆所闻，今日非但中下等社会中，十数岁之国民，结婚者比比皆是。即在校受教育尚未毕业之学生，自十六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十分之七皆已成婚。呜呼，吾国之为父母者，对于此蓬蓬勃勃有望有为任重责大之青年，不知养成其智育德育体育之完全人格，而反汲汲于有害无利之婚姻是急。无端使其儿女相处于黑暗家庭之间，增其担负，束其自由，处置其于永远不能自拔自离之境遇。呜呼，亦可怜矣。故吾常见许多青年之不能成功，非真不能成功也，其可怜之境遇，使之不能成功耳。许多青年之堕落，亦非其自甘于堕落也，而其可怜之境遇，使之堕落耳。此虽过激之言，然亦实情也。仆自幼贫苦失学。年十六来沪习商，藉以糊口。当时困苦万状，非但西文莫名其妙，即粗浅之中文，亦难卒读。其后幸抱定一暂不结婚之宗旨，日则以新闻纸为吾良友，夜则风雨不辍，研习英文。迄今忽忽十年。自问学问虽无门径，而对于吾个人自立之基础，已稍稍成功。再俟数年，仆即依此基础，谨慎进行，虽将来之结果如何不可预知。然而比之于许多已成婚可怜之青年，略胜一筹也。然仆若起初稍一不慎，则亦成一不能自拔之无告青年矣。可谓险矣。仆意今日已受害之青年，虽属可怜，而未受害之青年，又将纷纷加入。素仰先生以救青年为职志，一言一语，皆为青年界之晨钟。可否将早婚之害，时时著文，宣之报端。使一班有志未婚之青年，读之有所觉悟，得以造成其自立自由之基础。此功德当无量也。余不白。

莫美卿顿首

（录自《新青年》2卷8号）

陈独秀答陈蓬心

蓬心先生：

示悉。社会服务，诚为美风。惟国中公共事业不甚发达，习惯未成，难以实举。鄙人尤有望于青年诸君者，首以“为自己服务，不令他人为己服务”为第一要义。欧美著名书报甚多，各科派别分歧，非片纸可罄。本志将设介绍书报一栏，以副读者诸君之望。所询工具之事，别由吴先生撰文奉答。兹不及。

记者

(一九一六.十一.一.)

陈蓬心致陈独秀

新青年记者大鉴：

读最近大志吴先生之“青年与工具”一篇，不啻对于我青年界之狮子吼。但所谓刨床钻台锯座，吾青年曾目睹其物耳，聆其名者，恐寥寥无几。若自修室中有之，殆可谓全国无一人矣。鄙意拟求吴先生，将该三物之结构形式各绘雏形，登诸贵志，并说明其功用，及普通工界名称，与上海在何处购买。又拟求贵社诸先生，提倡我国之工场，制造此等工具，倘能与商务印书馆周君厚坤，商量制造较简单之刨床钻台锯座，廉价出售，以惠我青年

界，即以福我中国之前途。则庶几吴先生之文，为不虚矣。再读第二卷第一号大志，有湖南舒新城君投函，愿提倡社会服务，以改良社会，热忱卓见，实获我心。惟社会服务，千条万缕，从何入手，鄙意拟请舒君或贵社记者，拟一入手办法，或一人单独可行者，或须数人共同行之者，务须简便易行，俾同志青年，可以着手试办。鄙人不敏，愿为先驱。再鄙人欲读英美两国关于新学说，或时事之著名杂志，以何者为佳，请贵记者列举数种见答，俾有遵循，不胜感禱。即请道安。

陈蓬心谨白

（录自《新青年》2卷8号）

陈独秀答毕云程

来示盛气督责，至佩极感。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为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反不若仇视新法者，或有觉悟之日也。此等心理，关系中国前途甚大。一经足下揭破，用敢略贡数语，以相证明。

独秀复

（一九一六.十二.一.）

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承复感极。以今日时局之艰危，仆岂敢妄以为乐观。（仆身居工商界十年，所感之苦痛，较先生尤甚。）特仆意无论时局危至若何地位，吾人之精力一日未绝，必须与此艰危之环境奋战。矧国事前途，其存其亡，尚系我侪青年之手。吾人果能为积极之奋斗，安知必无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日？进一步言之，假定国事前途，业已完全绝望，然吾人既已身陷重围之中，岂遂可束手待毙。努力奋战，杀开一条血路，从万死中求生，固我侪天职也。曾涤生氏有言，官兵打仗，四面皆是生路，惟有奋战是死路。抵抗官兵者，四面皆是死路，惟有奋战是生路。今日之中国，既已处于四面皆是死路之地位。我侪为中国人者，亦惟有奋战是生路，奋战以外，非爱国男子所忍为，亦非爱国男子所忍言也。更进一步言之，纵观世界强国，其国民之奋斗为何如。自强不息，勇猛精进，方有立足之地。惰力一生，国即灭亡。至大至强之国，倏忽渐灭，历史中不乏其例。可知人生当国家艰危之时，固然要奋斗，即生当国家强盛之时，亦不可不奋斗。总之既生而为人，便有奋斗之义务。际遇艰危而馁者，非也。际遇强盛而骄者，亦非也。质直言之，吾人可不问环境之如何，而一以奋斗出之可也。换言之，环境之变化，其为境虽殊，其为驱策吾人以上于奋斗之途，则一也。善夫先生之言曰：“一息尚存，寸心不懈。”善夫善夫。人生斯世，脑海中宜有一理想世界，以为进行之

鹤的，不可囿于现象世界，而为之颠倒。如是始有裨于人类进化之大业，而人生为有意味。云程不学，所怀若此，先生其进而教之。

毕云程敬白

(录自《新青年》2卷4号)

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仆前函感于先生之沉痛语，措辞似近“盛气督责”，其实当仆作书之时，悉本于良心之直觉，并无一毫意气存乎其间，且仆自信前函所述，为仆今后数十年处世之方针，躬行实践，以自尽其匹夫之责，非敢以狂妄之言渎先生也。先生谓“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宥于现象之故。”此言与仆意相符。然仆有一大疑问，国人何故而为现象所宥。以仆所知，世界万事万物，只有变化而无新旧，若必以新旧二字言之，亦只有新陈代谢而无永久不变之旧。自生理言之，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昨日之我之细胞，死去者不知若干万，今日之我之细胞，新生者不知若干万，孰能使昨日之旧细胞不死，今日之新细胞不生。自心理言之，思想之变迁，尤非人力所能保守。孰能使今日之思想，密合于昨日之思想，而无丝毫之异。自生物言之，花开花谢，谢者旧而开者新，未几新者复谢，而更新者复开。孰能使旧者不谢，而新者不开。自时间言之，旧者去而新者来。孰能使旧者不去，新者不来。若此诸例，更仆难数。总之，新旧者，乃比较之辞。有新始有旧，

有旧即有新，新陈代谢，乃为自然公例。无论何人，莫能违反。彼昌言守旧者，不知其自身之细胞，已日新又新，而彼之言语行为，亦不能不受时代之影响，而稍稍革新。例如某先生，夙醉心帝制，而在今日亦承认民国总统，此其著焉者也。故以仆所见，我国人之新者固新，而旧者亦未尝不新，旧者之新，比较新者之新为旧，非真能守旧也。即以我国历史证之，虽曰陈陈相因，而其新旧递代之迹，历历可考。惟仅有自然之新，而缺乏人为之新。故虽有变迁，而其迹不显。然旧法之不能墨守，则闭关时代，已示其端倪。仆以为欲为今日言守旧者求一切喻，莫若光复时之保辫。彼以辫为向来所有而保之，不知三百年前固无此物。今日政治上之革新，社会上之革新，彼守旧者以为向来所无而反对之。殊不知其自身未生以前，亦为向来所无。思想之窒塞，一至于此，我侪之罪也。仆以为今日第一要事，惟有导国民之思想，以上于自由进化之途，舍此一事不能为也。琐琐书来，不觉盈幅，暂止于是，容后再陈。

毕云程上

(录自《新青年》2卷5号)

陈独秀答常乃德

乃德先生：

章实斋分别文、史，诚为卓见，然此为著作体裁而言。足下欲径称说理、纪事之应用文为史，此名将何以行之哉？足下意在分别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作用不同，与鄙见相合。惟鄙意固不

承认文以载道之说，而以为文学美文之为美，却不在骈体与用典也。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骈文用典，每易束缚情性，牵强失真。六朝之文，美则美矣，即犯此病。后人再踵为之，将日惟神话妄言是务，文学之天才与性情，必因以汨没也。又如足下所谓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二十世纪之世界，其或可以已乎？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

足下对于孔教观念，略同顾实君。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决非向壁虚造，自无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愚于来书所云，发见一最大矛盾之点，即是足下一面既不信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意谓后人所攻者，皆李、刘、叔孙、韩愈所败坏之孔教，真正孔教非主张帝王专制者也。一面又称孔子扶君权，尚一人专制；又谓代议政治，非郅治极轨，民权未易言。孔子之言未可非。由足下之言，更明白证实孔子主张君主专制（无论孔子主张君主专制，为依时立论与否，吾辈讲学，不可于其学说实质以外，别下定义），较之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树义尤坚矣。

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含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犹之足下谓孔教为后人所坏。不知宋儒中朱子学行不在孔子之下，俗人只以尊古而抑之耳。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事彰著，不可谓诬。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则可，谓汉、宋伪儒败坏孔教则不可也。足下谓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非忠于一主。愚则以为可惜者，孔子所干有七十二君，而无一民也。足下揣测孔子之意，以为众人专制，不若一人专制。窃以众之与专，为绝对相反之形容词。既为众人，何云专制？此亦甚所不解者也。

足下又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云者，无可议也，非箝制舆论。此语尤觉武断。上古有道之世，果一无可议如足下所想象者乎？古代政治，果善于欧美近代国家乎？古代文明进化，果优于二十世纪而完全无缺乎？不然，何得谓之无可议耶？（吴稚晖先生有言，成周三代曾隆，汉、唐之治曾盛，所谓满清康熙、乾隆朝曾极治者，而其所留遗人间之幸福，即以洛阳、长安、北京之街道而言，天晴一香炉，下雨一酱缸而已。使吾民拖泥带水，臭秽郁蒸之气，数千年祖祖宗宗鼻管亲尝而已。（见十一月八日《中华新报》）此可为天下有道之写真。）

且足下不观庶人不议之上文乎？孔子意在独尊天子，庶人无权议政，亦犹之诸侯无权征伐。合观全文，宁有疑义？足下又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乃对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夫学者、政治家非预言者，对时立论，何独孔子一人？正以其立论不能范围后世，则后世亦不能复尊之耳。

愚尚有一言正告足下及与足下同一感想之人曰：“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骨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时间之生命也。尊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一九一六.十二.一，

常乃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座右：

前从友人处假得新青年二卷一二两号读之，伟论精言，发人深省。当举世混浊之秋，而有此棒喝，诚一剂清凉散也！惟仆于二号通信中，胡适君论改革文学一书，窃有疑义，愿为先生及胡君陈之，乞裁正焉。

胡君所陈改革八事，除（五）（八）二项先生已论及外，其余若（二）（六）两项，仆极端赞成，亦无庸赘言，惟（一）（三）（四）（七）各项，咸有一二疑义，不敢自默也。

吾国于文学著作，通称文章。文者，对质而言；章者，经纬相交之谓；则其命名之含有美术意义可知。夷考上古文之一字，实专指美术之文而言。其他若说理之文谓之经，纪事之文谓之史，各有专称，不相混淆。降至汉晋，相沿勿衰。故观江都龙门诸子所为纪事说理之文，要皆锡以专名。而如文选所载，虽多浮艳之

词，实文之正体也。自韩退之氏志欲标异，乃创为古文之名。后人推波助澜，复标文以载道之说，一若除说理之文而外，即不得谓之文者，摧残美术思想，莫此为甚！胡先生以古文之敝，而倡改革说，是也；若因改革之故，而并废骈体，及禁用古典，则期期以为不可。

夫文体各别，其用不同。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冶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亦何可少者？譬如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以骈佳乎？抑以散佳乎？此可一言决矣。仆以为改革文学，使应于世界之潮流，在今日诚不可缓。然改革云者，首当严判文史之界，（今假定非美术之文，命之曰史。）一面改革史学，使趋于实用之途，一面改良文学，使卓然成为一种完全之美术，不更佳乎？若六朝之敝，非因骈体，实用骈而无法以部勒之敝也。譬如衣木偶以华衣，华衣累木偶乎？木偶累华衣乎？今若取古文之法以御骈文，斯可矣。

尝观今之老师宿儒，动倡保存国粹之论。其所谓国粹者，乃指道德学说而言。然愚以为道德学说，乃世界之公物，非一国所得私有，即不得目为国粹。真正之国粹，正当于此等处求之。吾国之骈文，实世界唯一最优美之文，（他国文学，断无有能于字数音节意义三者对整，而无参差者。）而非可以漫然抛弃者也。至专以古典填涂，而全无真义御之，如近世浮薄诗家所为，固在必革之列。然若因此而尽屏古典，似不免矫枉过正，诗文之用古典，如服装之御珍品，偶尔点缀，未尝不可助兴，但不可如贫儿暴富，着珍珠衣过市已耳。若用俗字入文一项，愚意此后文学改良，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

忆某报文艺话中，曾有一则，谓白话小说，不如韵文能写高尚之情。即如京戏谱，可谓鄙俚，然其词句亦有非白话所可代替

者。如“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一语，写思家之情，断非白话所能形容云云。愚谓他日白话体进步，此种语情，未必不可表出。但今日之白话，则非其伦耳。

为今之计，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制矣。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较之乞灵罗马字母者，似亦稍胜也。

诗文须有真性情，独标我见，不相依傍，自是作文要诀。然此第于平日之蓄养致力可耳，若于执笔作文之际，乃怀不落窠臼之见，此与所谓文以载道之习气，实无以异。诚恐人见虽除，而支离之弊又起也。未审然否？

德年未及冠，智识非所敢言，惟愿以其不完全之理想议论，敬乞长者为之完成之耳。或亦先生之所许乎？

再观先生驳康南海书一文，亦有愚见，略陈左右。先生之驳康书是也，独其中有“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一语，未审所谓孔教云者，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云乎？抑指真正孔子之教云乎？（教者教训，非宗教也。）如指其前者，则仆可以无言；如指其后者，则窃以为过矣。

孔子之教，一坏于李斯，再坏于叔孙通，三坏于刘歆，四坏于韩愈。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所可考见者，惟其一生之行迹耳。然亦经伪儒之涂附，而令人迷所选择。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岂忠于一主者乎？公山佛肸皆欲应召，岂拘泥叛名者乎？其所以扶君权者，以当时诸侯陪臣互争政柄，致成众人专制之象，犹不若一人专制之为愈也。所以尊周室者，以当时收拾时局，在定于一，而周室于理最顺故也。岂忠于周哉？孟子以继孔自命，而独不倡尊周，且大张民权之说，斯可

知矣。

又文中引论语“民可使由”及“天下有道”二节，似有不嫌于原文者。仆以为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云者，谓无可议也，非如近世民贼独夫之箝制舆论也。代议政治，本非郅治极轨，则孔子之言，亦未可非也。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则纯系对于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且平心论之，今世学者，竟言民权矣，其实言民权毋宁言士权之为愈。必欲于今世求可言民权之国，惟德意志其或庶几。（以其国民皆士也。）若其他诸国，则远逊矣。若于吾国则所谓民权者，亦等于专制之称天而已。而不然者，试以吾国之国政，尽公诸四万万人，而求所谓大多数之民意者，诚恐蓄发辫，用旧历，废学校，复拜跪诸政，将继续而颁行矣。然则苟非世界大同，人尽圣哲，民权未易言也。孔子之言，又何可非哉？

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后学常乃德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王统照

统照先生：

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惟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医，且恐非教育可救也。此复

记者

（一九一六。十二。一。）

王统照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统照窃以为吾国衰弱不振之原因，即国民好学性之颓丧，而尤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夫学犹殖也，不殖则荒。矧文明日进，科学日新，尤非努力猛进以求学不为功。然负此努力猛进求学之责任者，诸青年也。且为先知先觉而负启迪指导一班国民使之努力猛进求学者，亦非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而完全任此仔肩者，固吾高尚纯洁诸青年之责任也。然今之青年，其下焉者，卑鄙苟且，可勿论矣。而稍知自好者，亦不过敦行谨言，期于自守焉尔。已其上焉者，又只知死守学校晦闷之课本，专攻一二陈腐之科学。于所谓勇猛精进，所谓活泼进取，所谓奋斗自勉，或充尽我青年之责任于万一者。吾虽交游寡而闻见窒，盖亦鲜其人矣。虽然常此不治，将成痼疾，而医之之捷径，则报章杂志，固为最良之针砭，而最利之利器也。虽然，报章备矣，杂志有矣，且完美优好而无疵矣。而所谓今之青年者，乃多惜雪茄醇醪之小费，车马声色之时间，而不一购阅焉。不宁惟是，且即有图书之阅览处，报章杂志之陈列所，恐亦惟愿浏览一二野狐禅之笔记，与夫妄诞不经之稗史。或则涉猎数页猥鄙琐碎之杂著，以及文采风流之小说。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论，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乃绝不一睹焉。嗟夫黄芦白苇，弥望皆是，可胜慨哉。是言虽过于激，

然亦确有是等之青年，而非统照之誓言也。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然青年之不悦学也如是。苟不有以振启之警醒之则如列珍羞，而未口试，陈纨绮而未体服者，奚以异。然统照不敏，窃愿贵志于报余附白，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及读书之方法，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其规程，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读书性，庶不无小补欤。上所陈者，多属平淡无奇。而鄙见如此，吐之斯快，如蒙斧正赐答，则无任幸甚。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王统照白

(录自《新青年》2卷4号)

陈独秀答孔昭铭

承示督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物此志也。只以学识浅陋，无以应读者之需求，殊惭愿耳。欲改造社会，必首明社会所以成立，及进化或退化之原因。然后据往推来，始有定见。惟已成之社会，惰力极强，非诚心坚守足下所云“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则自身方为社会所同化，决无改造社会之望。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

独秀复

一九一六。十二。一。

孔昭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屡读大著，觉先生救世热心，直跃纸上，佩甚佩甚。吾国社会迄于今兹，已陷于麻木不仁之象。扩观现时人物，一派则趋于个人快乐主义，只知得过且过，纵欲为非，绝无未来思想，印其脑际；一派则抑郁悲愤，谢绝尘世，孤芳自守，日流于厌世思想，以为可以告无罪天下。夫浅化之民，未来观念最为薄弱，饥则觅食，渴则求饮，只图目前，遑计未来。盖悠久远大之事，彼等固未尝有此脑力，可以推测及之也。而寄生于腐败政治时代，天地尽秋气，四海皆秋心，即令有志之士，苟非顺应此等龌龊现象，与之同化，必致无立足余地。故袒护厌世者，以为彼等处政治清明时代，而犹作此态，诚为暴弃自甘之徒。而处于今兹暮气重重，腐朽不堪之中国，要亦伤心人别有怀抱，未可吹毛求疵为也。仆以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之政治，信堕落腐败矣。然积人存国，我固社会中之一分子，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勉，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故仆年来颇确守“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盖社会苟未进于完全美满之景象，一切问题皆属于枝叶中之枝叶，仍不免有“惰性”之发生也。仆以为吾人所尤当所谨守勿失，持之以恒者，则莫如先生所谓诚之一字，语曰：不诚无物。又曰：诚之至者，金石为开。吾国士夫，何尝不高谈道德。而究之纸上空谈，何裨实际。且其自身亦未能以身作则，为人效尤。社会信仰之力，失其附着点。

遂如不系之舟，放乎中流，听其所之，而益不可救药。彼东人以“文字国”诮我，真我人所应革面洗心，一洗此语之污辱者也。社会与政治，究应如何方法而促进之，以日即于光明，此本至绞脑之问题。仆则固确信“Reform Society”为我人处世立身之方针，而的然不疑者也。未知大著亦肯介绍此等西方学说，以灌输我青年脑海否。揣此奉悬。余不白。即请

撰安

萧山孔昭铭上

(录自《新青年》2卷4号)

一九一七年

陈独秀答吴虞^①

又陵先生足下：

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即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一.一.）

吴虞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读贵报孔子平议，谓自王充李卓吾数君外，多抱孔子万能思

^①吴虞（1871—1949），字又陵，近代学者、教育家，四川新繁人。时为成都府中学堂教习，五四运动后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有《吴虞文录》。

想。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拙撰辛亥杂诗，（见甲寅七期）李卓吾别传，（见进步九卷三四期）略有发挥。此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

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亦犹是耳，岂好辩哉？拙撰宋元学粹语例言引李卓吾语，前清学部曾令赵学政启霖查禁。癸丑在成都醒群报投笔记稿，又由内务部朱启铃电令封禁（此次方准启封）。故关于非儒之作，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章行严曾语张重民曰：“辛亥杂诗中非儒诸诗，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不佞极愧其言。然同调至少。如此间之廖季平丈，及贵报通信之陈恨我君之见解，几塞宇内。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尘清监。教之为幸。即颂

撰安

弟吴虞谨启。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李平

李平先生：

为新青年撰文之事，已请之蔡先生。惟校事多忙，必稍迟始克慰读者诸君之渴望也。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一。一。)

李平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日前晤高君寿生，闻先生近有北京之行。兹者蔡子民先生，已应教育部之聘，出长北京大学，日内亦将北上。先生与蔡先生素有相知之雅，希即就近特约蔡先生，关于青年文字，统假大志发表为盼。蔡先生过申时，曾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并谓科学昌明，宗教腐说，已失其立足地。今后欲维持道德，改良社会，当普及美术思想，养成人类最高观念云。以美学代宗教之伟论，在吾国思想界，实得未曾有。惜是日时间短促，且非讲题范围，以致语焉不详，听者未能充分了解也。最好请蔡先生著论阐明斯理，登诸大志，以为迷信宗教者告。则造福青年界，岂浅鲜哉。想蔡先生以介绍西洋文明为己任，且新自近代

文化中心地法兰西回国，而对于吾党青年，尤抱莫大之希望，必能俯允所请，惠我爱读大志诸君子也。专此布达。敬请

著安

李平谨白

(录自《新青年》2卷5号)

陈独秀答褚葆衡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记者

(一九一七.一.一.)

褚葆衡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屡读大志，钦佩无似。际兹公理销沉邪说横行之时，贵报乃能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诚足称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也。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多所输入，实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对孔教，尤能发扬至理，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作当头喝棒也。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

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觐，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爱读者褚葆衡白

(录自《新青年》2卷5号)

陈独秀答T·M·Cheng

仆亦赞同尊友之意。足下可暂置世界语而习法文。通法文者，习世界语当其易易也。此复。

记者

(一九一七·一·一·)

T·M·Cheng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蒙覆极感。至论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完全应用。拜领教言，欣慰奚似。顷有友人来云，世界语语法既整齐，亦简单易学，而学习者寥若晨星，其故何欤。仆以不知对。友云，世界语之语法，与法兰西文大同小异。习世界语，宁习法文。盖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邦，而书籍尤富，不若世

界语书籍寥寥无几也。夫世界语虽学习而精通，亦不能实用，有何益哉。嗟呼！世界语虽名为世界语，然终难普及世界也。一般文人学子，深知其由，所以习之者少，而反对者多也。我劝君舍世界语而习法文，将来获益之多，岂可限量耶。君不见夫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三号法兰西文学协会Aleiance Francaise之通讯乎。独秀先生介绍云：“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犹为科学文艺之渊藪。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即无力远游之士，多读法兰西书，视昔日之习英文专为习商业计者，思想界所获宏益必多。法语知识，诚吾学界之所急需也。”君信我说乎？请舍世界语而习法文，然乎否耶，君自裁酌。仆闻斯语，疑信参半，不克定度。为特上书，乞赐教言，以解仆疑，而定舍取。曷胜幸甚。

T.M.Cheng顿首

（录自《新青年》2卷3号）

陈独秀答孔昭铭

尊论西洋独身主义流行之原因，及吾国欲禁早婚，必先打破家族制度。极是极是。惟早婚主义，源于嗣宗主义，即家族主义。宗族嗣续主义，源于儒教孔道祀祖孝亲主义。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不独早婚一害已也。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复

（一九一七·一·一。）

孔昭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大志于答某君通信中，有独身主义之主张。考斯种思想，在西方各国已有日益流行之倾向。而其所以如此者，厥故有三：

（一）人类脑力发达，则其对于情欲的观念自然日趋薄弱。盖思想高尚之人，尝多注意于正当职务。自朝徂暮，不遑宁息，更何暇纷心于他种问题。故鸿儒如康德、斯宾塞辈皆终生独居，甘作鳏鱼。而爱理沙白女王，且宣言以英吉利为夫不愿作他人妇。无他人人生目的，须向直线进行，百折不挠，然后始能达到成功之域。而缱绻床第，每令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学者中所以有怀抱此种思想者以此。（二）则欧人富于自主精神。一有眷属，则动受掣肘，为所束缚，转形不便。故不如弗行结婚，个人自由，可以完全无缺。（三）则现代经济组织，日益变迁。生活程度亦倍觉困难，若举行结婚，则负担之费陡增。个人在经济上地位必致左支右绌，无法弥补。何如牺牲快乐，以我行我志为愈。故法国人口出生之率，逐年递减。（原因复杂此亦其原因之一）法政府甚至仿行中古奖励政策，以为补救之计。观此情形，则独身主义之流行西方，可谓有日益发达之趋势矣。至于我国，素以家族主义立国。为父母者，以亟于抱孙之故，子女结婚年龄，尝不使之揆梅逾期。故有乳臭未干，雏发甫脱，居然授室宜家，实则其子女智识尚属梦昧，而身心两面，犹未臻乎完全发达。质言之，处于家族制度下之结婚问题，纯为被动的，而非出于自作主张之地位。其害之所

及，转使经济上失其独力资格，而增加若干困难也。仆以为欲禁止早婚，非先打破根深蒂固之家族制度不可。若提倡独身主义，犹在第二著也。鄙见如此，未知先生以为然否？务祈赐教为幸。敬颂撰安。

孔昭铭上

（录自《新青年》2卷5号）

陈独秀答顾克刚

克刚先生：

读本志而急知取舍如足下者，诚堪钦佩。惟记者学浅，不足厌读者诸君之望，惭愧惭愧。

独 秀

（一九一七·一·一。）

顾克刚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伟鉴：

屡读大志，获益良深。仆幼既失学，少长所与周旋接触者，类皆先生所云之陈腐朽败之老者壮者，互相传染，薰受其毒。故仆年虽未及弱冠，而脑筋中已满贮旧式思想。及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西法之效用，腐旧之当废，

新鲜之当迎，于是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迄今虽不能如先生所云之完全新青年，然自认确能扫除往日脑中之旧式思想。此非先生挽救青年之功而谁哉。仆读毕云程君之通讯，而深表同情。先生幸勿以青年堕落万象销沈，而或抱悲观，则前种斯因，后必获果。青年教育，当渐入佳境矣。兹有询者，吾国国民之对于西洋文明，一般顽固派排斥诋毁，姑勿具论，即一般维新派，信仰西洋文明甚坚者，然亦徒羨其美，望洋兴叹，大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而入之感。仆窃以为不然，仆以为西洋文明，其精神不外二者，曰积极曰崇实。苟能遵斯二者而行，则处处合乎西洋文明，何难之有。反是曰消极曰虚饰，即东洋之庸懦恶习，即今日中国之社会习惯也。鄙见如此。尚祈先生斧正赐覆。肃此即请撰安。

顾克刚上

（录自《新青年》2卷5号）

陈独秀致胡适之

适之先生左右：

奉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弟与孟邹^①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

^① 孟邹即汪孟邹，原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

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特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余详孟邹书中，俗冗不及详叙。手颂道祉

弟 独秀白

（一九一七年一月）

《新青年》欲求足下月赐一文，作或译均可。又及。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程演生

演生先生：

手教谨悉。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大作何日告成？急欲一读。谨复。

独秀 一九一七.二.一.

程演生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

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沈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仆久欲作“予之中国近二十年文学观”一文，因循未果，然他日终必质之足下以评论之。余不尽宣。

程演生启。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叶挺

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足下颇疑宇宙之谜，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足下其无疑于吾言乎。

记者

(一九一七.二.一.)

叶挺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

濁世，感甚感甚。第仆中衷多怀。窃以君乎不贵苟同之义，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今吾群之颓丧，正伪君子乡愿之流，扬波扶流，致一世胥溺。是非不辨，黑白淆混，贪昧馘法，鼓簧涛张，尽灭天良，日逐兽欲。而能逃出坑堑者实难其俦。有心人哀而药之，究循何道耶。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此二字实吾败群之返魂丹也。陈白沙曰：“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其所谓觉，即佛氏之解脱。千古贤圣，莫不由此中产出。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教旨，力振末世。其致良知三字，亦必于觉悟而后立。举世间一切之道德惑纒，亦必于觉悟而后立。无觉悟，无解脱，其所行皆伪也，皆不真也。陈白沙禽兽说曰：“人具七尺之躯，除了以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其所谓心所谓理，即良心，即公理，即觉悟也。曾文正公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世以其言为过当。仆以良心评判，实为至正不易之理。然何以为圣贤为禽兽，亦在觉悟与否而已。陈白沙赠彭惠安别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威武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及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其所谓自得，亦必由觉悟中做出。非徒颂圣人之言，模圣之行，便能见道，便号为君子也。又曰：“为学须从静中养出端倪。”所谓端倪，亦即觉悟也。王

阳明先生以知行合一之说训人，最切衰世之病。其精警之语有曰：“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觉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所谓道，即由觉悟中得来。朝闻而夕死无憾之道，即一切解脱，超然物相。惟有我相证明，一心一丝不滞也。以上赘摭陈言，于觉悟真谛之义，究未尽晰，以下再略述之。

宇宙胡为而然耶，吾人何处而自耶。耶教以天帝为创造宇宙、创造人类。而天帝乃无生无死，自然自在者。其说至近世科学兴，已根本动摇矣。科学家以原质莫破，为宇宙庶类组织之原，于实验上固不谬。然试深思之，而大惑不解者，几比宗教之说为尤甚。原质莫破，果又从何而来耶。科学者则以“以大”涡动之说解之。然以大为耳目所不得加，感官所不得接，无重量，自然自在，与彼宗教所说之天帝根本之义，果何差耶。于是哲学家持实质论，观念论，以及实质惟识论，实质唯物论、二元论、一元论、我识论、凡识论、有神论、无神论、凡神论等等。于宇宙人类之原始，仍蒙懵能完全解答。宇宙诚一不可思议之物哉，人类诚一大怪物哉。呜呼，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吾人试瞑目静思之，吾人真正无上之鹄果何在。彼没溺于人欲人中，为情驱驭，攘劳为恐日不给者，可等诸自嗟以下。世不乏明哲之士，古今来不乏贤智之辈，仆未见有一足以议此也。世界幻场耳，人生虚梦耳，举世一切可喜可慕之事，吾心胡为而爱之。举世一切可苦可危之事，吾心胡为而恶之。爱之恶之，果有何价值，有何目的。惟独任吾之精神不累于外物，不累于情欲，随遇而安，惟行吾素，险安足惧，名安足慕，利安足求，圣人所谓无所为而为之是也，即仆所谓觉悟真谛之义是也。正真之道德，必从觉悟中做出。能觉悟则一切斩绝。其行其言，不期自合于道域，不期自不隳于恶。盖世间一切

之恶之不道德，皆累于情欲而后成，未闻无所为而为之者也。然世必有大惑于吾言者矣。以为人生已如幻梦，所为俱无最高之价值，又胡为去欲澄心，希圣希贤，徒自苦励。循其是心，甚则杨朱之肆欲狂乐，自促其生，大败于人群，次者亦将颓寂不振，恬淡无为，如末世学佛者。呜呼此辈，岂真能觉悟哉。特深溺于当前之物欲，藉解脱之空言，冀蔽良心之责悔，而苟安可哀也已。故古来先觉，知宇宙之虚幻，无足冀求，皆不敢大张其言。只待人由经历挫折中觉悟。佛氏言之，而流弊滋大。惟日本学者得其真谛，了悟生死，超脱物欲。武士道之流，盛昌舍生赴义，以捍国家，踵背相接，其故可思矣。夫人瞽于当前之情欲，陷没难拔，虽父母兄弟流涕而劝，犹不反顾。何则劝者之情，不足以克其爱溺之情也。今足下欲导入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群。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虽日聒于陷溺者之耳，未见其效愈于父若兄之劝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为正的。以清宵良夜之言，激撼其习心。促迫其觉悟。然后能领会善言，臻于道域。惟道德第一关头，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而觉悟又非空言所能为力，若无觉悟之机，虽强聒以忠言善语，求其效十不见一二也。然纵有觉悟之机。不得他人提撕唤醒，力坚其信，亦必旋牵于物欲，而日趋污下。足下勉哉。吾辈青年，坐沈沈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然已稍能觉悟，廓而化之曰，向圣贤路上鞭策。悠悠前路，不知能免陨越否耶。亦惟良心是赖而已。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鞠躬

（录自《新青年》2卷6号）

陈独秀答常乃德

乃德先生：

读来书不厌详求，好学精思，至佩，至佩！

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根本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

足下谓叔孙通、刘歆等依托儒家，乃投世主之好，以为进身之途。足下当思世主于九流百家中，何以独好儒家也？足下既谓近世儒者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为非，何以又言《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耶？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足下岂谓贵族共和制度，有加于民之共和耶？

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以治乱言，王政之治乃一时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里面的。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时

的，乃里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若共和之乱，乃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真共和自身之罪恶。足下有云：

“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可谓一语破的矣。吾人于上陈理由，未能彻底了解，故于共和立宪政体，遂无信仰。无信仰遂无决心。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

独秀 一九一七.二.一.

常乃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年假满来都，购新青年第四号读之，知曩者狂妄之言，已蒙登录，且加以指正矣，欣感何极！虽然，犹有未喻于怀者，故敢卒陈其所见，幸垂教焉。

以史概应用之文，定名自是不当，前书不过假定，取便行文耳。然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究不可以不分，则先生固是其言矣。文学美文，虽不专在骈体与用典，然骈体与用典之文，不能谓为非美文也。骈文不过体裁之异，尚不足道，若古典之为物，则窃以为不善用之，固足以束缚性情，牵强失真，善用之，却可以助文章之省简。譬如叙一事，状一物，以常文说之，累累数十言未必能尽且肖，取相类之古典一二语代之足矣。盖古典之为用，颇似专门名词。名词括物之德，古典状事之情，一也。特是苟专恃古典为生活而成之文，则诚有如先生所言，易伤文学之天才者，惟

因此遂全禁古典，似不必耳。二十世纪虽为物质文明之时代，然精神生活，究不能全然抛弃。则文学美术之文，亦何可少乎？

至仆对于孔学之观念，有数语可以概括之。即仆信孔学之实质，与宗教之实质，全然殊科；又信孔子之言，未尝专主于专制政体。至孔子之道，果适于现在生活与否，仆未尝取孔氏之书尽读而晓其义，不敢断言。然私心窃以为世界过去之圣哲，无论何人所称道之学说，未有能与后世之生活完全适合者，亦未有完全不能适合者。孔子亦其中一人也，则何能外此公例哉？

先生以为汉唐诸儒，何以不依托道法杨墨，而独依托孔子。仆谓此当分两等人观之。如叔孙刘歆之属，此辈心志，不过假学问为干禄之具，值所师为儒者，或世主好儒，遂因缘以为进身之途耳。是孔道自孔道，此辈自此辈，不足论也。乃若韩愈以及唐宋诸儒，其心目所期，未尝不以继道统者自命，独惜所得为孔道之一部而非全体，所见为孔子之雅言而非微言。是故谓唐宋诸儒所学与孔道之一部适相吻合可也，谓孔道之一部与帝制有关亦犹可也，遂谓孔道即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是以分概全，未为可也。若谓汉唐诸儒独依孔道，遂谓孔道即帝制之证，则张道陵未尝不依托老子，摩门教未尝不依托耶稣，将谓老子耶稣亦尝言符咒之术，善多妻之风耶？若谓孔子尝称帝制，与二氏之凭空依托不同，则孔子又尝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矣。今使有人衣狐貉之衣，食必姜酱，自以为是孔子之道，又以是教人焉，则亦遂谓孔子为口腹之鄙夫可乎？

窃见孔子虽尝言专制，而未尝不言大同。如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或有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者。孔子生未开化之世，一言一动，胥以救时为亟，故不得不常言专制。如诗书与礼皆所雅言，而诗书与礼则皆专制之法，不可行于后世者也。（礼

运一节，虽首称大同之美，而其究归于小康。盖亦对证发药之言也。）宋儒学行，诚有卓绝者。仆谓不第宋儒，即如韩昌黎者，吾人虽不是其原道之说，而其品行文章，亦实非后人之所及。特是品行自品行，学术自学术，不能以持躬之正，遂许其见道之笃，亦犹不能见道之笃，遂许其持躬之正。此理至明，无足赘也。

孔子生于二千年之前，其思想言论，不能以后世眼光论之，吾人固不必强为装点，如近世儒者所为，甚至有以周召共和为今之共和，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者。惟孔子未尝专以君主专制为是，则证据凿然，未可抹杀也。昔孟子以继孔自命，迹其言行诚不必尽似孔子，独其谓孔子为圣之时，则可谓深得孔子之奥。孔子之道可推行于后世者，一时字而已。其他一切则皆是枝枝叶叶，适于古者未必遂适于今也。

仆见本期论文中，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其中所言，仆几无一语不五体投地。尝谓今之尊孔者，其病在明知孔子非宗教家，又既知孔子之道，未必全适于后世，然因误认今日社会道德之堕落，为亡弃旧学之故，思以孔道为补偏救敝之方，故不得不曲为之说，而以孔子为宗教，以孔教为国教之议遂兴。此其数皆不明道德之真象，不通论理之思辨有以致之。故先生谓孔子不必尊，仆亦谓孔子不必尊。然谓孔子不必尊则可，谓孔学为纯然专制之学，则犹未敢以为信也。

至于众人专制一语，不过沿用俗称。其实一人为暴，不过专制；众人为暴，乃成乱治。专制之暴，为力尚微；乱治之暴，遂不可救。得失之数，盖较然也。必谓一人可以为暴，众人即不可为暴，窃谓所谓众人者，不过较一人为众而已，持较群氓，犹是少数。以少制多，虽谓非专制焉不可也。矧孔子所值之时，乃是众人各自于其势力范围之中，而施其专制。此则确然为专制而非

乱治也。

先生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此言蕴理至精，仆宁敢妄有訾议？惟是国之施政，不第当问其欲不欲，尤当问其能不能。使国情而适于共和也，则从吾所欲，取共和可也；使国情而不足语此，吾人虽甚欲，其如不能何？（仆此言颇与筹安会人表面所持理由相同。然彼辈谓中国不能行共和，仆则谓吾民既能有辛亥倒清室之战，复能有去岁争人格之战，则吾民非不能行共和者也。至开国艰屯，何国能免？要在吾民有以自奋而已。）

抑又闻之，共和民政无乱也。（真正之共和民政，亦未尝无乱。其乱在挟多数之意以临少数。穆勒“群己权界论”论之详矣。然今日所谓共和民政云者，既不足以语于真正大多数之民意，则为治为乱，固无系乎此耳。故可以不论。）其所谓乱者，必其邻于专制者也。盖今所谓共和民政之乱者，有二端焉耳。其一则蒙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近世民贼大盗之所为，其为专制易见也。又其一则势均力敌，莫能相下，或树党以互攻，或恣戮以快意，驯至如法国大革命后之恐怖时代，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虞，此固世俗所尝目为共和民政之乱者。虽然，苟即其事而一审之，则知此皮相之见，未可据以为共和民政之罪符也。盖其恣睢暴戾之现于外者，固若以大多数之民意行之，而其实则内幕之中发纵指示者，别有人焉。杀人者一人，被杀者又一人，此亦变象之专制耳。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夫共和民政，固足以导吾人于能力发展之途，而共和民政之出乎轨道以外者，其不足以语此，抑亦明甚。

是故苟以共和与王政较，则去取之间，固人情所同；而以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相较，则仆宁取其治者以苟安旦夕耳。何则？

既同有专制之实，同非自动之制，则除以治乱判去取外，尚有何法以轩轾于其间乎？此则愚见所及不敢苟为从同者也。为是与否，尚祈有以教之为幸。即颂撰安。

常乃德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陈丹崖

丹崖先生：

惠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读之不禁狂喜，谅胡适君亦有同情也。惠书有云：“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又云：“文字者，即代表言语之机械也。”此二段名言，前者即排斥古典主义之理由，后者即不避俗语之理由。足下所怀重大之疑，实已自行解释，无待他人之赘言矣。

行文原不必故意禁止用典。若古典主义之敝，乃在有意用典及模仿古人，以为非此则不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体，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会、革新思想耶？西洋近代文学，喜以剧本、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古典实无所用之。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词》多当时里巷之言也。

爱国哀音，与夫以悲天悯人而执笔者，皆世界上可敬之文

豪。胡适君所薄无病之呻吟，非指此类。胡君所谓，正为啸傲湖山，发愁叹肤词辈耳。勿复不尽欲言。

独秀 一九一七.二.一。

陈丹崖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日者得读左右主撰青年，雒诵再三，至理名言，诚青年之药石，其裨益祖国前途者，云岂有量！仆虽寄身异域，亦得于文字行墨间，神交国中贤者，向往之诚，曷其有极！惟间有疑问不解处，仰左右析阐为怀，必乐闻之。

左右所提倡文学实写主义，一扫亘古浮夸之积习，开中国文学之一大新纪元，无任钦佩。至于非古典主义，仆窃有所疑，敢质诸左右。盖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纯乎精神的科学也。然精神每凭形式而发现，无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之文字，决不能载深远周密之思想。古哲先贤所作文字，虽未必尽合现今时势，然确有独到之处。仆谓不必多刻求古深，惟绝对的不用古典，则为过甚。即西洋文学，亦未必全非古典。想君明达，于西洋文学，素有心得，不必多赘。

又左右答胡君适书内，（见青年二卷二册）言之有物一节，左右似不赞同，谓恐失之“文以载道”之弊。夫足下既不主理想主义，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无物，与理想主义有何分解？仆愚昧无似，愈不了解。请左右有以教之。

再胡君适既主张非古典，不用陈套语，然细读胡君著作，亦

不尽脱离关系。岂胡君“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含糊道去”耶？况言为心声，文字者，即代表言语之机械也。与上流社会谈话，尚避俚语，况文字中不避俗字俗语，而得表优婉明洁之情智者几希。

至于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此即不同流俗之意。然人云亦云之说，自古斥为文家大病。岂必新文学谓然耶？

无病之呻吟，本属文人恶习。惟好生乐趣，尽人皆然。谁愿于康庄熙攘之世，而作悲伤憔悴之音乎？惟文字既为精神之外现，精神既受困苦颠沛，势不得不一诉之文字。诗三百篇哀婉怨悱，适足代表一时之情感。即近代俄国文学，在泰西推为昌明之区，因久困于政府暴政之下，人民颠沛流离之苦，一诉之于文字，即此例也。矧忧劳可以与国，士君子每先天下之忧而忧者耶？愚谓惟恐举国上下，沈溺安乐，啸傲湖山，玩愒岁月，敌国至于境而不知，盗贼瞰于墙而不闻，斯诚士子之大耻，较之无病而呻，犹不啻大渊也！种种疑窦，愿一一代为解释。曷深企盼！此上，即颂

著安。

弟陈丹崖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

惠书谨悉。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

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先生前所见之课程表，日来各门均小有更改。中国文学则拟以自魏至北宋为一期，自南宋至清为一期。未审妥否？尚希赐教。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二.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rammar，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日前见公所拟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似以魏晋至唐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是承前。词开曲先，固不待言，即欧苏之文，实启归方。其与昌黎柳州，谅为貌同而心异。又如说理之文，以语录为大宗。以白话说理，尤前此所无。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褻，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故鄙意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质之

高明，以为然否？（后略）^①

钱玄同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钱玄同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独 秀

（一九一七.三.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胡适之君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

^① 此处“（后略）”系原文所略。

之矣。兹反复细读，窃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藉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君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实事者迥异。）短如箴箴引。（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体”亦皆具此优美。然如长恨歌中，杂用“小玉”、“双成”二典，便觉可厌。）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腐败之一大原因。胡君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君虽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君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捷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君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诤文，胡君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君知“坝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

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谓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果尔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蒙于胡君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赞同者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尤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君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用典一层确为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

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一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头脑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学之文，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善化”、“河间”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文学，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之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裳、笏、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裤、碗、盆、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

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祲辟札洪麻”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胡君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薊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鸚鵡，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骞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惟此皆就文体言之耳。若论词曲小说诸著，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仍当以胡君“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无此两事之词曲小说，其无价值亦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相等。故如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至于小说，非海淫海盗之作，（海淫之作，从略不举，海盗之作，如

“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海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水浒”尤非海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前此所谓文学家者，类皆喜描写男女情爱。然此等笔墨，若用写实派文学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价值，若出于一己之假薄思想，以秽褻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则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属于前者殆绝无，属于后者则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为传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价值。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惟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研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君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黄，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论其理固然。而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小说略如上节所述。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

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弟尝为滑稽之比喻，谓中国之旧戏如骈文，外国之新戏如白话小说，以骈文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即其敷衍故实，泛填词藻之处，苟逐字逐句为之解释，则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旧戏之仅以唱工见长，而扮相布景举不合于实人实事，正同此例。白话小说能曲折达意，某也贤，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读白话小说，恍如与书中人面语。新剧讲究布景，人物登场，语言神气务求与真者酷肖，使观之者几忘其为舞台扮演，故曰与白话小说为同例也。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君所举旅美某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某氏

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又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此论甚长，异日当本吾朮见，写成一文，以就正有道。兹则未遑详述也。

钱玄同白 二月二十五日

（录自《新青年》3卷1号）

陈独秀答蔡元培

子民先生：

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甚愿今后宗教家，以虚心研求真理为归，慎勿假托名宿之言，欺弄昏稚。特此敬复子民先生，并告天下。 记者

（一九一七.三.一.）

蔡元培致陈独秀

《新青年》记者足下：

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

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爰陈其概于下，幸揭载之。

信教自由会演说“然宗教真理，乃因研究而愈显”至“凡是者皆今日宗教复兴之所由来也”。案鄙人演说此一节时，大意谓“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如宙之无涯涘，宇之无终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为哲学。任取一哲学家所假定之一说而信仰之，是谓宗教。既皆假定之说，决不能指定一说以强人信仰，故信仰当绝对自由。”次言“德人因信仰物竞争存、优胜劣败之说，而厉行军国之主义，致酿成今日之大战。其实军国主义，在今日可谓至愚。不过我人生长弱国，虽斥为至愚，人亦不信耳。”今报纸所载，多与本意不同。又引力说及进化论，皆鄙人所信。而报纸所载有谓“空间之大，太阳系又何悬而何放，何为而不堕，非科学所能解”。又有“大主造物之功”语，又谓“人猿之间必有一物类，当劣于人而优于猿，今日何为不见”。此为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不知何以阑入鄙人演说中也。

政学会演说报纸所载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最为舛误者，分列于下：

(一) 国民道德“法国系取放任主义”。“放任”为“防御”之误。

(二) “宗教与战争”。此标题当作“道德与宗教”。

(三) “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国教育极为发达”至“如福祿特尔即其一也”。当作“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二

年，法国厉行教育与宗教分离之政策。凡国立学校中，关系宗教之分子，一律排除。现在从小学至大学，任事者并无教会之人。此外反对宗教之学说，时有所闻，自福祿特尔以来，不一而足也。盖法之国立学校，虽排除宗教分子，而教会仍有私立学校之自由也。”

(四) “其故盖由于政治之不振”至“德国虽如此注重军备，然尚有反对者”。本意谓“或者归咎于俄国政治之不振，然德之政治，可谓振矣，而有反对政府者，不如法国之人人告奋勇也。”

(五) “现在宜运动报馆，群起反对云云。德相遂借此言定罪”。“报馆”当作“罢工”。“德相”当作“德政府”。

(六) “不然信仰宗教”至“此所以最易引诱俄之趋于战争者也”。本意谓“或者谓信仰宗教，亦未尝不无可利用之点云云。然俄人信仰宗教之程度最高，而并不勇于公斗，则宗教之不足利用明矣。”

(七) “知之作用”。此标题当作“美术之作用”。此一节本意谓“不信宗教之国民，何以有道德心，全恃美术之作用。盖道德属于意志，近世哲学家谓人类不外乎意志。不惟人类，即其他一切生物及无生物，亦不外乎意志。婴儿之吸乳，植物之吸收养料，矿物之重量，皆意志也。然心理有三方面，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美术之作用有两方面，美与高是”。速记者误志为知，而又脱落太多，故此节不可了解。

(八) 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从前有和平会之倡议”至“未克有成”。本意谓“所以俄、美在和平会之所倡议，法国

甚赞成之。惟为德、奥及土耳其等国所反对，致无成议。”

(九) “在昔学者曾发明世界进化之理”至“有强存弱亡自然淘汰之语”。本意谓“法之拉马尔克，英之达尔文，发明世界进化之理。达氏虽有自然淘汰优胜劣败之说，然亦就生物界之现象而假定之，初未尝用以推断一切之事物。自尼采以此义为世界进化之惟一条件，而悬为道德之标准，于是竞强汰弱之义大行，而产出德国之军国主义。”

(十) “有科普布领为俄国之亲王”至“并加以研究”。本意谓“克鲁巴特金本俄之亲王而提倡无政府主义，为俄政府所仇视。避居英伦，著书甚多。最要者为《互助论》一书，乃于生物进化史中，求得互助者始能生存之一公例，以驳达氏物竞之义。其书广列证据，不尚空论。今日持人道主义者，多宗之”。“克氏之可贵，并非以其为亲王故。不过以亲王而肯牺牲其资格以倡无政府主义。且世人多疑无政府主义为强盗派，而彼乃以无政府主义家倡互助论，尤足令人注意。例如持平民主义者甚多。托尔斯泰以伯爵而肯与农夫共同操作，则注意者较多。此不过一时之形容法。乃互助论之名既不见，并不及无政府主义，而但言亲王，真可谓还珠而买椟矣。”

六年二月十九日 蔡元培白

(录自《新青年》8卷1号)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

佩剑青年先生：

来书捧诵数四，一一诉诸逻辑之境，觉不犯矛盾律者几希

矣。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而来书亦明明承认孔道“仅能适于当世之时，不能适于后世之时”，是足下所疑者，已不待他人解释矣。

近世学术，竟尚比较的研究法，以求取精用宏，来书所谓“取长去短”，即是此义。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来书所谓“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可强今人以行古道”，是足下不徒明明容许吾人有批评孔教之权利，且自身亦有诋弃孔教之主张也。（古道不可强今人行之，此正本志之所主张。）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记者倘以孔教为是，当然非难欧化，而以顽固守旧者自居，决不忸怩作“伪”欺人，里旧表新，自相矛盾也。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育尚焉，非必去宗教即不可以立国。（法社会学者孔特，分人类进化为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时期。）即以宗教国粹论，九流百家，无一非国粹。阴阳家与墨家，实为中国固有之宗教。佛与耶、回，虽属后起，信徒乃居国民之大部分。乌可一笔抹杀而独尊儒家孔子耶？

中国民德不隆，诚足下所当痛哭。然此果非尊崇戴假面具作“伪”欺人之孔教（《礼经》所教，大部分如此，望足下详细一读）不可拯救耶？足下能断言之乎？

吾华之秽德彰闻于世界者，莫如官监、男伎二事，公然行诸首都。自共和新说得势以来，此数千年或数百年之恶德，一旦革

除，岂非欧化之明效大验乎？古圣经传，固不禁刑余闾人也。据此可知前十年之人心，必更恶劣加于今日。孔教之伤于中国者，于政治、于社会、于家庭，本志已具言之，以供学者研究之资料，故兹不赘陈。

足下所谓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请更详示以理由。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记者当虚心欢迎之，决不效孔门专横口气，动以“非圣者无法”五字，假君权以行教权，排异议而杜思想之自由也。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佩剑青年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有道：

贵杂志略为涉猎数册，苦心热忱，无任钦佩。颇有所不解者，愿先生解其惑，俾某献其愚。

夫孔子圣之时者也，但仅能适于当世之时，不能适于后世之时。贵志所以诋孔教者，非以此欤？是理诚是。虽然，彼取数千年前之孔教，而强与数千年后地隔数万里欧西之学说，一一相附丽者，于理固谬。若夫挟持今日欧西之思想文化，而痛诋数千年前之孔教（如贵杂志关于孔子种种论说）宜若今世当务之急，必先去孔教者，某不敏，诚不知用意安在。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可强今人以行古道，世界文化，愈演愈异，又乌可由今之道，而斥古人？取长去短，可也；一笔抹杀之，不可也。孔教非绝对的不良也。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各国提倡邦教，奈何先生弃

孔子耶？

某大愚，窃以斯世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惟人心陷溺，道德堕落，是真当哭也，是真当先设法以拯救之也。奸佞乖巧，欺诈蒙夸，俱戴一副假面具，以相交际。“伪”之一字，足以使青年人返禽兽路，不诚实是真一件好事不能作矣，国家尚何所赖耶？先生学贯中西，化青年之道德，似尤急于诋孔教也。前十年之人心，不如斯之恶劣，则孔教又何伤于中国哉？

某亦青年之一，非顽固守旧者，特不识诋孔教之用意，敢以上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先生肯解某之惑乎？则幸甚。

佩剑青年拜手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傅桂馨

桂馨先生：

尊论于尊孔诋孔之际，颇得其平。惟鄙意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也。

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歿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廉耻等消极道德，非孔教所专有。礼为宗法社会奴隶道德之根本作用。让之为德，不善解释之，亦流弊滋大。

吾国去日本近，足下欲往游学，可即行，到彼间习和文，其效速于国中数倍也。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傅桂馨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台鉴：

久诵大著，知先生于孔教问题，多所论列。崇论宏议，鞭策人心，钦仰无似！窃谓居今日之中国而欲研究科学，讨论真理，非先将历史上遗传之文明之思想，一一怀疑，一一批评，而与二十世纪之新思想相融合调和，则茫茫前途，永无臻于光明正大之域。

孔子者，世界过去时代思想家之一，而有代表吾国数千年文明之资格者也。孔子之所以不满意于吾人者，其最大者，曰崇尚绝对主义也。研究学理，最忌独断，故必经过精密之思虑，始能发为正确之言论。而孔教最重门户，论事只求其绝对，说理则偏于一宗，绝不容相异学派有讨论研究之余地。孟轲荀况，号为得尼山之真传者也。孟之痛诋杨墨，荀之刚愎自用，语多偏执，颇类嫚骂。其他汉唐以后之自命孔教忠臣者，又多抱此村奴骂邻之口吻，一味排斥他人，指为离经畔道。夫儒家之在周末，本不过诸种学派之一；虽其后皈依者众，有弥推弥广之势，然苟非崇尚绝对，则何至董仲舒之徒有罢斥百家，使臣民专奉孔子一人之请

愿，而使神州思想界黯然无光，以迄于今兹也？曰，不出宗法社会之思想也。

社会演进之顺序，由图腾而宗法，而军国。孔子生于封建时代，故其著书立说，率多注重于修身齐家之道。如三纲之义效法古人之说，使在下者知所服从，以保守先业，不致有偃背矩矱之举，固为美德，然一味服从，则成为奴隶道德，偏重保守，则万事无发达进步之机。此实宗法社会之缺点，亦孔子全副精神所贯注者也。

然时运进步，今日之社会，已不能不改变其步伐，以入于军国社会。若军国民主义，亲子分居主义，以及个人经济独立主义，无一不与孔子之道齟齬难容，势非破毁其教义，则必为吾族文化进步之绝大障碍。此仆盥诵大志，所以钦仰拜倒于先生之言论也。

惟挽近世风浇漓，社会道德，日益堕落，则所以维系人心者，又将何道之从耶？孔子之教义，虽多不适于今之时势，然其消极道德之信条，如礼让廉耻等，颇足以针砭今日之颓俗，吾人固当拳拳服膺，并以此自励励人者也。质之先生，必有卓识宏论，以飨我辈男女青年也。

又沪上有无专修和文之处，以为东途之计，务请赐教为禱。

傅桂馨顿首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汪启疆

启疆先生：

惠书敬悉。国事诚大难。对德外交，又复危迫，但处置得

宜，未始非兴国之机会。惟视国人之奋发何如耳。以仆狂率，欲在野略尽文人报国之义务，尚恐无效。不知足下以何因缘，而以在朝为问也。

独秀（一九一七.三.一.）

汪启疆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两叩崇阶，始知先生入都未返。当袁氏柄国，屏弃正士，首善之区，变为妖魔之窟。今则贤士争赴，如水就壑，意者国事其有转机乎。然自西南起义，一载于兹。政治萎顿于调停之中，民生愈形其倣扰。大本不立，国何以支，故使财政不整理，币制不确定，则国内生计愈蹙。生计革命，即在目前，是国家将亡于财政也。军事教育，不切实整顿，军械军需，待人而备。武人日叫嚣于国中，而怯于对外，国民既困于负担，竭泽而渔，同归于尽，是国家将亡于军政也。他若教育不普及，内地人民，且不知选举为何事。实业不发达，触目尽是，舶来品无一不足以亡国。而竟不亡者，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然亦仅矣。不知先生今后之宗旨如何，将在野以鞭策社会乎？将在朝以厉行改革乎？宪法大体告成，何日能宣布？宣布后能否实行？法国宪法，国会有调遣军队之权，故以霞飞将军之声望，一遭罢免，军队无激昂之举动，国人熟视若无睹，则以习之有素也。吾则骄兵悍将，环列国内，稍一拂逆，通电四出。宪法实行，欲其遵守难矣。夫中国屈辱之国也，本无武力之可言。然欲国治而民安，则最急于拔除不

正当之武力，此非第一人之私言。快刀斩乱丝，不得不如是也。
想先生必不河汉斯言。

弟 汪启疆顿首
(录自《新青年》3卷1号)

陈独秀答常乃德

乃德先生：

吾国大家族合居制度，根据于儒家孔教之伦理见解，倘欲建设新式的小家庭，则亲去其子为不慈，子去其亲为不孝，兄去其弟为不友，弟去其兄为不恭。此种伦理见解倘不破坏，新式的小家庭，势难生存于社会酷评之下。此建设之必先以破坏也。惟破坏略见成效时，则不可不急急从事建设，为之模范，以安社会心理之恐怖作用。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常乃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月前邮上一函，计已呈政矣。日来都中始得第五号读之，未知六号已出版否？兹将近作我之孔道观一文，寄呈尊览。此乃近日来所体会而得，为是与否，无所就正，愿先生为卒教之。

又五期载胡先生论改良文学一文，其解释古典之用法，与仆前函颇可印证。若白话为文体正宗之说，尤仆所私心祝祷，期有日得见此盛者。仆尤愿胡先生归国后，能一以改良文学为己任，或创一白话报以作改良之模范，则登高一呼，盛业当不朽也。大志此后能时时提倡此种言论尤善。

又有所私望于大志者，愿大志此后，提倡积极之言论，不提倡消极之言论；提倡建设之言论，不提倡破坏之言论。即以家族制度而论，与其提倡破坏旧有的大家族制度，何如提倡建设理想的小家庭模范？优胜之小家庭既立，则大家族自在劣败淘汰之列，正不必再劳破坏也。

至如所谓不经破坏，不能建设一语，此仆所极不敢赞同者。窃以此语不过就过去之现象所得抽象之观察，不知过去之现象，悉为天然的而非人为的。进化论者有言：“人治有功，在反天行。”今日凡百治业，罔不以反天行为胜矣，何独于此语而犹囿于现境为也？是否有当，幸垂教之。 即颂箸绥。

常乃德上言。 二月十八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淮山逸民

淮山逸民先生：

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

之世也。然谓今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无论人类进化至何程度，但有二人以上之交际，当然发生道德问题。

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

指斥旧道德之最趋极端者，莫如德国之尼采，然彼固悍然承认残忍嗜杀、自利自尊为道德。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是非乃别一问题。然彼亦未尝否认道德本身名词之存在，固彰彰明也。

日本人挑拨吾族之恶感，理或有之。然其取吾人代表远东民族，亦未尝无理由。吾人亦乐得承认之。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淮山逸民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贵志出版以来，吾青年界得一良友，提携指导，不可谓不勤矣。虽然，所得之效果何如耶？环吾左右而居者，无一非堕落之人也。即以吾之本身而论，谓非堕落，亦不可得。呜呼！岂可以已乎！

吾国民族果自今而堕落耶？吾知闻吾言者，必谓吾言为不经。试举其证：吾国民数号四百兆，女子去其半，老幼又去其

半，所存之青年壮力有为者，不过百兆耳。百兆之众，又当举其执业而分之：若农，若工，若商，若学，若政客，若军人。试问如上所数之各个人，能各尽力于其职业者有几人？他界吾不知之，我，学校之学生也，忝然为学界之一人，知之固悉，请得而言之。

凡人类皆有嗜好，又各有其恶嗜好，此由于人情好逸而恶劳，天性使然。苟不能以理性制私欲堕落最易。故学生百人中，好冶游与好观剧好斗雀牌者，亦皆各占其四分之一，（此指中学校以上之学生，正青年有志之时也）所余四分之一，仅廿五人，谓其能勤修学业，终日不怠者，犹恐未必。以吾学生界，尚且如是，以此类推，其他各界，亦必如是。呜呼！如此现象，岂可以已乎！

吾中国民族果自今而堕落乎？有心人所当痛心疾首者也。推原其故，社会所以呈此堕落之现象者，殆皆由于各个人之有惰性。惰性何由而发生？心理学家谓人之气质，为本乎对外刺戟之奋力，别为强弱缓急四种，因其年龄而有差异，年当少壮之时，概属强性，何以吾国民而不然耶？岂即医学家所谓惰性乎？惰性为一种精神上之病，据近时神经专门家之说，谓由于不规则之劳动及食物之不消化，与身体之不运动。故医学家又谓脑髓中有特殊之细胞为宿住，意思，三所。此细胞失其势力，意思衰弱，从而懒惰，遂不能堪劳役之事。由此以观，吾国人之惰性所以发生者，思过半矣。

顾吾尚有所谓知识不足与受旧道德伦理上之束缚，亦可为惰性发生之原因者。何以言之？语曰：“学然后知不足。”吾国人多半未尝学问，故知不足；知不足，则更不知乎学；不知学，故思想知识薄弱；思想知识薄弱，故不知上进。语又曰：“不进则退”退则惰性生，此一说也。何以谓受旧道德伦理上之束缚耶？有一人焉，其身体强壮，其知识充足，明于是非，勇敢有为之人

也。缘其身之所处，四周皆旧道德伦理之社会，未从兴一事，其左右之人皆曰，此有违于圣人之言也。磨折横生，虽有志之士，鲜有不遭失败者。久之心灰意冷，形如槁木，惰性由此生矣。

以上所举，皆惰性发生之原因，足以障碍青年有为者。欲除此弊，故仍当究体育，振精神，求学问，增知识，此关于储力方面言之也。欲将来有所致用于社会，则先宜打破旧道德伦理上之障碍。旧道德伦理，即普通人所谓善良风俗。夫风俗随时代而变迁，非一成不变者也。彼所谓善良风俗，不知其善良至于何度，故吾不承认是说为正当。且吾国既进而为法治国矣，事事但求合于法律而已足，固不须节外生枝。道德者，乃野蛮半开化时代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世有欲以旧道德伦理说范围人心者，直与迷信宗教之人，以上帝威吓愚民，同一警说，固无答辨之价值也。

最近日本文学士中村久四郎著《极东之民族》一书，（大正五年十一月出版，民友社发行，为现代丛书之一。）述吾国民族之历史颇详。然吾于是书有不惬于心者二端：

一曰标题之谬误。极东二字，本美语Extreme East，以示与极西对称之名词也。以地域而论，凡属于亚细亚系统之民族，皆在极东范围之内。著者谓此乃广义的，非其所取。（见该书第六页）即以著者所持之狭义说，日本民族，亦在其内，何以但言我国民族而不及日本？准之逻辑，外延与内含，不甚相符，于理实为不通。且既叙吾国之民族，即标题中国之民族，已名称其实。著者必以极东标题，此其故何耶？吾国之各民族，不足以组织统一之国家耶？呜呼！未免侮辱我太甚矣！

二曰有离间我国民族之意。此题缘前意而生。夫吾国民族之复杂，人所共知，结合之久，亦人所共晓。历史上虽不免有消长之

迹，然自共和成立以来，五族平等，已无歧视之见。著者一则曰：“汉人侵占蒙古人之土地。（此指该书第三二七页所言‘绥远道与热河道北界之暧昧’四条）夫侵占二字，乃本国对于外国有所攘夺之义，而著者以吾国国内行政区域之变更，而亦曰侵占，此其可通也耶？又曰：“汉回之相仇，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列举相仇之原因。（见该书第三三九页）吾不知著者何所据而云然？

以上二则，谓非有意离间吾国民族不可得也。（其余尚有所谓汉人革命成功之后，满人已退居第二位，此指吾国人谓汉满蒙回藏五族，疑为按等第而列举之故，不知吾国人并无是意，不过为口头上文字上形容之便耳。）观其结论一言，野心勃勃，直有宰割吾国之势。呜呼！吾国民处此竞争之世界，不进则退。列强虎视，吾国民自知国势之弱，应如何惕励乃心，勉图生存。不此之务，而犹泄泄沓沓，岂可以已乎？外国人之谋我，取术固有多端，又岂著书而已哉？吾国民不知自振，吾又不暇为中村氏责也。以上所举，心所欲言，故不得不言。文字之工拙，非我所计。未知记者以为如何？愿有以教之。余不白。即颂
撰安。

淮山逸民谨启。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莫美卿

美卿先生：

来书针砭青年之处，仆极端赞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

毅。”宏毅二字，为人生立身治事之最要方针。宏则希望远大，毅则艰苦卓绝，百折不回。青年修养，果能实做宏毅二字，成功者盖十之八九也。

独 秀

(一九一七.三.一.)

莫芙卿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比年以来，国事日非，外患不绝。先觉之士，忧国亡之无日，费无数之心血，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冀助国民之心，藉救国家于万一。此其热忱，极可敬佩，唯是言论之中，稍有不慎，则影响于青年前途甚大。盖少年之人血气方刚，智识浅薄，所行所为，本无成竹，一旦骤受此种非常之感觉，莫不热血上涌，冒险进行，置力量利害生死于不顾，横冲直撞，一意奋发，一飞冲天之精神，其志可嘉，其实可怜。夫青年所贵者，唯此种之精神耳。然青年所危者，亦此种之精神也。盖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天下事万无一蹴即成之理。譬之建屋，必先筹经费，集材料，而后方可依图样而施工焉。故成事之前，必当注重于预备。预备云者，即养成种种之要素是也。今之青年，类多误预备时代为成功，故失败多而成功少。因此而牺牲其性命者有之，倒行而逆施者亦有之。仆曾目睹敝友某二君，初皆热心过度，抛弃其固有之事业，离乡里，排万难，勇往直前，以冀所成，及至横受阻力，方悟前非，万般希望，顿成泡影，于是痛惜悔恨，悲愤交集，因志愿既未达到，而损失亦不可返。其后结果，一

则抱病而没，终身不闻。一则生气全无，百念尽灰。溯其原因，虽因思想简单之故，实则皆受一种无形之激刺而来也，言之可哀。夫希望与妄念，本然不同。希望方法可循。而妄念无之。故希望可成功，而妄念决难成为事实也。仆意青年之士，欲抱何种之思想，当先预备何种之要素，否则空洞之思想，即妄念之代名词，百无一成。其尤要者，当知前人种树，后人食果之至理。事之当为与否，只欲问之良心所安可耳，万不可先横一成败之见于胸中，自寻烦恼也。素仰先生爱吾青年之诚，尚乞于此点时时指导。幸甚。

莫芙卿谨上

(录自《新青年》3卷1号)

陈独秀答俞颂华

颂华先生：

愚自执笔本志讨论孔教问题以来，所获反对之言论，理精语晰，未有能若足下者。细读惠书，欣佩无似！惟鄙意尚有不取苟同者，略为足下陈之。

窃以宗教之根本作用，重在出世间，使人生扰攘之精神有所寄托耳。倘以规定人生之行为为义，则属入世间教，与伦理道德为枝骈，宗教之为物，将于根本上失其独立存在之价值矣，世俗虽有宗教三类之说，其实只一神、多神两类得称为纯正宗教，盖宗教不离鬼神也。若泛神教（或译作万有神教）则已界于宗教非宗教之间。桂特赫克尔谓泛神教质言之即无神教，其说是也。无神论乃一种反对宗教之哲学家见解，字之曰宗教，殊为不伦。

凡宗教必言神，必论生死，此大前提未必有误。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儒家虽有鬼神体物不遗之说，骤观之似近泛神教，然鄙意此所谓鬼神，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同，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也。即以孔教属之泛神教，是否可目为纯正宗教，尚属疑问。至“伦理的宗教”之说倘能成立，则世界古今伦理学者、哲学者，无一非宗教家，有是理乎？是白兰克马氏之说不足信也。西洋人称日本人迷信天皇乃一种宗教，是滑稽之言耳。而日本人颇有以此自矜异者。日本滑稽学者正多，不独建部博士也。

孔教之义，足下亦不满之，惟谓孔教等诸古代文学，只可改良不可废弃，此殊不然。教义为无形的，而文学乃无形的（思想部分）而兼有形的（文字部分）。足下对于文学改良之意见，非谓废其无形的部分而存其有形的部分乎？由斯以谈，则孔教与旧文学同一可改良不可废弃之说，未必有当矣。

愚之非孔，非以其为宗教也。若论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在鄙见讨论宗教应废与否与讨论孔教应废与否全然为二种问题），决非为扬他教而抑孔子也。华特氏谓宗教所以纳社会于轨道，爱尔和特氏谓宗教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关系。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

宗教之为物，无论其若何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关，若何有社会的较高之价值，但其根本精神，则属于依他的信仰，以神意为最高命令；伦理道德则属于自依的觉悟，以良心为最高命令；此

过去文明与将来文明，即新旧理想之分歧要点。其说非短篇所能尽，愚且以为属于讨论孔教之题外文章，故不欲多论。

来书意谓数千年历史上有为之力教，为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不必汲汲提倡废弃。是说也，乃保存孔教者所持最能动人之理由，亦即鄙人所以主张孔教必当废弃之理由。此事虽奇，实孔教问题之中心也。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为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好学深思之士，谅不河汉斯言。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吾人爱国心倘不为爱孔心所排而去，正应以其为历史上有为之学说，正应以其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而发愤废弃之也。

若夫废弃孔教，将何以代之，则国民教育尚焉。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若以此统一人心，而谋有以保存之、发达之，则此共和国中，尊君、尊亲、尊男之礼教，不知发达至何程度，始为美备也。愚实无此勇焉。

凡愚所言，皆来书所谓“讲明真理与适应现世”而已，无他意也。希足下尚有以教之。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三，一。

俞颂华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座右：

偶在书肆购得《新青年》第四、第五两号，归而读之，颇多感发。所论孔教问题二篇，尤其卓识。惟其中有与鄙见刺谬者，聊举一二，希赐还答。

先生谓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因谓孔教二字，殊不能成一名词，此诚不失为一种见解。然窃尝闻宗教云者，以信仰之形式，规定人生之行为。其为类甚多如以神为标准而言，则有多神的，单一神的，复一神的之分；依教义为标准而言，则有伦理的与非伦理的之判。日本建部博士曰：“儒学之有凡神的观念，乃学者之所论定，不可争也”（普通社会学第三卷第四百六十一页）。又曰：“宗教依其为人生之规定而发达，即宗教实用之发达也。”故以宗教的内容之发达论之，约分三期：即（一）命令的规定，（二）教导的规定，（三）契识的规定是也。耶佛二教主教导，而亦含多少命令。儒教犹未发达，故单以教导为主，然其发达则趋乎契识的方面也。所谓契识的者何？质言之，即伦理的内容与宗教的内容，全然合一，神非超绝的，而宗教除实用性外，并无丝毫不纯，此为宗教发达之极（同上书四六八页）。白兰克马氏曰：“伦理的宗教，于神与人教之关系外，更设人与人道德的相亲之谊”（Black Mar's Elements of Sociol

ogy pp 199)。使二氏之说而信，则先生所引文行忠信，不论死生，不语鬼神云云，不足为孔教非宗教之证，特孔教为凡神的伦理的宗教已耳。

至孔子之教义，固有不合现代生活者存，然在他教，亦不免此，特他教有嬗蜕，而孔教仍旧贯，此乃宗教发达与否之问题，非关教义之本质也。孔子教义，自有其不可诬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与时递变，滋长增荣，是则昌明孔教者应有事也。譬之周秦汉唐之文，非不甚美，以时代已遥，不足贻今世思想事情之变，吾友胡适之君，为作文学改良论，慨乎言之。夫改良之可也，若以不便于用，举而废之，而以他国之文为代，岂不甚谬？夫一国文化，自有特质。知文学可改良而不可废弃，则知孔教亦可改良而不可废弃矣。尝怪今之谭孔教者，抱残守缺，谋而不忠，而一二稍能辨理者，又寻垢索瘢，欲根本推翻其教义以为快。前者知保存孔教而不思所以发达之，是虽顽而犹勇也；后者知孔教之不发达，而欲以无教安焉是虽智而甚怯也。以二者之皆误，愿先生有以矫之矣。

先生又欲以科学代宗教，陈义甚高，仆亦深表同情。然学者之言，贵在讲明真理与适应现世，不可偏于一面。当今之世，宗教果可废否？如曰可废，不但孔教当消灭，其他各教亦当消灭；如曰不可废，而先废数千年来历史上有力之孔教，则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将以何代之？华特氏之言曰：“宗教为社会的吸力，所以纳社会于轨道者也。”爱尔和特氏亦谓宗教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特别之关系，使宗教绝灭，则一切社会的较高之价值，或将消失，而文化上较高之形式，亦随而隳矣。（The Social Problem by Ell ood pp 204—205）夫以西洋文明之进步，学者犹作此言，矧在吾国百废未举之时，而独汲汲于提倡废孔之

说，此其危险，如何可言？统观先生二文，俱针对现社会现国家立说，与纯然说理者不同，故略为言之。余不缕缕。敬颂

撰安

俞颂华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常乃德

乃德先生：

足下平论孔教，渐近真相，进步之速，至可钦也！

凡学说教义之兴废，皆有其绝大原因。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使其于当时社会无价值，当然不能发生且流传至于今日。尊孔者多不明此理，故往往笼统其词，所称道以为莫可非议者，皆孔教过去之成绩，未尝于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有详确之论断。是无异文家叙述古代战争，咸称石矢之为无上利器也。

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果能实行而有益于今之社会，则数千年之国粹，吾人亦何忍无故废弃之？果实行于今之社会，不徒无益而且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不当有所顾惜。

据学理以平亭两造，惟当较其是非而下论断，偏倚与否，殊无虑及之理由。若恐学理是非之讨论过明，或激成他种势力之反

抗，则吾辈学者尚有何讨论学理之余地乎？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滥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

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愚于《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已略明此义）。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的，则上之所教，下之所学，日日背道而驰，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吾闻有已行共和政体，而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者，未闻其民皆共和之民，而始行共和政体者。盖共和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惟其民适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以此为的，则日进有功。若虑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遂弹言共和政体，则共和将永无希望。良以非共和政体之下，欲其民尽成共和之民，是南辕北辙，万无达到之理也。一日不达到，即一日共和政体不能实现，足下将谓之何哉？

独秀

一九一七.四.一.

常乃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座右：

顷读大志第六号，蒙指示一切，感甚。去月十八日，曾上一函，附“我之孔道观”一文，当均呈政。此文不过略陈鄙见，以备采择，无价值之可言，似不必为之披露也。

就实际而论，孔子之道，比较的在周秦诸子中为毗于专制，

无可讳言。然当思孔子所承为宗法社会封建制度极盛之后，则其所称道，较之已为革新为进化。所异者，孔子为积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为渐进派，与庄墨之急进派亦不同耳。

先生辟孔道另具苦衷，仆亦颇能领悟。惟窃以为今日国中尊孔之主持者，不过少数迂儒。此辈坐病亦只在头脑稍旧，见理不真，尚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倘能因其势而喻以公理，未必竟不能幡然觉悟。今日反对赞成两方，各旗鼓相当，所缺者局外中立之人，据学理以平亭两造者耳。若公断之言，稍涉偏倚，则不惟无以折尊孔者之心，诚恐意见所激，则解决此问题之法，将不在学理而在他种之势力，此岂吾人所欲乎？若夫学术界定于一尊之思想，则根本上即不能成立，又不在孔道之若何若何也。

至共和与专制之利害，仆非敢谓共和不如专制，亦非谓国有不适于共和者。惟以为吾人欲求共和政治之实现，当从根本上着手改革，使其民而尽成共和之民，则共和政体何患不成？此固舍教育不为功矣。否则实质未殊，分子依旧，则虽经十度百度之政治改革，庸何济乎？

人生于世，不可无理想之鹄的以为进行标准，此仆所信以为然者也。然此理想鹄的之建立，要不能不依于现境。窃以为人生最大职务，即在就吾人环应之现境，加以变动，使实现吾理想之鹄的，如是而已。知有现境而不知有理想，固为不可，若舍现境而专言理想，则其所谓理想者，将何从以征其实现乎？

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云云，则固仆所常自警惕，庶几一日得免此病者，先生之言，仆敬佩之矣。即颂

教绥

常乃德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曾毅

曾毅先生：

惠书敬悉。过誉增惭。

尊意谓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内容，此盖“道”字之广义的解释，仆所极以为然者也。惟古人所倡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指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理想派重在理想，载道有物，非其所轻。惟意在自出机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异于钞袭陈言之古典派也。

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若仍以之载古人之道，言陈腐之物，后之作者，岂非重出之衍文乎？

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学，亦不必急切限以今语。惟今后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较为妥适易行。

读文选本，诚属要图。吾友沈尹默君（北京大学预科国文主任）方从事于斯，书成当与吾辈宗旨不相远也。此复。尚希续教。

独 秀 一九一七.四.一。

曾毅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仆于友人处，得读所为文学革命论，甚佩，甚佩。立起如市，购得贵志全册，又读胡君适所为文学改良刍议，窃不禁大喜。中国文学坏滥久矣，得足下之伟论，冲荡而振刷之，一扫黄茅白苇之习，使吾人精神界若顿换一新天地。由此浸灌成长，仆知后来者之视足下，亦将如今人之视孙黄辈为政治革命之前驱也。

仆尝谓吾国陈旧之物之存于今者，取其足以与新机迎合，而臃之，培之，化之，大之。其诸不适于现世界之生存，可视同历史之古物，一切束置高阁。文学然，道德然，学术然，政治亦然。此其间新机之关于政治者，最易受戕贼，良以权利之所存，而又阻于种种遗传之情性。惟此文学界，既无前二者之难，而又有乱极

思治之象，诚得海内外名宿，相与提倡，不出十年，必可奏廓清之功。即亦资之以助新政治之进化，真韩愈氏所云其功不在禹下也。盖吾人唯一希望，在现在之青年，与将来之青年，得贵志而新之以十年之教训，虽不中不远矣。

惟足下最辟“文以载道”之说，因辟“文以载道”，而兼及于“言之有物”。鄙见似不敢赞同。详观尊论所指，以为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而以言之有物之物，视为文以载道之道，足下似将道字呆看。谬推足下之所以呆看，则蔽于俗传之狭小道字，如王湘绮所谓文必依于道，故必依经以立义，一若除经外即非道也。仆则以为道之本义极宽泛，当古人学术未发达之时，一切名词，皆极含混。道而属于文，即凡事事物物，莫不赅之，不必专谈孔孟之道者，始谓之为道也。道如孔孟之于文，不过各道之一格而已。故仆妄以为文以载道之道即理，即今之所谓思想，特不过古人之所谓道，比于思想，则寓有限制作用之“正当的”条件在内耳。然究之吾人之为文，似不能不含此作用。任检一事言之：朋友之函牍往还，称量推崇，交际之道也；过其量则谀矣，而非道也。故述一事也，必视于国家社会有关者，或劝之，或惩之，莫不有道在焉。造艳情小说，而其义必止于不淫，不淫即道也。论古人得失，而其言必求衷诸至正，至正即道也。事之所存，即莫不有道之所存。言之有物，物即道也，即理也。先儒之格言，即本其一生所视察之结果；可供准则与否，别为一问题，而要其形于言，即纳而归之道也。

仆敢谓非道之文，不有价值；无物之言，必为空衍。足下主张写实，写实即有物，有物即有道。各学派皆各有其道，亦即各有载道之文，亦即各有其有物之语。足下既于学术不主一尊，独

安得以文以载道之道，而属之孔孟乎？

足下答陈君丹崖之言曰：“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理想与学术相依，似不必囿入文学范围内。”然文学与学术，实有相密切之关联。其理想优而其文字亦愈美，即其物足而意味亦愈深长。足下之不主言之有物，毋抑指昔时诗人以臣子之忠爱，而托喻于男女怨慕之情之类者乎？吾人试就其诗以言诗，果能写真，其诗即美，即云有物可也。然能使读者另会其影喻之旨，则其趣味更加浓厚，固无不可。不然，表面上所言不能入情，即其里面亦决不足观。尚安得谓之有物哉？藉曰有物，必破滥者也，必朽败者也。此仆所以不欲附和于足下者也。

仆向者尝慨吾国文学之坏滥，纂辑文学史一小册。其中取材虽浮滥，而其义则独抒鄙见者，实占十之七八；又窃自幸同于足下与胡君适之所主张者，亦十之七八。当仆命笔之时，实亦挟改革文学之志愿。如足下所谓古典文学，拙著特立专章以著之，以考其源而遏其流，姑钞呈拙著后之结论一节，以供质证。并呈正全书一册，尚乞高明有以教我焉。

中国之文，坏于用意摹仿。自扬雄著其端，而所师尚在乎意。至明清袭其习，而所法全在乎形。（中略）文至于统同是求，而后虚薄浮滥之文，乃充塞于艺苑矣。

中国之文，尤坏于滥用典故。圣作明述，吐词为经；语意渊涵，初无衬垫。战国诸子，明事达情，妙于取象，偶一遣用，意主左证，用兼隳括，初无意于篆刻也。西汉犹少，东京始繁。自是以来，比兴之义亡，铺张之情亟；恣意渔猎，漫涂粉黛；鹤胫续凫，张冠戴李；炫博者务为贖祭，好奇者窜入蚕丛；以古官代今名，托

僻典为影喻；几使读者茫然不知真意之所在，文至此盖可云一大劫矣！

因摹仿之足崇，故文范之论起。归震川之史记录本，赵秋谷之声调谱，揣摩声音章句之间，规其所以似古人者，几于无微不至。陋者从而效之，徒以抑扬转折为事，略为文之本，而后文以病而益荒。文本天地之元气也。天有阴阳寒暖，地有燥湿平陂，人有刚柔缓急，应乎理以为言，自然中节而有秩，无所谓法也。文之有法，聊为初学者示捷径可耳，而必执之以为高，则有流于机械而无变化之用矣，岂不谬哉！

因典故之是尚，故文料之书繁，摘屈宋之艳辞，采史汉之隽语，分类纂辑，用资取求，可省记忆之劳，可盖枵腹之丑，事至便也。其初也意本乎训蒙，其极也通行于场屋。或则数典忘祖，或以袭谬因讹。原书束而不现，空疏衍而弥甚。就令博记，而学兼断锦，何与通才？自非铲除，则真气雅言，终于沈晦。故欲尽文之能事，不于本求之，区区拾古人之牙慧，无当也。

文本于学，孔老释迦，非所计也。观古今文人，莫非学人；苟非学人，即亦不足为文人。而后之人不于学加深研，营逐于文字之末，何者为汉魏，何者为唐宋，宜其剽敝而不振也。文本于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蹇而求能辩也。虽许郑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稍具许郑戴段之学者。辞赋如扬马，文章如韩欧，其深明字义，常人之所不逮，而后之人不于小学加考求，惟以剽窃为工夫，涂抹为墙壁，是犹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学无字，则辞不雅驯；有字无学，则文为空衍。二者兼

具，乃可言文。今乏人动曰文荒矣，而不知实学荒也，学荒也。古人余力学文，孩提学书，今则耻不知学，老不知学，岂不悖哉？韩昌黎云：弃去陈言，予以为无贵去陈理。去陈言本乎学，去陈理本乎学。温故知新，宜泥所重，若夫徒知好古，无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头换面言之，何取乎灾梨而害枣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从而发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贵矣。文贵通裁，辞贵达意，通故道明，达故用显。奇辞奥义者非通，钩章棘句者不达；居今饰古者非通，假甲为乙者不达；宜雅而俗者非通，荒词累气者不达；当隶为篆者非通，以经书莽者不达。昌黎文之佳者，在于文从字顺；六经文之美者，在于意味深长。典谟之文，惟唐虞宜之，王莽效之则陋矣；渊云之文，惟汉时宜之，李何效之则衰矣。对扬庙廷，则宜庄重典雅；谕警黎庶，则宜明白晓畅。要其贵于通达，以适时用，古今中外一也。

知文之贵于通，散可也，骈可也，骈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于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并斥亦无不可也。处今之世，尤亟务焉。一国之废兴，视民智之多寡高下以为准。文之为用，渝民智之利器，鼓学术之风炉。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赖于是。察邻国之文，能适于浅，而吾国乃好为高古也；能进于整，而吾国乃日滋冒滥也；此非文病，学先病耳。（中略）乡使西学不东，犹是闭关却扫，一二学者，亦惟是起伏于古人之窠臼而已，其能有所振拔耶？顾亭林有言：“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然则今之文学之蔽也，殆已达穷变通久之运者乎？一代之

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酝酿之功，而其衰也，常在于菁华已竭之后。东汉为西京之酝酿，赵宋本唐代之调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启清。明而未融，故其敝尤著。今之文运，适与李唐宋明等观。混合之时，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于此际，偏于西不可，偏于中不能，但务调和中西之精英，以适于现今之实用。一旦两质融化，发生特别之光华，若宋之所谓理学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议者苟嗤吾说失中，谓中国代传之美文，何可尽废。夫以今学术之分科发达，文欲存汉魏六朝之体，诗欲追范经乐府之遗，特设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无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学科斗筲隶之书也乎？夫文出乎学而要乎用，文之本职也。但使人人能尽其本职，虽不美，庸何伤？

足下主张写实，主张通俗，此二者实足以破千古文学之的。前者为文学大本领之所在，后者为文学大作用之所在。仆尝以为文字之能事，最难形容尽致。形容尽致者，非画蛇添足之谓也，即取当时所有之情景而毕肖之。左氏叙晋楚之战，历历如在目中；范曄叙昆阳之战，如亲见其声势；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处处皆有其人：是亦足下所谓写实之义也。

文主通俗，仆已于拙著文学史中时时发之，特仆关于此，窃有一私见。中国之文，甚难于语文一致，以各地方音歧出，若不能将之乎也者焉哉之字及种种前置之词，而代以寻常通用之语，欲求此效，势不可不待之于语言统一之后。仆未知足下之所谓通俗是否为宋儒之语录。但就鄙意，以为先取其通晓者运入之，凡不能代以俗语者，必力求其浅显，如避能而用克，舍其而用厥，舍何而用曷，避熟语而用生字，皆大可以不必也。

足下以我国近世文学之坏，坏于桐城派，诚然，诚然。然桐城派

之影响，至于今而不绝者，实赖有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一书以痛毒于社会。昔之人欲售其主张，恒藉其选本以树之，非如现在坊间选本之无甚深义也。仆以为足下既张革命之军，突使一般青年观之，茫然莫得其标准之所在，则莫妙于取古今人之诗文，与吾宗旨稍近者，诗如李陵陶潜及古诗十九首之类，文如黄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瘞旅文之类，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趋于改进，似更易为功也。不知高明以为何如？冗中书陈，未及详审，幸足下有以进而教之。

曾毅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 I · T · M

足下于本志所持论，独垂询三事，可谓目光如炬矣。欧美政家学者，方劳精竭智以事此三者之讨论，而尚无完全之解决，智识浅薄如记者，更何论焉。既承下问，姑略陈所主张，其详请俟诸异日。（一）今世经济制度，过重利权，是以兼并盛行，贫富悬隔，极其流弊，不至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不已。欲救此弊，虽未必即能悉废今世之经济制度，而限制土地之过量兼并，及废除遗产制度，未始不可行也。记者所谓改良经济制度之道，即以此二者为始基。盖土地与人口之比例，倘不过失其平均量，自非生性懒惰者，皆有生存之余地。然后世之所谓罪恶，或真乃罪恶。否则贫而求生，虽盗窃亦未必即为罪恶也。遗产制度不废，则坐拥先人厚资，且以之造成罪恶者，其勤勉，其智力，未必有加于贫无

立椎之善人也。

(二) 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旧社会之所谓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未必有何罪恶可言（如妇人再醮之类）。吾人今日所应尊行之真理，即在废弃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

(三) 人类公性，原有保守进取二方面。欲救吾国之衰微，教育方针宜偏重进取主义。进取主义中，宜富强并重，二者恒互为因果，殊难轩轻也。

记者

一九一七.四.一。

I · T · M生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获读大志，益我良多。兹有疑问数条，书呈左右。倘蒙赐以裁答，幸甚幸甚。

(一) 足下云，道德堕落原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平均，金钱造成罪恶。敢问改良经济制度之道。

(二) 足下云，旧社会之道德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吾人当排斥之，而尊行真理。请示其一二例。

(三) 国是未定，将使诸事并进，抑宜有所偏重。教育方针因不一，致有谓宜采实利主义者，有谓宜采军国民主义者，以吾国既贫且弱，似宜二者并进。然实施之际，究不能不稍有所偏重。乃足

下云，国家强盛，各种事业，恒同时进步，断无百务废弛，一业独进之理，自是至言。但不知于目前中国求所以起衰之道，于稍偏之义，亦有所采否也。敢以为问。

I. T. M生上

(录自《新青年》3卷2号)

陈独秀答胡适

适之先生足下：

惠书敬悉。鄙意区分中国文学之时代，不独已承钱玄同先生之教，以全宋属之近代，且觉中国文学，一变于魏，再变于唐（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故拟区分上古迄建安为古代期，建安迄唐为中古期，唐、宋迄今为近代期。玄同先生颇然此说，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抛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率复不宣。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胡 适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见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兄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

知贻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病也。

“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

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今试举一例以证之。林先生曰：

嗚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排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陪。

此中“而方、姚卒不之陪”一句，不合文法，可謂“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词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陪”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陪”，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陪”，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陪”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陪”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尚有可议者；盖二程子之语录，苏、黄之诗与词，皆启后之文学，故不如直以全宋与元为一时期也。足下以为何如？总之，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今之妄人论诗，往往极推盛唐，一若盛唐之诗，真从天而下者。不知六朝人如阴铿，其律诗多与摩诘、工部相敌，工部屡言得力于阴铿。其赠李白诗，亦言“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太白亦得力于此也。则六朝之诗与盛唐固不可截断也。此意甚微，非一书所能尽，且俟他日更为足下作文详言之耳。

白话诗乃蒙选录，谢谢。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古人非无以白话作诗词者。自杜工部以来，代代有之；但尚无人以全副精神专作白话诗词耳。自立此誓以来，才六七月，课余所作，居然成集。因取放翁诗“尝试成功自古无”之语，名之曰《尝试集》。尝试者，即吾所谓实地试验也。试验之效果，今尚不可知，本不当遽以之问世。所以不憚为足下言之者，以自信此尝试主义，颇有一试之价值，亦望足下以此意告国中之有志于文学革命者，请大家齐来尝试尝试耳。归国之期不远，相见有日，不尽所欲言。

胡适白 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刘竞夫

竞夫先生：

尊论比计孔、耶诸教为益社会之量，鄙意极以为然。宗教之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事实如此，望迂儒勿惊疑吾言。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刘竞夫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顷读大著孔教问题，拜服之至。读公文而不幡然悟者，其必天下之丧心病狂者矣。愚谓孔教是否已成教，不待吾辈多所辨驳，即彼孔教之徒，亦不敢自称已成也。何则？使孔教果已成教，则所争者仅定为国教与否而已。而彼辈乃晓晓先硬搬孔子为教，然后再争国教之地位，是举国本不以孔教为教也。既不以之为教，尚何国教之可言？

譬之吾人立会，而欲于会员中推一人为会长，是人必已为会员，然后有被人推举之资格。今乃有人欲推会外之人为会长，而其人又不合于此会之性质，（譬如会为化学会，而此人乃为文学家）则推举之者，势必先竭力鼓吹，谓此人为化学家而后可。今之争孔教者，何以异于是乎？

此辈全不明何谓宪法，何谓宗教，何谓国教。其视宪法乃如一纸诏书，而欲以一纸诏书，强令天下仍返于科举时代之状耳。故此辈心理，仍为恢复科举恢复八股之心理而已。

夫此辈岂不曰吾国社会为孔子所支配，已数千年乎？殊不知旧社会之伦理及家族之制度，皆我国上古社会所固有之制度，而非孔子之所创。孔子为何不生于泰西，而生于中国？正以有中国古代之社会，始能产出如孔子之人物耳。亦正以孔子生于中国之社会，不出奇立异，以招社会之嫉，如苏格拉底耶稣之殉其所主张耳。故孔子为圣之时者，即以其能迎合社会也。

孔子之道，上不忤君，下不忤民，而惟不利于世家。世家之势力，终不能敌君主与社会之势力也明矣。且世家虽无孔子之排斥，依政治进化之公例，亦终必消灭。由是言之，亦非遂为孔子之大功也。

孔子既迎合社会，而非改良社会，故中国社会之支配，乃自由相沿之习惯，而非由于孔子。执欧美之途人而问耶稣，无不知者。吾国下等社会知有孔子者有几人耶？吾国下等社会，未尝不知人应孝父母，然而其知此，非由于诵孔子之书，亦非有人告以孔子尝如是言之，仍由于相沿之习惯耳。使有人不孝父母者，告以孔子，彼能畏而改乎？抑告以天堂地狱之说，彼始畏而改乎？孔子不能使人畏，而张天师佛菩萨却能使人畏，此孔子不能支配社会之大证据也。

然则孔子所支配者果如何种人乎？亦惟四民中之士而已。原夫孔子自身即为士，生于世家柄政之时，自以草莽下士不得政柄，故视权臣为眼中钉，必欲除而去之。故孔子所说法，非为众生说法，只为士子说法。中华几变为官国，即食孔子之赐耳。

夫既非为众生说法，而为士子说法，则必尽国中为士子而后。不然，虽举孔子之天经地义，尽纳于中华民国宪法中，亦不能使全社会胥蒙利益也。孔子毕生未尝与平民一接触，而亦未尝有是心。彼耶稣则何如？耶稣之所以死，即以其专爱贫民而与在高位者抗也。耶教之盛，其真因不外乎此。欧史具在，可以证之，固非吾之谰言矣。因读大著有所裨触，不觉言之繁芜如此。苟有以教正之，则幸甚矣。

刘竞夫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余元浚

元浚先生：

惠书督助，至为感愧。《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前身，二者皆所主撰。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余元浚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主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首当为屈一指，不谓出仅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但不识彼时先生亦主任该志否？若然，则仆弃此不读，而终日为无谓之歎嘘，仆之运亦诚啬矣。先生之言论风

采，曾于甲寅见其一斑，其为一般人士所公认者，似不劳仆再为赞誉。仆亦今日青年界中一份子也，不自揣冒昧，有疑问焉，敢以诘诸先生。吾国自辟关以来，内政外交，著著失败。于是国人走而相告，群起而谋救济之方，金谓非振兴教育不可。是语也，非丧心病狂之甚者，不敢言其非是，乃至今日。其所经之时不为寡，而所费者亦不为不多。然居今日而发为“教育之效果已趋进吾国人民之程度乎”之一问题，果就今日之国势而细察之者，吾知其必不敢置确认之辞于此问题之下，或者皆谓其方针未臻完善使然。然此究不能为全国中之各个学校一律而言。仆于此问题，即而观之，而判其半数归于方针未善问题。而其所余之半，则诚于教育收其不完全之效果者也。易言之，则其在适当受教育之时间，固为完全之优秀份子。而一旦即于社会，乃顿异其观，而与恶劣之份子趋于同化。虽然，此一半不完全之效果，果因何故而未完全乎，则发生下列之二问题。“乏通俗之教育以维持社会之善良趋向”、“无所赖以坚固此半优秀份子之信仰善良于适当受教育之时。”此二问题，仆怀之又久矣。良以改良今日之社会，而极今日之危厄，非解决此二问题不为功。斯即中华民国之所赖于言论界者也，亦即仆之私心向往于先生者也。黑海溟沈，神州梦熟，于秋桐先生外，望先生有以共拯之。至于半数属于教育方针未臻完善之问题，虽执政诸公不能辞其究。而有以倡正之者，仍望诸先生。仆感之深而忧之切也，先生其不以为繁琐而弃之乎。

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上

(选自《新青年》8卷8号)

陈独秀答俞颂华

颂华先生：

洛诵惠书，无任欣感。好学深思若足下者，仆虽备蒙教斥，窃所愿焉。惟愚见终有不敢苟同者，尚希进而教之。

第一，今之人类（不但中国人）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宗教，本非片言可以武断。然愚尝诉诸直观，比量各教，无不弊多而益少。是以笃信宗教之民族，若犹太，若印度，其衰弱之大原，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其文明改进之障碍。法兰西人受旧教之迫害，亦彼邦学者所切齿；其公教会与哲人柏格森，俨如仇敌。此乃宗教之弊，事实彰著，无可讳言。

至于宗教之有益部分，窃谓美术哲学可以代之。即无宗教，吾人亦未必精神上无所信仰，谓吾人不可无信仰心则可，谓吾人不可无宗教信仰，恐未必然。倘谓凡信仰皆属宗教范围，亦不合逻辑。此仆所以不信“伦理的宗教”之说也。吾国人去做富发财外，无信仰心，宗教观念极薄弱。今欲培养信仰心，以增进国民之人格，未必无较良之方法。同一用力提倡，使其自无而有，又何必画蛇添足，期期以为非弊多益少之宗教不可耶？此愚所以非难一切宗教之理由也。

复次则论孔教。孔教教义，多言人事，罕语天人关系，亦是下所云然。良以中国宗教思想，渊源甚古。敬天明鬼，皆不始于孔子。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古，亦正孔子之特识。倘缘此以为敬天明鬼之宗教家，侷于阴阳

墨氏之列，恐非孔意。性与天道，赐也多闻，其他何论？欲强拉此老属诸宗教家，岂非滑稽？缪勒氏于印度宗教，亦未必了了，遑论中国，其言乌足据耶？《中庸》，天命，性，道教，四者联举，是为一物。以性释天命，则所率所修，均不外此。下文又云：“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是盖与老氏道法自然；西哲所谓宇宙大法相类。天性以外，绝无神秘主宰之可言。乌可以其有天命与教之名词，遂牵强以为宗教也？

孔子生于古代宗教思想未衰时代，其立言间或假古说以伸己意。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即如足下所主张之改良家族制度，倘孔教之伦理学说不破，父子析居，则有伤慈孝，兄弟分财，则有伤友恭。欲笃信孔教之民族，打破大家族制度，其事如何可行？足下欲奋如椽之笔，提倡小家族制度，以为事半功倍，不知将何说以处孝弟之道？倘殆说以处之，特恐事倍而功半耳。

吾人讲学，以发明真理为第一义，与施政造法不同。但求别是非，明真伪而已，收效之迟速难易，不容计及也。哥白尼倘畏难而顺社会的情性，何以发明天象？哥仑布倘畏难而不逆社会的情性，何以发见新世界？一切科学家、哲学家，倘畏难而不肯违反俗见，何以有今日之文明进步？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

谋使均衡也。高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俞颂华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座右：

辱承不弃葑菲，赐以裁答，说理缜密，感佩良深。今尊论之前提，与仆之所持者大相径庭，所得结论，缘是异趣，故无复讨论之余地。然又不能已于言者，盖假定尊论之大前提无误，所得断案，是否确切，仆尚不能无疑也，请略为言之。

窃以为吾国之宗教源于天，所以圣人配天，视为天之使命，拟孔子为天之木铎，是明明以天之使命属诸孔子。孔子虽不语鬼神，而其于天人关系，又未尝不形诸教义。中庸开篇即曰：“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夫率性与修道并举，天命与设教对引与欧文字书以bind anew or back 指宗教之字源，适相符合，皆所以明天人关系也。且也，吾国古时之宗教思想，为为复一神的，以天为最高之主宰，其下复设有种种神祇，孔子所以言天道者，盖为敬天也。其不语神怪者，以其视种种神祇属错神话故耳，盖亦敬天也。缪勒氏 (Max Müller) 言之甚详。

(参观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pp126—144) 然则孔教又未尝无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不亦彰彰明乎？此仆之所以终不能无疑于先生之论也。

孔子之教义，言人事居多，语天人关系者盖寡，无可伟

言。仆不谓为一神教，而谓之凡神的伦理的宗教，正坐此耳。先生之所以诋孔，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既闻命矣。窃谓欲变吾国宗法之习俗，则打破大家族制度，最为要端，（仆不自量，思于家族制度究其得失以告邦人。他日成文，或当呈正。）不在一味诋孔。

夫孔教之伦理学说，在今日诚有不可取者存。（孔教教义不止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亦非全与现代生活不合。）仆前书所谓可改良者，即冀忠于孔教者，于此发愤改革也。宗教之教义，固属无形的，然其形式（宗教上祀典种种）乃有形的，亦犹文字之分思想与文字部分也。今先生既恶宗法社会之道德，胡不于此点促孔教教徒之反省，忠告而善导之？即不然，奋椽笔以提倡小家族制度，或能事半而功倍。若必欲废弃孔教，以为改革宗法习俗之终南捷径，遑论填海移山，事有未易，就令能之，旷日弥久，恐收效反迟。况孔教非绝无可取之点，先生亦承认之。若并此可取之点，一律删夷，先生其忍之乎？

顺社会的情性 *Social inertia* 而徐图改善者易为力，逆社会的情性而思创造者难为功。罗蓬氏曰：“无古之传说，不能有文明之开化。不废弃古说，又不能有进步。故欲于此中静动之间，谋所均衡，实属事之至难。”又曰：“民众乐于竺旧，其保守旧制也，苟能于不知不觉间逐渐改善，最为足尚。”（*The crowd by Gustave Le Ben pp. 93—94*）乃先生欲革宗法之习俗，而惟孔是排，是何异舍易就难，欲速反缓；仆虽不敏，窃为先生惜之。

抑仆又有与先生所见不敢苟同者，即先生若论及宗教，一切皆非之。仆则以为宗教在现社会尚有存在之价值，无论物质的文明若何发达，苟社会国家，未臻理想上完全之境界，则蚩蚩者氓，

其精神上不能无所信仰，以与物质的文明相调和。若在吾国，物质的文明过不发达，似无需提倡宗教。然方今人心玩愒，世风浇漓，教育犹未普及，仍不能无待于宗教。以资救济。鄙见如此，先生必否认之。惜在吾国未闻有大宗教学家与大哲学者，不则仆将不远千里，裹粮挟贄以从，以一证鄙说之果有当否也。

凡此所言，亦各道其所见云尔，非敢自是也。真理所在，自当服从。倘蒙进而教之，则为幸多矣。此颂

撰安

俞颂华白 四月二十一日作于东京旅次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罗马字母，极以为然。惟多数国民，不能皆受中德教育，而世界知识，又急待灌输。通俗书籍，杂志新闻，流传至广，关系最轻，欲废译音，势所不可。由教育部审定强行，虽是一法，而专有名词，日新未已，时时广续为之，殊不胜繁琐。鄙见与其由部颁行一定之译名，不若颁行一定之译音，较为执简驭繁，一劳永逸也。译音固不易恰合，但由部颁行自趋统一，足下所谓纵有不合，亦不得改，以期统一而免纷更是也。仆所拟译音之字，固不必尽是，而立法似未可非。倘获通人之改正，由部颁行之，后之译者按表译音，较之人人任意取舍，不稍善乎？汉字母音未定，

各字发音，固皆声韵二音所合，以之译b c d等声，固有未当，然以之译声韵合成之ba ca da等音，似无不可。即有未合，而文字符号耳，由部颁行，以期统一，不愈于人自为之乎？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新青年二卷四号有大著“西文译音私议”，近阅“旅欧教育运动”，中有蔡子民李石曾两先生之“译名表”，复由友人转示俞凤宾君“对于译音之商榷”一文，虽所用方法各不相同，而欲冀统一译音之意则一。弟对此事，却别有一种意见，敢以奉质，幸辱教焉。

弟以为凡用中国字译西文人名地名，万难一一吻合。其故因字音之理，母音可单独成音，子音不能单独成音，必赖母音拼合，始能成音。中国文字之构造，系用六书之法，与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绝异。西文由字母拼成，故子音不能成音，虽不可成字，却可成字母。中国既无字母，则凡已成之字，或为纯粹母音，或为子母成合之音，决无单有子音而不具母音之字，因单独子音既不能成音即断无此字也。西文字音虽不能单独成字，然因其语言为复音语，故以b, d, f, g, k, l, m, n, p, r, s, t, v, x, z, 等字为一音前后之介音余音者甚多。遇此等字，若欲以刚刚恰好之汉字译

之，是断断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译法，以为用“夫”、“甫”等字译f，“克”、“忒”等字译k，t，“司”、“斯”等字译s，“而”、“儿”等字译l，r，便算十分工切。其实上列各字，其下皆有母音，绝非单独子音字也。

若然，则以汉文译西音，遇此等字，万无译准之理。（普通以“姆”译m，以“痕”译n，此其牵强，固众所共知）。此外如ga，gu，ge，go，za，zu，ze，Zo之类，亦无适当之字可译，因中国“群”、“斜”二声类无开合二呼也。

抑尤有进者：即使上列诸困难，想出一种迁就的方法，如“夫”、“甫”、“司”、“斯”、“而”、“儿”等字，其下虽有母音，以现在读法，大多数都已读得同没有母音一样。“克”、“忒”二字，因是入声，其下母音较不分明，姑且当他子音用。而ga、za等字，“群”、“斜”二声既无开合二呼，或以齐撮二呼摄代，或借用其清声之“见”、“心”二类之开合呼。然尚有一种困难，则字字译出，音长者字必多，在西文止一字母或二字母者，汉文即须用一整个之字，有时笔画或又不得不用繁复者。如此，则音读既未能收完全正确之功，反有信屈聱牙难读之苦，书写之费时间，又四五倍于写原文，则其不便也何如？

故弟意以为译音总是没有绝对的良法。则与其设为种种限制，某字定译某字，或音仍不能准，或逐字对所定之表译，弄得噜苏麻烦，（如Kropotkin一字，依大著译，则当作“克罗坡特口；”〔尊表于Kin字空不填字〕依蔡李之表译，则当作“克老卜脱坎”；又一般所译，或作“苦鲁巴特金，”或作“克若泡特金。”）还是不能讨好，何如别想他法，不拘拘于译音之正确与否乎？

所谓别想他法者，弟以为有两种办法：（1）竟直写原文，

不复译音。(2)译音务求简短易记。第一法，凡中学毕业后所用高等书籍，均可照此办理。因凡在中学毕业之人，无论如何，决无不懂西文拼音之法者。既懂西文拼音之法，则人名地名，写了原文，一样能看，无须译。虽然，外国人名如华盛顿，拿破仑，达尔文，瓦特，奈端之类，外国地名如伦敦，柏林，纽约，巴黎，格林威治之类，国民学校教科书便须讲到，此则不能不乞灵于译音。高等小学中虽有英文，然程度极浅，发音变化，也还讲不了多少，故高小中学教科书，仍不能不译音。(惟中学教科书于译音之下，当兼注原名，小学则可不必。)此类译音之字，应用若干，大致可以配定。我谓可一一尽译，列成一表，以后凡编中小学校教科书者，悉宜遵用，纵有不合，亦不得改，以期统一而免纷更。此表可由教育部制定颁行，仿日本文部省颁定之制。(日本凡文部省规定之课名，学者著书。学校教本，一切遵用，虽讹，亦不更改。如England既定为イギリス，决不再改为イグダラソド也。)其译法务求简短。吴稚晖先生曾谓最好将外国人名地名译得象一中国人名，中国地名，则免钩辘格磔信屈聱牙之病。故译Shakespeare为叶斯璧，译Kropotkin为柯伯坚，译Franklin为樊克林，译Tolstoi为陶斯泰。我昔曾反对之，以为未免失其本真。由今思之，此实是简易之良法，惟人名第一字，似不必译成中国之姓耳。诚能将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需用之人名地名悉数依照此法译定一表，期以实行，岂不简便易记乎？(惟旧译之已经用惯者，如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加富尔之类，自当遵用，决无须再改，反致纷扰。)若虑与原音不相吻合，则宜知即改“叶斯璧”为“莎士比亚”、“索士比亚”，改“柯伯坚”为“苦鲁巴特金”、“克若泡特金，”改“陶斯泰”为“托尔斯泰”、“杜尔斯德，”还是不准。而彼则不准而繁复难记，

此则不准而简便易记，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宁谓之此善于彼矣。

且人名地名，原不过一种记号。但使社会通行，人人皆知，则用不准之译音，固与用极准之原文毫无二致。今如 Scotland 之为苏格兰，Portugal 之为葡萄牙，Newton 之为奈端，Kant 之为康德，人人习用已久，共知其为何处地方，何等样人，与写原文一样。故苟知叶斯璧之为十六世纪末叶之英国文学家，柯伯坚之为现代俄国无政府党，即与写 Shakespeare, Kropotkin 无异。

如上所言，是写不准之译音，与写原文无异。然则中学以上之书，何以又须写原文乎？曰：其人既有中学以上之程度，自可看西文原书，故不如直用原文，冀看原书时可以多一点便利。且高等参考书籍，人名地名较多，一一译，未免麻烦，既能读其原音，何妨省此一番手脚？若中学以下，则因大多数不能深造于学，（纵或有习浅易实业者，然当惜其脑力，不可令其专勤于牢记无谓之人名地名拼法也。）故不可径书原名，以苦其所难。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也。

或曰：高等书籍写原文，固为便利；然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

“十九世纪初年，France 有 Napoleon 其人。”

如此一句写时，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则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

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此弟对于译音之意见，足下以为何如？

钱玄同白。 五月十五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李亨嘉

亨嘉先生：

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今之对德宣战，非以图近利（加关税缓赔款之类），非以助协约，非以报小怨（夺青岛之类），亦非以主张公理拥护公法，正欲扑彼代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之德意志，使彼师事德意志诸国，知无道之强权，不可滥用，然后吾弱者始有偷生之余地耳。至于实力能胜任与否，在理论上不成问题，在事实上非单独与德宣战，殊无绝对失败之理。且既已绝交，势难反顾。日攻青岛以来，吾国已非中立，今仍欲骑墙，祸更不测。

吾国民偷目前之苟安，无远大之策略，欲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也（不但中国如此）。若国之大政，必事事少数服从多数，则吾国之恢复帝政，垂辫缠足，罢学校，复科举，一切布旧除新之事，足下能保不为多数赞成乎？

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来书所谓代表舆论，乃同流合污、媚俗阿世之卑劣名词，记者所不受，不忍受也。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李亨嘉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贵志持诸子平等，不尚一尊，及文学改良务求显易二义，竭精殚虑，不厌求详，可谓能见其大，当务之急。持论亦复平允，吾无间言。独是最近如对德外交一文，极力主张宣战，仆虽无似，窃有怀疑。倘能启发愚蒙，岂特一人之幸？

夫德以军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又以潜艇战争扰及中立诸国，吾既屡受损害，为公理计，为自卫计，毅然宣战，宁得谓狂？然一国之外交，不第视其正谊如何，亦复视其实力如何。日人之于郑家屯，法人之于老西开，按诸义理，岂不可与宣战？而终至于让步者，诎非以实力不足乎？今使吾国确有战斗之能力，则虽加入协商以战强德，在名义为维持公法，在事实为缩短战争，一举而足重轻，吾何为而不尔？而我国实力则何如者？

或谓德无余力兼顾东方，吾可宣而不战，此等理论，诉之逻辑，庸非滑稽？今有甲乙丙三人于此，甲则孔武有力，无理取闹，以与乙斗，且凡过其地者，甲皆痛击无遗。丙为二人之友，亦以过其地而为甲所击伤。而丙实一病夫，不敢与战，顾谓甲曰：“吾战汝。”又谓乙曰：“吾助汝攻之。”于是时以木屑草头自远投甲，于乙无益，于甲亦岂有伤乎？今之宣战，何以异是？盖吾之足为协约助者，不过工人粮食。然此区区者，虽不宣战，吾尚可以勉为。与其宣战而无损于德，何如不战而有利于协商？

至大著所持理由，不外谓对外可以增进国际资格，联络协约感情；对内可以振奋精神，力图对外。仆则以为前者吾既抗议绝交，可以已矣。若画蛇添足，强人所难，当亦为协商诸国所不取。至后者所谓对外，恐适成仇外之代名。足下试察国民心理若何，当不谓仆誇張为幻。故仆疑足下所持理由甚不充分。

总之，吾国自甲午之役，以至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国内三次革命，国民已如惊弓之鸟，其讳言宣战，固亦情理之常。故一闻宣战之声，即百货停滞。究竟政府有何不得已，必欲为此虚名之宣战，而实受损失于无形？贵志代表舆论，正宜极力反对。今反为赞成，仆实百思不解。

夫近人论外交，谓宜举国一致，诚然，诚然。但所谓一致者，当以少数服从多数，而决非以多数服从少数。今对德宣战，为多数之国民意思，抑少数之执政主张，又不待著决矣。至于有无条件之加入，仆以为既无实力可以言战，又乌有实力以为条件之保证乎？然则条件之有无，俱不可以言战也。仆之私见如此，不敢云辩论，亦聊以质正耳。进而教之，所厚望焉。

李亨嘉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胡晋接

子承先生左右：①

辱赐书，过蒙奖励，且矜且惭。先生讲学万山中，不识世俗

①子承，胡晋接字子承。

荣利为何物，所遇门下诸贤，大都洁行而朴学，知先生之德教感人也深矣，溥矣。以硕德名宿如先生者，道破旧式思想之污浊，提倡教育精神之革新，新教育真教育之得见于神州大陆也，当为日不远矣。

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选，乌可得哉！先生倘以为不谬，尚希时赐教言，且指斥所不备，幸莫大焉！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五，一。

胡晋接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屡读大志，深佩卓识。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盖思想为事实之母，社会事实之总和，必等于社会思想之总和，此自然公例，无何逃避。

仆尝太息痛恨于此日中国之教育，大多数为伪教育，以其形式则是而精神则非。一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其脑筋中固仍然未变革其数千年来污浊之思想也。以故兴学垂二十年，而迤鲜效果可言。严译群学肄言有云：“民质不良，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每诵斯语，尽然神伤。

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必一般青年湔除其数千年来污浊之思想，而发生一种高尚纯洁适于世界二十世纪进化潮流之思想，然后吾国前途之新国民，乃能崭然露头角于新世界，而有以竞存而图强。

自来学说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

夫真理者，最后之战胜。此次欧战结果，恐欧洲学者之思想界，尚有不适于用，而亟待革新者，而何况吾中国？

世界无尽，吾愿无尽，安得常与先生晤对一堂，俾共研求此最可宝贵之真理耶！率臆妄陈，惟先生有以教之，幸甚。专此，

只请

道安

弟胡晋接鞠躬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

××先生：

所示各条，均应力谋实行。鄙意欲创造新文学，“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本志拟锐意征求此二种材料。至特辟一栏与否，似不必拘泥。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改良文学之事，关系甚重，苟不实心实力做去，恐此项学说，仍是昙花一现，不久即为学究派之腐说所战胜。故就鄙见所及，举关于实行一方面之事数项，条列如下，愿先生有以教之。

·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

·子民秋桐曼殊诸先生，均为当代文士所宗仰。倘表同意，宜请其多作提倡改良文学之文字。

·关于改良文学之文字，当允许各报转载，勿以杂志之版权问题妨害学说之进行。

·吾人今日所论之改良方法，仅举其落落大端。文学为一种精微玄妙之科学，其应行讨论之处，决非此落落大端所能尽，亦决非一时之中，三数人之心思才力所能尽。故青年杂志除时时登载此项论说外，应特辟“文学研究”一栏，以容众见。凡有关于文学之问题，无论如何微细，亦一律刊入，以供同人讨论。

·今日学国文者，多取前人所作文字为读本。平心而论，前人文字虽有不尽为吾人所满意者，然亦未必尽非不可效法，只须选刻之人，能破除迷信古人之念而已。故最好商诸群益或他书局，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刻选自古至今之文字，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但须确有可取，即采入书中，以资

雜誦。（私意此事对于后来学者颇觉重要。）

·改良文学，是永久的学问。破坏孔教，是一时的事业。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说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孔教之能破坏与否，却以宪法制定之日为终点。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属无可奈何。故青年杂志对于文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尤贵以毅力坚持之，不可今朝说了一番，明朝即视同隔年历本，置之不问。

××上

（录自《新青年》3卷3号）

陈独秀答张护兰

护兰先生：

“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一经足下揭破，其有不以足下之言为然者，必其人不诚实者也。

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其势目前虽不可侮，将来必与八股科举同一运命耳。

独 秀

一九一七，五，一。

张护兰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屡读大志，获益良多。中国文学倘不革命，即中国科学亦永

无发达之日。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盖吾国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数语见教育公报所载梁任公之演说）。然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使言文渐相一致，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使中国文学开新纪元。至学校课本宜如何编纂，自修书籍宜如何厘定，此皆今日所急应研究者也。惟此外仆不能不怀隐忧者，为他日之反动力。以仆悬测，厥有三种：

（一）老学究均八股中人物，其头脑之冬烘，深不可拔。前清废科举，改策论，彼辈慑于天威，故腹诽之而不敢形于言辞。今骤闻此文学革命，则彼辈感于斯文之将丧，必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之余，乃施其破坏手段；国人意志薄弱，鲜有不被其惑者。

（二）一知半解之学生，对于文学，早有一种成见。以为文必求古，字必求奥；圣经贤传，中国之粹；国粹若亡，国何以立？平日又受顽固教师之诱迪，益坚其信。吾辈之言，当然被斥为妄谈。

（三）一般赞成改革文学者，并承认小说词曲实系文学正宗，十三经等乃陈死人之言，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火之可也。又知先生等对于中国小说，曾加以批评，于是红楼梦为其公余研究正课，西厢记为其参考书，天天宝哥哥，日日林妹妹，人戒之，则曰：“我将于此修炼我词句，发展我思想。子不知小说为文学正宗耶？”

上述三种反动力，仆深信将来当然发生者。故预防之法及遏止之方，亦不可不先筹画者也。

仆尝谓我国文学，病在虚饰。比于道德问题，大有关系。我国人处世接物，每多出以诈讹。循至文学，亦落此弊摹古人，琢

字句，只求外观琳琅至内容之合理与否，素不过问。有时良心上欲作一二诚恳语，然格于习俗，仍不得不故意花言巧语。盖我国人言行不一致久矣。国人亦并不以此为非，或更从而演绎之。教者务使言行不相一致，而学者亦力求言行相歧，否则恐不能见容于社会。故仆以为国人之道德，倘素重诚实，则文中偶用对仗，或偶杂古典，必纯出自然，并不加以雕琢，亦何伤也？

今先生力排古典，力斥摹仿，此系快刀斩乱丝，不得不然。但仆以为尚系治标之策，将来未必发生若何影响。仆以为处今日而言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双方并进。盖国人之道德既趋于诚实之途，则对于种种花言巧语，自认于道德有亏，必力避之。人人有此自觉心，则文学革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矣。质之先生，以为然否？尚乞教正。余不白。

张护兰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李杰

李杰先生：

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李杰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有道：

连读贵志，于辟孔一门，多所论列，俾我青年恍然于数千年来弱国弱种之大本，而思有以驱除之。至理名言，钦佩无既。但鄙意以为一方面辟孔，一方面须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而与孔子相反者，作为破坏后之建设，使国人有所遵循，视尤为当务之急。按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纯系摧残君权，扶植民权。如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谓大盗者，即窃国者侯之窃国贼也，亦即帝王之代名辞也。又曰“殪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盖君权之下，人民无议论之余地，而君主固假圣法为护符也。凡此皆欧美近时之大问题，而我国数千年前已有入发明之，望贵志竭力提倡，则不徒我国史之光，亦足以杜持欧美学说不宜东亚言论者之口。仆于贵志有厚望焉。专此敬请撰安

李杰谨上

(录自《新青年》8卷8号)

陈独秀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

仆前答某君书，所谓“华美无用之文学”者，乃一时偶有一

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谓全体文学，皆无用也。

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高明以为如何？

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其有不心怀复辟者，更属主张不能一致贯彻之妄人也。康南海意在做大官，尊孔复辟，皆手段耳，此论更不足论。其徒梁任公尝直称其名曰康有为，深恶之也。

独 秀

一九一七，六，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前阅新青年二卷三号通信门，先生答T.M.Cheng君语，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云云。先生认世界语为“人类必要之事业，”此说弟极表同情，至云未能应用于文学，恐非确论（文学之上加以“无用”二字，弟尤不敢赞

同。然此当是先生一时之论。观大著“文学革命论”所言，知先生于文学之事，固视之极重也。）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故智，写许多费解之怪事，以眩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弟以为此等怪物，止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重儻，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故胡适之先生以水游比史记，弟极以为然。且以为使司马迁施耐庵易地，则史记文章必用所谓“鄙俚村语”，水游文章必用所谓“龙门笔法”（括弧中八个字，聊学鸚鵡名士口吻，以博一笑）。彼“鄙俚村语”与“龙门笔法”之异，正犹尚书用“兹”论语用“斯”孟子用“此”之。异假如有人说，用了“兹”字，便如何如何有文学上之兴味，用了“斯”字“此”字，便如何如何村俗不堪。则虽选学名家，桐城巨子，亦必嗤之以鼻曰“恐怕没有这种道理罢”。既知此理，而必以“龙门笔法”为雅，“鄙俚村语”为俗，此真不知半斤无异八两，二五即是一十矣。吾谓其文之内容而有文学真价值也，则形式为诗经，为楚辞，为汉魏乐府，为杜白之诗，为周辛之词，为关马之曲，为施曹之小说，为胡先生之白话诗，无乎不可。其形式之异，只是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耳。若然，则用世界语纂译文学，亦只须视其内容之价值如何，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且所谓华美，其界说果何若，殊有难言。一般鸚鵡名士之所谓华美，不外弟上文所说“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而已。大约中国之所谓文人学士研究文学，即在此种地

方。故当其摇头摆尾，口角嘘唏，将甘蔗渣儿嚼了又嚼之时，专在改换字面，删削虚字。乃嚄嚄然号于众曰此句如何古奥，此句如何华瞻，此句如何险峻。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真叫我肚肠笑痛，转不过气来。于是有传染此等名士习气者，谓世界语文法如此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板的文字，怎么可以做美文呢？呜呼。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世界语得公等咒骂，幸喜无金漆，却非马桶，敬谢盛意。又或谓世界语何必学，假如不通西文者学之，亦需一年半载，学成之后，并无若干好书可看。其通西文者，更何必学此等索然寡味之文字。吾谓此亦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之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如何竭力提倡，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考世界语自一八八七年六月二日出世，至今才三十年。其初出世之二十年中，不甚有人注意。犹忆丁未戊申之间，刘申叔张溥泉诸君在日本，请彼国之大杉荣君教授此语，其时日本此语亦始萌芽。一面吴稚晖褚民谊两先生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加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异，中国人亦渐知注意。私意谓苟非欧战，恐三四年来又不知若何发达。然现在虽因欧战，暂受濡滞之影响，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

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

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高小之英文，本可删去。盖其人若能进中学，则中学一年级之英文，固是从abcd字母教起，全不在乎高小之多此赘瘤。若无力进中学，则此区区几句粗浅的英国话，学了毫无用处也。）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从无例外之文法发音。以两年之力记生字一万，则杂志书籍无不可看，岂非极有益之事。且外国人名、地名、及学术上专门名词之无从译义者（专门名词可译义者，虽居十之七八。然不能译义，止可译音者，亦必有十之二三，）现在编译书籍最为困难。若用华字译音，总是不能译准，仍非下加括弧注原文不可（此意详上月与公论译音之信中。）若用西文原字写入，斯诚善矣，然各国于字母发音，各不相同，人名地名尤甚。且如Hegel一字，其首之H，依英德则有音，依法则无之。又如Hugo一字，亦同此例。故或译“器俄、”“许峨、”或译“虞哥、”“雨苟”也。依名从主人之例，则人名地名自当各读其本国之音。而学术名词，则普通用英，讲究者用德，然法之学术非逊于德，且法人多为德人之先知先觉，似乎用法尤为合理。然此不过我一人之臆见，终究不能划一，大约各视译书者自己外国文之程度而定。如此，则一部书中嵌入之外国字名词，兼数国之拼法，数国之读法。无论读者未必能尽懂此数国文字也，即曰懂矣，而甲字依英读，乙字依法读，丙字又须依德读，乃至丁戊己……诸字，又须读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之音，其为纷扰，不已甚乎。弟意今后凡书中嵌入之外国名词，欲免上列种种困难，只有用世界语之一法。试以地名言之。如比利时国，不作Belgsum、（英）不作Belgique、（法）而作Blguilo、希腊国不作Greece、

(英) 不作 Grece、(法) 而作 Grekujo、西班牙国、不作 Spain、(英) 不作 Espagne、(法) 不作 Espaiia、(西) 而作 Hispanujo, 人名及学术名词准此。如此办法, 实有三善。(1) 发音皆有一定, 毫无难读之虑。(2) 免得忽此忽彼, 不能划一。

(3) 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 所有各种名词, 可以算得一种永逸不变之定称。中国书中嵌入别种文字, 舍此其谁。(况世界语不得以外国语论。在世界未至大同以前, 无论何国, 皆可以世界语为“第二国语”。故中国文书中嵌入世界语, 实与写中国字无异。) 或谓此语出世未久, 各种名词, 恐未完全。其实不然。世界语之“百科全书,” 已有成书。手此一种, 名词何患不敷。即以浅近言之, 日本中村精男, 黑板胜美, 千布利雄三君合著之“大成エスバテソト和译辞典”, 所载科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历史上之名词, 已甚多多。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瞎讲。顽固党既虑有此语而国粹消亡。洋翰林又虑有此语而被所操之英语(或他国语), 失其名贵之价值。于是交口诋毁, 务必不许他人学习。此种狃狃之妙相, 真欲令人笑死。Tolstoi 以盖世文豪而用世界语著书、Ostwald, 以科学大家而以化学所得之诺贝尔奖金充传播世界语之用, 他国学者如此热心世界语。返观吾国之所谓学者, 大言不惭, 抹杀一切, 以西学为末技, 以世界语为粗浅, 说得“像煞有介事,” 其实茅塞心中, 满口胡柴。嗚呼。中西人之雅量, 其相去之远, 竟至于此, 真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矣。

一月以来, 种种怪事, 纷现目前, 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办上下, 定民志,” “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 二千年来沈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 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 虽不合理, 尚

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或谓二千年以前之人，其脑筋中决不能发生平等之观念，故不能责孔丘倡“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吾谓此说殊不尽然。彼庄周、墨翟、宋钐许行诸人，固亦二千年以前之人也。何以彼等便能倡平等之学说乎。）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犹忆夏穗卿先生前著“中国社会之原”（见癸卯年新民丛报），谓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无如其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之发明，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竞君择，适者生存。”儒教尊卑上下之精义，遂为崇于二千年来之中国（夏先生原书，今不在手头，撮其要旨如此。）夏先生至谓“墨蹶儒兴”为涿鹿战后一大事，此实精绝之论。故先生大著“吾人最后之觉悟”一篇所陈之义，弟以为于今月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近日解散国会之呼声日高。然欲解散者，无论其居心何若，而做到文章打到电报的理由，要不能太离本文，故金以“制宪不善”为词。独康圣人别开生面，以不定国教为议员万恶不赦之罪。自吾侪观之，“尊崇孔子”四字写在宪法上面，已经觉得不伦不类。而康先生则以为孔子而仅仅“尊崇”，未免尚嫌平淡无奇。充其量，盖非以孔子为三头六臂，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怪物不可。否则孔子犹是人类，纵然是空前绝后之至圣，似乎中华

民国人人“尊崇”之，亦可算得克尽景仰先圣之能事矣。何以康先生遂要磨拳擦掌，怒发冲冠，与议员不共戴天乎。康先生此等动作，我侪见之，实欲失笑。然吾欲请问康先生。议员不定孔教为国教，其罪诚莫可逭矣。不知“长素”二字，又作何解。以“素王”之圣，而竟有妄人不但不稽首膜拜，还要自以为比他“长”一点。此等非圣叛徒，当科何罪？愿康先生下一转语来。

弟钱玄同

(录自《新青年》8卷4号)

陈独秀答胡适

适之先生：

玄同先生谓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虽未免过当，然作者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若丑妇人搽胭脂抹粉，又若今之村学究满嘴新名词，实在令人肉麻。吾国札记小说，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亦略高。所述杜十娘、朱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欢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话浮词乎。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辈迂腐之

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此乃吾国文学缺点之一，足下及玄同先生以为如何？

独 秀

一九一七，六，一。

胡适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昨得“新青年”三卷一号，奉读大著“对德外文〔交〕”，甚佩甚佩。又读“国语研究会”会章及征收会员启，知国中明达之士皆知文言之当废而白话之不可免，此真足令海外羁人喜极欲为发起诸公起舞者也。

通信栏中有钱玄同先生一书，读之尤喜。适之改良文学一论虽积思于数年而文成于半日，故其中多可指摘之处。今得钱先生一一指出之，适受赐多矣。中如论用典一段，适所举五例，久知其不当。所举江君二典，尤为失检。钱先生之言是也。

钱先生所论文中称谓，文之骈散，文之文法诸条，适皆极表同情。其评“老残游记”，尤为中肯。适客中无书，所举诸书皆七年前在上海时所见。文成后思之，甚悔以“老残游记”与吴趼人李伯元并列。今读钱先生之论，甚感激也。

适于钱先生所论，亦偶有未敢苟同之处。今略记之，以就正于足下及钱先生：（一）钱先生云“至于近世聊斋志异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此言似乎太过。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以文法论之，尚不得谓之“全篇不通”。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

陋耳。(二)神怪不经之谈，在文学中自有一种位置。其功用在于启发读者之理想。如“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读之使人忘倦。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其写猪八戒，何其妙也。又如孙行者为某国王治病一节，尤谐谑可喜。似未可与“封神传”之类相提并论也。(三)“七侠五义”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其书亦似有深意。如宋仁宗在史上为明主，而此书乃记其贵为天子而不知其生身之母沦为乞丐。圣明天子固如是乎。其书写人物略有“水滸”之遗意。其前半之蒋平，后半之智化，皆能栩栩生动。似未可以“海盗”一端抹杀其好处也。(四)钱先生以“三国演义”与“说岳”并举，亦似未尽平允。“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且三国一时代之史事最繁复，而此书能从容记之，使妇孺皆晓，亦是一种大才，岂作“说岳”及“薛仁贵”、“狄青”诸书者所能及哉。(五)钱先生谓“水滸”、“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小说之有价值者，此盖就内容立论耳。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今即吴研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怪现状”之下也。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

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若我佛山人经意结构之作如“恨海”、“九命奇冤”，则与此类大不相同矣。“二十年怪现状”在上所举同类之书中，独为最上物。所以者何，此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非李伯元所及。“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其中记彩云为某妓后身，生年恰当某妓死时，又颈有红丝为前身缢死之证云云，皆属迷信无稽之谈，钱先生所谓“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者是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品花宝鉴”为乾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不知此书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后吾国道德进化时，“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淫淫之书者矣。（美国人骤读此种小说，定必駭怪。同此理也。）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质之足下及钱先生以为如何？（第二流正多佳作，如“镜花缘”一书，为吾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以钱先生未及此书，故一及之。）

论戏剧一节，适他日更有“戏剧改良私议”一文详论之。今将应博士考试，不能及之矣。 胡适五月十夜

（录自《新青年》3卷4号）

陈独秀答李寅恭^①

协丞先生足下：

惠书及文，均一一读悉。大著及尊夫人之文，已陆续录之本志，拜谢拜谢。

欧洲良法美俗，足资吾国社会改良者，不少。足下倘有日记或札记载此等事，录赐本志，则裨益读者匪浅也。吾国有子弟不能教，有土地不能耕。为人类全体计，以大好河山，安插此辈游民，使他种勤俭多能者迫于衣食，岂得谓平。审是则人之谋我，何足异哉。国事方纷如乱丝，足下可再留欧数年。此时回国，无一事可做。国民毫无自觉自动之意识，政界有力者与在野之旧党相结合，方以尊孔教复帝制复八股为志，视欧洲文明及留学生如蛇蝎。于是风行草偃，即受教育之青年学生，亦多鄙薄欧化，以孔道国粹自矜，谓此足以善群治国。社会思潮，与百年前闭关时代无或稍异。如此国家，如此民族，谓能生存于二十世纪进化日新之世界，谁其信之。足下愤慨林政之不兴，然犹其一端，而非其全体非其本根也。率复，不尽欲言。

独 秀

(一九一七.七.一.)

^① 李寅恭，字协丞。

李寅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前后寄上各书，并“比利时之森林”、“论养树园之办法”、“吾人求学之方针”（英文）三文。又内子绍南“哀青年”、“余之病院中经验”、“夏克通南极探险”、“绍南别母诗”诸篇，谅入台览。论养树园之办法，附图五片，请按照文中所叙述之次序，分前后加图一图二等嵌入。如嫌图不清白，翻印更糊涂，则置之亦可。此文虽不佳，确为森林上之根本问题。倘先生加以介绍语及评论，尤足使国人注意。（中略）月前闻英人要求西藏十余款，不啻取而代治。在国人以为太无理，无如自家日日所争者私人利禄，高材者但致全力于政论不休。而一切实业，如农林上事绝少通盘筹画。故全国地亩应作农业及森林用处之详图，至今政府尚未筹备及测定，而与我接壤之邻邦，已暗中调查详晰矣。以印度森林论，偶展其森林上各项地图一看，不能不对于英人之经营印度、缅甸之有法而叹服也。现今全印度之木田，已画定共有二四五六一二方英里。如喜马拉雅一带山田，大吉岭及缅甸全部，皆林木最盛之区。而我之云南西藏及尼泊尔Nepal小国，与之毗连，气候地土及木产，大致相同，何不可一致兴办乎。今英人力认西藏为一小国，则欲其脱离我手，用意坚矣。闻谷先生长农商部，忽推翻周自齐氏辛苦多时创设之林务处。呈请裁去，政府允之，我国林政，不复可望。世人共说我国人无目，今新党为政亦复如此，可胜叹哉。恭虽于课余杂著一二，涉于农林上

问题，为“科学”、“农商公报”、“神州日报”采登，未见有毫末之影响。言之只为中国前途悲也。恭今年下半年想回国，回国以前，拟游法调查一切。且梦想一往喜马拉雅山一带，直至缅甸，看看英人森林上之成绩，及各省所设森林学校养成森林上下级人员（因森林上长官及他项人材，皆在其本国及欧陆各大学内养成）诸情形，未知能如愿否？又森林一项，各国多收为国有，因不如此，则管理不能画一，无长进。英之印度全国森林，尽为政府之产，均进步臻臻日上。今我国同学，少习此科，在欧者无人，可叹也。官费出缺，教育部复乱允在欧殷实之自费生充补，国中穷苦学生，遂无求学之极会。今西藏蒙古及各边省，尚无一人留学。我对于国政，但有悲观而已。临发复开封，拉杂言之，幸先生不以为妄言为幸。雪窗手僵，言不尽意。敬颂道侔李寅恭寄自伦敦

（录自《新青年》8卷5号）

陈独秀答钱玄同

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

独秀

（一九一七.七.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弟自读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即拟撰一文，题为

“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两月以来，执笔欲写者数次，皆以校课太多，忙忙碌碌于编纂讲义而阁起。兹先将改革之大纲十三事函告如下（左）：

1. 以国语为之。

2. 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此数一时不能说定。）

3. 凡一义数字者（指意义用时完全一样，毫无差异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4. 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中国字无语尾变化，若排列法无一定，必致主宾倒置，使观之者不能得正确之解释。故如“室于怒，市于色”、“味雉彼视”等句法，必当严行禁绝）。

5. 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德门集庆”种种肉麻可笑之句，必当删除，固无论矣。即如“阁下”、“足下”、“左右”、“执事”、“台安”、“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其实亦可全行删除。若抬头“双抬单抬，更不消说。”空格偏写之款式“老伯”、“小侄”、“姻兄”、“世讲”之称谓亦当废止。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6. 绝对不用典。

7. 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

8. 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句读如。、：、；之类。〔或用。、：△亦可〕，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9. 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楷体各人各写，初无一定，书法家尤喜立异。惟唐石经字体，最为平易正确，现在刻木浇铅之宋体字，什九与之相同；草书在魏晋隋唐之间，极为通行，自张旭怀素以至祝允明王铎，喜作狂草，各式各样，信笔写去，以致草书专成美术，而不适于实用。今宜取“急就”、“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此事，弟数年前即拟为之，因循未果，今后得暇，当勉力成之。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草亦兴于秦末。）本为由繁趋简，故周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用隶，晋唐用草，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草亦不能再进者，因照中国文字之形式，变至草书，已简至无可再简也。）然自宋以来，忽又废草不用者，厥有二因：（1）为张旭怀素等狂草所坏。字无定体，且任情缴绕联绵，不易辨认。（2）为可笑之仪文礼法所拘。以为写了草书，便不恭敬，故臣对于君，民对于官，卑幼对于尊长，皆须写耗时费墨之楷体。及其末流，竟至有所谓“黑方光”之“馆阁体”。现在第一层之弊，但须勒为定体，不许瞎写，便可矫正。第二弊，简直不成问题，直当破坏此种可笑习惯而已。

10. 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如曰说文五百四十部，广韵二

百有六韵，注音字母三十有九母，可作540，206，39也。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古书中表数之句，更有难解者，如尧典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语。骤视之，可作三千零六十六日，〔此从句字逗。〕或三百二十二日〔此从上六字逗〕解。史记改为“三百六十六日”固佳矣。今若改为“366”，岂不更为简明？）

11. 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此事说来话长，当别为论。现在我自己可以先表明一句。我绝非耶教信徒，且我绝对以为今后世界只有科学真理，彼宗教神话，断无存留之价值。如国人以此为太骇俗，或仍用民国纪元，其民国前一年辛亥，至用共和元年庚戌，则倒数之，称民国纪元前一年，至民国纪元前二七五二年，亦未尝不可。惟彼帝王纪年，三年一改，五年一换，盗贼、夷狄、呆竖、淫奴，无不具备，此断当废止不用）。

12. 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道。

13. 印刷之体，宜分数种（如全方者，全圆者，及丰锐停匀，毫无棱角者。隶书字体与楷全同，惟笔势为异，亦可采用），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

上列十三事，不过偶然想到这几层，便先写了出来，是否平列，是否同一类的性质，及尚有重要部分之遗漏与否，都等到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再行细想改正，现在且不去管他。

……私怀所蓄，尚有多端，欲藉《新青年》之余幅，写他出来，以就正于国内明达君子。先生其许我乎？

弟钱玄同

（录自《新青年》第卷5号）

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

《新青年》爱读者：

记者前获上海友人书，云《公民杂志》有一长文驳正本志非孔意见。当时闻而乐之，以为必有崇论宏议，足资攻错也。近购而读之，乃大失望。培风君之文，其要点不独于记者之说少所驳正，且竟完全赞同，使记者不获闻反对之快论，是以失望也。

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参观《宪法与孔教》论文）。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惟期期以为孔道为害中国者，乃在以周代礼教齐家、治国、平天下，且以为天经地义，强人人之同然，否则为名教罪人。

前记者答俞颂华君书有云：“孔子精华，乃如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滿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今培风君亦云：“礼果为孔子之道，则孔子之道诚不可用于今日。”是其所主张者，已与记者无殊；所不同者，其假定之前提，乃不以礼为孔子之道耳。

夫以礼非孔子之道，诚属创闻。儒家重礼，见薄于老、庄，其言其事，不始于今日。若言礼不始于孔子，即非孔子之道，岂可忠恕之道为孔子所发明，前人未之言耶？细读培风君之文，知其于

国学造诣尚浅，又不若康南海以礼教代法治之说，尚成一家言，有一驳之价值也。培风君倘能详实证明孔子不重礼教，亦记者之所愿闻。

独秀 一九一七.七.一。

新青年爱读者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贵志指斥孔教不宜于现代生活，痛快之至。近读第四期公民杂志培风君“孔子之道与今日之中国”一文，盛称孔道，且云“我国今日，非行孔子之道不足以自救。”其重要论点，在礼非孔子之道，孔道重忠恕；中国万事之败坏，皆在不忠恕；故欲救中国，必行孔道。其言当否，乞有以教之。

新青年爱读者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吴虞

又陵先生：

惠书敬悉。

《礼运》大同之说，古之孔教徒鄙弃之，以为非圣人之言，以为孟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以为杂而不伦；今之孔教徒以求容

于共和国体，故不得已乃尊重昔之所鄙弃者，以为圣人之大义微言，以为孔子之所以师表万世者以此。此即所谓孔教改良耶？所谓孔教进化耶？抑何丑陋至于斯极也！

鄙意尤有进者：即使《礼运》出于孔子，而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乃指唐、虞禅让而言。大同之异于小康者，仅传贤、传子之不同，其为君主私相授受则一也。若据此以为合于今之共和民选政制，是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曷足与辨哉！

独秀 一九七一，七，一。

吴虞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前著“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今又得三证：

吕东莱与朱元晦书曰：“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翟之论。”东莱以为老聃之论，直不认为孔子语，一证也。

朱子语类云：“礼运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谓其说似庄老。先生曰：礼运之说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又问礼运似与老子同。曰：不是圣人书。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计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朱元晦认礼运非孔子书，且非子游作，而或以为似庄周，或以为与老子同，二证也。

李邦直礼论曰：“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是而谓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如是而谓之薄俗。’又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如是而谓之起兵作贼谋乱之本。’以禹汤文武周公之治而谓之小康。郑氏释之，又以老子之言为之证，故不道小康之说。果夫子之遗言，是圣人之道有二也。”李氏此论，见圣朱文选。其意以为圣人之所以持万世与天地长久而不变更者，君臣父子而已。不认大同小康之说为孔子之遗言，而又以郑康成礼运注引老子为有所牵惑，不悟郑氏以老子注礼运，正足以证明大同小康之义，原本于老子也。此三证也。

至是而儒教徒据礼运大同之义，为儒教合于共和之护符，可以休矣。然则不佞之主张，古人多有先我而疑之者，固不仅陆希声王介甫解老之说足以证明也。乞附入通讯，与拙著前说互证。

即颂

撰安

弟吴虞谨启。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顾克刚

克刚先生：

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惟人类生活，既必经此阶级，且今方在此阶级中，则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倘漠视之，必为其群进化

之最大障碍。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

例若今日之中国政象如斯，吾人有何方法从事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乎？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所讪笑者。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栏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

独秀 一九一七.七.一。

顾克刚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披读大志，已一年有半矣。蒙灌输新思想，亦岂浅鲜！愧无以报，故作此函。

鄙人近来细阅大志，似乎三卷之内容，不若二卷；而二卷新青年，犹不若一卷之青年杂志也。进化公例，恒后来居上，而贵

杂志反之，仆诚惶恐。惟仆学识鄙浅，所言者或恐失之诬。如先生以为然，则改之；先生以为否，则教之可耳。敢布鄙意如下。

一卷之文重学说，二、三卷之文重时事。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教诲青年，当以纯正之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即以孔教问题而论，若是否可为青年修身之大本，固在学说范围；至于是否可定为国教，已入政治范围矣。若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及伦理的觉悟等文，固学说之论也；至于驳康氏书，及孔教与宪法等文，则时事之评也。）且今之政局，形式而已，既不足责，亦不足惜！亡亦无损，存亦无益。盖今日所存之形式，谓之已亡，亦不谓过。所存一线之生机，惟在后进之青年耳。

素闻先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惟冀国民思想根本之觉悟，则先生之负任，远在黎段之上。黎段之用心，惟在挽形式之不亡；先生之用心，当在挽精神之不衰焉。故仆非强先生以不言时事，良以先生多一句时事，必少一句学说。今先生尽力吸收西洋文明，将新道德，新学说，一一灌输于我青年，惟恐不给，岂暇他鹜而道及时政哉？竭诚呈辞，以报盛德，还望先生垂教之。

爱读新青年吴人顾克刚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卓鲁

卓鲁先生：

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

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

独秀 一九一七.七.一。

卓鲁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窃自民国以来，革命革命，既已脍炙人口。然革命二字，究作何解，莫不曰推翻满清专制之朝，而建中华共和之国而已。仆窃以为未足，及披辞源及日本法律经济辞典，其释革命则曰政治上之变更，其义似较广矣。然仆犹以为未安，及读贵志有文学之革命一篇，返复讽诵，豁然心悟。遂妄定其义曰：革命者进步改良之谓也。凡吾人对于宇宙间苟有所发明足以贡献于人群世界者，均得称之为革命。故革命愈多，则收果更大。改专制而图共和，是政治之革命也。去古典而务实用，是文学之革命也。其他种种革命，均由此义而生可也。若仅曰革命乃政治上之变更，是变更仅及于政治，此政治之所以不能进步也。夫理者事也。理之不明，必事之未察。吾国革命，形式而已，安得声骚之斗笔，撰为解释之文，将革命之原理，大揭晓于国人之前乎？先生志在民生，负有重望。贵志风行以来，蒙益良多，吾知法国之哲人，行将再生于中华矣。草草上言，尚希赐覆。此请浩安。

卓鲁顿

（录自《新青年》3卷5号）

陈独秀答沈藻墀

世之所谓词章者，乃兼韵文及骈文而言。所谓古文者，乃专指散文而言。其实以时代比论今古，六经诸子之文有韵而兼骈，犹在左、国、史、汉、韩、柳、欧、曾之前。若由今日世界文学眼光观之，无论今人、古人所作，凡用当时国语所造之文章以外，皆谓之“古体文”。固无分有韵无韵、骈与散也。今人模仿古人文体而为文，称曰“古文”，固是不通。称曰“古体文”，似无不可。鄙意文章分类，略为二种：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大别为评论、纪事二类。文学之文，只有诗、词、小说、戏（无韵者）、曲（有韵者，传奇亦在此内）五种。五种之中，尤以无韵之戏本及诗为最重要。

记者 一九一七.七.一。

沈藻墀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近读贵志，独秀半依诸先生之名著，对于文学上之分门别类，可谓无微不至。惟墀常见有一二学者，分古代之文为二种，一曰辞章，“如四六之文”。一曰古文，“如桐城派之文。”墀顾名思义，觉其界限既不明白，而在各义则又全然不通。夫辞章古

文，同为古人所作，则统称之为古文可也。今以辞章古文并列为二，试问古人所作辞章之文，是否亦为古文中之一种？又今之自号古文家者，其所作之文，一意摹仿古人之文。此种文我人且弗论其内容之如何，但我人可认为今人之作。然作者竟敢妄称曰古文。揆意此“古文”二字，亦属不通。前贵志所刊独秀半依二先生之论文，皆拟分文学为二种，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二先生所拟之名称略异而主旨则同）。揆阅之不胜快活，盖分类甚简单。世间之文，皆可罗列于此二类中。今揆拟一详细之分法，不知适当否，望独秀半依二先生正之。揆意我国文学，亦可仿西文之分法。如论文Exposition、描写Description、记述Narration、辩论Argumentation等类。此种分法，不过稍觉详细，然终不外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二种而已。

上海大同学院沈藻揆启

（录自《新青年》3卷5号）

陈独秀答陶孟和^①

孟和先生足下：

来书论世界语，思精义繁，迷信世界语过当者所应有之忠告也。惟鄙意尚有不致苟同于足下者，希略陈之。

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

^① 陶孟和，字履恭，河北天津人，时为北京大学教授，有《孟和文存》。

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一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用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一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越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足下倘不以此见为大谬，则于世界语三种怀疑，似可冰释。

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各国语何莫不然？虽不完全，岂足为病？极言之，柴门霍夫之世界语即不适用而归淘汰，亦必有他种世界语发生。良以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不可废也。各国各别之语言，依各国各别之民族心理历史而存在，斯诚不诬；然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想足下亦不能无疑。

足下谓世界语为无民族之语言，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且国界未泯，民族观念存在期间，各国语与世界语不妨并存，犹之吾国不能因此时未便强废各省方言，遂谓无提倡普通官话之必要也。足下倘无疑于全中国之国语，当亦无疑于全世界之世界语。

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来书以孔子专制罢黜百家喻之，似不恰

当。况提倡世界语者，未尝欲即废各国语耶？今之世界语中，东洋各国语无位置，此诚吾人私心之所痛憾；欲弥此憾，是在吾人之自奋。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此意已于三卷四号《新青年》答钱玄同先生书中略言之）。否则于人何尤？闭门造车，出门每不合辙。虽严拒世界语而谓人不我重，究于吾文明存在之价值有何补耶？

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

仆犹有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高明以为如何？率复不具。

独秀 一九一七.八.一。

陶履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近年以来，沪上颇有以世界语号召国人者。读新青年之主张，及新闻之所报道，青年学子，颇有风响之势。最近蔡子民先生返国，提倡斯语，既不遗余力，而钱玄同先生，辩护世界语之功用，预测世界语之将来，尤属言之成理。（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通信栏中）其能辟吾国文士之旧思想，钦佩无似。履恭不

敏，对于世界语，夙抱怀疑之观。犹忆壬子之夏，与怀中同游巴黎，遇国人某君，与共辩驳世界语之无用。某君卒无以应。杯中当或忆之。今请更以曩日所持之理，以质诸钱玄同先生。足下其许之乎？

今欲评论世界语之价值，当分别三种观法：（一）自理论之言语学之方面观，（二）自民族心理之方面观，（三）自世界语之功用方面观。一种言语之善否，未易言也。言语学者，乃遍究各民族之语言，志取其美点，定为原则。故言语之利便与否，文法之适用与否，不得不依专门家之判断，视其与言语原则之关系何似。世界语之单语，袭取欧洲各国成语，漫无秩序，而文法之构成，若宾格 *Accusative case* 之存在，皆言语学者所视为最不完全之点。至其语之太近似于意法西葡诸国语言，今于罗马支派诸语 *Romance Language* 存在之际，而加以无端之扰乱，尤为学者所不取。说者谓世界语在已存之人造的国际语中，固简而明，以言语学理律之，犹未纯也。

右兹所述，犹为本问题之小端。吾于言语学，乃门外汉，焉敢撙拾一二人之言，即据其权威，而施诸此经过三十星霜之言语？

（按柴门霍夫之著，最初见于一八八七，屈指计之，迄今适当三十年。）吾人当于言语其物之外之上，而更加以推究。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不异，而所涵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言语，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吾读德法俄文人哲士之伟著，读其译本，终不若读其原书。吾师哈蒲浩，尝谓英法德三国哲学家典籍，皆当读其原文，否则无由捉摸其真义。理想如此，感情更无论矣。

吾昔最好诵欧马之讴，Omar Khayyam波斯诗人之作，而英之诗家费子哲（Fitzgerald）所译者也。波斯学者某且谓欧马之真精神，费子哲之所传者，十分中不过五分而已。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谓可以保存思想传达思想乎？吾未敢信也。

更进而言之：今日世界上杂志书籍出版之数，其采用世界语者视诸采用英德法俄文者，其量其质，比测若何，当为识者所尽知。若谓将来世界语之出版物，且将日增，则英德之人士，果肯舍其国语，而采用半生半死之人造语乎？吾又未敢信也。

且吾闻之：意大利人，以世界语太与其国语相肖似，以其有污丹黎“神剧”之神圣语，排斥甚力。是则将来世界语之发展，更遥遥不可期。今后学术发达，各种科学，皆由国际间定其相当之名词，如气象学，海洋学，皆曾为学者大会所规定，则又何劳世界语为共用之名词？至若地名之不统一，则多由历史上之关系。比利时而应作Belgnilo，希腊而作Greknjo，既失其音，又丧其源，吾不识果有何利。（吾昔主张各国之地名人名应依其国之书法读法。日人峰岸米造即行此法，而加以英德法诸国相当之名词。数年前吾国出版之欧罗巴通史，即其例也。）

总之，洋翰林之诋毁世界语，或自有其理由在。吾则以为稍窥各国文学蹊径，涉猎其散文韵文，有所觉悟者，必以为一国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无国民性的生硬之语言发表而传达之也。

关于世界语最大之问题，厥为世界主义之观念。今日祸乱相寻，人类固自相残杀，甚且以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之人，恃武力，逞狡谋，而肆为杀戮，然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则无可疑。质言之，则世界大通之局势，在欧战之先，已具其雏形，自北京

至伦敦凡十二昼夜，美洲棉之歉收，吾人全蒙其影响，政局之变，朝见于北京，而夕见于纽约之晚报。英人关于国籍之笑话，谓某之父为德人，母为法人，生于英，而结婚于美。凡此皆世界大通之确据，世界主义之先驱也。然世界主义是一事，而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有世界语未必即可谓世界主义之实现也。世人不察，以世界语为促进世界主义之实现者，误矣。吾尝默察世界之趋势，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identity of interests今日之科学思想，已无国界，而异日之利益，亦无国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考过去之人种，多渐渐灭，将来所残余者，惟诸重要之人种及其混合之种而已。言语亦犹人种，自古以来淘汰净尽者，日而有见。而英法德俄以吾国之语，今后且必常有变化而未能即濒于危亡也。易言以明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 in uniformity也。吾以为世界语之观念亦犹孔子专制之观念，欲罢黜百家也。

最末更有欲言者，则假使世界语之功用若说者之巨，其名亦殊未妥当。言语学者谓就欧洲之民族中，亦以用拉丁支派之言语者为便。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以英法德意之语为多。若瑞典挪威半岛之单语，采用极稀。若夫东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语之内。吾族民数之巨，吾国文学之丰富，奈何于所谓世界语，反无丝毫之位置耶？兹仅就鄙思所及，拉杂书此，上陈左右，并以质诸提倡世界语者。书不尽意。

陶履恭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文中符号，到不得已的时候，自然用得。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的时候，自然当用虚点做符号，方能清楚。就是引用古书，或他人的话，中间不关紧要的，也可以省略，用虚点代之。本名旁加符号，往时本有此法。但是人名地名，要用单画双画分别不用，还要讨论一番。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抄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许多作者，供给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形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

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此时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那能算是国语呢？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语中常用的文话（象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应当尽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才做得到“文言一致”的地步。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八.一。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生先：

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近年以来所出的杂志，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后来教育部出版的“观象丛报”，也是用横式。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至于别种杂志，书籍，即使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

利。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观象丛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直式的用西洋符号和句读，引号在直式里面，只能用“”“”两种。西洋引号，很不适用。止有“旅欧杂志”和“旅欧教育运动，”把.，：；？！记在每句每读底下，留出字的右旁，以便记“本名符号”等等。依我看来，究竟不甚清楚。）况且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

“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改直式为横式，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新青年”于原文译文并列的文章，既用横式，而Page的排列，仍照中国旧式，这更不便，尤其不可不改良。）

改用横式以后，符号和句读，固然全改西式。但是有人说：疑问号的“？”，嗟叹号的“！”，可以不必用。胡适之先生道：“窃谓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欤’、‘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刘半依先生道：“‘？’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见“新

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我以为这话不很大对。我国文章里面的“也”字,也有当疑问词用的。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这几个“也”字,都是疑问词。礼记祭义,“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欤。”这个“欤”字,又是决定口气。(这是俞樾说的,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又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记所引的,底下都加“乎”字。这是疑问词不用“乎”字的。又象那“焉”字,在每句头上或中间的,除训“何”的外,还有训“于是”的。(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又“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象“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眇眇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所以我以为这两种符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上列的几条例,是古人文章的不整齐。现在新体白话文章,出于人造,这种地方,当然要做得很整齐,决不许再有例外,那么似乎“?”、“!”仍是可省。这话我也不以为然。新体文章用字固然有定,倘使再加符号,岂不格外明白?又我所主张中国书籍须加符号一层,并不限于现在的书。就是古书,将来如其有人重刻,也非加符号不可。)

还有“……”符号表“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也是不可少的。左传襄公廿五年有句道: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这一节里加了“……”符号,才能显出“所不与崔庆者”底下“有如上帝”四个字还没有喊出,就被晏婴抢了去重行说过。

又尚书顾命，“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声注：“肄肄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章太炎先生说：这一句，汉书里改做“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比史记明白完备得多。大约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史记直录原语，汉书照他说话的意思译成一句明白完备的文章，所以两书记载不同。那么，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画出个正要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

胡适之先生又说：一切“本名”，在西文里面，都是把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中国文应该在“本名”的下面记一横画。（直式，则记在“本名”的右旁）。这话我极其赞成。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 (1)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岐说）
 - (2) 季孙曰：“异哉！子叔癡。”（朱熹说）
-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 (1) 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 (2) 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

这两条，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

以前我写信给先生和适之先生说，“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吴研人两家的著作，都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也因为现在那种旧文学家的谬见，把欧，曾，苏，王，归，方，姚，曾，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学家，反说施耐庵曹雪芹只会做小说，便把他排斥在文学以外，觉得小说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匡正他们的误谬，表彰“水浒”、“红楼梦”那些书。其实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写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aupassant，Tol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这大概有两个缘故：（1）中国小说家喜欢做长篇小说，动不动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写在一处。人数既多，写的时候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写某甲写得很得神，写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国小说，专就一种社会，或一部分的人，细细体察，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不在乎字数多，篇幅长，在乎描写得十分确切：这是胜过中国小说的地方。（2）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中国陶潜的“桃花源记”，很有这一种的意味。）或则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那男女恋爱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中国小说则不然，就是施曹两公，也未能免俗；（象武松打老虎，贾宝玉初试云雨之类）吴敬梓自己也颇有酸气。（象

虞博士祭泰伯祠之类。)这一层，是中国小说更远不及外国小说的地方。施曹吴三人以外，“西游记”虽说诙诡别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义派”里的名产，拿新文学的眼光去看，实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施曹的“写实派”去比，便有新旧的不同。“金瓶梅”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褻，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辩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老残游记里的铁补残，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写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至于近人李吴两家，适之先生说他“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这话很对。论到名笔意境，实在比“儒林外史”还差一点。所以我以为就是“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

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 Maupassant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象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好。）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晓得的人较多，并且招牌上也居然写了“共和”两个字了。伦理革命，先生已经大加提倡，对于尊卑纲常的旧伦理痛加排抵，主张完全改用西洋新伦理。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

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为甚么呢？因为在当时，他是“开新的”；还有先生所说的“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的缘故。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述。现在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依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

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煞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想来一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则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先生！你道对不对呢？

钱玄同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冯维钧

维钧先生：

具有中学国文程度者，应读“马氏文通”、“助字辨略”、“文字蒙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庶几于用字造句之法，稍有根底。具有高等大学国文程度者，倘志在文学，研究名家诗文集，自不待言。而“尔雅”、“扬氏方言”、“许氏说文”、“论衡”、“广雅”、“文心雕龙”、“史通”、“艺苑卮言”、“文史通义”等书，亦不可不精读也。西洋文学史及现代文学潮流，亦宜研究以观其通，庶免闭门造车之诮。中学校亦应略习文字学。惟不宜过深，若文字蒙求之类足矣。大学文科，自应以小学为主要科目。盖国语学，发声学、比较言语学，皆近代微妙最新之科学。是则吾国声音训诂之学，乌得不于大学求深造之士，未可以‘小学’之名而轻之也。大学预科应以何者为模范文，则文法理工各科，应有区别。此事烦重，非短纸可罄。若“史通六家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国故论衡”、“文赋”等，乃关于学术变迁文章流派重要之作，文科预科中自应注重者也。此复不备。

独 秀

一九一七.八.一.

冯维钧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先生议论新颖，思想高超，每读大作，辄爱不释手。兹有疑问数则，前曾请示多人解释，俱未能满足。先生学贯中西，素所钦仰，如蒙不弃，进而教之，幸甚。疑问列下：（一）具中学之国文程度者，应读何书，获益可期最多，进步可期最速。（二）具高等大学之国文程度者，应读何书获益可期最多，进步可期最速。（三）中学校应否将文字学列入课程。大学文科，应否列小学为主要科目。（四）大学预科国文课程，应以何者为模范文。关于学术之文，如“史通六家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关于文章之公式利病源流派别之文，如“陆机文赋”、“国故论衡”等，应否注重。以上数条，鄙人怀疑已久，请先生在下期新青年通讯门内裁答为幸。此上。即颂著安。

冯维钧谨启

（录自《新青年》3卷6号）

一九一八年

陈独秀答刘延陵

延陵先生：

尊意分“自由恋爱”与“极端自由恋爱”为二，且赞成其一而反对其一，愚诚不解，恐看时误会者，不只愚一人也。盖既已赞成恋爱，又复赞成自由恋爱，尚有何种限制之可言，而不谓为极端主义乎？

“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能并立；即足下所谓论理的婚姻，又何独不然？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结婚者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就吾人闻见所及，此事岂抽象之玄想？

堕胎溺儿诸事，诚即足下所谓“婚后之不德”；其主因乃在避贫与苦耳，字之以极端自由恋爱，殊不伦也。西方堕胎溺儿，多避贫畏苦；东方溺儿，且因轻女；于恋爱何涉焉？数获手教，恕不一一作复。

独秀

一九一八.一.十五.

刘延陵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接到手示后，即有挂号信作复；惟闻天津水汛，交通断绝，不审该信已至京否？今晨得新青年六号，先生于敝文评语，固有未合鄙意，今不欲赘；惟开首一语，“刘君此文，在反对自由恋爱及独身生活两种思潮。”甚掩著者之心。敝文主旨，在述婚制进化之迹，而附陈各种制度之得失，文中亦既言之；而文中只反对“极端之自由恋爱”与独身主义，未尝反对无极端二字之“自由恋爱”；文中可以覆按也。

“极端之自由恋爱”一语，为弟自创，详明言之，即反对“堕胎”、“溺儿”与“独身主义”，而未尝反对“自由恋爱”。盖吾个人不通之定义：极端之自由恋爱，即指但顾夫妇个人之逸乐，而为堕胎溺儿之事；此吾意中所谓婚后之不德。至于无极端二字之自由恋爱，则关于婚前，固毫无可以反对之理；而弟实亦未有一字反对。或者定名不精，致使先生看时误会。惟弟极不愿得罪自由之神，或因此而致世界青年骂我为古塚骷髅。敢请将此函登于通信栏，以明著者之心。不胜盼祷。千千万万！

刘延陵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

吴先生^①“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转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谓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故作此语，以难国人，在吾辈则以为烧之，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先生谓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恐未必然也。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本属至顺；盖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

^① 吴先生，即吴敬恒，字稚晖，江苏常州人。时在《新世纪》第14号上发表论文，提出“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

言，焉有独立之必要？先生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谨复。

独秀

一九一八，四，十五

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著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甚至于那很顽固的劳玉初，也主张别造“简”字，以图减省识字之困难。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者，殆无不感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这是对于汉字的形体上施攻击的。

又有人说：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于是有造新字者，有造新名词者，有直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汉字表之者，一如“萨威棱帖”、“迪克推多”、“暴哀考脱”、“札斯惕斯”之类；一有简直取西文原字写入汉文之中者；种种办法，虽至不同，而其对于固有的汉字和名词认为不

敷用之见解则一：这是对于汉字的应用上谋补救的。

以上两种见解，固然都有理由，然玄同今日主张废灭汉文之理由，尚不止此。

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自诸子之学兴，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一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一“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一为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一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但是有人说：中国旧书虽不可看，然汉文亦不必废灭，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可矣。此说似是而实非。既不废汉文，则旧

学问虽不讲，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之程度，亦未能减于读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如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故有二：（1）因国人的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2）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语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ck, 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

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因欧洲文字，本是拼音；日本虽借用汉字，然尚有行了一千年的“五十假名。”中国文字，既非拼音，又从无适当之标音符号；二十六字母，二百〇六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事，全不相干。今欲以吾侪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恐为不可能之事；又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

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成一种国文，亦大非易事。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已甚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况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此单音之痼疾，传染到日本，日本亦大受其累；请看日本四十年来提议改良文字之人极多，而尤以用罗马字拼音之说为最有力；然至今尚不能实行者，无他，即“音读”之汉字不能祛除净尽，则罗马字必难完全实行也。——吾以为改用拼音，至为困难者，此也。

即使上列诸困难悉数解决，汉字竟能完全改用拼音；然要请问：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还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由前之说，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译Ethics为Lun-li-hsuh吗？自然没有这个道理。由后之说，既采西文原字，则科学哲学上之专门名词，自不待言；即寻常物品，如Match, Lamp, ink, pen, 之类，自亦宜用原文，不当复云Yang-huo, Yang-teng, yang-meh-shue, yang-pih-teu；而dictator, boycott之类应写原文，亦无疑义；如此，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费了许多气力，造成一种“拼音之汉字”，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罢！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亦未能遽尔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谓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外国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似乎英文已成习惯，则用英文可也；或谓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先道，当用法文，我想这自然更好；——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三千，少则二千。（前于三卷四号新青年中致先生一书，云“以五千字为度”，今思未免太多。）以白话为主，而“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此是先生答玄同之语，见三卷六号新青年。）期以三五年之工夫，专读新编的“白话国文教科书”，而国文可以通顺。凡讲述寻常之事物，则用此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如此，则旧文字之势力，既用种种方法力求减杀，而其毒焰或可大减；——既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或可不至输入于青年之脑中；——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

以上为玄同个人主张废灭汉文之意见，及过渡时代暂行之办法。

此外尚有一法，则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学问，亦用此“新体国文”达之；而学术上之专名，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Esperanto嵌入。这个意思：一层可以使中国人与Esperanto日渐接近；二层则看用“新体国文”编的科学书，究竟比看英法原文的容易些。我想此法亦好。——此法吴稚晖先生从前也主张过的，其言曰：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此法行，则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用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所有限制以内之字，供则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空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新世纪第四十号）。

这个废灭汉文的问题，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愿赐教育，以匡不逮。如以为然，尤愿共同鼓吹，以期此事之实行。本社同人，及海内志士，关于此问题，如有高见，不论赞成与反对，尤所欢迎。

钱玄同

4, March, 1918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汤尔和^①

尔和学兄左右：

惠复拜谢。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况复明目张胆，倡言于学校，应受绅士待遇之青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来书虽系弟私人请益，以关系学术，故揭告读者，谅不以为忤也。以后倘有大著赐登本志，指导青年逃出迷途，则幸甚。

独 秀

(一九一八.五.十五.)

汤尔和致陈独秀

独秀吾兄：

示敬承。

“三焦”之说，即以内难经论，亦仅指部位名称。强欲附会今说，可当胸腹两腔。金元之交有以心相为“三焦”者，譬说也。

^① 汤尔和，浙江杭县人，时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

“丹田”尤为荒谬。纵在我古医家，亦所不道。妄人以脐为“丹田”，若谓道家之说，则道家其人死无对证，而书阙有闲，不妨闭门造之。倘欲附会生理，则按脐之为物，在胎生时以脐带与胎盘连络；胎盘外面有绒毛，与子宫粘膜连络；胎盘剥离，（即分娩时，）脐带切断，其断端陷于坏疽脱落，其所遗之痕，即脐。故自胎生以后，脐于人体初无丝毫之用。或竟公然谓人之初生以脐为起点者，于胎生学太无常识，不值一哂也。

弟恂尔和顿首三月三十日

（录自《新青年》4卷5号）

陈独秀答张厚载^①

缪子君鉴：

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尊论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剧曲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

欲以“隐寓褒贬”当之邪？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美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

^① 张厚载，字缪子，江苏青浦人，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邪？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

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独秀

一九一八，六，十五。

张厚载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①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为文学之有变迁，乃因人类社会而转移，决无社会生活变迁，而文学能墨守迹象，守古不变者。故三代之文，变而为周秦两汉之文，再变而为六朝之文，乃至唐宋元明之文。虽古代文学家好事仿古文，不肯自辟蹊径，然一时代之文，与他一时代之文，其变迁之痕迹，究竟非常显著。故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之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而已。

^①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复（半农）。

梁任公之时务报新民丛报，在前清时代八股思想未除净尽之日，乃能以新名词新文体（在当时固为最新之文体，）为士流所叹赏，其所著述皆能风靡一时。则文学改良为社会固有之思想，为进化自然之现象，可以想见。故黄远生亦谓“文学之必须改革，乃时代思想当然之倾向。”（见所著想影录）

且文学改良之后，文学上有三大利益：

（一）能绝窒碍思想之弊。旧文学之所以当然淘汰，即因其窒碍思想；如八股为旧文学中最劣等之文学，明太祖创设此种文学，即所以使人民绝对无思想之自由也。新文学第一利益，即使吾人思想活泼，不致为特种情形所障碍，而常有自由进取之精神。

（二）使文学有明确之意思真正之观念。旧文学之弊，在笼统含糊；黄远生且以“笼统为国人之公毒，不仅文字一事。”（见东方杂志远生所著《国人之公毒》篇）新文学则绝无此种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段有一段之意思，一节有一节之意思，文字浅显，而意思明确；多作此种文字，可使吾人头脑清楚，知识明白。

（三）为文言一致之好机会。新文学干净明白，使人易于了解；且杂以普通习用之名词尤为雅俗所共晓；如“结果”、“改良”、“脑筋简单”、“神经过敏”，以至“当然”、“必要”、“事实”、“理想”等语，一般社会，几成为一种漂亮之俗语，尽人皆能言之，而文学上用此等语调，亦仍不失为雅洁，此岂非文言一致之动机乎？

有此三事，故仆对于改良文字，极表赞成。至于改良上具体的办法，如胡钱诸先生所举，仆最表同情者，为“不用典”一事，因此事最足以窒碍思想也。袁随园亦谓“用典如陈设古玩，

各有攸宜；然明窗净几，亦有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又谓“唐人诗不用生典，叙风景不过‘夕阳芳草’，用字面不过‘月露风云’，一经调度，便日月轩新；犹之易牙治味，不过鸡猪鱼肉，华陀用药，不过青粘漆叶，其胜人处，不求之海外异国也”，云云。能不用典故，一意白描，洵文学上之最美者也。

此外若趋重白话一节，仆亦赞成。惟以水滸西厢等书为极有价值的文学，与金圣叹批评才子书同一见解；而金圣叹之批评，乃未尝一为胡钱诸先生所援引，岂尚怕与人苟同耶？仆以为圣叹之批评，亦甚有价值，以其思想，即文学改良的思想也。先生等既倡言改良，而吐弃其人，不屑一称道其与先生等同一之论调，此仆所不解也。

仆尤有怀疑者一事，即最近贵志所登之诗是也。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诗，纯粹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但此诗从形式上观之，竟完全似从西诗翻译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诗否，尚属疑问。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西人翻译中国诗，自应作长短句，以取其便于达意。中国译外国人诗，能译成中国诗体，固是最妙；惟其难恰好译成中国诗体，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译成西洋式的长短句。宰羊一诗，及其他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车毯等作，并非译自西诗，又何必为此西诗之体裁耶？旅欧杂志载汪精卫先生译《Fables de Florian》一诗，作五言诗体，韵调格律亦甚自然。彼译西诗，且用中国固有之诗体。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清华月刊载抒情丛谈，对于先生之文学改良谈

攻击甚力，于白话诗尤甚。）

仆之意思，以为文学改良，乃自然的进化。但一切诗文，总须自由进化于一定范围之内。胡先生之尝试集，仆终觉其轻于尝试，以此种尝试，（沈先生之宰羊诗等，皆统论在内。）究竟能得一般社会之信仰否，以现在情形论，实觉可疑。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故敢致书于贵记者之前，恳割贵志之余白，以容纳仆之意见，并极盼赐以明了之教训，则仆思想上之获益，当必有更进者。

又戏剧为高等文学，钱胡刘三先生所论极是。胡适之先生更将有戏剧改良私议之作，刘半农先生亦谓当另撰关于改良戏剧之专论，仆皆渴望其发表，以一读为快。但胡适之先生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谓“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俗剧下自注云，“吾征之征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此则有一误点。盖“高腔”即所谓“弋阳腔”，其在北京舞台上之运命，与“昆曲”相等。至现在则“昆曲”且渐兴，而“高腔”将一蹶不复起，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

又论中所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此言亦甚长，非通讯栏所能罄。刘半农先生谓“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云云。仆殊不敢赞同。只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则“二进宫”之三人对唱，非中国戏耶？至于多人乱打“乱”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伶自幼入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

合，尤有一定法则，决非乱来，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乱打，其实彼等在台上，固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也。

又钱玄同先生谓“戏子打脸之离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论。戏子之打脸，皆有一定之脸谱，“昆曲”中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之义，此事亦未可以“离奇”二字一笔抹杀之。

总之，中国戏曲，其缺点固甚多；然其本来面目，亦确自有其真精神。固欲改良，亦必以近事实而远理想为是。否则理论甚高，最高亦不过如柏拉图之“乌托邦”，完全不能成为事实耳。近有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戏曲固有之优点，其思想亦新，戏剧改良之议，仆以为可与彼一斟酌之也。

张厚载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

足下指斥憚君^①之说，愚未能代答；惟鄙意以为尊谓信望为两事，固无不可；然宗教家之信望，均以神为目标？必以因纳法证明神之真实存在，然后依以求智，方不失为刚愎，方不坠于迷信，故憚君以基督教之释智为未足也。尊谓寻求上帝，为知识之开端；愚为依他求知，依他途之起点；固不独基督教然也。吴稚晖先生有言：我辈虽非国民党信徒，而死后魔骨为灰，无一粒非

^① 憚君，即憚代英。

国民党而为他党；此言余亦云然。至国民目为暴烈分子与否，固无所容心焉；倘有人竟以暴烈称之；则殊惭愧；可怜之支那人，尚何暴烈之可言！

独 秀

一九一八。六。十五。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读贵志以促青年之自觉为主旨，佩甚。兹就心有所触感者，为先生言之：（1）钱玄同先生之文字革命，为激烈派，其进锐者其退速。况钱君之主张，直至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以尽诱导之天职；如应用文十三条改良之议论，十条主张省万千百十诸字，以亚拉伯码号代之，华文书（一万），亚拉伯码书10000；甚或须加以逗点以解明之，请教何者更简明。十二条之主义，将引起多数人之奇异；余读科学杂志甚或不便；独英文（概括西文）则不觉，习惯使之也第七条与第十一条实多此一举，人且斥为媚外；此说若出，必遭诟谩；甚且令国人失却文字革命利益之信仰。第三条为势难（硬不能）办到者又余所望于钱君者，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不免无涵蓄，非所以训导我青年者；愿先生忠告钱君，青年幸甚。

恽代英君之论信仰，不知是因有排国教之主观，而波及于宗教否？宗教是否能容于新世纪，恽君之伟论，实不足为此新世纪人群心理之代表（恽君如直接下问，当细论之，不敢虚占青年之篇

幅，盖自己未敢信持宗教思想者之论说，能为不信宗教青年之所取也。其次则为学识意思，亦不能为青年之训导者）。恽君以向上性（其实即希望，亦即恽君之所抛弃者）为宗教之护符则不可，以为宗教要素之一种则可，盖宗教自有宗教之精神在也。余自恽君所谓“然望包在信内一语”，窥知恽君不认识（非慢也，实觉非此三字，不能有分量）基督教，亦即不认识宗教。望为基督教之目标，亦为人世兴奋之剂，信则为实际的，为陈述的，为可靠的，为已定的（如今所称之自信自助之意义不同，基督教之信为信神，信基督之十架，见使徒信经），望则为羡慕的，未来的，希冀的，进步的，是也。又持智以处世，欲其不堕于刚愎，则智字之解说，必进而至哲学之地位。哲学之智字，能不堕于刚愎乎？能维持道德乎？未也。希腊Philosophie，仍不外为求智，究不自以为已经得智也。余是故取乎宗教之释智，寻求上帝，为知识之开端，此基督教之释智也。恽君以为未足乎？幸惠教之，但愿勿以意气用事，先排成见，则终能水落石出也。其（3）独秀先生于青年之脑筋，求灌输政治知识，实为可感。特据余读先生之论调，极似一国民系之言论家。其愿以引导青年得政治知识为前提，若夫诘责当代政治家，则非所敢望，深恐当局以国民系暴烈分子视先生，则属望新青年之青年，将呼负负也。先生以为何如？愿不以愚玩而弃之。此颂撰安。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谨上

（录自《新青年》4卷6号）

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

崇拜王敬轩者：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

独 秀

一九一八，六，十五。

崇拜王敬轩者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①，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

^① 见《新青年》4卷3期《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

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启。不备。

崇拜王敬轩先生者 四月二十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区声白^①

声白先生：

Esperanto在学术上，尚属因袭的而非创造的；在言语上，尚属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孟和先生之不满意于此语也，殆以是故；余亦云尔。弟鄙意与孟和先生微有不同者：今之Esperanto，或即无足当“世界语”之价值；而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全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并希望孟和先生予以赞同者也。

独 秀

一九一八.六.十五.

（录自《新青年》4卷6号）

^① 区声白，广东顺德人，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五四时期曾与黄凌霜在北大组织“进化社”，宣传无政府主义。

陈独秀、胡适之答易宗夔

宗夔先生：

承示深为感佩。

仆等主张以国语为文，意不独在普及教育；盖文字之用有二方面：一为应用之文，国语体自较古文体易解；一为文学之文，用今人语法，自较古人语法表情亲切也。

今世之人，用古代文体语法为文以应用，以表情者，恐只有我中国人耳。尊意吾辈重在一意创造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以免唇舌；鄙意却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否则才力聪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方之虫鸟，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旧文学不过啼叫于严冬之虫鸟耳，安得不取而代之耶？

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先生以为如何？率覆不备。

胡适之 陈独秀^①

一九一八.十.十五.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者注，此信是陈独秀起草的。

易宗夔致陈独秀胡适之

适之独秀两位先生大鉴：

我国数千年来，文化毫无进步，虽有种种的原因，而言文不能一致，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鄙人在十余年前，即有这个议论，主张言文一致的道理。彼时寡调独弹，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个理由，鄙人也就不往下说了。前月鄙人请蔡先生^①吃饭，席间偶然谈及此事，听蔡先生说两位极力提倡文学革新的道理，发行一种杂志，发挥的狠透彻。鄙人就被费几文，买新青年回家一看，才晓得两位见解的高超，实在佩服得狠。但是鄙人对于这个道理，所见微有不同的地方，不能不向两位上一个条陈。

独秀先生主张推翻孔学，改革伦理。鄙人以为见解太高了，不适宜于现在社会的情形。我们因为中国不懂文字的人太多，非以白话为文章，教育便不能普及，我们尽可用白话编国民小学的教科书，用白话写信，编成尺牍便览，发行几种白话报，廉价出售。办事的时间惟恐不够，那里有闲工夫推翻什么孔学？改革什么伦理？惹起那班不三不四的乡学究村夫子，惟恐砸破他的饭碗不得不起而反对之。到是我们主张言文一致的障碍物了。

适之先生谓“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这个道理很对的。惟欲破坏什么桐城派的古文，什么文选派的文学，什么

^① 指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江西派的诗，且欲取而代之。据鄙人看来，却可不必。我们但办我们言文一致的事业，看他们的古文骈文诗句，恍惚是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既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又何必取虫鸟而代之？如此办法，省却许多的唇舌，保存许多的精神，拚命的向言文一致的前途进行，庶可以达我们改革新文学的目的。

鄙见如此，不知两位新文学家以为然否？尚祈赐教。即颂大安。

弟易宗夔谨启

再者，鄙人著有新世说一书，却完全是文言书。呈上自序及例言广告，两位尽可作鸟叫虫啼之悦耳。内有一则，与两位有关系，写上一阅。

近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傅斯年诸君，发刊新青年，创为文学革命之义，主张以白话为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则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为根本上之解决。钱并主张废去汉文，另采用一种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傅则欲铲除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谓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误谬，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观诸君之绪论，类皆以旧文学为死文学，须一律扫除，主张言文一致，于新文学界放一异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渐，未始非吾国文化进步之一转机也。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张寿朋

寿朋先生：

康有为为人好歹，我们不去论他。至于他跟着张勋复辟，正是他的好处，因为他相信孔教，便要实行孔教教义，孔教的政治思想，他这始终一贯的精神，到可佩服；你为何要骂他出乖露丑呢？倘若康、张的事业成了功，必定大下上谕要尊崇孔子圣人之道；那时颂扬圣君（溥仪）贤相（康有为）的，恐不止足下一人。如今康有为失败了，跟着下井投石，以成败论人，大可不必！

足下颂扬了半天孔子好，而所以然的好处，却没有一字。鄙人说孔子不好，却确有证据，并非不虚心不看书轻易说话。前几号本志，鄙人曾有好几篇非难孔教的论文和答人的通信，请足下细细研究一遍；“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鄙人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足下之雅意。”若空说孔子好，孔子不好，都不足以服人。象足下此次空空的颂圣文，以后恕不答复。

陈独秀

一九一八.十二.十五.

张寿朋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寿朋昨日到一位朋友家中，幸获与贵杂志新青年相遇。看未

终篇，不忍释手，便一口气看下去，自四卷一号至五号，接连五本，整整看了一夜。易卜生号以下，敝友处尚未买到，故某亦以未获尽阅为憾。统观大著，“于菟三教，气吞全牛”，洵不愧乎“新青年”三个字矣。但是，窃有欲进而与诸君商榷之处，请先向诸君道个歉，然后再说。

寿朋今年三十岁了，早在十五六岁的时节，就不幸遭了极悲惨的境遇，不能再求学问；到廿多岁时候，也曾新闻界混碗饭吃。又不幸因为主张太过激烈，遭了大大的危险；自从近来这几年，多在僻野山村中过日子，饱尝那“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风味，脑筋的陈腐不消说了。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的树起一块“文字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诸君须知道吾国的国民，和那惊风的小儿相似，越恐吓他，他越不肯服药呢；所以寿朋想要劝诸君不要闹那“文字革命”，只说个“改良文字”就罢了。

男女的问题，非待实行共产主义，“衣食足而知礼义”之后，断不能得圆满之解决。若现在便要打破贞操的防围，好有一比，比如劝那受了风寒的病人吃荤吃鱼一般。依寿朋愚见，对于男女之间的问题，现在所亟宜主持者三端：

(1) 勉励男子的贞操，俾与女子均分那为时势所限的痛苦。

(2) 痛斥那男女间得新忘旧的行为，荒谬的恋爱。

(3) 改革男女吃醋的恶劣根性，嫉妒，耍挟，怨讪之恶德。（按此三条，并行不悖。）

贵杂志所译述各种小说、诗歌，以及诸先生之诗，若人力车夫，宰羊，落叶，车毯，相隔一重纸，学徒苦（此诗音调，大类

古诗中之孤儿行)诸篇，无一非仁人之言，惻隐之声。当兹人道不明，良心麻醉之时会，得此电气之力频频感射，亦当稍有苏醒。第“不忍觳觫”一念，虽齐宣亦未尝不有，然究不足与为善者，不肯牺牲幸福，克制欲性，以尽救人之责故也。愿意以为诸君以后所做的诗文，所译的小说，勿徒为悲天悯人，说消极方面的话，宜多从积极方面取材，庶足以“廉顽立懦”，俾豪杰之士闻风兴起也乎（古诗中之东门行，新小说中之孤星泪，很有这种意思）。

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仁人之言也。所谓“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意也。然此等观念，实不可输入这般恶浊众生的脑筋中。佛氏有言，“末世众生，业力深重。”他们听了这宗话，他将来要无恶不作，以为这非我的本心便不妨去做了。

西洋哲学，寿朋无能为役。然窃观古代希腊Eleatic派积静非动之学说，以较僧肇的物不迁论，法藏的华严义海百门，形相似而相差实远。何以故？请举一例，诸君就明白了。昔南北朝时有一法师讲色空义。他说，“一微尘析为众微体时，众微体空，故微尘亦空。”秦跋陀禅师笑其谬误，乃正云，“一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无中微，众微空中无一微”（不暇查书，约记其意）。若积静非动之说，何以异于那位法师所说之色空义耶？诸君于本国学问每嫌其旧，而于西洋这种谬误的旧学，却又不嫌，抑又何耶？

柏格森“直觉”之说，果如贵杂志所谓者，则决不得与程正叔“德性之知”相附会。必欲勉强附会，只堪拟于佛氏之所谓“投胎舍”耳。鄙见如此，尚祈诸君有以审之。（程正叔“德性之知”是实有此知。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此觉否。）

近时德国Euclen美国William James二人之学说，看来未

必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性质相同，似无援引之必要。且王阳明之“良知”，当下即是，不更求之格物穷理。其谬误所极，不可胜道。在今日智识蒙昧之吾国，尤当摈之。（如张勋之徒，其良知但知复辟为好而即行，知行合一者也。）

中国文字里面夹七夹八夹些外国字，这种体裁，寿朋绝对不赞成。即如前面写的那几个外国字，要把一幅纸移转来写，好不费神。读起来，又不能成诵。（中国文字的写法，发笔本从左而右，顺行列则从右而左，殊不可解。如今可以把行列改作从左而右，较为方便。或竟改作横列，则于夹西文为便。然读时毕竟困难。）鄙意以为必须用外国字的意义添造些中国字，由中央大学研究会订定一部字典出来，久则必能通行全国。非但名词可造，即疏状词也可以造。乃至本国普通俗话之所有而文字之所无者亦须要造，如是，方足以资新文学之应用也。（鄙意如取六书会意之法，则经济可造个“糶”字：从手，从利。世界语可造个“理”字：从言，从通，或“诤”字：从言，从共。论理学可造个“讻”字：从言，从理省；或“法”字：从言，从法省。如取谐声之法，则用西文之首音以为其声，而以“贝”字“言”字等偏旁配之。或一义一字，或一义两字随便。其音务明了，笔画不宜太多。盖所重者在字义，字义既详定于字典中，（并附西文原字）则虽村学究亦能知之矣。）

世界愈文明，则学术新理愈多。一个人的精力那里能数尽读世界各国的书？又安能遍学各国的文字？若定要学外国文字，才能数研究外国的学问，则学英文者不能研究法德俄等国的学问，学法德俄文字者亦然。如是，则非遍学各国文字不可。此翻译一道所以为学问上一件极有利益的事也。文字若能添造，译学若臻完美，则求学之人将那些学外国文的日子省出来，别有用处，岂不

好吗？若谓西籍浩繁，美不胜收，不能遍译，则先其重要者，精妙者，简易者，徐及其余。人之读书，贵在触类而长，因故知新，岂以享现成家业，徒多为务哉？

诸君读了外国的好诗歌，好小说，入了神，得了味，恨不得便将他全副精神肚脏都搬运到中国文字里头来，就不免有些弄巧反拙，弄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何以故？外国有外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中国有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所以每有在外国极有精神极有趣味的活，拿来中国却没有精神趣味了。若谙习外国文言的自然全读外国诗，不用读得译本。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造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费犬精神不能。如贵杂志上的老洛伯那几章诗，很可以读。至如那首牧歌，寿朋却要认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因此故寿朋请诸君在翻译上还要费点儿神。（责备贤者，休怪休怪。）

诸君不嫌老聃庄列，却要痛骂魏伯阳张伯端，岂知道教旁门虽有多歧，真诀初无二致。参同悟真，即道德经之枝苗也。论起来，道家金丹之术，本来没有多大的价值，但现在也没几个真正懂得的。那些打坐运气的人，早是发了昏，堕入五里云雾去了，诸君却又当他做御女摇战（邪道未尝无此）的工夫，口孽造得不少。这些小道，就不懂得，也不算事。但是既不懂得，便犯不着胡乱骂人。诸君若要问寿朋懂得么，寿朋只好答道：不懂。却愿意指引诸君去寻一位懂得的人问问。那人是谁？就是东洋最崇拜的明朝那位王阳明先生。

王莽学周公，曹孟德学文王。后来只有人骂王莽曹孟德，并没有人连文王周公也骂。诸君却因排康有为而诋及孔子，未免太猖狂得不成话了。就是康有为那老头儿他冒充尊孔也还不必与王莽曹孟德同科。何以故？王莽曹孟德是心术不正的小人，康有为却

是太愚了。他少年时也抱了个很大的志愿，救国的热肠，只是没有学问阅历，干一回事干坏了，他还不悔悟，他还要目空一切，以为孔子的本领不过如此，我已经比得孔子了。狂来狂去，狂到今日，越变成个蠢物了。他跟着辫子犬帅去干那复辟的事，出乖露丑，至死不变，现在还要说些什么“共和”“共乱”的谎话，真正可笑，亦复可怜。这就是狂人的殷鉴。大凡学者之责任，应该排伪以崇真，明真以消伪。诸君恶康而并且诋及孔子，倘非感情之见，便是犯了心粗胆大的毛病。诸君要知道，人生不能出乎宇宙之外，决不能违天道的范围。孔子之道，便是天道。易经云：“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庸里头几句说得好，“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云云。诸君若要仰面唾天，也只得由诸君罢了。

孔子之道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遍的，不是局的；是精微的，不是粗犷的；是眼中看见十万步，脚下只用一步一步行去的。孔子之道，非是自己做得尽，是叫我们后世的人去继续光大的；是暴君挖破了的；是俗儒削坏了的；是现今一般妄人污蔑了的，却仍旧是日月一般的光明，我们睁开眼，就看得见的。寿朋无似，为求那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正道，救世的方法，绞脑筋，耗心血，翻来覆去，几阅寒暑，才于孔子之道真信得过。诸君若还虚心，再将孔孟的书研究一遍，程朱的书参考一回，想聪明胜过寿朋十倍，不难一旦掉转头来。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寿朋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诸君之雅意。所谓“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仆。”若诸君不再看一看书，便轻易说话，寿朋就要请诸君恕他“一声勿响。”诸君现在胡乱诋议孔子之处，寿朋亦不

暇一一置辩。此候
箸安

张寿朋鞠躬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莫等

莫等先生：

足下提出的意见，已经王先生用“化学”的见解，陈先生用“科学方法论”的见解，说得颇清楚，不用鄙人多答的了。但是鄙人也有几句话奉告足下，请研究时要留意：宇宙间万象森罗中，有客观的实质和主观的幻觉二种。实质有对境，如高山流水等。幻觉无对境，如海市空花等。有对境者为实象，无对境者为幻象。实象之组织未改变时，时时可入吾人的感官。幻象便时隐时现，因为本无是物，不过是吾人主观的幻觉；不若那有对境的实象，人人可见，时时可见，不随吾人主观改变的（有时有部分的改变，也是吾人主观的幻觉）。即假定鬼相是人身的放射物，当然是有对境的实象；而何以时隐时现呢？

陈独秀

一九一八.十二.十五.

莫等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贵志（《新青年》）第二号，知对于有鬼问题，又有所争

辩。但非必与物质有同一之状态也（解剖人体，所含元素，人而不同。或其中混有此等放射物少量，凝集网膜，便足通过障碍运而见。鄙人旧日曾以此释透视之事，近读日本文学博士福来友吉透视与念写一书，始知其误。彼实验两妇，能于三枚或十二枚之乾片中，书写晴朗之文字，而上下则无痕迹。“此事经多人立证甚可信。福来氏书十余万言，插真迹图数十幅，专纪之，唯并无论断。”可见非直接放射所致也）。

人当精神凝集时，可以任意变动身体之各部分，及其发生物。手足筋肉，属于随意筋，人可以自由运动之无论矣。其有不随意者，依于精神集注之结果，亦得变动。如入催眠状态时，依于术师之命令，能使人身变成坚木，可以抵御刀针等暴力。又可以使为种种之活动，或变易声音等。“尚有奇异现象甚多，兹嫌词费，不及陈。”此均关于实质之变动也。至其发生物如分泌之多少，血液之停流，体温之升降，机感之盛衰，呼吸之迟数等，更无一不可随意变动。此在常态心理时亦有发见，唯不能如变态时之显著耳。

据上二则，则人类身体有发生物，亦有放射物。发生物如血液涕唾等，固有形质；放射物如香气光线等，亦有形质。（麝香镭锭虽极少量可耐数百年，然非永不缺少，则有形质可知。）不过其分量不同，斯隐显有异。实则同为一体所发生，可以随意凝集于内，亦必能随意凝集于外。既能凝集则摄鬼影念写等，均可解释。即是等术者，可以使动光类放射物透过障碍，（此是有限度的）而集影于乾片，故成所谓鬼影及念写也。

此外对于热力等之化用，亦可与以同一之解释。如印度术士之咒水令拂，及日人武内天真能令時計笔筒自行移转等，（吾此事固由一辈人，闭眼胡说，或牵合附会所致。然亦以世界学者无

明了的解释，不能予世人以满足，而虚幻之说遂乘之以往。此在外国犹然，某某辈盖无足贵也。鄙人对此问题，研究有日，从基本上可以断定无鬼。而于摄鬼相念写等事实，则积极承认之。以此等事实，散见于东西书籍，确凿可信者甚多，不胜枚举。后有辩论，当随时援引。”最近如俞复、杨廷栋等，均云摄得鬼影，语亦可信。俞复更云能于无光处摄影及摄得山水等影，意可证后理之确凿也。）兹略陈意见如下：

人之所以觉知物质者，以其有微细分子之放射波动以太，而神经为之感动也，此种放射人类亦有之。外物与吾本无直接关系，其所以能入觉官者，以有色声香味等性也。据近世物理学化学之研究，色等本无自性。不过物质放射一种极微分子（此种极微分子，将来亦可望见及。以现时所用极端显微镜，可以见百万公分之一去从来假定之有机体分子不远矣），调动其附近以太而传播于吾人觉官之结果。此等极微分子之放射，无论何物何时皆有之。如热虽在冰点下二百余度，犹放射不绝。声亦无时不放射。但每秒不达十六次以上颤动，则吾人不闻。光尤然。法入鲁滂至谓世界实无黑暗。彼乘夜而出之鸟兽，可以有见。吾人感官特不发达耳。此言物体寻常之放射也。至物质解体时尤有特殊之放射。其强烈之度，更千万倍于此。依现在所发见，此等物质已有多种。其中如镭铀者，无所不存在。虽泥土空气，均有极微之量。若能集合少数便有极强之光热。依鲁滂说，物质在世界，无时而不消散。此种解体，为直接之消散。而寻常则平衡未破，消散尚少，故其发射有微著不同耳。吾人既为物体之一，当然有寻常之放射。至特殊之放射，依理亦可有之。乡有降神女人，能令水热，言者凿凿，惜未一见。吾颇欲使入催眠状态者试之。又欲变通勃兰塞及魔摆等法，设一种易移动之物，而使催眠者移动

之，“陈百年先生谓西洋曾有人实验魔摆，不能自动，此诚然。以纵有放射力当有限度，不能从室外撼此一丝之物也。”均未果。

（世有好事者，不妨先我一试也。）与此更可互为佐证。

鄙人旧曾搜集此种事例不下百数十条，颇欲以归纳法发见其一定之法。近已稍稍就绪，唯尚无余暇以足成之。兹先以一部分发表于贵志，颇欲引起海内学者之研究，或加以是正，则真理出而邪说息，世人亦可以免于眩惑。否则枝枝节节而求之，虽日办万言无当也。贵同人多明达之士，其亦以为然否乎？余不尽。

莫等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爱真

爱真先生：

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因为我们也都抱了“扫毒主义”，古人说得好，“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

鄙人现有两句话请问足下：（一）玄同先生说“谬种”，说“妖孽”，固然是骂人，而足下说“毒气”，说“毒物”，是不是骂人呢？（二）足下列举毒物五种，因为我们骂人，也在这五

种范围以内，但不知骂人的毒是归那一种呢？

足下既然厌恶那五种毒物的热度，一天高似一天，又抱了扫毒主义，那是好极了。但是奉劝足下：以后就是有人把毒气喷到你脸上，千万不要“骂人”，要紧，要紧。

独 秀

一九一八.十二.十五。

爱真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冰弦先生说：“如新青年者，允为吉祥文字，日处沉沉地狱之中国，仅此新声，微微刺我耳膜，但觉片时舒服。”我读新青年也觉得是这样。

自从四卷一号直到五卷二号，——四卷以前我没有读过。——每号中，几乎必有几句“骂人”的话，我读了，心中实在疑惑得很！

新青年是提倡新道德（伦理改革）新文学（文学革命）和新思想（改良国民思想）的。难道“骂人”是新道德新文学和新思想中所应有的么？新青年所讨论之四大事项中，最末一项曰：“改良国民思想。”可见先生等已承认现在国民思想的不良。然而先生等遇见了不良思想的人，每每便要痛骂。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恐怕与改良国民思想有些相反罢？

先生不赞成中国戏的“乱打”，说他是“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我以为“痛骂”和“乱打”，也不过是半斤和八两罢了。

若说：“凡遇了不可不骂的人，我们不得不骂。”那么人家

也可以说：“凡遇了不可不打的人，我们不得不打。”

若有人说：“骂人是言论自由。”那么，人家也可以说：“打人是行动自由。”

先生似乎也说过“改造社会”的话？是新青年不仅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和新思想而止，并且还主张改造社会。若然，则我愈加佩服了！

我尝问我自己：“社会为什么要改造？”“社会怎样会得不良？”

世界上有五种最大的毒物，——（一）国家主义；（二）宗教主义；（三）家族主义；（四）资本制度；（五）汗浊思想，——布满在宇宙的里面。社会的不良，人心的顽固，都因为受了这种毒气的缘故。这种毒气的利害，就是“百斯笃”也终是“望尘莫及。”所以明达如先生辈，也不能马上跳出此毒气范围。——例如“驳共和平议”“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的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的话，”——不过那一般普通人所受的毒，较先生等愈加深了。

一个人受了这种毒气，和受了“百斯笃”疫气，实在是差不多。

若这个人所受的疫气较浅，尚可医治的，我们应当替他医治。若这个人所受的疫气较深，已是不可救药的了，我们也是无法，只好让他死掉。——然而终究不应去骂他！

用种种消毒的方法，去扫除那凶恶的疫气，是我们应尽的本务！——这是人道主义！

先生！现在的社会，实在不堪的了。先生如不以改造社会为目前当务之急，我也不用多说。否则还请先生等速速跳出此毒气的藩篱，扫除这五种最大的毒物！

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

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帮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将来的收获，也一定是格外丰富的！

五卷二号钱玄同先生答任先生文中有“至于玄同虽主张废灭汉文，……”一段话。钱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把既要废灭汉文，又要改良汉文的理由，说得实在充足。然而这段议论，幸非做在民国元年以前。否则，被那刘师培一班人看见了，他们一定要把他抄去，做个护身符。设使有主张共和的人反对他们，他们就可学了钱先生的口吻说：“我们很主张废灭君主专制政体，然君主专制政体一日未废灭，即一日不可不改良。譬如一所很老很破的屋子，既不可久住，自须另造新屋，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以蔽风雨。但决不能因为旧屋既经修补，便说新屋不该另造也。”独秀先生！设使在七八年前，有个人对你讲这样的一番话，你对于这个人，应当作怎样态度？

我近来实爱新道德，新文学，新思想和新青年的热度，一天高似一天。厌恶那五种毒物的热度，也一天高似一天。所以就不顾文字的不通，语言的无伦，老了脸，赤了耳，写这封“荒谬绝伦”、“胡说八道”的信与先生。

先生看了这封信，以为这是奴隶根性的话，不要脸面的话，凉血动物的话，那么，请先生把这封信践之，踏之，可也！撕之，焚之，可也！上坑时当他草纸用可也！否则，还请先生示我以详细的教言！

爱真上

新世纪十八年，十一月，廿六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一九一九年

陈独秀答王禽雪

禽雪先生：

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足下既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不但国粹一端已也。

独 秀

一九一九.一.十五.

王禽雪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仆自七岁入国民小学，十一岁入高等小学，十五岁入师范学校，二十一岁任小学教职，仆仆终岁，无一日不在学校中。但未熟东西文字，对于教育上新学说未能彻底研究，以供献于社会，殊愧。平居窃念，我国青年教育，大都不能摆脱奴隶性者：如学习本国文字，则必须先求“之乎者也”之虚字，学习外国文字，

则必须先求不三不四之会话；学习地理历史，则必须先求上古之神话及地名；学习图画字书则必须先求秦汉魏唐之碑帖宋元明清之山水。而世界潮流之趋向，优胜劣败之道理，一概置而不论。惟拘守旧法，侈言保存国粹。质言之，保存国粹者，即保存故纸堆中之物耳。四顾国中青年，大多数之嗜好皆奴隶性之嗜好，此所以来邻国之侮而莫敢抵抗也。故吾谓摆脱青年之奴隶性，实为切要之举。仆不学，对于此事，不能有所发挥。贵志，青年教育之导师也，倘广发婆心，著论及之，俾吾辈青年得以摆脱奴隶性，而知独立自主之光荣，非惟救青年，乃救中国耳。仆诚无似，惟愿左右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宁波孤儿院王禽雪上言。

（录自《新青年》6卷1号）

陈独秀答黄介石

介石先生：

足下这封通信，真是令我无从回答。我读了某校修词学的试题，有几层感想：（一）觉得这试题，不是现代学校试验国文的题目，仍旧是古代科场策问的老套头。（二）我想全班学生，总有一大半人不知道这题目问的是什么。（三）全题所论，多半是文章的派别和变迁，当是这位先生自家见解的修辞学，和西洋的 Rhetoric 不是一物。（四）修辞学只限于骈文，当云“骈文修辞学”，不当泛称修词学。以骈文为文章之全称名词，在名学上说不过去。（五）今天才晓得中学学生多半国文还不能通顺的缘

故。这班国文教习，真是“误入子弟……”了。

独秀

一九一九.一.十五.

黄介石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仆，中学校学生也。入校三年，于一切功课，虽秉质驽下，尚能勉强领会；独有国文，最感困难。第一年，读商务印书馆之共和国国文读本，每读一文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于“若夫”“然则”诸字，不憚反覆解说，往往上课一句钟，即专讲此类虚字；但是我等听了许久，还是莫名其妙。前年秋，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专选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评语；讲解之时，于本文文句不甚注意，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他老先生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越是不懂。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课，就是国文，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去年有一位朋友给我全份新青年看，我始知学校里专读古文，本来不合式的。我看胡适先生答盛爱初先生与黄觉僧先生之语，始恍然大悟；从此以后，亦来学做白话文章，看见好的白话文章，与白话小说，必要细心去读。现在写信给朋友，虽不能完全写白话，但总是照着自己意思，用这半文半语的句调写将出来，比到以前做那劳什子的古文，起上两三句钟的信稿，还是不能达意的，觉得自由有趣得多了。这是看了新青年所得的益处。仆既得新青年之益，现在就有一点事要来请教请教先生。年假中有一位

朋友拿了某校国文部的修辞学试题给我看其题曰：——

“彦和刘氏刻镂文心，纂为雕龙，固笔苑之匠轮，词坛之规矧也，明诗以下，书记之前，辨章程式，罗列众裁，然敷奏以言，初无疆界，训谟誓造，因用殊称衡词核义，诂有鸿沟，夫亦风会流迁，质文县远，本立条生，自然繁湊，而半山王氏之评文也，常先体制，后计拙工，然则体制者，犹组织之均轴，文章之素丝，权量得失，洵莫能先软，仲洽之论流别，篇简不完，难征同异，萧储文选，班焉可观，枝柯繁委，出纳纷纭，雠校刘规，孰为后进，至于述代，鸿文之士，各启标题，撰录之家，人持类例，七音杂奏，难逃瞽旷之聪，五色相宣，不障离朱之目，若使遍吴楚于藩封，馭仆庸以大国，则曲礼三千，既囊括于五经，名川六百，亦归墟于四渎，至乃燕越殊趋，则舟车之功自异，丝麻量长，则檀褐之用斯殊又能寻根讨叶，擘理分肌，拔彼赵帜，宏我汉京欵，既明天堑之分，宜谨入关之约，如汉法则三章可举，仿鲁经而五例当寻，典刑既立摘辞自纳于风规，模楷无征，辩实犹违于酬献，复能约以易简之辞，申其神明之用欵。”

这个题目，我看了丝毫不懂。这修辞学，是否即英文之 Rhetoric？何以这位老先生的修辞学题目是如此做的？我还听见说，这位老先生教学生亦要答骈文，若不能答骈文，就是不懂修辞学。我听了，更加糊涂起来，心想新青年中说骈文是过去的死文学，假如不会做骈文就不懂修辞学，岂非骈文死了，修辞学亦死了么？外国有 Rhetoric，亦有骈文么？讲 Rhetoric 的人，亦要做骈文么？我是学问浅陋，不懂什么，对于此题，颇为怀疑，故写信请教先生。万祈先生不要见笑，明白教我，幸甚。

黄介石鞠躬 民国八年正月三日

（录自《新青年》6卷1号）

陈独秀答吕澄

吕澄先生：

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为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实在是大大的缺点。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的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的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说起美术革命来，鄙人对于绘画，也有点意见，早就想说了；如今藉着这个机会，正好发表出来，以供国内画家的讨论。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①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这是什么理由呢？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钞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中国画在南北宋及之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许人说半句不好的。绘画虽然是纯艺术的作品，总也要有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能表现一种艺术的美，才算是

好。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髓”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到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说起描写的技能来，王派画不但远不及宋元，并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吴是天主教徒，他画法的布景写物，颇受了洋画的影响），象这样的画学正宗，象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至于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他那幼稚和荒谬的地方，和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译的新小说，好象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要把这三个怪物当作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此覆还求赐教。

独 秀

一九一九.一.十五

吕澄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贵杂志夙以改革文学为宗，时及诗歌戏曲；青年读者，感受极深，甚盛甚盛。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

① 即王石谷画，当时被视为绘画正宗。

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the fine arts），此通行之区别也。我国人多昧于此，尝以一切工巧为艺术，而混称空间时间艺术为美术，此犹可说，至有连图画美术为言者，则真不知所云矣。〕尤亟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者也。十载之前，意大利诗人玛梨难蒂氏，刊行诗歌杂志，鼓吹未来新艺术主义，亦但肇端文辞，而其影响首著于绘画雕刻。今人言未来派，至有忘其文学上之运动者。此何以故？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我国今日文艺之待改革，有似当年之意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姑就绘画一端言之：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习，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上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推商家用为号招之仕女画为上。其自居为画家者，亦几无不以作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海上画工，惟此种画间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称全体，则比比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反容其立学校，刊杂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此等画工，本不知美术为何物。其于美术教育之说，更无论矣。其刊行之杂志，学艺栏所载，皆拉杂浮廓之谈；且竟有直行抄袭以成者；又杂俎载答问，竟谓四洋画无派别可言；浅学武断，为害何限。）一若美育之事，即在斯焉。呜乎！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

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亦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辟，美育之效不难期矣。然提倡此数事者，仍属于言论界。方今习俗轻薄，人事淆然；主持言论者，大率随波逐流，其能作远大计，而涉及艺术问题者，独见一贵杂志耳。贵杂志其亦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而为第二之意大利诗歌杂志乎，其利所及实非一人一时已。杂陈鄙意，幸加明教。此颂

撰 安

吕澄谨白 十二月十五日

（录自《新青年》6卷1号）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吾兄：

国民外交协会发起国民大会，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园集合；警厅因为四号学生闹了事，便禁止集会；此时公园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军警，禁止行人走过；大会恐怕开不成气了！

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

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入），整顿大学^①，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独秀白 五月七日午后四时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指北京大学。

一九二〇年

陈独秀答虞杏村

杏村先生：

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请看有名的清华学校和北洋大学还是这样，别的不用说了。我也曾经害过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汗流浹背呵！这件事不但不必责备政府，并不必指望什么教育家，谁配当教育家？只有学生自己起来解决。

独秀

一九二〇.二.一.

虞杏村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今年夏天我从商业学校毕业出来，在银行里谋了位置，有一位年老的同事问我：“商业学校教些什么东西？”我一时说了几句大话，后来想想汗流满面；虽则在学堂的时候，成绩亦不算恶，终觉得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人，现在把原因说些出来：

（一）学校里好尚虚名，办学的请了几位留学生，同不得意

的政客，教学生读了几本似通非通的讲义，就说得天花乱坠，不是夸造就人才，就是说改良商业；其实造成的人才极少，并且何曾把商业改良。

(二) 讲义来历不明；外国留学生，把外国书译了几本；或者把编成的书，东拉西扯成了一本讲义，只要名目的同，不管能否适用。

(三) 教员不适宜；请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教经济学，请一位工科大学的二学士教银行学，只要能照讲义读一篇，亦不管学生明白不明白。

名词不统一；譬如“Current Account”有的译为往来存款，有的译做活期存款，还有用东文“当座预金”的，弄到学者摸不着头脑。

我记得以前有位蒋梦麟先生，他在时报上投了一篇稿（与某银行经理谈话），说的实在不错；因为商业学校的毕业生，真是没有用处；虽然学生自己亦有不好的，但一半是受学校的害。还请几位教育家和实业家，快些想个法子，救我们可怜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虞杏村自大连中国银行寄。

（录自《新青年》7卷3号）

陈独秀答臧玉海

玉海先生：

林老先生自命为古文家，其实从前吴挚甫先生就说他只能译小说不能做古文；现在桐城派古文正宗马先生也看不起他这种野

狐禅的古文家；至于选派文家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不必拿宝贵的时光阴和他说废话。况且现在青年思想底大害，不是这班顽固的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彻底的少壮学者呵！

独 秀

一九二〇.二.一.

臧玉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和先生是从来没见过面的，这回无故的相扰，真是觉得对不起！

先生也许知道：直隶的学校除了京津略开通些，保定的是极死不过的！在这许多极死不过的学校里边，还是只有个育德中学气压略低些。你想，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们还不快些走向光明去，偏要自寻不快，有些人立起个“国故促进社”来。学生的知识虽则幼稚，却也知道已死的东西是不能促进的。——研究也可，整理也可，怎的会促进？不料他们讲了些圣贤书——囫圇吞枣的讲了些史记，畏庐文集——还不算，又给那承道统的林琴南写了去一封信：拿他比韩愈孟轲，拿那所谓倡新学说的比杨墨佛老，求他给他们讲的那课程做个序。林老头子，居然就来信应允了他们。序还没做成，我先把这封信抄上给先生看看，看了真是肉麻啊！先生要不嫌扎眼，以后我可以再把那序子寄给先生。来信如下：

育德诸君子同鉴蒙

賜書以孟韓見待讀之汗浹于背仆伏處京邑年垂七十
以賣文賣畫自活不敢問及世事以叛倫逆常者鬧如蛙蠅復
有大力者拥最上之舉比率之為禽獸行名曰新道德實則示
之以忤逆淫蕩凡能力反道德者均謂之新視楊墨佛老之禍
酷至萬倍楊墨佛老均不足禍人而孟韓尚力攻之今之倡率
人類反于禽獸孟韓

雖作又將如何而況世無孟韓又焉能制
諸君子崇尚儒先保守經學此滄海橫流

中一砥柱也鄙人幹力雖薄敢不起從
諸君子之後請將所選之書凡例一紙

見示以便恭撰序言以如
尊囑鉛槧困人不暇多述諸希
鑒宥不備

林紓頓首

独秀先生！我想我們這些很活潑的青年生在現在，真算走了背運了！不但沒人領我們走向光明去，還有許多的大人先生們要蒙蔽我們，限制我們，摧殘我們。你看殘苦不殘苦！可憐不可憐！我在這個生涯里瞎混，一方面可憐自己，一方面可憐我那最親愛的同學；我是不能不奮鬥，不敢不奮鬥的！——雖則那些事可以任着他們，可是我怕把我那很好的同學領錯了路！所以我寫信給先生商量。總之，先生如果不忍于看着他們瞎子領瞎子，我還是請先生努力的領我們向光明去！

一九一九年十二晚念四，學生臧玉海

（錄自《新青年》7卷8號）

陈独秀答明慧

明慧先生：

我们若还要国会政治，男女都应当有普通选举权。他们如若不肯，必有一班学者帮他们说出种种学理来；我们若是再进一步，他们必然又强制我们要选举权；到那时必有一班无耻的学者，又来说出选举权底一篇大道理。

独 秀

一九二〇.二.一.

明慧致陈独秀

记者足下：

现在世界文明国大半妇女都有选举权。为什么我国妇女独没有呢？有人说：“中国女子的程度还没有到。”我不晓得他们说几时就算可以到了。若是他们说中国女子没有做出什么可观的事在社会上，但是这不可以怪我们，只因为政府不给事我们做；虽然我们有能力有才干不能显出来，真是可恨！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奋斗的原故。比方我们现在还不快快起来，我不晓得几时能够有选举权送到我们的懒手上来。我想我们起头做的时候，一定要受许多可怕的阻滞；但是我们不必怕他。倘是前几年没有革命的

举动，那就我们现在仍旧要受专制的压制。

我们的民国名誉上已经有八岁了，但是实事上一点也没有实行。因为民国的意思，就是国民应该用选举权来直接表明本人的意思。虽然男子已经有选举权表明他们个人的意思，可惜我们女子同在专制国手下并没两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女子没有选举权来表明我们个人的意思。我不信男子能够用他们的选举权来表明我们女子的意思。有人想选举是男子特有的权柄，可惜这是错了。前几年的时候，权柄都在一个专制皇帝的手里，平民那有什么选举权呢？倘是那时候的男子要选举权，平常的人要讥笑他们象现在的人要讥笑女子要选举权一样。幸而他们男子不怕别人愚笨的讥笑，所以能够造成一个民国，他们才能享受选举的权柄。我们当然是很佩服他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呢？我望我女同胞同心合意一齐起来废去这不平等的制度，和得到我们希望的选举权。我们若是一天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可以算是民国真国民了。既是这样，那就民国也不能算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民国了。

明慧上 十二月五日

陈独秀致周启明^①

启明先生：

二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②也收到了，先生译

① 周启明，即周作人。鲁迅的二弟，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② 《青年梦》，即剧作《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曾在《新青年》七卷二号至五号连载。

的小说还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说集》①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你开来的办法，芝寿兄②托我转答如左：

一、照原议。

二、照原议。

三、版权既不让群益，报酬若干，群益的意思，决计请先生自定。

《新青年》七卷六号底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佳节③，故决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底汎劳动主义④，如何？

守常⑤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⑥底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⑦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弟独秀 三月十一日

一九二〇年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

又白

（据《历史研究》1979年5期）

① 《域外小说集》，鲁迅和周作人用文言文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

② 芝寿，即陈芝寿，上海群益书社负责人。

③ Mayday佳节，即五一节。

④ 汎劳动主义，托尔斯泰所提倡，主张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制定出三条劳动规则，还将人类活动分为四种类型。

⑤ 守常，即李大钊，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⑥ 新村支那支部，十九世纪初，在法国有一部分文人学者出于改革社会的要求，主张以互助友爱为基础，辟地乡村，组织新村落，以建立起理想的社会，此种运动称为新村运动。在日本则有武者小路实笃试行，并成立有支部。周作人当时曾在北京提倡，并筹建新村组织。

⑦ 豫才，即鲁迅。

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

守常 适之 申甫 玄同
孟余 孟和 百年 尹默 诸兄公鉴：
慰慈 抚五 逸先 启明

《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

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

（1）是否接续出版？

（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

（3）编辑人问题：

（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

（二）由在京一人担任；

（三）由弟在沪担任。

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弟独秀 四月二十六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知耻

知耻先生：

工人底教育和储蓄固然是要紧，但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做减

时、增资底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久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须强迫工人贮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利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尊论以为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这句话真是名言。但全社会底界说，不是资本家独占的意思才好，不是工人除外的意思才好。照先生和郭某底意见，欧、美、日本底工业界，都是破坏的气象，都是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工人都习于游惰，那末，此时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工人勤俭、安分，只有我们中国工业界出品增多而且不恶劣。好极了，欧、美、日本也有不及中国的一日！不但先生及郭某有这样见解，欧、美、日本底资本家诚然应该叹美中国工人能安分做牛马，比欧、美、日本喜欢破坏的工人驯良得多，但是我以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好到十分，若工作时间每日加增到二十四小时，工资减到每年一个铜子，更足表示中国工人勤俭、安分的美德是世界古今第一。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二〇.五.一.

知耻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上海劳动状况，至为复杂，概括言之：每日工作时间，大约自九小时至十三小时；每月工资，大约自五元至三十五元，工人生活，虽比不上达官巨商，然较之乡野贫苦食力之辈无工可做者，稍胜一筹，普通皆能衣食饱暖；其工作技能较高者，在休假日亦衣服楚楚。以仆所知，最苦者为小工商店之学徒，如小翻砂作即其一例：工作时间无定，无工资，早起作工，恒至半夜才得休息。缫丝厂女工之虐待小女工，亦极可惨。印刷工，纺织工，尚无虐待情事；其生活状况，亦尚不恶。小码头工甚劳苦，而近来工资已增加数次，为数不小；惟收入虽增，而不知善用，故仍褙褙不堪。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据郭外峰先生言，日本工人已有这种现象，增工资减工时之结果，不但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工人习于游惰，不能如前之尽心工作也。故仆之愚见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贮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

再吾国工业今方萌芽，求工不得之人，到处皆是，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仆以为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日本

之前车可鉴也。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知耻上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章积和

积和先生：

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上海工价虽比乡间高，而物价也高，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别人尽义务不是常事，而且不能普及。

独秀 一九二〇.五.一。

章积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前略) ①工人补习教育，现在有些人都很提倡，这的确也是新文化运动一桩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学校里附设的四个工场，共有工人二十多个。他们都不会算账，也不会写信。吐痰哩，东西乱唾，很是随便，他们并不晓得什么叫卫生。但是他们的手

① 《独秀文存》中原文如此。

艺，确是很有经验。可惜他不能把那些经验，弄个系统，说给人家听。

我们因为佩服他们的技能，不由的不替他们可怜不识书算的苦。所以在去年本校学生分会里，就有人提议今年要办所工人义务补习夜学校。议决之后，我被推做筹办主任。那末我一方面就定出招生简章，到外面去贴，好附近工人来学。章程上定的课程，就是拿书信，珠算，笔算，做主要科目的。一方面又请了本校工场里的职工长，和他谈话，要他去和那些职工接洽，报名入学。并且告诉他所有的同事，也可以由他担保来学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不收费用，供给纸张笔墨书籍。……他们当时答应寒假后再行回复。那末我就想要这个办法，双方进行，必定有许多工人要来学的。那晓得到了开学的时候，来学的人竟就很少！于是乎这一桩重要的事情，竟就搁起了。

但是我总“莫名其妙”。我想既不收他们的费，又送给他们的书教他们，他们真落得便宜，他们却为什么不来学呢？我便越想越疑，越觉得奇怪！后来我总要想晓得他们的所以然，就一个一个的问遍本校工场里的工人，问他们何以不报名入学。他们就说我们一天到夜，要做八九点钟工作，很是吃苦！一到夜里，马上就要去睡觉了。不然，那末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够起来做工了。要晓得我们不做工，就没得饭吃，所以我们还是不去读书的好。实在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那里是不肯去读呢？无奈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罢了。……

他们一辈子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说法。我到这个时候，才晓得他们不能去受补习教育的苦心，就替他们越想越可怜起来了！

但是我想我们学校附属工场工作的时间，离八小时的谱子还

不远，他们已经要叫疲倦了。那末要叫每日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人去受教育，岂不是更难了吗？所以我想现在中国的工人，是不可不受补习教育的。要叫工人去受补习教育，先不能不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要商店学徒受补习教育，也是如此。不过只要他们停止夜市好了。这些话，要请你详细替我纠正。

章积和 一九二〇.四.二〇.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胡适（残）

〔上缺〕八卷一号文稿，我已张罗略齐，兄想必很忙，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二号报要强迫你做一篇有精采的文章才好。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吾兄在南京的讲义，务请恳切商之南京师，特别通融，给新青年社出版。可否乞即速示知。

弟独秀白 八月二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周启明

启明兄：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

《风波》①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暂用他纸，稿纸候洛声②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弟 独秀白

八月二十二日

（据《历史研究》1979年5期）

陈独秀答费哲民

哲民先生：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 and 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先生说：“劳工解放，农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何以我绝对未曾听见看见，这句话先生说得太轻率了。

独 秀

① 《风波》短篇小说，鲁迅作。初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

② 洛声，即章洛声。

费哲民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近一年来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新思潮的勃发，就跟着这个云头，改造环境，思想界的变迁，可谓革新中国的好现象了。现在北京，上海及各处地方出版的新杂志很多，高谈主义的，研究问题的，也有讲哲学文学的……思想都是很新，大抵都含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意味、还有些抱积极运动者，把“布尔塞维克主义”(Bolshevism)去直接运动，也是不少——虽然文化运动，红灼灼，热烘烘，是极可喜的事；但照我想来，这个交运未必可喜，只可吊呵！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现在这种新思潮杂志，不单是出风头；并且还犯一个大毛病，就是：“迭床架屋”，“炊冷饭”的令人看了都要摇头了。

现在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便是“解放”和“改造”这些名词；试问这些名词，这些声浪，时时在我们耳朵里经过，要说到底实践了多少，这个怀疑，我实在解决不下——新中国，新社会，固然很好，不过那背后的“军阀”、“政客”，“官僚”，和那肮脏的空气，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铲除这种障碍的东西呢？我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悲观！那里有乐观？现在的社会，只有黑暗！那里有光明？现在的小民，只有痛苦难堪！那里有享共和的幸福？我思量了一回，什么解放，什么改造，都觉得麻烦够了。我对于现社会的感触，写在下面：

(一) 妇女问题。妇女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也很多了，有一部分为争“妇女的人格”起见，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很是不少，现在听得广东方面，已经有女权运动的发生了，象这种妇女，是已经醒觉转来的新妇女了。这种运动，成败利钝，都不去论他，但是他们在这个专制的家庭里，觉得很不耐烦，恨不得立刻推翻，解放他们的几千年的束缚，做个自由的新妇女；他们现在最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社交立刻公开，实行他们男女的自由恋爱的主义。我想，社交公开，极容易一桩事，要在这过度时代的当中，难保不发生道德上的意外问题吗？

(二) 青年问题。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思想活动的青年，因为受了新思潮的激刺，都要和旧社会奋斗，恨不得立时跳出旧家庭，度他们的简易生活（新生活），恨不得立刻建设个新社会，过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想，这种青年，这种学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期里头，或是神经过敏者，望自杀路上去走，这又从那里起挽救他们呢？

(三) 劳动问题。劳工解放，农人解放，商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但是我国的工人，到底从那里着手去做解放的运动？我国的农人，商人（店员学徒包括在内），应该给他们解放不要？解放之后的利益，究竟能够享受不能够享受呢？即使能够享受，到底有几种呢？

上面三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圆满解决，现在就请你在新青年杂志里给我一个答案，下一个批判，我正感激你呀！

费哲民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高铨

高铨先生：

吴稚晖先生说：“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汪精卫先生说：“我们天天发理论的空言，闲却了实用的科学，岂不是变相的清谈！”吴汪两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我知道吴汪两先生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万能，物质文明万能，更不是说思想革新无用；是说离开物质的文明，离开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谈的流弊。即以思想而论，的确是人间超物质以上的财宝；但离开科学的基础和方法——*Logicsystem*——便是诗人的想象或妄人的胡思乱想，和思想大两样。这种胡思乱想，只是空空洞洞，为害还小，只怕是东扯西拉弄得材料很丰富，一动笔便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培根，狄卡儿，马格斯，苦鲁巴特金等^①，牛头不对马嘴的横拉一阵，那怕著书等身，终久是个没条贯的糊涂虫！我晓得有许多青年犯了这种毛病。医这毛病的良药，就是自然科学和 *Logical system*。说到实用的科学，化学工业更是十分重要。我们当初对于西南大学怀着三个希望：（一）开办费六十万元常年八万元的理化试验所。（二）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费三万元的图书馆。（三）常年费十万元的编译处。图书馆和理化试验所自然都是公开的，供给社会的要求，不为一校学生所独有。此外实行男女同

^① 苦鲁巴特金，通译为克鲁泡特金。

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也是我们重要的希望。可是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附白于此，请诸公原谅。

独 秀

一九二〇.九.一.

高铈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前略）^①我现在译了一编Lester Ward氏的女性中心说，从日本文译的，改编了一些，分作两编，上编是从一般生物学说，下编说人类，可以登出么？也想从中国转寄，到先生手里恐怕是下月。我看一般大学者做这思想发源的人，（创新学说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学识，而且另外还有他们各自的专门。从科学发达了以后，从科学建造的哲学（自然哲学，）更加是得力。我想我们只说他思想，不问这些思想的根源，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学说自身是很有根基，在我们会变成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只剩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在心里。

先生说的：现在新青年底大害不是这般顽固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透彻的少壮学者呵！这话很对。空空洞洞的东西从那

^① 《独秀文存》中原文如此。

里去透彻！他们那些老辈不过是些空空洞洞的思想，我们如果也是空空洞洞，那这个冲突，是没有内容可言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对于真理，没有信仰力。这个都是这些硕学鸿儒，害成功的。从那种不合理的推理，不正当的结论造成的。我们自己从自己经验见到许多言之成理的大文章的推论来的大结论，大定律，他们都可以违背，有时且必须违背，造成了一种观念，以为推论是不相干的摆架子，结论是自己想想随便定的。在我观察的狭小范围，觉得这种人很多，先生以为是怎么？这都是不晓得事物，都有logical system，这logical system是我们的真理。

明慧女士的要求选举权一篇话，因是弱者之声，我们要听。我觉得他的见解还没有到。我是主张绝对解放女子的人，人家问我的缘故，我决不说：为女子争利益为平等这样简单。为什么要平等？说不到时，也不过是空空洞洞的话。我的理由是因为全人类的利益，是进化当然的行径。人家反对解放女子的，我去抨击他，也不是说：打抱不平，保护女子这样简单。我是为真理，为全人类的利益的缘故。这个意思，就是我想译女性中心说的缘故，先生于我这些话有高明见解教我么？

西南大学的事，我在日本报上时时得一点消息，我希望他大完成。但日本报上并没有详细，内中是些什么科，（想不是单科）还请你有便时告我一点。化学工业实在是一项要紧的西东，（并非张扬自己所学，先生也说的）做起来却不容易。始基的一个小小化学实验所，就是没有几千元是不能着手的。先生主张西南大学要设这所，我真是佩服先生的见解了。我想我们做事要从根本做起。他们从前办学校的都只是虚样子。我记得（现在我不甚知）好些学校名字叫做什么工业学校，农学校……等，都是一块黑

板，几枝粉笔，这种学校真是害人！

我听说德国学生学工的五倍于学法的，我想我们人脱不了物质，我们中国人，一面要把精神革新，一面非立新生计不可。工字是我们人类立足的基础，是改良中国人生计的根本。先生说么？我又进一层想，在大学的教习，不只要教学生，教社会，教人类，是他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见解到这里，我希望西南大学的化学科的实验所，办得更高，更完备，高过那学生专用的程度。我们中国的天产没有人研究，用这实验所，收集材料，收集人才，做下去我想十年之间一定有大成绩的。这种事，我很愿意做的。我觉自己没有什学力，恐怕帮不得什么忙。我是今年暑假可以毕业，毕业之后如能够有时间，把这里大学的设备详细一查，大约也有几分可供先生参考。就恐怕没有这余闲时间就是了。

试验所的地方何处更好，我于中国情形不熟，不能说出，但这地方有三条件：

- (一) 用水充足，而且洁净。（井水不宜。）
- (二) 煤气之供给。
- (三) 电力之供给。（自备更好）。

如果实验所不在设备较完的市镇，第一，没有纯洁水，我们自己要设净制装置，水池，水塔，（有时因地形可以不要）费用就大。第二，煤气是不能小规模做的，最简单只好用air gas来代，也要装置费用。第三，我们是规模最小的时候，用市上电流，最好是自备。化学上多用直流，市上电流，许多是交流。（除了皂炉中利用电热者可用交流，且以变流为便，从交流换直流不要装置。）从经济上，便利上，都是自备为佳。自备直流机，夜间发电，一面点灯，一面立一间蓄电池室，日间又可以用，非常之便。以上三者想早在先生及王先生鉴中，我现在要考，考后再谈

罢。

弟高铨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杨重熙

重熙先生：

对于死者果有感情，有挽诗可以表现；对于寿者和婚者有什么感情？如此挽联，寿联，喜联等一切虚伪的文字，当然不应该存在。

独 秀

(一九二〇.九.一.)

杨重熙致陈独秀

记者先生：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请诸位先生指教。先生们如肯费点时候答复我，那我就非常感谢。

有一天，我的朋友为一个死去的同学开追悼会。会场中挂了许多挽联，我周围看了一回，都是说的些无味话，甚么“骑鲸”呵，“化鹤”，又是甚么“修文天上”啊，因为那死的朋友姓申，所以有一个人还用上秦庭哭师的典故。真是把甲的帽子给乙

戴，不管配不配。

又有一次，一个朋友的父母做七十岁的双寿，兼着他兄弟完婚，很是热闹。大厅里挂了一些寿联和喜联，写的是“鹤龄算永 鸪祝欢膺”呵，“德邵古稀福膺繁祉”呵，又是甚么“祥开麟定 庆衍螽斯”呵，说上许多，也不问粘不粘得上。

我想挽联，寿联，和喜联，原是想表情用的。若果堆着许多死典故和陈腐话，而且你用过去，我用过来，有甚么意味，又怎样能表情呢？简直说是虚套罢了，我对于这件事，想了许久，不能解决。所以把我的疑点写出来，请诸位先生指教。

(一) 挽联，寿联，和喜联，应不应该存在？

(二) 如果应该存在，要不要讲文言和对仗？

(三) 如果不应该存在，对于死者，寿者，和婚者用甚么表情呢？

杨重熙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录自《新青年》8卷1号)

陈独秀答知耻

知耻先生：

仆未尝不深知道先生是一位很可敬爱的青年，是一位人格很高尚的人，惟其如此，看见先生和万恶的资本家接近久了，竟然和他同化，说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话来，所以我格外痛恨资本家的魔力，不但掠夺了无数工人底财产，而且弄坏了许多青年底思

想！工人财产被掠夺的问题，和工人要求教育平等的问题，理论上本不相联属，先生硬要拿后者做前者的条件，正合一班妄人主张不识字的女子不能放足一样。我并不是看轻了工人教育，而且很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制度出现，但不愿意拿这个做讨论别的问题的条件，失了别的问题的独立精神。

先生主张“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我且问你：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如此看来，又应该拿什么做工人教育问题的先决问题呢？还请赐教。若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底障碍，这句话只应该出在资本家走狗的口里，不是有人格有良心的人应当说的。

独秀

一九二〇.九.一。

知耻致陈独秀（一）

独秀先生：

前上一书，谅邀鉴及。所述劳动状况，异常草率，而关于该问题之吾见，亦未详述，今日稍暇，爰再抒己臆以求正于先生。

仆意知识重于钱财，欲解决劳动问题，必须增进工人知识。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工时，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然仆此言决非谓不应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惟仆以为当与增进工人知识并行，且既欲增进工人知识，尤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良以工人之精力有限，若不减

工作时间，而更益以补习教育之时间，虽有好学者，亦恐其有害于身体上之健康。故仆以为与其提倡“罢工”、“怠工”，不如提倡工人补习教育。仆闻英国自欧战后，规定凡在工厂或商店作工年在十八岁以下者，一律应受强迫补习教育，其意甚善，大可采取而扩充之。

吾国一般社会知识幼稚为世界最，补习教育之需要，仆实以之为今日吾国第一要事，不仅工人须受补习教育。兹姑就工人补习教育言之，该问题在此时提出，极为合宜。刻下工商业中高级机关之人颇感受工人无教育之苦。譬如美国织工，每人可管布机十二部以上，而吾国织工每人仅管布机二部，若有人愿加工资减工时，而改每人管机二部为四部，则工人必群起反对，不可理喻。此外以工人之无知识，而损坏机件，减少出品，种种无形损失，莫可言宣。果能乘此时机，提倡工人补习教育，增进工人知识及生产能力，则减工时增工资为当然之结果。不惟工人得相当之优遇，工业出品且以之而进步，社会亦蒙其利，较之以“罢工”、“怠工”等消极方法鼓动工人者，其利害得失为何如，愿先生有以教之。

知耻上

一九二〇年，四月，廿五晚。

知耻致陈独秀（二）

独秀先生：

今日读先生复书，谨悉。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应该强迫他们做工，强迫他们做工的惟一善法，就是废止遗产，（遗产废止

这一事他日再谈,) 不能作为工人亦可游惰的理由。仆以工人补习教育为重, 正为工人设法, 非此不能真正造福于工人及社会。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惟一基础, 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 而不以教育为基础, 虽以多财与工人, 亦难有良善之结果。彼纨裤子弟未尝无钱, 而其所受遗产之毒, 致不能保留其人类之向上心, 较之无钱之人更苦。仆见某君某君即昔日之工人而今日之资本主, 其子弟已变为游惰者。无教育而有钱, 为害之大, 莫可比拟。故仆意工人应当要求有“受教育的权利,” 热心劳工问题者, 应当鼓吹“工人有要求受教育的权利。” 工人教育问题一解决, 则工作时间问题, 工资问题, 其他一切待遇问题皆当由工人自身为相当的解决, 即进而求工厂管理权, 生产由劳工支配, 仆亦甚为赞成。由少数幸福而变为多数幸福, 固仆积年所梦想者。惟仆之主要意见, 必以教育为入手办法, 知识平等而后人类平等, 增进工人知识, 即为达到“生产由劳工支配,” 必由之途径。照现在大多数工人的程度, 想使他们进步, 非教育不可。倘然不注重教育, 他们连字都不认识, 并要求改善待遇都不知道, 请问先生用什么法子可以唤醒他们的大梦? 即使他们战胜现在的资本家, 而拥有现在资本家的财产, 不过换一个位置罢了, 结果他们的游惰, 不善用他们的金钱, 还是一样。他们的子孙受遗产之害, 还是一样。差不多同推翻了前清政府, 换了现在这种民国政府一样, 这都不是彻底的办法。

仆的意见, 彻底的办法只有一种, 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义务(工人当然包括在内。) 现在中国什么事都做不好, 什么好听的名词都不中用, 就因为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的缘故。虽自身利害关系最密切的事, 因为没有辨别利害的知识, 心里要想好好儿做, 结果还是一团糟。先生不要看轻了工人教育问题, 先生答复的话, 太偏

于感情作用，不顾仆夙有的人格。难道先生不知道仆的为人么？

现在要免除先生的误解，再明白说一句：仆对于减时加资并无阻止之意，且努力助其成功。全社会的界说，决不是资本家独占，也决不是工人除外。欧美的工业界，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与中国，亦不能并论。所以不能并论的缘故，乃以教育为标准。德国不受教育的人，二千五百人中只有一人。英法美各国受教育的人，平均亦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据战后教育调查，英美各国尚努力注重工人补习教育。他们的出品，倘然以时间比例起来，一定比中国工人的出品多而且优美，这是工人教育的成绩。日本所以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为日本工人教育不及欧美。中国更不及日本。现在中国的社会如此腐败，一般人没有良好的娱乐；倘然不注重工人补习教育及相当娱乐设备，而惟减时加资，其结果必与愚夫愚妇之溺爱子女无异，适足增加工人之游惰，非徒无益而且害之。

工厂利益，并无把握，前几年工厂亏本的很多，那时游惰的工人必处于淘汰的地位了。先生所云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每年工资一个铜子，真是笑话。仆不料先生如此误会。总之仆意在以建设的方法积极的手段——即平民主义的教育，——造成一多数幸福的社会；不欲盲从他人鼓吹消极的破坏。现在青年激于一种虚骄之气，无坚苦拔俗之志，而惟以炎炎大言为能，不耐劳苦，不事工作，而梦想黄金世界之实现，仆愿先生有以启迪之而教诲之。幸甚祷甚。

知耻上言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

再仆此函为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而发，仆对于工时工资问题，将来另有意见发表，特此附白。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周启明

启明兄：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①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②、《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弟 独秀

中秋后二日^③

（据《历史研究》1979年5期）

文焕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你们所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

① 随感录 即《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

② 《新潮》月刊，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编辑，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北京大学创刊，一九二二年三月终刊。

③ 中秋后二日，即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唉！先生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苦恼的工人，多是劳动界的一份子，从前受资本家底压逼，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们要我们工人长，不敢不长；要我们工人短，不敢不短；要我们东就东，要我们西就西；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

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九.九.三.杨树浦路电灯工厂文焕

（录自《劳动界》5期）

朱信庸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读了你们的大作，实在佩服！你们要想去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并觉悟一般做梦的资本家。这事我想并不是两三个人的责任；大凡有这个能力的人，都应该尽力去做。但也不是一股误解的人所说的“代抱不平”，却是为人道尽义务，为人类谋幸福。我的知识很浅，也不会作诗，这篇之作，不过是把热烈的感情所冲动；固为我相信一个人，“劳动则存，不劳动则亡。”这篇就算是这两句话的表现罢了。

朱信庸

（一九二〇.九.）

（录自《劳动界》5期）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答仲渊等

仲渊，慕雍，颜启烈，邱伯年，和工商友谊会诸先生：

诸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秀松汉俊独秀同白

（一九二〇.九.二十六.）

（录自《劳动界》7期）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

“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

八卷二号报准于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弟 独秀

（一九二〇.九.）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人社

人社诸君：

接到诸位底来信，一直懒到今天还没有答复，文章更不谈了；只好静候着读诸位底大作，供我懒人底眼福罢。

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值得当个问题去讨论。象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底程度还同五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我从前和汪精卫先生谈及此事，精卫先生说，中国人把男女防闲看得这样重，只有索性实行乱交可以破破这固执的空气。精卫先生这话虽未免激烈一点，但对于中国人的迂谬思想和习俗，每每令人发这种感想。

前月十五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有一段新闻，真令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录在后面请诸位想想那姓蔡的是谁？

独秀复

一九二〇.十.一.

曹张^①宴客时之趣语

——忽谈“姓蔡的”问题——

曹张两使濒行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

① 指曹锟、张作霖。一九二〇年三月，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招收女生，为曹张引为攻击蔡元培的口实。蔡对曹张等人的攻击、谩骂，在所不顾。

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使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使亦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使曰：“可不是。”曹使即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某阁员以他语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大抵卒然而至，且所言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云。

人社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广东现在没有一个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中等学校的女毕业生，除了少数可升岭南大学外，简直没有求高深学问的地方。那么广东高等师范应该男女同学，不是性灵闭塞的人，都没有不承认的。怎想今年广东教育大会通过高师开放案后，即有省会“碍于风化”的沮议，省长“无开放之必要”的批驳；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从此就成泡影。我们细想专门以上学校应该男女同学的理由何等充分，数百女生底开放高师的要求何等恳挚，现在竟遭失败，真是可叹！

我们见得这样情形，觉得“高师开放”底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所以立意去干这宗事情。运动的步骤：第一，想十月十号以前，刊行一本高师男女同学问题号，关于男女同学底利害作具体的研究，想将一般腐物的迷梦唤醒。但我们能力薄弱，恐没有多大的影响，先生平素对社会底运动有很大的同情，故求先生帮助我

们，替我们撰一篇文章，最好九月二十五号以前寄到。

独秀先生呀！这一宗事情关于社会进化很大，很望先生对于我们这种要求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敬祝先生康健。

人社。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赵仁铸

仁铸先生：

增高一国学术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程度不可；增高大学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教授程度不可；此时中国要增高大学教授程度，非多多聘请外国学者不可，这是一定的道理。章行严先生前在北京大学时，即力说北京大学教授底程度已和学生底需要不相应，非改聘外国学者不可。王抚五先生也主张西南大学教授只用外国专门学者，他自己情愿辞去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当助教。章王二先生底见解都和尊论一致。我也极端赞成这个主张，但附有两个条件：（一）图书馆及科学实验室有相当的设备；（二）学生外国语有充分的听讲力；否则就是延聘外国学者来也无甚益处。

独秀复 一九二〇.十.一.

赵仁铸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阅报悉国中有西南大学之建议，而先生等被任为筹备员，深以为吾国教育界前途贺。大学之组织分科之办法，虽时时于报端见其鳞爪，以未窥全豹，不敢有所妄陈；然愚见所及有一事不敢默然者，则教授之选择是也。考教授二字于英德文为Professor，法文为Professeur，乃最高尚最荣誉之职也。其在德国及瑞士更为重视，任其职者均为各界之泰斗，著作等身之士，以数十年之经验导青年后学之士，识途老马，是以无颠蹶之虞。铸昔在巴黎参观大学开学式，见教授席中均颁白老者，须发皓然之士。归而考其历史，始知皆各界之杰才，国中之硕士也。英美教授资格不及德瑞之严，然任其职者亦莫不得博士后积十年以上之研究，经五六次之发明，否则断不敢望此席也。反视吾国，任教授之职者均属青年后学，往往在国外大学初得学士硕士，回国即肩此重任，其得有博士学位者更志高气扬，莫不有大学教席舍我其谁之志。在吾国人才缺乏，固不足深责，然长此不已，岂我国高等教育前途之福哉！今乘我西南大学正在草创之时，聊供一得之愚，如蒙采择，不胜幸甚。

铸以为吾国在此过渡时代，大学教授当用外人，前在国时即力主之，今出国后更仍不变我初衷，幸先生等勿笑其洋迷也。铸所谓之外国人，非能说几句外国话如我国以前各校所请之外国人也，亦非但得有硕士博士头衔之外国人也，必其人得博士后更积

有十年以上之研究，杂志丛报时时见其发明之披露，此等人在其本国人材如林，尚无分于教授席中，设吾国降格以求聘任此等人为教授，以视世界著名各大学之教授固未免稍有逊色，然以视吾今日之本国教授，其相去自有公论矣。

回忆初来此间，有德国同学名米思麦者，在此得博士后，又复研究一年，一旦来别，云将归国；铸询以将有何任，彼云将往柏林应中等教员试。铸深以为奇，彼即转询吾国亦有此等考试否。铸答以中国人得博士后已为万能，任大学教授尚绰有余，更何惜为此中等教员乎！彼答曰，然则君毕业即有Prof. Dr. 之希望矣。铸闻之不禁赧然，即答曰，余回国后当再不蹈他人之覆辙，但愿在化学工厂中任一小职，惜现在中国工厂尚不发达，如无机会，将来亦拟在中等学校中任一教职，能免此考试，已属幸事，若Prof. Dr.，余所不敢为亦不愿为也。彼云若贵国学生能人人若君，则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之大学何难与德国相等。此一席谈，铸深印于脑不敢忘也。

又忆及昔在美国每晤吾国同学，辄滋滋问北大教授薪水若干，如何入门。铸答以君等毕业后，何不为耶尔哈佛之Prof. 而愿为北京大学之教授乎？彼乃屈指申数曰，某某吾昔在某大学之同学也，某某与吾同得硕士也，彼等先回国，已在北大掌教矣，吾留此较久，岂反不胜任乎？铸答以君为中国人，亦爱中国乎？答曰，何在而不爱？铸曰，君既爱中国，当希望中国第一之大学将来与世界著名之大学并驾而齐驱，若人人如君，不将沦吾国大学于德国中等学校以下乎？彼乃恍然大悟不复冀此大学教授矣。

先生等闻此琐屑之谈，吾知其必厌然乏味矣。今请简述之曰：
(一) 中国之教授在此过渡时代，非本国人所能任也。(二) 请真有学问之外国人为教授不足耻也。二十年前之英吉利，欧战前

之美利坚，其著名大学之教授均为德人，是以英美学生闻 German Professor 三字，莫不敬而重之。铸自离北大后，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院内研究有机化学，所从之教师，非美国人乃瑞士人也；楚材晋用，美国尚如此，在吾国亦何伤？欧战停后，蒙其介绍来此间，从世界著名之化学家 Werner，不幸来此不久，彼即逝世，乃改从继其任之 Karrer 研究有机化学中之 Glycosides，此为近十五年德国化学家所最从事于研究者。前柏林大学教授 E. Fischer 为此界之泰斗，今此间之 Karrer 则其后起者。英美各大学对于此类化学尚少研究，铸不自量力，肩此重任，在此研究已逾一载，虽不敢谓有所发明；然积一年三百日，一日八小时之成绩，亦不敢谓毫无心得，预计明年二三月间可得一小结束；应试后或往德国明兴 Muchen，或往法国曩西 Nancy，二处之教授非但为德法二国化学界之泰斗，抑亦世界学者所景从也。（后略）^①

赵仁铸寄自瑞士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知耻

知耻先生：

先生也主张要加工资减时间那便好极了；先生又主张不以减时增资为满足，更力主实施教育，那便更好极了。但先生是主张

^① 《独秀文存》中原文如此。

拿教育做减时增资底条件，我以为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若加上条件便是搪塞底话。我主张拿减时增资做教育底条件，先生以为怎么样？每日做工十二点钟，上海现在的生活必需品这样昂贵，每月只有十元八元底工资，试问先生若处到这种境遇，那里会有时间力量去受教育，那里会感觉没有知识底痛苦？人类生活的欲望是由物质的进到精神的，断没有丢开物质的便进到精神的。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

先生自己说是主张减时增资的，说我“还有误解之处，”先生说我“武断；”先生说“三次通信具在；”现在把屡次通信里关于主要争点底话录在后面，请先生及读者诸君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误解，武断。

先生第一次信上说：

“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先生第二次信上说：

“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时间，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

先生第三次信上说：

“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惟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善良之结果。”

先生这次信上说：

“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

把四次信上的话综合起来，先生是竖了一块教育平等底大招牌，随即自认没有神通使他实现，这便是只有招牌而无货卖了；但是先生一方面又力说没有教育是不能减时增资的，那么，先生

所主张的减时增资，在逻辑上是不是已经自己取销了呢？换句话说，就是先生明明晓得教育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偏要拿他来做减时增资底条件，这不是拿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减时增资的障碍是什么？

独秀 一九二〇，十，一。

知耻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八卷一号新青年，知道先生对于我的意见还有误解之处，现在再略加说明如下：

劳工问题之解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但是我的意见仍希望一般热心劳工问题的人，以全副精神注重工人教育这一点，因为我身居工厂，实在觉得一般工人知识的饥荒，比无论什么痛苦都要深一些。他们肚饥知道要食，身上寒冷知道添衣，惟有没有知识的痛苦他们完全不觉得，所以若不想法增加他们一些知识，即使先生们天天为劳工问题做文章，还是不中用，于他们身上还是不能发生效力。如此情形，试问先生有何方法可以解决劳工问题？

先生最致疑于我的，以为是“拿教育这句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我不能不说这是先生的武断。我三次通信具在，明明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与先生无异，但不以此二事——减时增资——为满足，力主实施工人补习教育及储蓄与减时增资同时实行，所以免工人耗费时间金钱及习于游惰之弊，而谋增进

改善工人之地位。即使他们的知识能力经济能力逐渐增进，成为工厂股东之一分子，股东即是劳工，劳工即是股东，这就是我的希望，不知先生何以看不明白。至于如何入手，我们都是“人”，没有“神通，”只好就所能去做就是了。

知耻白 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郑贤宗

贤宗先生：

我前次文章发表之后，言论界未曾有赞同或反对的表示，我很为失望；现在接到先生底辩论，并且是很有价值的辩论，我非常快慰。我的意思还有一些和先生不同的地方，不得不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在答复先生底辩论之前，我有几种信念必须明白发表出来：

(一) 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二) 世间有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说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固然不对，一定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逻辑上也有毛病。) 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益的推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

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我们若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努力放弃了，那么世界终极是或者要毁坏的，个人终极也都要死亡的，我们未到终极期间底一切努力岂不是无意识么？（三）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譬如医治多年的疾病，纵然有药到病除底仙丹妙药，也要有这药才能够治病，断不是在理论上否认这病，这病便自然会好的。因为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这三条信念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所举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底两个最大的理由，在第一个理由，我那篇文章里面明明说：“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我实未曾说过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东西。无政府党既然承认“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而在现社会实际的共同生活底需要上，是否真实证明国家这种形式这个制度（不是国家主义）底时期已经过去？在第二个理由，像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底罪恶。像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至于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有时不免现出狭隘的情感，但他是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如

言语，历史，宗教，利害等，）底基础上面，根深蒂固，他成立底基础不消灭，他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单是消灭了“国家”这个名义，在实质上人类但凡有组织，那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民族的冲突，就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想免除这种冲突，非先在事实上免除造成冲突底各项自然的障碍不可，各项障碍中以言语和利害关系最重要，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

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他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他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在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是根本解决，在我以为是因噎废食。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问题，未免有点笑话。在我那篇文章内，并没有说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是好的，只说过要有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要有强迫劳动的法律，要有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底人民分别一下，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先生一方面以为我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我实在有点不解。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个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做个主义来信仰；先生一定说他们于人类生活只是有害无利，难道先生所主张的无政府社会未实现以前之暗杀，暴动，炸弹，手枪，是于人类生活只有利而无害吗？

我那篇文章内是说旧党势力恢复推论到复辟，并非专门拿无

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来防备复辟。先生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这种理论说说很容易，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

孟子人性皆善底话，只看见性底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底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嗔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习不是性，我第一要问，何以善的现象是性，恶的现象就不是性呢？第二要问，习惯是不是第二天性，佛教所谓无始以来的薰习是不是和性有同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些？让一步说，恶是习不是性，可以改正的，但长久期间造成的恶习惯恶心理，是不是短少期间可以洗刷净尽的？在这恶习惯恶心理未曾洗刷净尽期间，自由放任主义是否行之有利无害？性善是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基础，要请先生用科学的方法仔细研究一下。我所谓一时也决非很短的期间，大概要以疲劳回复了并且有了新的刺激普及人心为限度。我所谓强迫劳动底法律决不是永久的，这件事用不着先生死不赞成，我敢说不但现在及将来不会有永久的法律，就是过去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永久的法律。

我以为关于人类基本生活劳动底规定，有二种方法：（一）

由人类平均担负；（二）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时间可以较别的劳动时间减少。我所谓用法律强迫劳动，是不许有人不劳动，是不许大家都不肯从事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因为若没有法律强迫，在这机器完全代做和劳动的艺术化未成功以前，我敢说无一人或只极少的人情愿去做，并不是说用法律来规定“那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那一个人应该做不洁的劳动。”我不知道先生这种疑问是从何处想起？

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衰减的；假定日后依教育底成绩，理性充分发展能够抑制本能，只望这个来解决男女问题，又不知在何时代。先生持论底通病是注目在远的将来，而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急待解决之问题放下不管。

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请问先生什么东西可以禁止罪恶发生？

事实是道理底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最后我要忠告先生的，就是先生所说：“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这句话。先生能断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便不须改革了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独秀 一九二〇，十一，一。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郑贤宗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八卷一号上“谈政治”一篇后，很有些意见，现在

拉杂写在下面，以质之先生可乎？

先生以为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政治，法律等，所反对及者，只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不能反对及将来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国家，政治，法律；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据我所见可就不然。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有两个最大的理由：

（一）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不可磨灭的东西。先生常说世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难道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么？无政府党以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出风头期，已经过了，要是再不废掉他，就要变成进化道上的障碍物，所以大声疾呼的打破他。从原始时代的无国家到有国家是进化；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独非进化吗？这是一层。

（二）无政府党主张大地众生应当互相亲爱，视地球上一切人类都是兄弟；不当有什么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自有了那国家之后，于是把地球上同样的人类，划了不知多少堆数：什么“支那人，”“日本人，”“美国人”……于是而“博爱”这个名词的意义，至多不能超越国界了；国家以外的人，就视同仇敌，大家坚甲利兵，互相防御；从此战争呀，并吞呀，杀人如山，血流成河；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凶暴乃远出一切动物之上；这是谁为房阶^①呢？而且人生的目的不外求快乐，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世界，有什么快乐之可言？这是第二层。

无政府党的反对国家，既是根据于上面两层理由，所以反对

^① 房阶，祸端。

及者，倒不是先生所说的过去与现在，乃是现在与未来；因为过去的国家，无政府党承认他是应当有的，——他是进化轨道上所应当经历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过去了，何用反对？未来的国家，不管他是甚么形式，只要他可以受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的攻击，一切都在反对之列。

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于人类生活上只是有害无利；无政府党反对了国家，当然一并反对之：这是无容疑义的。说官僚政治，拥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不好；难道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就会好了么？

先生又说强权如水火一样，有善用与恶用之两方面，所以只要善用之就是了。无政府党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但这是无政府社会实现后的事，非所以语于今日。因此近代的有名无政府党，除开了托尔斯泰先生之外，没有不主张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的。先生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罢！

关于达到改造社会的方法，先生主张与无政府党略近，——同样主张用强力来破坏旧社会；但是破坏后，先生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以代之。这我可不敢苟同。先生所以主张无产者独裁的缘故，有两个理由：（一）恐怕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二）将来渐渐地又要生出资本家来。这两个理由据我看来都不十分充足。何以故呢？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势力来复辟？康有为何以自己不能独自把溥仪牵出来做皇帝，一定要靠张勋的丘八太爷来帮助？要是张勋没有许多丘八太爷在手里，他

怎样敢谋复辟？可见复辟不复辟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复辟在本身一点没有力量。我们把资产阶级的财产一齐归了公，断不怕他们再有什么阴谋做出来。就是不然，因为有特别情形不能不照先生所说的办法行，但我承认他是过渡时代的一种临时办法，要“久假不归”的维持下去，成为一种新政治，我是死反对的。至于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我也很是怀疑。先生所举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的自治都市一段来证明，我不敢妄下批评；因为克先生的国家论我没有读过（从前星期评论曾译登过，但我没有读；现在又寻不到那星期评论，只好不说这件事了。）但据我的意思，这一层似乎是先生的杞忧，与无政府党的主张无干；因为无政府党是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废止金钱，不但生产机关公有，就是消费机关也属之公有的，那么资本再何由而来呢？

末后先生又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我不知先生何以敢下此断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据我的观察，他老先生这几句话确是不错的。“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能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先生既承认了他是一时的现象，那么施之以强迫劳动——暂时的——自然可以；若因此一时的现象，而遽立永久的法律，我死不赞成。人类有劳动的天性，先生也承认的；那么决不会因一时的反动而失去他的天性，法律何为哉！

先生又说：“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先生主张非规定法律以强迫不可。我以为劳动无论其是否是人类基本生活

的，没有不可使之艺术化的理；而劳动时间能减少至最短程度，也就不会觉得十分苦；至于不洁的劳动，自然不是大家所欢喜，但终能设法用机械代之的。就是不能代，我以为可以减少其劳动时间；譬如普通人每日劳动三小时，那末这不洁的劳动减少至两小时，就不愁没人干了。反之，如先生所说规定法律来强迫，我倒要请教这法律如何规定？一切人类同样都是圆颅方趾，那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那一个人应当做不洁的劳动？若说以受教育的高下为标准，社会上既然有教育不平等，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倘然这法律上规定：“陈独秀做大学教务长，郑贤宗做挑粪夫；”我便要不服：陈独秀何以要规定他做大学教务长？我何以规定我做个挑粪夫？这个问题请先生解决才是。

最后先生所说的男女问题，我以为也不是法律所可以解决的事。要防止这种罪恶，惟有从教育方面着眼；而且实行自由恋爱后，这种问题终可减少。还有一层，人类的理性与本能是互相消长的；恋爱是一种本能，他日人类的理性因为不受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牵制，一定能够充分的发达起来，那末这男女问题，自然不致扰乱社会的安宁了。

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

先生鉴于现在政治的罪恶，对于俄罗斯的劳农政府不禁油然而生欣慕之心；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事。当他一种过渡时代的暂时办法，我也很赞成；但我所主张的终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这便是我不敢苟同先生的所在。倘有意见，幸请赐教！

郑贤宗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柯庆施

庆施先生：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独秀 一九二〇.十一.一.

柯庆施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

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

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过中国的青年，受毒太深了；把那创造活动诸本能，虽不能说他已经消灭得干净，可是已经被他消灭去一大半。所以我们不说改造则可，一说改造，则必先设法把青年们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但是究竟如何培养，还要请先生指教！

先生在谈政治文里，说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及由劳动者执政权的一段文章，实在说得透彻。国家政府法律，自身本没有什么能力，何用废除！至于资本家推倒以后，确非劳动家执政权不可；不然，则资本家必然要重行发威。但是我想劳动家执政若干年，资本家都变为劳动化了；而且他们的野心，都已平服了，那时只要经济组织完善，则国家政府法律，自然变成无用。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国家——法律，我们现在不必想法废除他；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待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天下没有一个‘吃饭不做事’的人了，那么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我们不去废他，他自会变成无用的。

我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所受的感触，也不知多少；今天随便写了些，特求先生指教。

柯庆施上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

适之、一涵兄：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

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道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选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答陈独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

适

(据北京大学档案)

陈独秀致罗素^①

罗素先生：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

^① 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政治上主张和平主义。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到中国讲学，对当时中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哲学原理》、《心的分析》、《西方哲学史》等。

国之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独 秀

(一九二〇.十二.一)

(录自《新青年》8卷4号)

陈独秀答张东荪

东荪先生：

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底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比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

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 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

(2) 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 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

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的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

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我便有两个质问：

（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

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论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左：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松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唯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①

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

① 《新青年》刊载，原文如此。

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象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①，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

① 即革命。

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将来那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的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

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什么协社主义，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什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颠预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①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

^① 福利耶，现通译为傅立叶。

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那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①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独 秀

（一九二〇.十二.一.）

张东荪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②或用资本主义，不防

① 即专政者、独裁者。

② 即合作社。

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因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们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的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录自《新青年》8卷4号）

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等

守常 玄同 适之 孟和 一涵
慰慈 豫才 启明 抚五 诸君：

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弟独秀

（一九二〇.十二.）

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并请转寄给没有圈子的人。适。

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胡适致陈独秀（稿）^①

独秀：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

^①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注，此信约写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

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树铮陆军总长，陈独秀教育总长”的话，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一九二一年

陈独秀致《群报》记者

《群报》记者：

在今天的《群报》上看见冯菊坡先生给《群报》记者的信及记者的答复，知道冯先生肯对于鄙人《欢迎新军人》那篇文章，加以有理性的讨论，鄙人心中十分感谢冯先生，并且鄙人对于广州报界因此由悲观变为乐观。因为不幸我所见过广州报，不是无关重要的纪载，便是发议反对方面的隐私，或是用无条理的诡辩、谩骂来出风头，象冯先生这样有理性的讨论，我第一次见着，所以我格外欢迎。

冯先生也承认现在及近的将来我们没有理由主张废兵，冯先生所怀疑的，是鄙人所说“或至很远的将来，我们都没有理由主张绝对的废兵论”这句话。

现在我引用罗素先生一段话来答复冯先生，以备冯先生参考：

“（前略）除去这些事件以外，还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就是用一种有组织的计划去扫灭无政府主义，恢复旧式的专制。假使拿破仑生于克鲁泡特金所主张实现的社会中，他的天才没有发展之余地，他能够甘心雌伏吗？如果一般野心家互相结合组成一种私有的军队，自铸军器，到后来出面压制深信自由而毫无防御的

国民，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制止他们的行动。”（见《到自由之路》第五章。）

罗素先生的意思是以为就是很远的将来，人类的竞争心、争权心和妒忌心三样根性是不容易完全消灭的，所以对内对外，小事仍需要法律，大事仍需要兵力，才能制止一切不正当的事。虽然将来的法律及军队渐渐和现在不同，而绝对的废止期，几乎是现在的人类一种空想。

以上面的说话，可以说明我不主张绝对的废兵论，并不专因为“抵御外侮”，也不单是“一时的手段”，然却不是目的。

冯先生的意思，大概希望以法律的实力代替兵的实力，冯先生要晓得在无政府党看起来，法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主张要绝对的废止他。我以为法律力量是强过舆论，兵队的力量强过法律，确是人类的不幸，但此种不幸是很强有力的事实，我们只有努力把他渐渐改正，空言否认他，是没有用的呵！

不但兵的问题，我以为一切问题都不应该尊重在很远将来的空想，把现在及近的将来之实际改造忽视了，不知冯先生以为如何？

陈独秀 一月十日

（录自广东《群报》1921年1月11日）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

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①，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②，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独秀白 二月十五日

（录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

豫才二先生：
启明

《新青年》风波^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弟 独秀

二月十五日

（录自《历史研究》1979年5期）

① 《新青年》8卷6号在上海付排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抄，被迫不能按期出版。

② 指一九二二年胡适等人主办的《努力周报》。

③ 指一九二一年二月《新青年》8卷6号付排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一事。

陈独秀答皆平

皆平先生：

广东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都注重教育，至少也不反对教育，社会上空气稍差一点，然尚未到绝望的地步。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听说朱谦之也颇力学，可惜头脑里为中国印度的昏乱思想占领了，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他此时虽然出了家，而我敢说 he 出家不会长久。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不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亦终于造

谣言说梦话而已。中国印度古来诸大冥想家，谣言造了几千年，梦话说了几千年，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底知识，比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之一毛，我们快醒了。此间编译局若成立，当然要注重科学书，但这还不是提倡科学的好法子，不但科学风尚未成，出书无人购阅，而书籍上的科学，还是文哲学式的科学，去真科学还差一点。我以为造成科学底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这四件都是我们在广东正在要做的事。匆匆不及详答，乞恕。

独秀 一九二一，六，一，

皆平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久不通信，殊念念。近来报章载广东事及先生事甚多，惟有今天晨报虹君通信，说先生去而复留的情形，使我非常乐观。这封信是从那无穷希望里迸出的。近来偏袒北面的报纸所说的话，我不相信，偏袒南面的报章所说的话，我也不相信。这不是从什么事实的根据而不相信，是因为我不希望他那样。北面政府是弄得不成样了：对外不能去平库，对内不能去维持教育，不说别的了。我常和几个同学们谈笑说：“要是诸家报纸约好了，不代政府登那‘水板写字’式的命令，北政府就算完了。”我近来看报

纸，除看看什么“学灯，”晨报第七版，“觉悟，”“青年之友，”（其实这里面除了些无谓的争论和空泛的哲学及文学，也没有真可看的。）简直不要看国事——不是对于国事灰心，只觉得“五花八门，”“朝三暮四，”不如留点工夫看看别种时事。广东那方面，我最不希望再有什么统一中国底行动——那只是白费事，结果替我们国民更堕深一层地狱。从混杂不清的所谓“统一体，”渐渐分为更完全，更有希望的小“统一体”……这是“进化”底趋势——无论那种“进化”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实有多少热烈的人们，让“彻底”、“牺牲”、“奋斗”闹昏了，——闹得一事无成，我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到了这步以后，我们自不感困难来做别的事。在广东方面有那几个做领袖，我觉得这种Dictatorship是必要的，自不难先办到“新国”这一步，以广东的面积和人口，足够“国”底资格了。不然，我就怕外攻内讦，把一点有希望的芽以及根完全铲去，那后来的实现格外难了。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陈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

所有的运动起首于教育底运动，孙陈二位如果是诚实的，我知道他们必定不放你走。只要有一点可留的希望，我知道先生也必定是留住的。我对于广东的形势只拿先生的行止，就可料定了；——并知道有许多合理头脑的人们，当也是这样想的。对于教育上，我没有什么意见可供献。不过近来易家钺朱谦之二君——先生所指为无基本科学根柢的——行事：一是犯做“呜呼苏梅”的嫌疑，一是上弥勒院出家，使我觉得那种未受“科学的西北风吹

过”的所谓哲学的头脑，简直是靠不住的。他们时常拿“真理”底死敌为工具去求他们所谓的“真理”——就是以为真理是可以由“意志”求来的，忘却只有智慧才能给出普遍承认的“真理”。如是，他们常常陷在感情阱里，来对人接物。易君事不必提了。朱君的近代思潮批评，我是看过的。近来出家的宣言——自叙和他前几年旧作自由论，——我今天通在“青年之友”上面看过了。我很奇怪他不在他所谓批评三法——“怎样的，”“为什么”和“这能存在吗？”——再加一条“有根据吗？”这一个方法不提，于是他的所谓“虚无”，所谓“自由”……通通随口出来了。让我举几个很好笑的例子：他说宇宙有始必有终，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有什么根据？宇宙是怎样始的呢？宇宙又将怎样终呢？我故大胆说一句，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又说克鲁泡特金做互助论，可谓能进一层了，但仍不能进而说宇宙底全统系底进化，我的眉批是“克氏没有研究过宇宙底进化，如何能拿生物底进化用到宇宙底进化呢？互助论是科学的，不是如玄学的先生们，玄而又玄地谈什么‘真理’的。”更，他近来所说的“绝对的自由，”又说什么“不服从自然底律令，”这我通通不懂，除非朱谦之真成了西游记上的佛祖师，我不相信他被人用棉花塞着喉咙还能“绝对自由”地说出话来；或是提在空中，没有一点支持，能不随“落物律，”以每秒钟加速率每秒三二点二英尺落下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哲学没有科学，就失了事实的根据；失实的话不是谣言，必是疯话。朱君的大胆，是我佩服的，但在学问上，大胆说无事实根据的话，是无意识的。这些话我不欲说的，因为朱君已申明过他的议论是主观的，是不受批评的。我觉得这种议论只当躲在一室里，自己对自己说以为消遣或无不可；现在并且有许多他的朋友，竟被朋友的感情遮住了理性，在

感情的幕后，来大吹大擂地说他如何的了不得，初不把这“有否根据”底问题想一想，这种现象或者是学术思想界底隐忧！

连着这个我要说到现在译著界，译著界受现在所谓“新文化”底空气包着，只有些哲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我觉得没有自然科学底基础，那哲学对于学者是广漠的；没有自然科学底基础，那社会科学是很年轻无知的。丢去物质上的价值不说，自然科学将养成我们好观察底习惯，爱真实底性情，以及种种从理智生出来的信仰和精神；——这通通不是什么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可及的。我觉得科学最靠得住，将来救世界人类从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除了科学莫属。我不反对宗教，我不反对哲学，但我觉得宗教和哲学自以为能解释一切，所得的结果，不如站在“不可知论者”的地位里，科学所给我们的满意——这不特对于我一个，所有平常的人也觉着是这样。对于现在这些什么社，什么丛书，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他们已被那种空气压倒。我觉得希望当从广东方面编译事业起。在译底方面，当预备多些钱专为科学书籍——这些钱当然要不了多少，只要一次大人们气按住，不打仗，不去招兵买马，就够好几年用的了。——科学书籍当然是从普通的，和历史的起首。这是我的经验，我以前读了一本“New Knowledge”引起我要看“Radiactivity”又要看“astronomy”又要看“Theoretio chemistry”又要看……固然我在学校被功课时间限制住，不能做如我所要做的，但这足例明一本普通科学书，常可以使读者进求稍专门的书读，所以我想那边编译局只要在一年中能有几十本普遍的，及历史的科学书——初看的人自然不多——就足能造成一些“科学”底空气。这空气将渐渐浓，后来看科学书的人，自然就不少了。这起首的钱在几个穷学生，或几个营业的商店自然是困难万分，但在一个想为有益政府方面当

然是不算什么的。

这封信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吗？并望也在那上答我。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已去三小时了！以后有暇再说罢，知当累先生的宝贵工夫不少，恕我。敬祝先生健康和进步。

皆平 五月二十六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寅生^①

寅生先生：

来电敬悉。白沙先生^②日前到此，自述北游石家庄以至京师，比以此道不易行，仍经由石家庄以至汉口，复由汉口而上海而广州。谈时力言决计以戎杀贼，当时弟明知其所言难□，因其心意烦闷，不欲重违其旨，漫应之而已。次日往见中山先生，自陈欲往北京运动开国民大会倒徐^③，中山先生因其体弱，亦劝其暂留广州著文，不必他往。与弟不见数日，即传其蹈海矣。寓中无长物，只衣数件，遗言赠之茶房，乘渡船赴海，临命时闻曾留下扁帽各一。省署派人寻觅遗骸，至今未获。弟所以尚未奉闻者，一因遗骸未获，二因此种惨痛之事，诚不忍使先生早知。今承电询，不敢隐矣。俟捞得遗骸时，再行奉闻。

弟独秀记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录自《历史档案》1984年4期）

① 寅生，易培基之字。

② 白沙，即易白沙。

③ 指徐世昌，时为北洋政府大总统。

陈独秀答张崧年^①

申府先生：

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吴先生此话正和你的见解相同。

你说：“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我想正当的爱国心（我近来以为爱国心当分正当不正当二种，正当的若朝鲜之抗日本，爱尔兰之抗英伦，不正当的若日本英伦之侵略政策），便是这样发生的。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想不到你也看出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叙不可。其实名称实际的开明专制不是容易的事，我现在最可恶闭起眼睛说大话的人；罗素对中国人临别赠言，开口便说中国人欠诚实，真是一针见血的逆耳忠言！关于欧洲近状，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

独秀 一九二一，七，一。

张崧年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前略）^②新近伦敦有一个劳动出版公司，所出有一种通俗

^① 张崧年，字申府，北京大学教员，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中国旅法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

的小丛书，其中有一本名共产主义，听说很好，是保罗夫妇（Eden & Cedan paul，这两人很不错，很著作翻译了些书，都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所作。

（中略）③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是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其实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点迷信，什么事也作不成。人不可以“太”明白了。吾又感着人非到被社会逼得走投无路非反攻不可的时候，也作不出什么事业来。法国的共产党是由旧有的社会党变成的。去年十二月法国社会党在都尔会议，提议加入第三世界工人会即国际共产党（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经大多数通过（共有十二万人）。于是此党名称虽仍叫“社会党，”（但注为S.F.I.O.即共产主义的世界工人会法兰西部，）实际上已成共产党了。不赞成的右中两派少数人（共五万）出党，另组一社会党，称为劳动世界工人会法兰西部（S.F.I.O.），自以为社会党正宗，彼此攻击甚烈。法国共产党因袭旧来的底子，党费甚富，机关报日刊有五种（均直标名为共产党报，其中以L' Humanite最著名，销行最广），月刊周刊有四十余种。但虽如此，势力仍远敌不过国民总会（Bloc National即政府党）。惟与英国共产党（此党之基本原叫不列颠社会党）比，要算好多了。英国共产党新近因译刊共产世界工人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的案文，被政府搜查一空，捕去两个重要党员。在法国的出版物便自由多了。英党正式的机关报，只有一个周刊，从五月起加了一个月刊（The Communist Review）。此外英文共产主义的杂志有The Worker's Drandnought（周刊，Miss Pankhurst所主持）及The Plebs（月刊Plebs League

的机关报，主张独立的劳动教育的）等算最好的。法党最重要的人物为M. Cachin及Frossard。法党最引重的有三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即Anatole France（安那佛郎西），Henri Barbuse（巴比斯），Severine（塞威利娜女士）。佛郎西七十多岁了（生于一八四四），称世界生存的最大的文学家而加入此党。巴比斯唱光明（Clarte）运动，很有势力。他的光明团与其机关报“光明”（周刊一张）都是信共产主义的。英党最重要的人物为Mo Manus（马克马那），有人说他为英国唯一的信流血革命的。

（中略）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讷pierre Janet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之“心解”相近而不同，吾所以想研究心理学，一方因其对于哲学的关系；一方也因其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须。现在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是精神病患者，人心不改造，社会自无希望。法国图书馆里英文书少的利害。世界第一的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里，英文新书简直不备，新杂志亦寥若晨星。法国图书馆很像中国旧日的藏书楼，陈腐得很；别的机关现在用女子很多，图书馆则无，多用些很疲倦样子的老头子。

（中略）

巴黎没有别的好处，只有一个美。美之表现为雕刻绘画与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博物院，大学，全灵堂等；若寻常的楼房只有与人卫生不宜，更说不到美）。吾到法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中国如能整顿好了，是同美国一样可以无须仰给于外的。吾现在最简单的所信是：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

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世界全个不好，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尤以旧有的工业为要。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有应了的希望。

（中略）

现代西洋哲学家最懂得科学方法最能用他的，要数罗素第一，杜威也知重之，便差远了。柏格森口口声声说他哲学怎样与科学有关，其实纯是欺人之谈，现在人已渐渐晓得了。（新近 *New Republic* 周刊有一篇文说此，很好。）柏格森现在法国是后古派的健将，他又对于天主教要人说他的学说与天主教义相近，此很像倭铿（Eucken）是宗教思想的大代表。他两个同是西洋近代思想界的反动派，（柏格森哲学可说是孔德以前的哲学，与法人重理性的心习是不相合的。）中国再不可找这两个人去讲演，以中国人好空悬笼统的脑筋，岂可再经他们直觉不要解析的虚无飘渺的古老方法之薰染？（后略）④

张崧年寄于巴黎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②③④ 比处的“前略”、“中略”、“后略”均系《独秀文存》中原文所略。

陈独秀答朱谦之

谦之先生：

我见了你的来信，想不笑实在忍不住，若真笑出来也未免太刻薄了。

我请问你：主张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主张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为什么便算是人格破产？这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说理持论只应该指出是非真伪，为什么要顾忌到有没有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难道你是以有无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做真理之标准吗？你是相信虚无主义的人，又是出家归佛的人，为什么说出“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的话来？

独秀 一九二一，七，一。

朱谦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你主张要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吗？你要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特此预白。

朱谦之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皖事已有变化，我们在上海的同乡主张专力在教育上用功夫。首先注意的就是教育厅长问题，省城方面，已有可与接洽机会。教育部方面，我们当可建议。上海同乡都希望吾兄到皖担任此职。弟意吾兄下年倘决计不在北大，到安徽去办教育，也倒很好。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和他项官吏不同，但能做事，似不必避此形式。吾兄万一不能去，我们便想请任叔永兄担任。闻叔永兄已任教部秘书，出为厅长，较秘书更有权可以办事。吾兄倘以为然，便请你写信和他商量一下，得他同意，我们便可令京沪二处皖事改进会同人，分向京皖当局建议。望即赐复。

弟独秀 八月廿七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何谦生

何先生：

我在北京时就听得同善社^①有许多妖邪举动，后来更知道长

^① 同善社，一种迷信组织。信奉只要静坐不辍，并诚心念经拜佛，即可祛病延寿，甚而成仙。

江一带信奉邪说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是广东现在也不少了。主持其事的人无一不是有形无形的辫子朋友，信奉邪说的大都是政界军界极腐败不堪的分子，劳动界学生界信奉邪说的都极少或竟即于无。这种邪说较之灵学会野心更大，简直是白莲教义和拳底后身，且含有复辟作用，只有用刑法来裁制，那里够得上加以学理的批评。

独秀 一九二一，八，一。

何谦生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近来的同善社，几乎遍国皆是了。他本来是一个灵学会的化身；西洋人每谓中国难免不有第二批拳匪出现，未必不是指此而言。我近来翻阅全国的报章杂志，竟没有一篇攻击他的言论，真令人十分失望。昨在友人处谈及此事，友人告我道：“今年四月间，湘潭日报曾载有攻击同善社之文数篇。后来同善社中的人，和该县的县知事商量，借端将该报封禁，并将该报主笔拘押数日。”我便到处去找四月份的湘潭日报，仅仅寻得一篇，题名“辟同善社，”将同善社里种种捣鬼的情形，说得十分详确，今剪下寄上。（但是同善社中还有些甚么扶乩，飞鸾的功课，该文中还没有论及。）我希望先生，拿出推倒上海灵学会时的精神，做几篇得力的文章，使这班妖人不敢再行鼓吹邪说，那才是中国国民的大幸咧！

何谦生 一九二一，七，廿五。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蔡和森

蔡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

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 秀 一九二一、八、一。

蔡和森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ivol, 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

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

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购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购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

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我命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杰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由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

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

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

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

(一) 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谗然不能终日。(二) 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 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

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

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Evolutionet revolution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

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一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逢尼

（选自《独秀文存》卷三）

陈独秀答区声白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左：

(1) 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由自在哪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

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的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独自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仗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 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

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

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 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于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

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独 秀

区声白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先生前天在法政学校讲演，对于无政府主义批评，弟有很多怀疑的地方，兹特列举出来望先生指教。

1. ……先就经济而言：现在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据我所知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若照先生说“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就是以少数压服多数，无政府党人是绝对不敢赞成的。但是先生所批评的，不知是那一种无政府主义？如果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极端反对的，我很希望先生声明一句。

2. ……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

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像，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下过一度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尤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的灾难，各地方的民居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我很愿意先生把无政府主义各派别分清一下，再下批评。总之无政府党人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化的，即如巴枯宁之主张由未善而至于较善，克泡鲁特金之主张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于较为自由。若是先生所说的“绝对的自由”，不知是那一个无政府党人之所主张，还望指教。

3. ……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但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象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

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如果无论善人恶人都不能去干涉他，那么，无政府党人之暗杀官僚，推翻资本家，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所批评的想必又是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主张反对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敢赞同的。至于先生恐怕法律废止之后，如有发癫的人就怎么办，这是容易的事，把他送到癫狂院医治便得了，因为发癫是由于生理上的关系，没有甚么罪过，若果疾病都要受法律制裁，虽民主主义的国家亦没有这种的法律。至于强汉之杀人放火，我们准可以善言劝导他，并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使他悔悟。假使先生问这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怎能够处置他呢？人类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便连饭不会吃的。我举一个例，比方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有少数不良分子，想破坏大学，后来经共同的意见，把他拘禁起来，这是不是法律。总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一种公意，凡事皆由公众会议解决，公意是

因事实之不同，而可隨時變更的，不象法律有銅板鐵鑄的，由幾個人訂定不管他人如何一定要他人遵守的。且訂法律的時候也沒有得遵守法律之人的同意，這是不對的。由此可以證明無政府之不難實現，若果依照自由自立自主的原則向前進行，沿途都是康莊大道，除了盲目的人外，斷不致撞得頭破額裂的。

聲白

陳独秀再答區聲白

聲白先生：

前天在《群報》上看見你的答复，現在再略陳鄙意如左：

1. 先生不贊成個人絕對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見解比別的無政府黨好得多（我在廣州《晨報》上見過幾篇文章，一面說他們是共產的無政府主義不是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個人無政府主義他們曾反對過；一面却口口聲聲說：“我們主張極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們既贊成安那其，而要求絕對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張對於這種個人主義的頑固派之辦法，我却有點懷疑：一、你說施以善良教育，達到無政府共產實現的時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請問照你的說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無政府主義是不能實現的了，那末，在私產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這才真叫做走途無路了；二、你說假使遇了這種人，我們准可用誠懇的態度把正當的理由告訴他。我請問照這樣告訴他，他仍然固執，那便怎麼樣呢？即以你對嶺南學生而論，你總用過誠懇的態度把正當的理由告訴他們，效果如何呢？先生說：“便

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屏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的大敌。“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屏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底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使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认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立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2. 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3. 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4. 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问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

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情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5. 法律底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直是自欺欺人！

6. 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

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7. 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借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北京无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底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東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8. 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柔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独 秀

区声白答陈独秀

独秀先生：

1. 来书云：“有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我前次不是向先生说过吗？“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人之自由，乃众人以人视之以人待之，故自由非独处乃连合。自由者乃人权也，人将来不维持以强力，而维持协约。”我们借社会方能生存，个人为社会之分子，故欲来个人之自由，当先求社会之自由。来书既云“因公共利益的关系”，便是社会的自由。又云“因为他们自己……之关系”，便是个人的自由。我们自然赞成社会的自由，而反对妨碍公共利益之个人的自由，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主张拆屋的多数居民可因他们的需要而互助他，如因交通上之关系，附近热诚之居民，如不与交通上有重大之关系，可自行迁移而让与之，至于职业上之关系，则共产之

世，人人共工作，相同的工作，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一条街上才能够工作，迁移了后便不能工作吗？至于特别嗜好不知指什么。建筑好么？同一的建筑一定很多；空气足么？那一处没有相同的空气。如此仍不迁移，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所屏斥亦奚足惜。有人难我说：“你们主张自由，这岂不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吗”？不知这种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大敌。资本家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工人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官吏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人民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总之无政府之世，众人协约而为群，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自由契约是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与几个人订定强他人遵守之法律不同）共同工作互相协助。出之于感情，其中之人，亦恐为众人所不谅，或众人之干涉，即设有不肖，断不敢犯众怒！若有不践行信约的，可为众人所屏斥，总之无政府党人既然能推翻政府和资本制度，那么，迁移的小事，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何必过虑呢？

2. 来书云：“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

我们如何能够合起来做事，合起来做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既然有了共同的目的，便可共同订定一种契约，如果违反了契约的，当然要退出。比方我们欲组织一个大工厂，我们就找一班人来，彼此相约说“我们每天作工四小时，如果赞成的，就请加入，以后如有不践行信约的应受众人所屏斥，”他们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且这种契约是共同订定

的、愿意的、自由的，不是强迫的，那么，先生所忧虑纷扰的现象，断不发生的。一团体各人之联络是这样，一社会各团之联络也是这样，更何纷扰之足云。

3. 来书云：“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以上所讲这一段说话我十分赞成，但是不免有点误会。我所讲的自由，是指推翻了现存的制度而说，不是处于现存之制度就能够实现自由。处于各种恶制度之下，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所以欲得自由，就要推翻现存的制度。至于“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这种消极的手段，断不能有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我也不赞成的。所以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多置身于工团派的运动，且用革命的手段，以扑灭现存的制度，实现无政府主义，断不是想个人逃出社会，以实现无政府主义，先生请勿误会。

4. 来书云：“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我确是反对个人的及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不反对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然先生竟说我把无政府主义打的粉碎，于理论

上实在讲不去。北方袁世凯是人，我反对袁世凯，然不是反对人，先生竟因我反对袁世凯，便说我反对人，我是不能承认的。先生既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没有强力一定要先生相信，先生亦没有强力使我不信。但是如果做事不必人人同意，那么，陈独秀可以和王敬轩合起来办杂志，康有为可以和孙中山合起来组织政府，真是妙极。既然意见不同，还不许人自由退出，你想他人服从你，他人也想你服从他，相争不下，必至于杀戮，这种悲惨之现象，吾实不忍言，不堪言。至于先生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我也不能不怀疑，因为先生在女子师范演讲（演说辞见正月廿四日《群报》），先生说：“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又说：“正当的人生，就是我不压人，亦不受人所压”。这几句话真可为无政府党人的格言。我请问先生物质上的生活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为什么“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便不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又有没有冲突？

自由之与联合绝对的没有冲突，我前函已经证明了，但是先生还没有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今再为之说明。克鲁泡特金在《面包略取》第十一章自由契约说：“吾人自由团结，做共同的事业，其结果很是庄严。比方欧洲十七万五千里铁路，纵横如网，四通八达，自马得利地，到彼得堡，自加立师到君士坦丁，不停留，也不换车；更便宜的，是旅客如有携带的零碎东西，仅用一方纸片，写明去处，投于车站，再不费什么手续，就可给你带到

目的地了。建设铁路的方法，就是依自由契约，互相讨论，使各路线彼此联络，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没有政府的监督，和与什么道路大臣、独裁官、大陆会议、调理委员会，都不相干的，万事全由诸小社会的契约，就成功了。”克鲁泡特金又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他的根据和原理》说：“十九世纪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状态，帮助这同样的无政府趋势，他就是自发的力量，逐渐广大，大的组织，一天一天发达，结果便全用自由的契约。欧洲蛛网一般的铁道，始初是由各处自己建筑，后来才联络一气，运载搭客和商品，直接经过许多路线，却未尝有一个欧洲铁路的中央部去管理他。这是那些以契约而做出来的最动人的实例。如果五十年前，有人敢预说那怎么多的分立公司所筑的铁道，最后能措成一个完全的网形，如今日一样，他必定被别人目为呆子了”。这是自由联合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的铁证。既然有了一种自由契约，那么如果两方合意，便可联合。联合一年也可两年也可，何得云东挪西变，一堆散沙，如果他违反了自己承认的契约，便失信于社会，不用你去惩罚他，他自己也站不住。就现在而论，凡经营商业的人，全靠契约来维持，很少有敢胆破约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东西是“信权”不是“法权”，中国的孔老二也知到“民无信不立”，这是一个例呵！然且自由乃相对待的名称，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必要以一己之自由尊重他人之自由，方得谓之自由。所以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个人与个人结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团体与团体相联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社会的自由，所以孤立便不能自由。以上反复申论，自由与联合不特没有冲突，我可简直说：“惟联合才能自由，惟自由方能联合”，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5. 来书云：“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

总上几句说话，先生都以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断难得人人同意，这也是我所承认的，但虽然不同意，有一部分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思以就他人，不用武力，也不用法律，这是自由的同意。我见五四运动的时候，各干事都是自由认定的，如果不干又没有用法律惩治他的，这是我亲眼的事实。至于学生联合，确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就不能联合，所以去年广东就有两个学生会。

6. 来书云：“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凡是只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或是只顾一己之自由而侵犯他人之自由，都是叫做个人主义。凡是主张个人主义的是个人主义者，并不是指一个人而言，无论他是少数人或是多数人或是一个人，都不赞成。如资本家掠夺工人之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如官吏掠夺人民之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这都是个人主义。我们之反抗他，并不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因为他们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自由的魔敌；我们之铲除他就是为自由之保障。至到无政府共产之世，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没有，虽有亦是很少很少，我们准可用善言劝导他，说明个人主义不能生存的道理，如果仍不觉悟，我们就可对他说：“朋友，我们和你作的事，然而你常不尽责任，且常侵犯他人的自由，我们和你共事的人因此不能不和你分开，去罢，去找寻那不管你偷闲及受得你气的人去罢。”先生一定问

我，如果他不肯去就怎么办？因为人人都有廉耻的，断没有受人驱逐还不去的道理。

7. 来书云：“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

我确是主张干涉恶人，恶人不过是侵犯他人自由之人，我们之所以干涉他，完全是正当之防卫，断不能说是干涉他人之自由，但是先生竟因我主张干涉恶人，而说我不主张废除法律未免近于武断。法律不过是一部分之人要来压制他部分人之一方法，未必能够干涉恶人，有时反侵害善人，是不公道的，不平等的，所以无政府党人主张废除法律而代之以自由契约，必要共同合意才订立的。因为将来之社会团体，如蛛网之密布，各团体均有一种自由契约，由各会员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不象法律是一部分人订立要他部分人去遵守的。法律禁止奸淫，而执政立法者可以宿娼纳妾，法律禁止抢掠，而官吏可以大扒特扒。陈独秀反对安福部要受法律制裁，吴佩孚反对安福部则可领大功；张勋反对共和而主张复辟，而可以逍遥法外，陈独秀主张共产，就要被逐出境；约法上大书特书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而政府可以随时干涉人民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照此看来，政府之法律，可谓一点的价值都没有，我们断不可再作法律万能的梦想罢。

8. 来书云：“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屠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

先生所举出的几个例，皆由宗教迷信迫之使然，科学进步，便可消灭，在近日已经很少见，何况是在科学昌明之无政府时代。因为无政府党人所提倡的是科学真理，所反对的是宗教迷信，所以无政府主义进一步，科学也进一步，到了实现的时候，盲目的群众心理，断没有出现的，而先生拿宗教迷信之群众心理比方科学昌明之群众心理，未免时代错误了。

声 白

陈独秀三答区声白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明告诉你一次。

1. 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美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俟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

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底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多许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底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是用人力从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倚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底指教。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

2. 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

愚的传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说话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呵！

3. 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底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底不同，更足证明法律底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底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底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底契约发生。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蔑视的。

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回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回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

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底性质，第二是他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的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之不同，代议制是你们不赞成的，那末，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末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童儿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底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个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

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的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他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他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底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底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们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底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在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底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4. 你说：现在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

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收没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若但是退出这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5. 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底限制及课各团体底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底冲突是由管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底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他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

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到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6. 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Stirner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象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Stirner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庞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Tolstoy^①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象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Tolstoy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现实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悌纳否认社会的组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底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

① 即托尔斯泰。——编者。

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底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梯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7. 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金特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他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那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末，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底好朋友！

8. 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

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珍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的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内，人人能为社会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他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9. 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名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数读者也都莫名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是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特泡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

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要严重的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是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底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己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由罢！

10. 广州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令广州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得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

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11. 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自由的）人送到远方底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12. 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各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象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末，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1）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2）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3）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13. 可以利用群众心里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

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里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或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里？（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真的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惆怅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他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正的。未经相当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完美的地方。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二点不得不附告读者：（一）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

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底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象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独 秀

（一九二一、八、一、）

（录自《新青年》9卷4号）

区声白再答陈独秀

独秀先生：

1. 来书云：“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投无路了。”

无政府共产实现是不是要等到善良教育普遍之后，我虽不能断定；但是在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份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但是施行善良教育，现在就要去做，这是教育家之责任，不必要等到私产政府倾覆之后，即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处在最腐败顽固北京政府的底下，都可以施行他的善良教育，不必要等到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班人通通做了大总统阁员后，才能够施行善良教育。假使他们做了大总统阁员，一班教育家的头脑还没有改变，也是没有用的。即如处于现在私产政府之下，就要去宣传社会主义，不必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去宣传社会主义。若果说处于私产政府之下，不能去宣传社会主义，一定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能够宣传社会主义，等到无政府共产实现后，方能够施行善良教育，这才真叫做走投无路了。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社会党，车载斗量，这都是人民宣传的力量，各国私产政府没有设立几千百个社会主义学校、无政府主义学校制造出来的，施以善良教育，也都是我们人民的责任，不必倚靠政府的。

2. 来书云：“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于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

人之所以固执，皆因没有知识，和不知合群的道理的缘故；如果与公众没有妨碍的，准可听他自由，但是如果与公众有妨碍的，就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对于教育上更要加倍的注重，不过三两个月他便不固执了。至于我对于岭南学生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总比用武力强迫他们信从我的主张效果大得多，因为我对于他们用一种诚恳的态度，他们对于我便有感情，既有感情，那么我所讲的说话，他们便可相信，若果我对于他们怒目相视，他们对于我必发生一种恶感，那么我无论讲什么他都不听了。

3. 来书云：“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

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扇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信约（或自由契约）和法律完全不同，断难混合为一。信约之英字为Contract，他的定义为：“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两人或多数人的合意）”，法律之英字为Law，他的定义为：“A rule of action, prescribed by the supreme power of a state（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定的行为规律）”。所以信约一定要经过守约的人之同意，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至于信约一定要经两方同意方能订立，断没有一方面可以订立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这就是法律，不是信约了。先生说我说法律是几个人订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我请问先生立法权是不是放在几个代议士之手中，抑或在于人民全体。先生既说“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更要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好过定一种全国死板板的法律，因为各地方的社会习惯常有相差很远，若强一地方以从他地方之习惯实为人生之最大苦事，如不遵从，就要受法律所制裁；且各地方的人民常因天时气候地理之关系心理也不一样，以心理不一样的人民，一定要遵守同一样的法律，你说有道理没有？至于先生说：“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我请问先生，满清的法律是谁人定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和日本是不是代议制度？代议制度是不是议员才有立法权？几个代议员能够

代表人民全体否？不知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先生反去崇拜讴歌我实在不敢附和。我更问先生中国和日本的治安警察法是不是政府几个人订定的，抑或人民全体定的，治安警察法有根据于社会的习惯和心理的基础上没有？可知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保护政府治安罢了，什么保护人民都是欺人的说话。

4. 来书云：“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无政府的时代没有法律，维持社会的秩序全靠信约。如果有人一旦疯狂起来，破坏了他们自己所定的契约，若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们准可原谅他，但是如果是有意的，我们就可以宣布说某人破坏契约，以后大家请勿上他的当便得了。因谓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除了疯狂的——当可绝迹，纵有亦居极少数，断不能与大多数的人为敌的，万恶的资本制度都可推翻，少数之破坏分子，亦何难解决。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得了。先生又问社会如何退出？凡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叫做一个社会，不必要人类全体才可叫做社会；如果社会不能退出，我请问先生社会是不是一个地球抑或一个监狱？

5. 来书云：“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我看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第二十七条：本会（总联合会）以联合主义及自由底原则为根据，保障及尊重加入各团体底完全自治权（见《新青年》八卷四号）。与权力集中完全相反，

先生所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至工团派的组织为什么不适于革命，和为什么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先生没有说明理由，我不明白，还望指教。

6. 来书云：“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主张个人绝对的自由，不承认有所谓社会，更不承认有他人的意见；我既说人人同意，可见得不是以一人之意见，而侵犯他人之意见。又有社会可以自由退出，因为个人主义是不加入社会的，所以没有社会可退出，可见得我所主张的是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反之以一方面之意见，不许他人自由退出，如日本之不许朝鲜独立，只顾一己之权利，以侵犯他人之权利方算个人主义。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是任由他人压服都不抵抗的，我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所以就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请先生想一想何尝有矛盾，何尝把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打碎。

7. 来书云：“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先生原文确有“抵抗的”三字，一时忽略，很是抱叹。但是抵抗和压服完全不相同，抵抗是把被人夺去的权利取回来，压服是要把他人的权利据为己有，即如朝鲜现在为日本所征服，他们

一旦起革命脱离日本而独立，也不过是取回朝鲜的自治权，何尝有压服日本的意思。又如一个盗贼把我的东西夺去，我只要夺回自己的东西，岂有把贼所有的东西都要夺为己有的道理。一方面反对人做贼，一方面自己又想去做贼，这种以暴易暴的办法，实在不敢附和。

8. 来书云：“为一群或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又云“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

不知先生说“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先生之所谓“人”是全称的，不是特称的，断没有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才算是人，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便不算是人，凡是二人以上之集合都可叫做一群，如果除了一群之外便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怎能够说“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可见得先生之所谓“人”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并不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我请问先生：“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有没有冲突？至于在一团之内因意见之不同，有时我牺牲意见来就你，有时你牺牲意见来就我，这都是很平等的；如果讲到压服，只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管他部分人的意见怎么样的了。比方一学校之内，校长发表强迫学生遵守的命令，这可算是压服，如果学生自治会的决议案，学生大家去遵守，这种便不能叫做压服；因为讨论的时候，各各人都可参加在内，没有指定那一个应该服从那一个，所以牺牲一己的意见以就他人也是很公道的，因为今日我可以牺牲意见来就你，他日你也可以牺牲意见来就我，没有压服与不压服。至于校长的命令便不同了，因为他只

有一己的意见，没有经过学生讨论过，且学生一定要服从他的意见，他可以不服从学生的意见，这方算是压服。至于对特少数顽固派的办法，我上文已经说过了，若社会上还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断不能成功，所以社会革命以后，只有少数的顽固派，断没有多数的顽固派。

9. 来书云：“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克鲁泡特金所引出各种的联合都是以自由契约而联合的，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比方我说“把东西放在口内吞落肚下去，”我虽不说明“吃”字，人人都知到是吃了。先生既承认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我不过证明自由联合之可能，并没有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至于处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不满意于其主人，都可以解辞职务，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各团体之分子反不能自由退出，先生想必以为现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罪恶未深吗？

10. 来书云：“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

先生既多谢我把两个学生会不能联合底例举出，但是有一件事先生还要多谢我的，就是这两个学生会没有经过武力，现在因得两方的同意，又自由联合起来了（见三月四日《群报》）。可

见得大团体大联合一定要同意及自由才能够成功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意见，怎能够联合呢？若不是自由的联合，如日本之并吞朝鲜，英国之灭亡印度，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这是好的现象吗？那么，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先生以为如何？

11. 来书云“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我又请问比方先生在北京提倡新文学的时候，被恶气所压迫，为什么先生又肯去呢？姑退一步讲，只是先生才能够有廉耻心，在别人一定坚不肯去，我们就用几个人抬他出去，谁人抬呢？阿保、阿胜、阿茂、阿寿。抬到什么地方？就是抬到出于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便得了，如果他再来，就给他一个闭门羹。

12. 来书云：“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

个人与个人间既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小团体，团体与团体间也是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更大的团体，无关系之各团体及个人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就可找第三者之团体出来就理排解，如有恃强欺弱的，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象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便得了。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如果自由就不能联合，为什么英、法、日都能够联合呢？可见联合是不必要武力的，只求两方的契约便得了。

13. 来书云：“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公

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先生所说的一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二人可利用群众，大的科学家就不能利用群众？反要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未免自相矛盾了。总之：我主张固定的事，就用一种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就由公众的意见来解决。法律是死板板的，不能更改的，如果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这就成为一种公意，不是法律了。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定法律的人怎能够有预想的天才，知到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又不能不借公众的意见来解决了，此又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完善的地方。

声 白

一九二二年

陈独秀致周启明沈兼士等^①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象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谈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据手札）

^① 周作人（启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裕藻）当时皆为北京大学教授。

周作人答陈独秀

仲甫先生：

我们宣言的正当，得先生来书而益证实，因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且我们宣言也原是“私人的言论”，当然没有特别不准发表之理，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

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而竟证实了：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我们以少数之少数而想反抗大多数，一定要被压迫而失败，原是预先知道的，因为世上是强者的世界，而多数实是强者，我们少数的当然是弱者，所以应当失败。先生的“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一句话，倒还应该是我们对先生及其他谩骂我们的诸位说的。（下略）

周作人

四月六日

（录自《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陈独秀致周作人

启明先生：

接来示，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以外，真令人觉得奇异了。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象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们现在果主张基督教、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思想都有不许人反对之自由吗？若是反对他，都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吗？都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吗？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呢？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原来合乎真理与否，很难拿强弱少数为标准，即以此为标准，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这篇帐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因此我现在仍然要劝告先生们——我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四月二十一日

（录自《民国日报·觉悟》

1922年4月23日）

张崧年致陈独秀

仲甫先生：

新青年三号昨早已收。以后愿多寄一二册。

昨天巴黎报已载日本原敬打死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唉！制度迫得吾们对于人死乐，只这一点也非革命不可！

俄共产党机关报Pravda，此间偶一见之。Pravda就是“实话”的意思。一个亡命法国的俄国小中产阶级的人说，“许多报都谦虚着取了“实话”Pravda之名：莫斯科“实话”，彼得格勒“实话”，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波尔什维克们的创造能力不足改变他们日报的名称。”（N.A.Landau-Aldauov, Deuo Revolvtion, P.113.）呜呼！原来在实话以外，造花样的人是有充分的创造能力的！

近来读了些列宁，特洛斯基自家的著作，益感动。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扫清压制者，被压者之先锋组织为治者阶级。”

又说，“养成些有经验有影响的党领袖是一件很烦难的事，但无此，无产阶级专政与“其意志之一致”只是定‘空’话。”

特洛斯基说“吾们记取，当社会革命时期，有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不能施用，与当帝国主义的战争时期，国际法不能施用同。”

又说“马克思之真实教义只是行，进攻，革命精力之发展，

把阶级的打击引到他逻辑的结论——这些之理论的公式。”并不

特洛斯基文才甚美。他现在的名著是特洛斯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 et Communisme)，新出英译，表面被出版者改题为“The Defence of Terrorism”，译文较法译为好。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高学理的价值。法译今年才出，较英译(一九一九出)为好。他去年又作了一本书，法译名“共产主义之孩子病”(La Maladie infantile du Communisme) 英译名“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Left Wing Communism, A youthful Disorder)，在战略上很重要。

一方须以剑锋与人战，一方又须以笔锋战，真难为他们。

伦敦劳动出版公司(上次说过的)七月中新出的“劳动月刊”(The Labour Monthly)为最要看的杂志。最近诸方面的消息多可从此得着。已很登了些重要文章(如列宁特洛斯基的近作)。有很公道的批评。这个杂志是伦敦“劳动研究部”里一部分人等所组织。“劳动研究部”设于一九一二年。本名“费边研究部”。是一个联合团体，由八百四十九个劳动团体组成。专研究关系劳动的问题，供给教知，发行书册。由这个杂志可见英伦主张社会改造者已渐趋于左。行会社会主义者许多已归依共产主义。好像寇尔Cole近在一个日本杂志上也这样说过。吾现在对于日本消息茫然，想在新青年上时常载些。日本，无论如何，是与我们很有关系的。

现在资本阶级的举动最可注意的，当然是华盛顿会议。“劳动月刊”说，今年可叫会议之年。共产主义者的会议(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党第三次会议与“赤工联国际会”成立会议)去，资本主义者的会议来。华盛顿会议出生于日美之争，而中国为其处置物。罢兵，罢兵，纯粹是欺人之谈。英国对于日美，是两个都舍

不得。劳动月刊如此说。又说，就令他们分中国这个脏分得暂时可以合洽，终究还是破裂。资本帝国主义者性质，本来如此。

现在最可伤的是俄国的饥馑，有两三千万人待毙：两月以前，英美政府，救助救助，嚷了个不得了，鲁意乔治最痛切，（法政府简直在无救的意思）但是后来左考查，右研究，直到现在，一粒未出，而坎拿大，美国，阿尔然丁（南美）各处收成好的，多的米麦榜子糟蹋了！大西洋的船都没有主顾空停着！吾们对于这种情形，还有别的办法？！

适之现在上海么？“干！干！干！”现在怎么干法？文法研究，颇有趣味。他素喜提唱归纳法，自己也喜用归纳法。但却要大大注意一件事，便是hasty Genrvalization（忙通）。忽了忙通，笑话百出。又科学上的则律，很重Nder Certain Condition（在某种情形下或某种条件下）一个仿语，忽了这个，也可成大错。此即是重因，还要重缘。（缘即（Condition）适之第二举例所得大通则，就欠说了一句关于缘的话。“开明专制”，不宜过说。正式的提唱总还是“劳农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虽是吾们所谓“开明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同一意思，但可惭，狙公之术还不能不用。不然，徒惹反感，无利实际。诚然，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群众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事实不可不如此，无愤如何。列宁自己也如此说：（前引语）见儒为从来无比的诚实人，这也可算理由之一。（Lenine, Cest le gars le plus hounete Ilnapa encore eu son pav eil sur la terre“列宁实是唯一的最诚实的小伙。在地球上他还未有过对儿”。（瑙威士人语，见高尔基的“列宁论”Gorki, Vladincir Jliitch Lenine, p.16.）“开明

专制”近于吾们一时的话，深想起来，意思实极含糊。吾们说实话，又要说的极明了。一个名词不加解释，总是可以使人误会的，也无取更论。吾们的中心意思，何尝有一点不为大家？自然，说大家，自己也在其中；人如不为自己，什么事也可不作；而且必是先为自己。吾们如不是利己主义者只在吾们主张的结果可以普及大家。吾们现在只是想以吾们侥幸得的一点的觉觉未得机会觉的伴侣，使吾们，吾们自己与别人，都得更能圆满觉的境遇。所以吾们极端注重教育。（注重教育也是吾们所谓专制与人不同之点）。但为办合于吾们因实地感受而相信的主义的教育，必不能不革命。因此吾们主张革命必须先于教育。罗素以前很反对这个话，现在也服了。新近曾同一个人说：“吾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都感着非有此事一革命一不可。无此一事，吾们都无活路。不是吾们无活路，凡好人都无活路。不是凡好人无活路，凡应当有活路的人都无活路”。最应当有活路的人就是劳农。劳农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他们，别人都不能活。但是现在怎样？别人都活的过份了，劳农自己却迫得绝了路！

张榕年

（录自《新青年》9卷6号）

陈独秀答黄凌霜

凌霜兄①：

精研笃信安那其②，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

① 黄凌霜，名天俊，字凌霜，广东天台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校时曾与区声白组织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

② 安那其（anarchism），英文译音，即无政府主义。

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专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

独 秀

一九二二.七.一.

黄凌霜致陈独秀

仲甫先生如晤：

申江别后，忽已易序，抵俄后，以邮便不通，遂鲜音候，南

望天末，我劳何如？在俄经过情形，想先归诸人早已奉知，不必再叙；但其中委曲非见面不能详白。生等于十三日离满洲里，翌晨即安抵哈尔滨；是晚趁车南下，顺道往北京一行，逗留数天，即返沪上，重领教益。生此次去国，对于政治经济方面之观察，略有管见，将来拟提为论之，贡献诸国人。生未去国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书不尽意，奉此致候。

凌霜草于京奉车上十六日

（录自《新青年》8卷6号）

陈独秀致张东荪^①

东荪先生：

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先生前文是否主张资本主义的发达实业，姑且不论，惟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

^① 张东荪（1895—？）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时为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崇尚唯心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不知先生对此方法有所怀疑否？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弟亦以为必经过这个时代，但无很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久必生他种变化，先生以为如何？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吾辈反对联省并非主张废省。尊论谓“特所谓省者必非今日之省”，诚是诚是，苏、皖二省就是一个好例，何以主张联省者未议及此？老实说他们完全是苟且的心理，承认现状而已，乌乎可。算是武人狠，我们无法推翻他，让他们自去做皇帝，我们何苦要上劝进表！

独 秀

（一九二二.九.十七.）

（录自《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9月17日）

陈独秀致蒋梦麟^①、胡适

梦麟
适之兄：

国立江苏自治学院，为张君劢所主持，此院名称不见于新学

^① 蒋梦麟，字兆贤，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总务长、教务长、代理校长，1929年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解放后去美国。

制，且北京教育费奇窘，焉有余勇本年即以七万九千二百元举此？究竟内容如何，京学界对此有无抗议，均求详示。

弟仲甫白

十二月十一日

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又白。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一九二三年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此间局面尚称巩固，决不似京、沪各报所传之恶。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特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努力》出版，望每期赐寄一份为叩。

弟实庵白

四月七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答邓汉琼

汉琼先生：

贼滑的黎元洪，固然令人恨，也实可令人笑，你说他是狃与

曹吴并称，却是过于高抬他了。“擒贼先擒王”，此时实际上“扰乱”中国的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之王是曹吴不是黎元洪，黎是曹吴的傀儡，放过使傀儡的人而专责傀儡，这是北京上海一班为曹捧场的政客暗渡陈仓之妙计，章太炎所谓“伪作正言，阴为曹吴谋者”，正指此辈，幸你勿为他们这种伪作正言所误。

独 秀

(一九二三.五.九.)

邓汉琼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是不错的，“民主革命的企图，必不容北洋军阀有存在之余地，有了北洋派，便没有民国，此种顺逆是非之大义，炳若列星”。现在我有一感想，应着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而生的，是“西南寒电与驻沪代表”。寒电说：“窥其（直系）用意，非吞龇西南摧残民治不止，是则和平统一，只为片面之要求；强敌在前，果非文辞所能御”。又“兵为防守，不为争权；虽折冲疆场，为义兴师，终不背和平之旨。”明明白白是对北洋派最后的通牒了。

可是，要知曹吴是狼，黎元洪是狈，前者食人饮血的兽欲已是达至百度以上，真配称“狼之王”了，后者谁敢认他不是狈呢？实在，若黎氏没有曹吴的武力凭借，同时若曹吴没有黎氏的伪衔凭借，双方未必猖獗至于此极。

说黎为军阀傀儡，太纵容他了。为着谄媚袁氏，他知道仇杀

民党，为怕身以国殉，他知道解散国会，他何尝是傀儡？我见阴险残滑之小人，从未有如黎氏之甚者！

寒电和曹吴宣战了，怎样对黎？“讨贼”这个名词，恐怕要“勉为其难”哩。因此，驻沪的四代表，我以为实无存在之余地了。

邓汉琼十二.四.二九.于南堤美华学院

（录自《向导》周报第24期）

陈独秀答李子芬

子芬先生：

来函所谓“空想的文哲派，他们都是直接间接的御用学者，引导国民回避革命心理主要犯”，这句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当头棒喝，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先生所主张的乡村共产主义运动，鄙见以为未免浪漫一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共产主义的运动如何能在自耕农居多的中国乡村成功群众的运动，此时乡村里只宜于国民运动，而且国民运动是中国目前所急紧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先生以如何？

独 秀

（一九二三.八.一.）

李子芬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中国无产阶级的福音——向导周报出走后，我的心弦起了相应的振动数而共鸣了，黑暗旅行中胆子更壮了！你们所指导的方向，是万分正确而割切的，在这样感觉迟钝智能萎缩的民众当中你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筚路蓝里（缕）的工作，这真是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啊！先生，由现实产业制度反映出来的生活状况之不可安，实在逼迫我们只能在革命和自杀两条歧路上选定前途，遍国中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先生这个名称定得很适当）实在太多了；近代资本工业经济潮流的慢性传染，给与下级社会的苦痛太难堪受了！社会制度明言或暗示：只有欺诈刻薄，苟合，容忍诸美德，是现代正式生活之道，在这些情形下的弱者心理，由旧伦理和宿命观训练成的奴隶根性，铁也似的坚，而阶级意识极端难得侵入；同时有产阶级的联合势力或抽象刑具，又不断的对于我们加以威迫和利诱；虽然于苦痛经验中，我们也会觉得：这样的遭遇，是一个站在群众利益基础上而与反动势力决战的革命家，所应有的，不可逃避的自然运命，但亦使我们认识清楚了：在此种环境摧残下，真能具足必死的精神而为主义奋斗的志士，是何等的少！

中国共产党此时横在面前的紧要使命和工作，我以为有两大要点：（1）大规模的思想界消毒运动，（消毒的对象，就是：黄色的社会主义者，美国式的社会改良家，空想的文哲派，他们都

是直接间接的御用学者，引导国民回避革命心理的主要犯），

（2）大规模乡村共产主义运动，地方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农村组合运动共产主义的知识传播等等。现在社会运动的最大弱点，就是都市式的色彩太浓——国民党的病也在这里——地方人材太少，有知识者没有信民间去的决心，我们运动的范围不大，半由如此）。（下略）^①

李子芬于湖北黄梅县

（原载《向导》周报第34期）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到京想必诸事都好。

商务三百元蔡君^②已收到，囑为道谢，余款彼仍急于使用，书稿请君早日结束，使商务将款付清，款仍交雁冰转蔡可也。

弟仲甫白

十二月六号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 《向导》周报原文如此。

^② 指蔡和森。

一九二四年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前函言张申府事，据守常^①说，恐大学以道德问题不使用他。近有人荐之于此间某大学，亦因同样的原因而被排斥。呜乎，旧道德尚有如此威权！闻此间商务印书馆主任某君出缺，兄能否荐申府继任，请示知。

又蔡和森书稿事，也请从速解决，因旧年迫近，蔡君需钱至急也。

弟仲甫白

〔一月〕十八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昨函言为申府谋商务图书馆主任事，谅已达。前主任已病

^① 守常，李大钊。

故，该馆正物色人，倘兄可荐申府，望即以快信达王岫庐君。
蔡稿亦请速解决。

弟仲甫白

〔一月〕二十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

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

弟仲甫白

〔一月〕廿七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尊意已由孟邹兄转知。弟朝朝所遇烦恼之事，未必减少于兄，乃以“顽钝不理”四字克服此环境，故尚少心绪不宁的现象，

不知吾兄亦以弟话为然否？

蔡稿求兄早日解决，因其需款至急，弟曾为贷款二百元，若稿款久不来，弟亦陷此困难涡中也。

《努力月刊》不知何日出版，望示知。弟须答复张君劭一文，若《努力》出版尚无期，拟载之三号《新青年》也。

弟仲甫白

二月十五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办一下。至托至托。

弟仲甫白

二月二十九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兄：

特启者：《中国青年》将出特号反对太戈尔，他们很想吾兄

为《中国青年》此特号做一篇短文，特托我转达于你。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寄弟处。兄倘能做文，望于本月十五左右发出，二十日以前寄到上海。

弟 仲甫白

四月九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一九二五年

陈独秀致章行严^①

行严先生：

顷见上海报载：北京司法部训令京外各机关，凡查获宣传共产党员，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如有政党为护符者，亦一律依法办理，仰即严秘检查等语。

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这道训令词中有三点最不可解：第一，共产党本是代表工人阶级及贫农利益的政党，何以说他以政党为护符？第二，法律只能制裁刑律条文上的犯罪行为，岂有一宣传某种学说某派党义即构成罪名之理？第三，司法部并非立法机关，何能以一纸部令决定宣传共产党为内乱罪？

这道训令若出自军事机关或腐败官僚之手，我们毫不以为怪，乃出自应该尊重法律的司法部，并且是精通法理富有世界知识的行严先生所长的司法部，这便要令人骇怪了！

^① 章行严，即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早年任《苏报》主编，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为《民主报》编辑，参与二次革命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办《甲寅》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部长等职，有《长沙章氏丛稿》。

人们以为今日托足权门的章行严，已非昔日讲学论政的章行严，他已无违背军阀意旨之可能，我们和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但我仍不敢这样轻蔑行严先生，兹谨向先生有所陈述。

共产党本质，并非凶恶不法象三K党等秘密结社之类。其在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公开的政党，都有集会、出版、讲演及竞争选举之自由，先生都亲眼见过；先生若不过于轻鄙本国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至于农业国不应有政党之说，无论是非，先生在论坛上尽可有此主张，而未便利用官权禁止政党，更不能独禁共产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为天下人之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与其说中国共产党有内乱罪，不如说不依法律不由民意以武力夺政扰民窃号自娱实犯内乱罪之武人已遍中国。若说共产党所根本主张的政制和中华民国现行的政制不同，因此得比附到内乱罪，这种话若出于别人之口，已失刑法只以裁制行为之原则，况出于极力赞助段执政以“革命”行为破坏中华民国现行根本法（民国约法）的行严先生之口，更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若行严先生及其他权门宠儿，向人民板起成则为王的面孔，以为权力在手，即是法律与正义之化身，只许他以法律正义绳人，不许人以法律正义绳他，这种不可一世的逼人气焰，在袁世凯时代，在第一次安福执政时代，在曹党得意时代，行严先生都亲身领教过，现在宁肯蹈此覆辙？

上海《申报》北京电，更指司法部此项训令与反对善后会议

有针锋处，此电更有伤先生的名誉了！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生即欲依附权门，以私人名义为善后会议辩论已足，似不必滥用官权，以“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防止异己者之口。反对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乃天下之公言，非共产党人之私意，国民党已公然宣言反对善后会议且不论，即如先生同一政学系之好友李印泉，又如先生所兄事之太炎，都公然反对善后会议，并反对段祺瑞自称执政，先生亦将指印泉、太炎为共产党人，“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么？吾料段氏逆取不能顺守，武力专政之演进，势必日甚一日，天下健者不只一段氏，更不只一行严先生，先生竟能以“宣传共产党员”六字，诬尽天下人而杜塞其口么？先生竟想象军阀官僚的势力能够长治久安的统一中国么？中国在他们统一之下能够得着进行么？

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人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先生的答复登在京、沪任何报上我们都可以看见。

独 秀（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02期）

陈独秀致戴季陶^①

季陶先生：

^① 戴季陶，又名传贤（1890—1949）四川广汉人，国民党右派主要人物之一，主张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和单纯的国民党，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革命统一战线，被称为戴季陶主义。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选，……”“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

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

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

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

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抄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

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公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

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

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

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辨。

(一) 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斗争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 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改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 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

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纓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 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

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 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 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独秀（民国）十四年八月卅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29、130期）

胡适致陈独秀（稿）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

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
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
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
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
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
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
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
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
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
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
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
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
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
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
容身之地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①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一编者注。

一九二六年

陈独秀致蒋介石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国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

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

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

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党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音！），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

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诬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的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

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

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独 秀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57期）

陈独秀致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等

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示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

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的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侥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而且会愤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的普遍的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的（象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辩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的普遍的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

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样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语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

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它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义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

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

（录自《向导》周报171期）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

各级党部负责同志：

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我们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变质量”这一原理；我们更须懂得质量上的增加，大部分是靠在群众的实际活动中学习与训练，不是单靠书本上和党校中可以收效的。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并且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之增加，正是使党革命化，正是增加质量之一种方法，一种重要的方法。

尤其是北伐军和国民军所到的地方，一般民众的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然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

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照此数目加一倍）。我并且以为在事实上各地党员发展到左（下）列数目（新旧党员全数），或者不是空想：

地 域	党员数目	社会成分
江浙区	7,000	工人及智识者
粤区（两广）	10,000	农民及工人

湘 区	7,000	农民及工人
鄂 区	4,000	农民及工人
北方(直晋三特区)	3,000	工人农民及智识者
山 东	1,000	工人农民
河 南	1,000	农民工人
陕 甘 ^①	2,000	农民及智识者
四 川	2,500	农民及手工工人
江 西	2,000	农民及手工工人
安 徽	500	智识者及农民
福 建	500	农民及智识者
东三省	500	工人农民
云 贵	200	智识者及农民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湖南矿工各省路工外，别处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建议，希望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都能够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淡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

请接受革命的敬礼！

独 秀

十月十七日

(录自《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① 《中学校刊》第十五期所载此信此处为“陕西”。

一九二七年

陈独秀答符琇

符琇先生：

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你以为军事行动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吗？如果你这样想，便是你的终身疑问，恕不能再为解答了。

独秀（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符琇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你在向导某期所教一切，感谢之至！但我不澈底明了，还有点疑问，再烦来函指教。

革命若要成功，凡是有客观眼光的同志，谁都承认非革命基础——农工……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利益奋斗不可。不过

在前两月时，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南有香港帝国主义，东有闽之周荫人，西有久谋得机取粤之唐继尧，北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及其部下一切小走狗，尤其是叶开鑫节节南下，迫近广东。处在四面楚歌之国民政府实甚危险！若不出师北伐自卫，等待全国革命基础——农工……组织完善，起来，恐他人南伐于国民政府之围墙下矣！所以我对于先生所说：“……这一种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总不免有点疑问。 此祝

努力！

符琇鞠躬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91期）

陈独秀答王纯礼

纯礼先生：

一个革命党要承认事实，创造事实，不可掩蔽事实，事实是不肯被人掩蔽的。你只须细细考察：现在是“以党治军”，还是“以军治党”？现在是“力助工人农民”，还是“力助商人压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团摧残农民”？你亲身在广东，应该看得清楚这些事实。你如果是一个革命分子，便应努力去掉这些反革命的事实，不应掩蔽这些事实。讳疾忌医，那才真是“有碍革命”哩！

独秀（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王纯礼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是敬仰你的人中一个，对于你的一切言论，没不尊崇的。惟是对于你一百六十一期中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尤其是一百七十五期中“革命与武力”一文，虽认为是先生出于爱护革命的至诚，亦是一般民众与国民革命军应当领受的正当言论，而不是“快心之谈”，可是读了总是有点不高兴。现在不妨把我的意见写出来。

我们知道铁蹄下的民众现在正是无异“若大旱之望云霓”的盼望着革命军，想法去帮助革命军。在这时候，先生偏倡“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劣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革命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武力与民众合作？”之说，似乎把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意思，不是为求工农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原无异吴佩孚的北伐了。这样一来，岂不惑乱人心，减少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的信仰与帮助么？眼下革命军的行动，并没有“不能力助工人……”、“不能力助农民……”与依然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事实吧？先生何必要有这些言论，使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失了信仰与帮助？

其次如“真正革命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政

治经济状况中，革命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裁制”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主张‘以军治党’”等话，事虽如此，亦绝对应如此，可是弦外之音，使前方日夜与贼肉搏的将士们听了，如何的灰心！他们为革命而流了多少热血，奋不顾身的杀贼，并没有违反了如先生所说的话，我们不在战场上的人，应该如何勉励他们，赞扬他们，何苦来说这些话，使他们发生了“我们打仗是盲目的么”？“我们不服从民众和党的制裁么？”“我们治了党么？”的感想，随着灰心与丧气齐来？

余外还有点意见，就是先生如见革命军北伐行动上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还是如静江先生所说，以“函电相绳”好些。如“决非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也要请先生慎重一点，免得生出为革命而反有碍了革命！

王纯礼于虎门营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91期）

陈独秀致蒋希曾

希曾先生：

手示敬悉。“救党运动”，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但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不过从事此运动须认清事实，要将党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状况中救出，不可将党从日渐革命化的状况中救回老家！右派先生们目睹党日渐革命化，大感“亡党”之痛，起而做救党运动，这一救却糟了！邹、谢等方在上海为日本帝国主义

办《江南晚报》，先生倘见此报，当益增感慨。凡是革命分子，即偶涉迷途，终必省悟，先生即其一例。《美洲评论》尚未见过，能赐寄一读否？恽、于诸君俟见面时再询及先生的意见。国内革命工作需人甚急，先生不必久留海外。

独秀（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蒋希曾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道鉴：

（前略）^①曾于民国十四年加入国民党，惟加入以后，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不甚清楚，因而义愤填胸，与邹海滨张溥泉谢慧生先生等从事于教党运动；而今思之，不值一笑，种种前情具述于拙著之美洲评论中。惟一向不识先生之通信处，无法请教，恐盲人瞎马，造孽更多。兹见“向导”所载之通信处，特试写数行，如果此信得达，务望先生拨冗手赐数行，指教一切。恽代英于树德宛希伊王一飞诸位，熟悉愚之已往，二月以前已写信与以上各位，未识曾为先生道及否？匆匆草此，余容后尽。

敬颂百福。

蒋希曾手上二月十一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92期）

^① 《向导》所刊原文如此。

陈独秀答沈滨祈、朱近赤

沈滨祈
朱近赤 先生：

你两位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而根本是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归趋，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及其前途。所以我们对于你两位的来信一并奉答。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

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上的说话，已经在根本上答复了你两位所提出的问题。以下再就来信所举的具体事件，略略申说几句。

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营业，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上是答复沈先生的话。

朱先生的说话，有许多我们不能懂得。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当然不能解决全民的痛苦，因为全民中之军阀、官僚、买办、劣绅、土豪的痛苦，各被压迫剥削阶级似乎没有为他们来解决之必要。先生主张要解决“全民”的痛苦吗？赶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学佛罢！你断定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必压迫农工群众，我们以为不一定如此，必须国民党完全变成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工贼的集团才会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方

法不是目的，共产党之目的是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将崩溃的现代，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犹未垄断全产业界资产阶级势力犹未强固的中国，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正是国民党极右派的主张，他们正是恐怕国民革命之前途，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势力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他们因此宁愿意让资产阶级结合买办、官僚、土豪、劣绅、流氓等，以造成帝国主义能够仍旧统治中国的政治环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离开了共产党，才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色彩，才没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国民革命。凡是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们（国民党极右派）走一条路，他将来必然背叛国民革命，因为他已经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急须要做的事——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

独秀（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沈滨祈致陈独秀

记者先生：

“国民革命之归趋”的问题，据李达先生在他的大著《现代社会学》里说：“……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功，必归着于国家资本

主义也。”“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也，列宁已先言之矣。”“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将来可以和平达于社会主义，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则在进化过程中，必更有经历一度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国今日一般人对于产业政策之见解，多主张采用劳资协调主义，期以社会政策，节制资本。”

“然社会政策，苟可实行，则国家资本主义亦可实行，与其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引起将来之阶级斗争，不如径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之为愈也。”

李先生的主张，是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直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我是很赞成的，未知在事实上，可以行得去否？谨以一百二十分的敬意请求你很详细的解释！

敬祝努力！

沈滨祈于国大宿舍三月三十一日

朱近赤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自始就相信共产主义，我虽不曾加入共产党，然我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却不曾稍懈。我以为现在中国的革命，国民革命，不过是达到共产革命的一种过程。固然我们要努力国民革命，以期达到共产革命。我们却不可说中国所需要的便只是国民革命。尤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决不能真正解决了我们全民的痛苦。我相信民主独裁实现后，就是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将来压迫我们农工群众，必更高明而且利害。那时，我们不继续共产

革命，不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能够解除我们大多数工农群众的痛苦吗？！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党里许多新兴的军阀，便无时无刻不想设法压迫工农运动呵！今日读报载先生与汪先生联名宣言，殊使我疑惑，宣言上一则曰，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再则曰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不会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又曰中国所需要的是建设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照先生的说法，中国的革命，并不是需要共产革命，尤其不需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需要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然则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要组织共产党，一方面促成国民革命，一方面依然宣传共产主义？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不好了吗？鄙人不敏，窃有疑焉，愿先生明以教之！

朱近赤 四月五日

（原载《向导》周报第193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陈独秀致中国国民党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

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么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士兵、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因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

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97期）

一九二九年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在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体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

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因此，我们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计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 秀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录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

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

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则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

① 《中国革命和机会主义》（1929年10月印）中收录的原文如此。

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统传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

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題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像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

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是革命

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

“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它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

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像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

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

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对于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坚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

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它到来解决，因为它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华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

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像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

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它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

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谗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谟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

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于政治的行动”（《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

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更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

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

的党在那里！？

十一、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 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文中几个完全造谣的地方，略加了短注——编者。^①

（录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剴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

① 此处的“编者”为《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

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方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象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话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

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析，‘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点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吗？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

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析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析的话再向中央解析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象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哪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象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

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到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

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何等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

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析？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透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敬礼

独 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录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一九三一年

托洛斯基致陈独秀

亲爱的陈独秀同志：

为了时间经济起见，我用俄文给您写信，希望您不难找到翻译的人。我很想学习中文，单单为了能阅读您关于中国经济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作品的第一卷已经收到，谢谢^①！同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由此见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由于您在统计表上加了标记，其中某几张表我竟能领会它们的意思。这使我觉得极其开心。

在最近一星期内我写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苏联问题的一个政纲草案，兹随信寄上。假若中国同志能将它译成中文，并尽快告诉我你们的批评意见，我将极感愉快。

我于×月×日关于中国各反对派小组〔组〕织统一问题以及左派反对派内部生活问题写给您和其他中国同志的信^②，不知有否收到。我很久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消息了，以致完全不知中国

① 原译者注：“陈独秀似乎根本不曾有过专门的经济著作。信中所指的书，据我猜测，多半是一期《无产者》杂志，其中可能有一篇陈独秀写的讲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

② 原译者注：“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的信，《答中国反对派》。”

反对派的目前情形。我急不及待地等候您比较详细的来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托 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选自《托洛斯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陈独秀致蔡元培

子民先生函文：

在报上见先生病后已复康宁，至为喜慰。兹特恳者，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放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顷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专此敬祝

道安

独秀手叩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蔡元培

子民先生赐鉴：

敬启者。比月以来得晤海门陈训丹先生，与谈文字学，甚为

快慰。陈先生于此道颇有深造，且多创见，独秀以能时与晤教为乐，陈君亦以居通州太孤寂，思来京获得友朋商榷之机会。因此日前曾言之于志希①、孟真②二兄，为寻一相当职业，使陈君得以寄居京中。闻中大及史语研究所目前均无法可设，故特陈情于先生，倘研究院其他部门或教部之图书馆及编审方面，如有可谋，请先生为之一言，使陈君有居京研究之机，则独秀之所渴望也。此上敬祝健康

独秀拜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

(据手札)

① 志希，罗家伦的字。

② 孟真，傅斯年的字。

一九三二年

陈独秀致蔡元培^①

子民先生赐鉴：

兹特愚者，皖人濮君，留学日本返国后，历就沪、皖教职，独秀来南京方有缘聚首。一年以来，多承其照料接济，谊至可感。兹已失业，事畜维艰，更无余力惠及故人。独秀欲为尽力，奈处境如斯，开户无门。惟念先生关爱素切，特为濮君事作书介绍于座前，至希进而教之，倘有机缘能得一相当位置，则加惠于濮君者，即亦加惠于独秀也。濮君与独秀只乡友，并无政治关系，此层请先生勿以为虑。

专此敬颂 起居百益。

独秀手上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贱恙时益时发，亦是肠胃的常态。近日令亲周仲奇先生来赐诊治，（金家凤兄介绍），颇见效。知 注特以奉闻。

^① 此信信封上注有“霞飞坊七十二号柏烈武先生转，为濮君介绍于中大罗志希、暨大沈鹏飞、商学院裴复恒诸校长”等几行字。

陈独秀致胡适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牛兰*现在即是这样的生活），不象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果能得着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书看以销磨光阴。梦麟先生前曾送来几部小说，惟弟近来对于小说实无丝毫兴趣，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罢！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

* 1931年8月，瑞士共产党人牛兰在上海为蒋介石特务逮捕。

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此祝

健康！

梦麟、孟真、叔雅、启明、兼士及其他友好，均请代为道念。

弟仲白 十二月一日

回信望寄段书治兄转下，他常来此探视。

叔雅兄所著《淮南集解》，望他能觅一部送我。又白。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一九三五年

陈独秀致胡适^①

适之兄：

由书治兄转来信及稿均收到。闻此稿费已付帐，如释重负，请转达云五先生致谢，千万。此稿改好交何人转致他，并求询明示知！（弟常向此间商务分馆购书，不知可否交那里转云五先生？）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倘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即确能出版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乞便中转达此意于云五先生。

兄南游中，此间颇有谣言，兄应有纪行一文公表，平心静气描写经过，实有必要。弟私心揣测，兄演词或有不妥处，然圣人之徒不过借口于此，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先觉耳！

此祝

著安

弟仲甫启 二月十四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者注，此信寄自南京。

一九三七年

陈独秀致陶亢德·①

亢德先生：

（前略）②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下略）③

独 秀

七月八日

（录自《古今》月刊第8期）

陈独秀致申报馆编辑部④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

• 此信信纸上有“江苏第一监狱第二科发受书信查讫”印章。

① 陶亢德，《宇宙风》刊物的编辑者兼发行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曾于该刊第51号52号53号刊载《实庵自传》。

②③ 《古今》月刊刊载原文如此。

④ 据查《申报》，此信未见公开发表。

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迨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无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

（据《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陈独秀致亢德^{*}

亢德先生：

（前略）^①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

* 此信寄自武昌。

① 《古今》月刊刊载原文如此。

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既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率陈乞恕。

独 秀 十一月三日

（录自《古今》月刊第8期）

陈独秀致陈其昌

璠昌弄诸兄鉴：

璠兄十月十四十七两信早已收到。十六日信并猴子的信与做书计划，亦早收到（廿日的信也收到）。他所拟做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现在能这样耐心的做书，真使我不敢不赞一词，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回他这样的话，未免使他扫兴，然而实在无可回答也。璠兄的婚事，我闻之且喜且忧，喜的是得着意外的良缘，忧的是他将来的生活。圃兄来此已一星期，日内或将到湖南去教书。我不愿在此久居，亦不能久居，去处尚未能定，因天

下老鸦一样黑也。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国，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璠兄说别人是宗教徒，现在大概也受了宗教的传染而不自觉了！弄兄十一月二日收到，璠弄和俊昌意见或微有不同，根本仍是一样，即是不懂得此次战争的意义，超林则走得更远，根本和你们仍是相同的，即是把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对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人，终会抓住现实。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关于老彭和长子，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香兄来信亦收到。昌兄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三日的信及英文信均收到，是事无法可设，我也不愿设法，恐怕出力不讨好，前次罗君就是一个殷鉴，报馆所记自多失实，《申报》访问记，我未见着，能寄我一看吗？此种事太多了，无从预防，也无法更正，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将来有我自己写的文章书物为证。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

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此祝健康。

弟

仲 手 启

一九三七、十一、二十一

（录自《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一九三八年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

“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①，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②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谈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为，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

① 剑英，即叶剑英。博古，即秦邦宪。

② 必武，即董必武。

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三月十七日。

一九三八年

（录自《血路》周刊一九三八年第十二期）

一九三九年

陈独秀致托洛斯基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在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

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的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的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了。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于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

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愈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和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和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九年×月

（录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致杨朋升^①

朋升先生：

四月二十九日手教敬悉。弟遭丧非谣，前有一函寄先生及觉玄兄，述丧中不便为刘启明君为文写字，想未达兄也。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刘君所囑，迟至此期，方能报命，晤时请代达鄙意！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夏间拟至嘉定左近觅一清凉地居住，但未悉能否如愿耳。

此祝

大安 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阅报知成都于十一日被炸，尊居如何，立盼来示报我以平

^① 时在成都国民党某部为官，余不详。陈独秀入川后，俩人始相识。陈独秀晚年在川四年中，杨朋升在生活上，尤其在经济上，给予很多帮助。

安！敌机赴渝蓉者往往通过江津，居民闻声，未免惊恐也。

此祝

平安 夫人均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

信封背面书：倘朋升先生不在成都，即交夫人拆阅赐复！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上月十一日成都遭敌轰炸后，即上一函询候平安，至今未获复书，不知此函达否？抑先生因事公出不在成都也？倘见此信，希即示复，以慰悬念。 此祝

健康 夫人统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郑学稼^①

学稼兄左右：

前函谅达。渝市近日迭遭轰炸，北碚想无恙也。李生宗荃承

^① 时为复旦大学教授，1938年与陈独秀相识，交往甚密，因有甚是托派组织成员的说法，而郑本人否认。

兄帮忙，考取复旦会计系备取第四名，尚求吾兄鼎力为之特别设法补入正取，则吾兄始终成全之力，李生家庭及弟均不胜感谢也。闻观音岩张家一花园已炸烧为平地，顷又闻南岸袁家花园亦被炸，不知农山兄及其夫人平安否？希即示知。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

(据《传记文学》30卷5号)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承转寄某先生所赠陆百圆，如数收到，即希代为道谢。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近日两寄手教，快慰之至！六月之炸倘先生及夫人均在成

都，恐不能幸免，此真吉人天相之也。成都颇大，敌机势不能遍炸，倘非军政机关及繁盛商场所存在，总可幸免。尊居西顺城街倘与此等地带相连，似宜移居小城守偏僻之地，慎毋说敌机炸过之地不再炸也。弟移居江津之鹤山坪已数月，离城二十余里，敌机过境百余次，有时并其声亦不闻之，近以交通太不便，拟移居县城对岸，然尚未大定也。和平当是尊夫人雅号，弟竟不能确切记忆，罪甚！杨子毅不知何人，清音阁即其别号耶？日内如得短句即写寄。 敬祝

健康 夫人统此未另

弟独秀叩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二日手教敬悉。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西顺城街既近商场，似以移居为是，炸死固痛快，残废未免麻烦也。至少夫人及女公子必须迁居，或仍住青城。弟前在北大时，有一英文教员亦名杨子毅，故尔一问。久欲游成都，惟以其地拔海过高，不宜于弟之血压，恐终不果行也。 此祝

健康 夫人统此候安 恕未另启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前寄十一月二十二日手教并附嫂夫人所赐画笺，感谢之至！久未作复者，因贱恙加剧，近始略平也。尊居新迁骡马市街，门牌不知，故此函仍寄顺城街，未审邮员能转送到否？

倘能因公到川南，甚望枉江津一晤，惟弟住在离城二十里之鹤山坪，驾倘临江津，求先期示知，以便如期入城相见也。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二三星期，此时期先生如到渝，到国府致乐庐一问章行严兄即知弟住在何处。

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候安 恕未另启

寄上拙诗《告少年》一篇，乞正！

弟独秀手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据手札)

一九四〇年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由行严兄转来十五日二十二日两次惠书均读悉。弟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承公垂念，感何如之！本月四日即移居城中，惟以医生下月初由歌乐山抵渝市开诊，故至今迟迟未行，现已决于三五日内由此赴渝，抵渝即直住宽仁医院，住一二星期即仍回江津。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友好皆未见如我，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吾兄盛意，心感之而已。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公为行严所刻印章样本已为转去。

行严兄已移居中三路聚兴新村五号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弟已于六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二号病室就诊，拟住院旬日，出院后住友人处旬日，即仍返江津。出院后住何处尚未定，留渝期间，兄有信来，寄中三路聚兴新村章行严君处转下可也。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安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 二月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弟来渝住医院二星期，病稍减轻，根治仍在静养。此间嚣烦，不可久居，明日即起身回江津，赐示望仍寄江津县大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邓仲纯先生转交，不误。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 二月十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在渝病院中曾寄上二函，已达左右否？渝市医院，不易（宜）久居，弟已（于）昨日午后三时回抵江津，乘船八小时，病势并未增剧，想已稍稍轻减矣。知注特闻。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回江津后即上一函，谅已收到，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谢字亦不敢出口也。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此次赐函中有容后面罄之说，岂最近有东游之机会耶？ 又
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西流^①等

第三国际过去反法西斯的口号并没有错，他错在以不通的“人民阵线”“反侵略阵线”等口号，凭空做联合布尔政府的梦，而不是组织国际普罗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他们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赞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大译其列宁反对一九一四年大战的论文，天天高喊此次战争是上次大战的重演，即双方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为了维护其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而战争。“动向月刊”竟做了他们的应声虫，在这一理论上，我竟看不出中国托派与史派之区别。列宁对一九一四年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之收效，是由于帝国主义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约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

^① 西流：即侯清泉，托派组织成员之一。

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一九一四年大战之现存结论，也应该用自己的脑子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对于像欧洲大战这样大的事变，不能观察其活的环境与特质，而视为历史重演，以背诵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经验与理论了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乃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特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现在又有人把列宁当年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无论他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希特勒，英法虽不是被压迫的普鲁士，但希特勒却是横行欧洲的拿破仑第三，而不是威廉第二；因此，不但在德国，即英法普罗政党固不应采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却应该采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号。今天的武器和交通和以前的大大的不同了，英法的国内战争即令能够成功，倘在希特勒倾覆以前，革命新政权的命运决不能象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样幸免了！吾兄来信也说：“如果法西斯胜利，人类将有沦于浩劫，因此应尽力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这话对极了。但怎样阻止法西斯胜利呢？我认为只有希特勒对英法战争的失利，和以前拿破仑第三战败一样，引起国内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若在英法取失败主义，只有促成人类浩劫，胜利的自然还是希特勒，固然不是英法政府，也不是英法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若谓交战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者，工人都应该反对，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白朗宁同样看待，把国社党与社会党同样看待一样的错误，这样不分轻重皂白的错误。以前因此帮助了希特勒在国内成功，现在又会因此帮助希特勒在国际成功，普罗固然要准备明天，可是今天应该做什

么？今天已经在战争啊！赞助希特勒或反对希特勒，事实上，理论上都不能含糊两可，反对希特勒，便不应同时打倒希特勒的敌人，否则所谓反对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胜利，都是一句空话。尊意如何？尚望详示。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二

……前函意有未尽者，兹再陈述如下，弟有二信念：（一）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二）现在德俄两国社会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我根据以上的见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而且事实上，印度一旦脱离了英国，必然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使希特勒对英取得决定的胜利，这不是反动是什么？我这一意见，不但连根兄见之骇然，即兄等亦未必认为宜慎重考虑，因为和我们脑中以前所学习的公式太冲突了。此信亦望转寄连根兄一阅，并前函一并抄给×兄，那便更好。……

四月廿四日

反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的大斗争，不是由于民众，而是由英法对德战争这一较好的形式，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耻辱，若再空谈高调，使国社主义获得胜利，那便是耻辱罪恶！又及。

三

……关于你对欧战的意见，答复如下：你对于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把平日所持对于民主和苏联的意见推翻了，还免不了为现存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即是为列宁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未能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即犯了上次写给兄的两点之第一点，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马恩未见着，所以列宁不能袭用马恩对于普法战争之现成之理论；我们时代之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列宁未曾见着，我们也不能袭用他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上次大战的结果无论英败或德败，人类命运无甚变化，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我们能认清法西斯的胜利，能加速大众民主的实现吗？如果这样想，便是“死狗”在德国希特勒登台前之荒谬见解之重复，我们能假定此时能在英法号召国内革命来答复法西斯吗？我看客观上的条件没有一点使我们能够这样轻率的假定，这样的假定除了帮助希特勒和“死狗”以外，没有别的效果。以前有许多人不要国民会议，只要苏维埃，我曾问他们，苏维埃诚然好过国民会议，但将怎样走向苏维埃？兄现在说：“我们不能忘记大众的民主”，我也要问你：“你只是不要忘记没有用，将怎样走向大众的民主”？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是大众民主运动的制动机。即以中国问题而论，英法若是败了，中国不外日俄两国统治，若英法胜了，全世界法西斯运动破产，当然恢复东西旧秩序，其影响于中国国内政治，也可想而知，我们能做比此更好更美丽的梦吗？以前，第三国际在国内的口号是“人民阵线”，在国际的口号是“和平

阵线”，“民主阵线”这一口号很少用，即各国党曾经用过，我不能承认那是不对的，因为根本苏联不民主，各民主国又未曾有和希特勒决战的表现，那时拿民主阵线这一礼物，从事联欢英美政策，以为各民主国内民众斗争的制动机，这和现在各民主国向希特勒开炮时他们不采用民主阵线政策，最后都是错误的。至于此次拥护民主，不能和上次大战中拥护民主相比，因为上次大战尚没有法西斯的问题，上文已详释过了，余详前次为此问题写的信，可以参看，此信和前写老×的信，均望寄××一阅，免弟重写，兄和我在数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这次不是○×兄所谓感情用事）谁来推翻它，我们都赞成，兄已忘了吗？我现在说，老实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奴隶……①

（录自《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前由行严转来赐款，即复呈一函，谅已收览。顷又得三月二十日手教，并信笺信封，屡承厚赐，何以报之！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②，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承示为尊府君志墓，敢不用命，请即将行述寄来，以

① 致西流三信中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此处蔡先生指蔡元培。蔡于是年三月五日在香港九龙病逝。

便乘精神稍佳时，拟稿呈兄修正。拟寻何人书，亦望赐知。此复
敬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问候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

前在渝乞白寿良君为刻印章，白文颇生动，附上一阅。又
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①

朋升先生：

顷接二十二夜垂询之函，至谢！此间自二十二日至今日，九天中□□□□皆有警报，此外□□□□□□□□所幸敌机皆掠造境而过，城中未见敌机，更无被炸之事，不知蓉市何以有此误报也？尊处想尚平安。此祝

先生及嫂夫人一切安恭！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据手札)

① 此信系明信片。

陈独秀致杨朋升^①

朋升老兄：

闻成都前昨两日被炸，兄处平安否，即希示知！城中天气渐热，弟已移回乡间，贱体如恒，知注特闻。此祝平安

弟独秀叩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

赐示乞仍寄原处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

报载成都数有空战，路人传言尤烈，日前匆据寄上一明信片，至今尚未获复书，尊寓平安否，至以为念，接此信请即回示数字，以慰悬念！夏来空袭恐多，天气又热，嫂夫人及女公子以移居青城数月为宜。刘启明君前囑弟书一联，早已寄去，至今未回复，不知收到否，晤时请代询之。此祝健安及平安 和平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

(据手札)

① 此信系明信片。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连日闻成都有警报，致函询问又不得复，正惶恐时，获读五月三十日手教，喜慰之至！闻青城极好，何必在乡间又筑屋，谅为久居计也。拙札草率不恭，竟蒙积藏，惭感无似。示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比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六月六日手教读悉。敌前炸成都郊外斑竹园，不知是何目的？敌机十二日炸渝时，闻掷下传单云将炸平蓉渝两市，比种愚计大言，诚不足谓，然日常轰炸必甚猛烈，嫂夫人应即日移居近蓉外如新都等县城，且可久居，比乡下安全而又方便也。孕妇

受惊恐易小产，切望即日迁移，万万勿犹豫！！！敌得直昌，距程益近，将来警报与紧急警报必相距不多时，孕妇临时向乡下跑警报，绝对不宜，愚者千虑之一得，望兄切勿忽视之！弟移居乡间（鹤山坪）已月余，李雅髯君回江津城时恐不能相遇也。鹤山坪在江津县城西南二十余里，此时尚平安，来示仍寄城中可以转到也。此祝健康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连根^①

……你们的意见一致，我都见着了，不得不力疾简单的复你数语：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人工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资产阶级民

^① 连根，托派组织成员之一。

主政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跟着学话。现在你又拿这一空洞名词做武器，来为希特勒攻打资产阶级民主的英美。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阶级作用不同，（帝国主义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只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法西斯则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根本铲除无产阶级组织与宣传）不懂得法西斯的经济制度比起英美帝国主义来，是由日渐国际化的局面，回转到国家化，自给自足的封建化，而认为只是简单的政治不同。政制是由它阶级的经济的推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以政制的表现而论，德意俄的格柏乌政治和英美法的议会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吗？第三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若一眼只望着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才能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够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

（参看与××的信），以上四种根由之总根由，还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自然科学的公式有时还可推翻，社会科学的公式更脆弱得多，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拿旧的公式当做万应丸，永久演绎的用在现时日益变动的复杂的事件上，自然牛头不对马嘴。

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都是侵略的强盗；实际上词句之间却暗

暗左袒希特勒，我细读你的信，不但在思想与死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进读“破晓”一小册子（破晓当然是根据托洛斯基的意见）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像这样为史大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态度还不明白吗？还说什么对两边都不左袒呢？“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理应合并了。如此你们以后再反对斯大林，便是无政治原则私人权位之争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所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构，谁能寻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你们的意见若无望改变，和死狗妥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如果依照你们的希望，（至少破晓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国连美国也失败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那时不与死狗妥协，还有何出路！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
我现在提出两个问题请兄答复：

（一）在纳粹威胁之下英法革命党，是用反纳粹口号能够集合力量，还是用反本国政府口号能够集合力量呢？

（二）假使现在德国内部有一种民主势力对纳粹起国内战争，你们主张同时一齐打倒，还是联合纳粹打倒民主派？或是如意因的主张同时冷淡呢？①

及 白

（录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及书信》）

① 此信中的所有删节号是原有的。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前日读六月三十日手示，知嫂夫人及女公子均已送往青城，至慰。惟嫂夫人将产，青城山中或不便，以能长居外县县城内为宜，尊意以为如何？七月二十四日成都有空战，尊寓想平安也。敝寓昨失窃，窃去衣被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为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弟拟求四个好友各写一个小斗方，四个女画家各画一小斗方，装成四条屏，以为纪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兄为写一小幅（纵横皆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则成为完璧矣。倘蒙许可，得书即将纸寄上（纸幅大小一致，故必由弟寄上）。

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安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

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渝南岸至多住一个

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不审此二城中兄有知友否？
又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前寄函乞为作书并拟求夫人为作画，至今未得复，不知曾达左右未？久未见报载敌机光顾成都，想府上一切平安也。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西流

西流兄左右：

日前寄上一函，内附超麟兄来信，想已达览，七月廿一日手示并守一兄的信已读悉，因病不能早复兄信，今犹如此。（此函陆续写了廿余日才写好，精神不佳可想。）望勿多疑！

来函谓：“他对民主的了解，和对于世界的局势过于乐观，我觉得还不免一些稚气”，我们所争论的中心点，正是这两种问题：（一）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二）应当保护民主。你既然认为他稚气，（其实是反动）又说他没有错，即你自己也感觉得有点自相矛盾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美，在此

点，资深和希之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会有革命的局势，其理由是：（一）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全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三）此时德国的武器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四）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可以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仍为法西斯政权，（此情势恰与英法相反）届时社民党及其他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革命，以无革命政党故。基于上述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这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什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以前认为白朗宁内阁和希特勒是一样的，因此帮助纳粹得了政权；现在又认为纳粹的德国和民主的英法是一样的，又帮助希特勒征服了有民主传统的法兰西。我还可进一步推论，如果人们仍旧轻视民主崇拜独裁像守一所说：“人类不管好坏，总只得抉择于法西斯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独裁之间”。换句话说只能抉择于德俄两种政制之间；那么，即使英法失败引起了革命，也只有使世界更加黑暗堕落和希特勒胜利一样。一个格柏乌的苏俄已足够使人们窒息了，再加上几个格柏乌的苏法苏英，你老兄能受得了么？如此，则必须详细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诚如守一所说：“我们中间主要的不同意见，还是在于民主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

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 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

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

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 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其余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

（所以东方需要民主，西方不需要民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即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第二必须取消刘仁静破产的理论，即：任何时期，任何事件，无产阶级都不能与别的阶级共同行动，这一理论，显然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能采用，在目前

国际战争中也同样不能采用，若采用这一理论，都只有反动作用。昌兄说：“在战争进行中之现在，民主与法西斯之显然界限已归消失，或将归消失”。这句话真莫名其妙！（一）在政制本身上，民主与法西斯绝对不同的界限永远不会消失；（二）若说其界限是指英法美等民主国日渐法西斯化，即令真是如此，也绝对不能据此以为我们应该欢迎独裁反对民主的理由；（三）英法美将来法西斯化，是要靠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帮助希特勒完全胜利，希特勒军队打到甚么地方，当然法西斯化到甚么地方，否则英法美的民主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推翻的，如果把战时的内阁权力加强当做是法西斯化，这便不懂得法西斯究竟是甚么；（四）若认为现在的民主国和法西斯之显然界限已归消失，请睁开眼睛看看下列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
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 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
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 思想、言论、出版相
当自由。

(五) 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为。

(三) 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
在。

(四) 思想、言论、出版绝对
不自由。

(五) 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
是犯罪。

据这张表，二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几时消失的呢？在法国是因何消失的呢？每个康民尼斯特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今后的革命若仍旧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那只有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并且即这种革命（？）亦无可能在英法失败后发生，你们主张在英法取失败主义的口号，到底是为了谁呢？史大林派很巧妙的第一步以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代替了反法西斯的口号，第二步便对英法美放冷箭以掩护法西斯；你们和他们取了同样的步骤，你们的第二步骤，在破晓及守一与我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守一等对大战的见解，是由于估计苏联性质及民主态度出发的，我皆与之相反，而彼此却都是一贯的，惟有你老兄对大战态度同意于守一等，对苏联与民主似乎还是和我接近，此真不可解。此函请抄给老赵及守一等。原函及前各函，均望寄还我，因为打算将来印出来。昌兄信附上，此祝健康！

弟仲白 一九四〇年九月

（摘自《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五日九日平信及五日（信中此日期恐有误，以此信尚言“蓉垣近半月来无警报”）航空挂号信，均读悉。尊翁墓志文，稍迟即当拟上请教。此间米价三十余元一斗，每斗六十斤，或较成都斗大。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计日嫂夫人已满月，谅已出医院住城外，但九里堤距蓉市太近，以稍远迁为宜也。收款复函附上，但称某先生而不及姓号者，虑彼有所忌避故，如此可乎？报载十二日成都西城又被炸，不知情形如何？近日连上两函，一附史表一份，一附宣纸一张及史表补文一纸，谅均已达到。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聩亦加剧耳。数闻人言中大医学院之臧君内科极好，现在成都，不知兄识之否？此祝健康 嫂夫人公子均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左右：

五日惠书敬悉。尊翁墓表属草寄上，表与志详略有殊，示下

事略，足用不嫌少，惟行文陋劣，希先生正之！关于年月日尤须详细审核，勿任讹舛。事略言尊翁生于光绪庚辰年，寻庚辰为光绪六年，以时间计之，亦当在此年，旁注乃谓为光绪二十几年，恐有误。光绪二十几年无庚辰。光绪帝在位只三十四年，距民国三年只六年。尊翁卒时断不止二十岁左右，且先生生于庚子乃光绪二十六年，岂有父子生年相差只数年之理耶？依中医之理，血压高乃阴不制阳，鹿茸益阳，服之乃以薪投火矣；西医视鹿茸为补品，高血压亦不宜补也。允赐书件，望早日惠下。此祝双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事略寄还，乞查收 又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

四日惠书敬悉。请行严写墓表事，已专函告之，并请其直接函复吾兄，纸及稿可即寄去，似不必候其回信，因此人疏懒异常，即肯写亦未必有回信，且稿必钞副寄去，恐不不写且将稿遗失也。适之字既不佳，且远在海外，托写亦不便也。弟求兄之书希望早日赐下，写时不必矜持，即随意如来函之字即大佳也。弟睡眠尚好，夜中小便只一二次，只手足畏寒，手部反畏热，贱恙非由血虚，血虚则患低血压矣，贱恙适与之相反，比正常血压高三四十

度，万不宜再服鹿茸矣。即兄服鹿茸亦必留意，至大便带血时则不可再服也。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候安公子等问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弟已移居城中，乡中天寒，盗又大炽，不可居久，来信仍寄此处。又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

前示囑函行严兄为尊翁书墓表，比即专函告之，不审其已有书抵兄否也？同时弟亦复兄一函，谅已达左右，乞兄之书，甚盼早日赐下。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昨接成都省立传染病院某医生来书，据云成都除房屋人工外，其他食用物价较重庆尤高昂，弟因此料想兄处月非五百元不能维持，或恐不只此，而收入未必有此数，弟尤为困难，不审何以应付之，拟否另设法谋生，便中乞示一、二，以免关怀。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兄左右：

前函谅达，不知纸及稿已寄行严否？昨日友人自渝来云行严面告他纸到必写。纸及稿倘尚未寄，盼即寄去，惟稿必钞副，恐其失去或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向兄索稿之事，因此人疏懒生活无秩序，自幼即如此，老来更习名士派，不可治矣。至于写，弟可担保其终必践约也。其旧居已毁于轰炸，方在修理中，暂居“通远门外两路口重庆村八号”，信件可寄此处。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据手札)

一九四一年

陈独秀致S和H

HS二先生：

与H先生别三年矣，与S先生更廿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叹！

顷见二位与Y兄书，于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谢之至。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路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为其陆稿荐出而嗜之，是迷信也；倘味道好，因其为陆稿荐出而弃之，此

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言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出，虽油印也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独秀

一月十九日（一九四一年）

（录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致 Y

Y兄：

兹附上致HS二君函，望与彼等通信时转去，……H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我辈最好与之讨论实际问题（历史的及现状的）使之无可逃遁，不必牵涉抽象的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免得缠夹不清也，陶孟和不是不懂，仲纯弄错了。……即祝
健康

弟独秀

一月十九日（一九四一年）

（录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承赐书条及白木耳并五日九日两函，均先后收到。拜谢，拜谢！

尊翁墓表行严虽应写，然其人过懒，倘日久不寄上，可示知，以便再函催也。物价如此高涨，吾兄每月亏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贱恙如旧，勿念。此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此函想正当旧历年关入览，敬贺元旦之喜。

又及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前寄二月二十六号挂号信，内附千元汇票一纸，信中未云此款作何用，即今已逾半月，尚未见来示说明，何耶？前为提大字联，曾否收到，来函亦未提及，尤为惶惑，此联寄出时，弟疏忽

未曾挂号，倘途中失去，将如何是好！此二事务求吾兄拨冗示知，至盼至祷！此祝健康 和平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有道：

四月三日手教读悉。久未作复，至歉。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书法又不足被之金石，吾兄何必定欲彼书之耶？谢无量君闻近在成都，兄必识之，彼为弟四十年前老友，晤时希告以弟之住处及近况，武昌别后，已数年不见矣。有泸县罗希成君，寄居成都之北郊，收藏颇富，有蜀石经一方，最驰名。吾兄如识其人，请转求赐拓片一纸见寄，是所望也。日来又有空袭，劲草园想平安无恙。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公子夏健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 五月二十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一月前曾寄上一函，烦兄问谢无量君消息及向某君乞蜀石经

拓本，至今未回复，不知收到否？阅报成都有敌机数至，然轰炸不烈，想尊寓悉平安也。专此敬祝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①

朋升先生左右：

久未通信，十余日前又寄上一函，亦未获复，先生身体安否？或因公他往乎？至以为念。接阅此信时，甚盼即复我数行，以慰远怀。

此祝

健康 夫人均此未另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前奉七月八日惠书，尚未作复，兹又接读七月二十四日来

^① 此信信封背面有书，倘朋升先生因事离蓉，即交夫人拆阅赐复。

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前求兄转向罗君觅取蜀石经拓片，已有所得未！敌机日来尚至成都，尊居在郊外，想平安也。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日前上一函内附有致晋公一短信，当已在此函之前达到。闻上月底蓉市被炸甚惨，尊寓究竟平安否，颇以为念；兹收阅转来罗希成君与吾兄书，乃由防空司令部代发，又非吾（兄）笔迹，更滋疑虑，得此信望即复数行，以释远怀。

此祝

健康 嫂夫人统此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八月三日夜、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灯下，三函均诵悉。兄所书联，寄到即为题识，但虑拙笔有辱尊命耳。蓉城大劫，尊寓竟平安，至慰，至慰！江驛城及白沙镇，曾各落一弹，非有意轰炸也。仆寓离城二十余里，想无妨碍。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邪？罗希成君之石经拓片想尚未医至兄处也，谢无量兄近日见面否？专此敬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①

实物税只能解决军食问题，于民众绝无好影响。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先生：

久未寄手教，正焦灼时，突于同日接收上月二十日二十四日

① 据此信信封，写信时间为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

二十五日三书，欣慰无似，并欣悉嫂夫人于上月十一日产一麟儿，兄似颇重生男，且母子平安，不得不遥为恭贺也。承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向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知！前在汉口，刘辅丞先生闻弟将入蜀，曾托弟之友人送弟川资五百元，存之笥篋中入蜀时始用之，今后亦将于赴蓉时动用某先生所赐也。被窃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赐刻篆章及拙稿则去如黄鹤矣！闻成都气候温暖，于高血压病颇相宜，惟以道路遥远，恐非病体所堪，即能到成都，亦只能居新都、郫等外县城，以跳（跑）警报绝对非贱恙所宜也。求书之纸，迟日即寄上。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前收某君赐款，比即寄复，又寄上拙作史表一份，想均已达左右矣。闻四五两日蓉市均遭空袭，计日嫂夫人产子尚未满月，尚在城中否？安否？寄上白纸一张，求大笔为书直幅。嫂夫人在产中，不便求画矣。史表油印时落一段，兹补印寄上。尊居离蓉市太近，何不移居郫县、新都等处耶？

敝寓离县城二十余里，暂颇安静，病亦如恒，望勿远念。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同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

久未寄书，谅尊况如旧也。章行严确已赴湘，写件已如约寄兄否？前托兄向罗君所求之拓片想尚未到手也。闻成都米价下跌，确否？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兄左右：

十一日手书诵悉，罗希成君赐石经拓片二纸亦收到，请代为

道谢！大书对联已率涂数字交邮寄上，想已达左右矣。此时弟居多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数倍，如何可支？为兄计，唯有出外做官（只有县长或管理粮食之职务，可以发大财），及移家出川（黔、湘、桂之生活费都比川省要少一半）二策。以弟之年力，此二策均不能行，惟有转乎沟壑已耳！

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郑学稼

学稼兄左右：

十四日手书敬悉。惠书所论尚多与鄙见微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对于《我的根本意见》尚未详阅也。此提纲式短文，乃为托派国内以至国外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因为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文，未能详细发挥，或不免为人所误解也。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仍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塞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塞维克与法西斯

为李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此间日前有传言兄在某校演说谓：“只有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读来书，尊兄似不如此，恐为传言之误也。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鄙意只有英美胜利，中国民族虽说不上解放，而政治经济才有发展希望。

（据《传记文学》30卷5号）

一九四二年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左右：

题兄大字联已于两月前寄上，拙作《韵表》寄上已近一月，均未获复，不审都收到否？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不知兄拟作何打算也，接此信！此祝

健康 嫂夫人均此

希即赐复

•••••

弟独秀叩

(一九四二年) 元月九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

朋升老兄：

读上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拙作《韵表》已入览，按尊函语气，大书对联似尚未收到，心中至为不安，以《韵表》遗失尚可补寄，对联倘有失，无以偿之也。所嘱之事本应尽力，奈一时想不出适当之人，以非于我于彼均为深交不便言之，或言之无效耳。兄就近乞晋公一言，岂非最适当耳。弟贵阳之行已决计作

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印谱叙文，因弟于此道过于外行，殊难着笔。兄尚有兴趣作花酒麻雀之游戏耶！此祝健康 和平嫂夫人及公子均此问好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 二月十二日

(据手札)

陈独秀致杨朋升^①

朋升先生左右：

三月十二日、二十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以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及此，且感且愧！弟于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寄命，不敢坚辞，百集成时，拟勉强书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拔海较高，于贱恙不宜，非为生活所迫。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疑伪作此言以慰我耳，倘真收到，请示以弟所题语句，则始能相信也，如何？此祝

健康 和平嫂夫人都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 四月五日

(据手札)

^① 收信人杨朋升在此信信封上书曰：“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悼悼何极。六月二十日”

陈独秀致Y

Y兄：

返校后来示敬悉，××带给你的江津日报，望寄给我，弟不愿送文章在该报登载，而×××已快走了。××已赴印度，前函已告兄，谅已收到了。兹送上一文（按：即《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前三文（按：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给二位老寡妇看后，可与×××一看，愿抄与否，由他们自便。需否抄一份给××××诸君看看，由兄决之。倘需抄一份给他们看，可寄给×××。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请人抄写不易，寄去他们也不会理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论世界大势）弟处已无存稿，望将原稿寄下。此祝

健康

弟独秀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录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文中两处“按”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编者按。